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元帅朱德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中国元帅朱德

1 中国第一帅朱德走上主席台，从毛泽东手中接过元帅军衔命令状和三枚一级勋章。刹那间，中南海怀仁堂掌声雷动

公元 1955 年 9 月。北京。

炎夏已经悄悄地溜走了，中南海古老的院墙里呈现出一片金色。树上的叶子开始转黄了，那是一种诱人的黄色。果实火红火红，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太液池”里的水不时地泛出片片银光；典雅的房舍，古朴的亭台，静静的草坪，茂密的松柏，和金果黄叶汇聚成一幅华丽的壁毯，使这处悠久的历史胜迹增添了无限的魅力。怀仁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在夕阳的辉映下，依然是那样古色古香，仿佛在向冬天的寒冷挑战。

朱德今年已经 69 岁了。

9 月 27 日下午，当朱德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前时，一股暖暖的热流从胸膛渐渐地往脸上涌，双眉跳动了一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今天下午，毛泽东要在怀仁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们授衔。

中南海，是我国金代的离宫，元代的皇宫，明清两代的行宫和御苑，随着星移斗转和沧桑变化，北京这一处世人瞩目的历史胜迹也改变了它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办公处所，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此居住、办公。怀仁堂原名佛照楼，建筑在仪銮殿的废墟上。仪銮殿被八国联军烧毁了，西太后逃难返亨以后，又建造了佛照楼。民国以后，佛照楼才改名为怀仁堂。有一首宫词：天半灯摇紫电流，玲珑殿阁仿欧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这就是指这座楼的建筑过程。建国以后，怀仁堂专作会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高国务会议等一些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今天，世人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怀仁堂内外喜气洋洋，连中南海也一改往日庄严宁静的气氛，显得熙熙攘攘，不时地传来阵阵欢笑声。

朱德已经穿上了一身海蓝色的元帅服，显得格外精神。朱德看一眼表，4 点多了。天边，淡淡的云，红红的霞，阳光渐渐柔和了。朱德昂首挺胸，向怀仁堂授衔会场走去。

怀仁堂前，陈列着 12 座兽首人身铜像，12 属相的牛虎犬蛇和景泰蓝铜狮。当朱德看到纪念碑时，忽然想起了 6 年前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景。那一次会议，代表们在怀仁堂里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大事。在闭幕式上，朱德满怀信心地在大会主席台上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6 年过去了，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防和军队建设都在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今天，党和国家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在领导战役军团作战中立有卓越功勋的人民解放军 10 位高级领导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军衔，就是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想到这里，戎马征战一辈子的朱德感到由衷的兴奋。

我们的总司令来咯！当朱德健步走进东休息室时，陈毅立刻站了起来。

休息室里，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谈笑风生，精神抖擞。各位早来了！朱德神采奕奕，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彭德怀、贺龙等人看见朱老总走进来，也纷纷站了起来。在多年南征北战中，朱德是总司令，也是共和国元帅中的长者。朱德出生于1886年，比刘伯承还大6岁，比贺龙大10岁。刘伯承今天没有到怀仁堂来。

免礼免礼，大家请坐！看见彭德怀等人先后站起来，朱德连忙做了个坐下的手势，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

陈毅走到朱德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乐呵呵地说，老总哎，你穿上这身行头好漂亮哟！比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陈毅转身要坐下，忽然看见身旁站着贺龙，又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贺老总，当初在南昌打第一枪时，想到了今天要成为元帅吗？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陈毅看到贺龙身上的元帅服，想起了南昌起义。

贺龙摸摸一字形黑髭须，颇有几分自豪地说：那时候一心想把第一枪打好，哪里能想到今天当元帅哟！

一说到南昌起义，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感慨万千。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耳朵，老师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去。哟，大家都穿上新衣服了，祝贺大家！是周恩来总理走进东休息室了。

叶剑英拱手相迎，说：周副主席来了。

看见周恩来，贺龙坦率地说：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授衔嘛！周恩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周恩来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公认的军事家。授予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的。贺龙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心愿。

周恩来听后，微笑着摆了摆手，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诸位元帅服务的，我给你们当好后勤嘛！周恩来习惯地把左手弯在胸前，显得那样随和、谦逊。周恩来那身灰色中山装在朱德、彭德怀等老师们的元帅服中间，格外引人注目。

一辆黑色吉姆轿车在怀仁堂前停住了。毛泽东下了车，微笑着向大家招手。今天，毛泽东依然是穿着那一身灰色中山装。

下午5时整，朱德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人一起，走上主席台。当时，朱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彭德怀、贺龙、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这四位元帅同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坐。

主席台正面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挂着国旗。元帅授衔会场庄严而肃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声音宏亮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开始！

军乐队立刻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气势磅礴的乐章在中南海上空回荡……

早在9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举行了第22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授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名单，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尤、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共和国第一次为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高级将领授予元帅军衔。

第22次人大常委会，不仅决定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还决定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4人分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今天，授衔与授勋同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同志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用高昂而富有激情的声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顿时，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站起来了，他要亲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授予多年跟随他浴血奋战的我军高级将领。在人大常委会上，有人提议给毛泽东主席授大元帅军衔，苏联不是也给斯大林授了大元帅军衔嘛！可是，毛泽东执意不肯。毛泽东谦逊地说：十个元帅，足够了！因此，已经准备好的大元帅肩章样品至今还陈列在兵工厂的展览室里。

在军乐队演奏《胜利进行曲》的乐章中，第一个接受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的是朱德。

朱德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再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元帅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毛泽东又伸出手来和朱德握手。朱德和毛泽东双目对视，握在一起的手微微颤抖。在井冈山会师时，朱德和毛泽东第一次握手至今已经整整28年了。28年来，人称“红军之父”的朱德和中国人民伟大的统帅毛泽东同舟共济，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今天，两位伟人的手又一次握在一起，彼此没有交谈，但千言万语却通过紧握的手在交流着……

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帅。

在朱德之后，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分别从毛泽东手中接过元帅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元帅们都在各自的战线独当一面，驰骋疆场，屡建奇功。今天，他们汇聚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祖国人民给予他们的崇高荣誉。年近70岁的朱德元帅，心情非常激动。

在整个授衔授勋仪式上，毛泽东的表情始终是严肃的。他用凝重的眼光向朱德、向祖国的英雄儿女们表示深切的感谢。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同元帅们的英勇奋斗分不开的。为了人民的胜利，他们忍受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为了人民的胜利，又有多少英雄悲壮地、默默地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难怪叶剑英说：要是叶挺还在，新四军就可以出两个元帅。

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在《胜利进行曲》的军乐声中结束了。参加典礼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部分军官，各军区、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共1300多人，先后离开了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八大元帅依旧留在怀仁堂。

怀仁堂前的草坪上摆开了一排排木桌，木桌上摆着丰盛的冷餐和水酒。

晚餐是自助餐，朱德元帅和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们一起，自拿碗碟，自己动手。

夕阳西下了。墨绿色的水面在霞光的照耀下，好象有无数片锦鳞在畅游；岸边垂柳依依，宛若仙境，中南海的傍晚格外迷人。周恩来端着酒杯来到朱德面前，亲切地说：朱老总，祝贺您。朱德急忙端起酒杯迎过去。

周恩来用热烈而激动的声音大声说：同志们，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们、将军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干杯！

在一片吹呼声中，朱德举起酒杯，将无限的幸福一饮而尽。

晚宴结束了。舞曲响起来了。

朱德元帅也抬头挺胸，欢快地跳起舞来。那舞姿，仿佛在行军作战……

这一年国庆节以后，人民军队正式佩带军衔肩章、符号，着新的制式服装。直到 1965 年，全军统一取消军衔。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国家授予军官以军衔，是国家给予各级军官的荣誉，同时是国家给予各级军官重大的政治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和国家对军人正规奖励制度的实施，将鼓舞全体军人和军官更高度地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保卫祖国、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红军之父”的功勋：南昌花园角二号， 朱德与周恩来密谈：何时打响第一枪

南昌起义前夕，朱德是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住在南昌百花洲畔的花园角2号。这里，留下了朱德元帅光辉的一页。

百花洲，一个多么动听的名字。它在南昌市状元桥和三道桥之间的东湖一带，原来这里是水泽之乡，被东湖之水环抱。南宋绍兴年间，豫章节度使张澄在这里建造讲武亭，训练水军，因而有“水木清华”、“约鸥榭”等景点。讲武亭北面，迭石成峰，土阜孤耸，亭峙其巅，称为“冠鳌亭”。百花洲风景迷人，晚唐诗诗人杜牧、宋代词家辛弃疾都留下了描绘百花洲旖旎风光的动人词章。朱德寓居百花洲畔以后，常到讲武亭旁散步。

百花洲，也是朱德谋划举行南昌起义的重要场所，是元帅军事生涯中的重要一站。

朱德元帅是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朱德元帅英勇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朱帅力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卓越的功勋是在军事领域。

朱德元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最重要的一名助手。“朱毛”的英名远播四海，举世皆知，人称朱德元帅是“红军之父”。

早在1916年，朱德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战斗中以少胜多，就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变幻莫测的讨伐战争中，有时候友军在战场上处于劣势，但是，每当朱旅长赶到，把绣有“朱”字的旗帜往阵地上一插，马上军心振奋，敌人往往见“朱”字旗而闻风丧胆，从而迅速扭转战局。朱德的威名已经对敌人产生了震慑作用。

1927年1月，朱德来到南昌，加入了朱培德的军队。朱培德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1911年参加了蔡愕领导的云南新军起义。1921年5月，朱培德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1925年，朱培德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及第三军军长。北伐战争开始后，朱培德又积极在江西发展力量。朱德来到江西以后，很快被朱培德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长。这两个职务，朱德一直担任到南昌起义爆发。

朱德的声望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南昌军校校长这两个职务，对于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产生了重要作用。1936年，朱德在回忆南昌起义时说：“我参加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举为起事中组成的新九军副军长”。

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异常严峻的时刻举行的，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1927年春夏，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到长江流域的重要关头，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先生制定的革命政策，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朱德认识到，“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北伐军中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清洗出来了，不能立足。为了挽救革命，也是由于形势所迫，再不起义不行了，党才决定

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起义”。

南昌的盛夏，酷热难当。大街上，宿舍里，处处干燥，处处憋闷，使人喘不出气。7月27日傍晚，朱德回到家里，脱了上衣，拿起毛巾擦了一把汗，忽然听到几声有节奏的敲门声。朱德脑海里打了个问号：谁呢？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呀！朱德警觉地瞟了一眼刚刚挂在墙上的那支手枪，转身去开门。

恩来，是你？朱德又惊又喜，一把把周恩来拉进屋，又是递扇子又是倒水，笑嘻嘻地问：恩来呀，路上还安全吧！大革命失败以后，南昌处于国民党势力的控制之下，周恩来是由陈赓陪同，从九江秘密赶到南昌的。陈赓曾经在北伐战争中救了蒋介石的命，因而多了一张“护身符”。

朱德同周恩来是老朋友了。早在1922年9月，朱德在德国留学期间，就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是中共旅欧组织的领导人。朱德就是在1922年11月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不久，朱德就和周恩来分手了。离别5年之后，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危急时刻，两位战友在南昌相遇，朱德和周恩来都感到格外兴奋。

周恩来又累又渴，连喝了两杯水，十分认真地说：玉阶，组织上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你也做些准备工作。

朱德一听，两道浓眉跳动了一下，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再不起义不行了。我们要尽快行动，一切都要赶在敌人前面。说着，朱德连忙摊开地图，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南昌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

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以来，南昌反动势力的活动日益加剧。蒋介石在庐山秘密指使段锡明、周利生、程天放等人成立的反动组织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已经控制了南昌的国民党所有军政机关和一些群众团体。南昌街上到处都有岗哨，国民党党校学生和南昌卫戍司令部的侦察队不分青红皂白，任意盘查行人；巡查大队从早到晚到处抓人，行人出入城门、上下码头、住宿旅馆，也会遭到严密的盘查和刁难，稍有可疑，就遭逮捕，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青年都被敌人抓起来了，第三军炮兵团也因被怀疑有共产党活动而被调到南昌城外，其中一些人已经受到监视。南昌军官教育团党代表魏瑾钧等人也被捕了。朱德自己被迫于6月下旬离开南昌，但20多天后，朱德根据党的指示，又返回南昌，利用滇军中的老关系老部下作掩护，领导军官教育团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今天见到周恩来，朱德在讲完南昌城内城外的敌情以后，特别提出：张发奎这个人不太可靠。

周恩来点点头。在九江的时候，周恩来就知道了张发奎曾经于7月24日正式通知叶挺和贺龙，要叶挺、贺龙把所辖部队调到德安集中以后，立刻赶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只是由于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在庐山召开的军事会议要“清共”的内幕以后，立刻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商定叶挺、贺龙不去庐山开会，带部队乘火车赶赴南昌，才遏制了事态的恶化。张发奎这个人曾经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的警卫团营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以第十二师师长的身份率部参加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及攻克武昌的战斗，立下了战功，1927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和他指挥的第四军一度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的依靠对象。但是，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以

后，张发奎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后来发展到率领反动军队镇压南昌起义。周恩来当时对张发奎的行动已有觉察，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周恩来对朱德说：玉阶呀，南昌的形势同全国一样，越来越险恶。何时举行起义，中央还没有最后决定，你这里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周恩来说完，站起来要走。

朱德说，恩来，你就住在我这里吧，你出去不方便呀！

周恩来笑着点点头，说：有你这个公安局长关照，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好吧，我就住在花园角2号。周恩来忽然凑近朱德的耳根，神秘地说：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朱德目送周恩来远去。朱德在南昌的活动受限制较少。南昌第三军的部队虽然属于蒋介石统辖，但是由于江西那个时期属于武汉政府领导，宁汉对抗以后，江西方面也下敢公开反动。朱德身兼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两职，在滇军中影响大，南昌城里的许多中上层军官，都是朱德以前的平级同僚，因而没有人公开干涉朱德的活动，这是朱德组织策划南昌起义特有的有利条件。周恩来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也是在7月27日这一天，叶挺、贺龙等人先后来到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这是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共有96个房间。7月下旬，江西大旅社被一支军队包下来了。27日，参加组织领导南昌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在江西大旅社喜庆厅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这次会议还决定在7月30日晚上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统一指挥起义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为了及时商讨起义中可能出现的有关问题，成立了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

南昌，这个被古人王勃称作“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方，正在酝酿着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

南昌，即将成为中国政治与军事的热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诞生地。

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的或者影响比较大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共有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是在打下武昌以后由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的。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经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驻守在九江和九江与南昌之间，加上由朱德指挥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南昌附近的革命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两万人以上。而武汉国民政府朱培德率领的第五方面军离南昌较远，该方面军的第三军位于樟树镇（今清江）、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主力部署在进贤、临川地区。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也在九江附近，第六军主力则在从萍乡向南昌开进的途中。南昌城附近，实际上只有敌第五方面军的警备团，第三、第九军各一部和第六军的第五十三团，总共只有3000来人。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的军队在南昌占有绝对优势，有把握在敌人的援兵赶到之前夺取南昌城，取得起义胜利。

贺龙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局恩来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指挥部，把举行南昌起义的行动计划告诉贺龙时，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

完全听共产党的话，你们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由于朱德对南昌城内外的情况了如指掌，前敌委员会要求朱德随时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的部队的情况，无论是支持起义还是反对起义的情况，都要摸清楚。朱德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举行武装起义更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积极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时，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突然于7月29日上午接连从九江发出两封急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到我到后再作决定。”张国焘参加了7月26日举行的中央常委会，会后到前方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事前，中共中央曾经打电报给共产国际，提出要在中国进行武装起义。共产国际表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否则就不要暴动，把军队中的同志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张国焘这才给南昌发来两封急电。

在朱德等人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南昌的反动势力也磨刀霍霍。形势已经发展到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等人决定，起义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暴动决不能停止。

30日早晨，张国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周恩来见了张国焘以后，立即召集前委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电报当“圣旨”，极力主张拉拢张发奎，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以后才可以举行暴动；否则不能举行暴动。

李立三一听，火气不打一处来，冲着张国焘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哪能现在还讨论？发一道命令，暴动就是了。

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论张发奎的态度如何，我们还是干。前委的几名成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经受到汪精卫的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暴动计划。我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靠张发奎。

张国焘见大家都反对他的意见，脸一沉，说：我说的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是中央的意见。

一听这话，平时很温和的周恩来只觉得有一股心火直往上窜，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是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说话时，周恩来气得把桌子拍得啪啪响。

谭平山也火了，大喊一声：来人，把张国焘绑起来。话音刚落，门口冲进来几个卫兵。周恩来一见，连忙制止说：不不，你们出去。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周恩来这时候已经渐渐冷静下来了。

这次会议争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最终改变了主意，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前敌委员会决定在31日晚上举行暴动。

7月31日下午，各项准备进入最后阶段。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起义领导人分头传达了党中央和前委的决定。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件意外情况发生了，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云南籍姓赵的副营长接到命令后，偷偷跑到敌人指挥部去告密，起义部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在举行南昌起义的关键时刻，朱德立了大功。

朱德想，在南昌举行暴动，教育团应该发挥主要作用。谁知滇军方面突然下达了一份命令，军官教育团的1300多名学员提前毕业，全部送到第三军军部，再分配到各部队，并且要求朱德主持毕业典礼。朱德一看命令，就知

道这是滇军司令要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不希望把这 1300 多学员留在南昌城里。于是，朱德就同周恩来秘密联系。首先在教育团紧张地开展工作。

教育团的枪枝平时就不多，一、二营平均每两个人只有一枝枪，三营更可怜，每个连只有十来枝枪，枪枝的种类也比较复杂。朱德果断采取措施，使这些枪枝都掌握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手里。一、二营的部分学员分配出去以后，朱德又给留团人员专门配备了枪枝。

为了锻炼教育团，提高教育团官兵的应变能力，起义前夕，朱德两次下达命令，把教育团拉到南昌城外进行演练。晚上，朱德又亲自组织了几次紧急集合，练习传口令、识别记号等动作。通过这几次紧张的演练，朱德和教育团的官兵进一步熟悉了南昌市的主要街道，察看了南昌市周围的地形地物及其主要通道。在这两次打野外中，教育团官兵利用地形地物很认真，执行命令也很坚决。

31 日晚上，朱德向教育团有关人员宣布了起义密令、普通口令、特别口令、联系信号以及识别信号，分配了战斗任务以后，就以公安局长的名义，宴请第五路军和第六军在南昌城里的团以上军官。朱德还特意在大士院 32 号伪市长李尚庸的贵宾楼里摆下盛宴，把敌第二十三团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团长萧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请”到一起喝酒。饭后，大家又坐下来打麻将。这时候，朱德的警卫员按照朱德事先的吩咐，给了敌团长的卫士一些钱，让他们到街上去买东西吃，还悄悄地把敌团长的枪枝挂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一切，麻将桌上的那几个军官竟然毫无觉察。

9 点多钟，一名卫兵拿着“山河统一”四个字从朱德身旁走过。朱德瞟了一眼，知道这是起义总指挥部送来的口令，心里想，好吧，这桌麻将一直要打下去，打到起义开始。

不一会儿，门突然被撞开了，一名青年军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报告长官，我是从二十军逃出来的。刚才我们接到命令，今天晚上部队要暴动。这个青年军官就是二十军的那名副营长，他是云南人，客厅里的那几个团长也是云南人。

朱德心中猛地一震，心想，一旦敌人有了防备，起义部队就更困难了。不，决不能让敌人知道起义的消息。朱德哈哈一笑，说：这个时候，大街上什么样的谣言都有了，信他干什么？来来来，我们打牌。

这不是谣言，是真的。长官，你们得赶快调部队呀！

朱德还想说什么，只见一名团长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说：也许是谣言，可是我也听说今天晚上要出事。我们还是小心些好。

朱德见这几个人想溜，连忙站起来，说：各位尽管放心，我出去看看。

朱德三步并作两步赶往贺龙的起义总指挥部。刚到门口，突然听到猛喝一声：哪一个？随即是扳枪栓的声音。

我是朱德。朱德答应了一声，走进屋。看见贺龙，朱德连忙说：贺龙同志，起义的消息已经走漏了！

对于武装起义，没有比事先走漏消息更严重的了，一旦敌人有了准备，就可能导致起义失败。历史上许多次起义都是因为走漏了消息而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听了朱德的报告，起义军总指挥部立刻下达命令：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

7 月 31 日午夜刚过，振奋人心的起义枪声打响了。起义军的勇士们一马当先，按照预定计划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一开始，战斗就非常激烈。

在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由于叛徒告密，敌警卫团事先有了准备。贺龙的第二十军两个团向该敌发起进攻时，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了起义部队的前进通道。贺龙见起义军前进受阻，亲自指挥部队从正面冲上鼓楼，压制住了敌人的机枪火力；又命令一支部队从后院翻墙冲入敌阵，终于将警卫团的敌人歼灭，占领了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

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向贡院的敌第三军第二十二团驻地发起攻击后，因该敌的团长被朱德扣留，失去指挥，官兵纷纷夺路逃跑，遭到起义军的火力阻击以后，被包围缴械。

第七十二团一部会同广东北江农军向部署在新营房的敌第三军二十四团发起攻击，由于起义军事先傍敌宿营，并依据地形秘密布置了兵力。战斗打响后，敌人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被缴了械。

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向部署在天主堂的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发起攻击后，敌人无心作战，仓皇逃窜，遭到起义部队打击以后，又退缩到天主教堂里据险固守。为了攻下这个据点，起义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迅速组成突击队，有的翻越城墙，从背后夹击，有的正面猛攻，很快迫使敌军缴械投降。

第二十军教育团的驻地同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只有一墙之隔。由于教育团事先以换防拜访力名察看了地形。枪声一响，教育团官兵有的从正面进入，有的从周围越墙而进，黑夜中，敌人还没有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

第二十军第六团向驻防老营房的敌第九军第八十团驻地突然发起攻击以后，敌人乱作一团，四处溃逃。

起义部队向江西省政府、南昌卫戍司令部、第三、六、九军留守处和牛行车站等地的敌人发起进攻后，只经过短促的战斗，就消灭了这些地方的敌人。

东方出现了一道红色的曙光，星星依然在闪耀，天空变得更高更蓝，苍白的月亮悄悄地退到山上。世界苏醒了。

南昌城里的枪声渐渐稀疏了，起义军鲜红的旗帜迎着初升的太阳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屋顶上高高飘扬。战斗只进行了4个多小时，南昌城就被起义军控制了。起义部队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人民群众。南昌市民燃放爆竹，欢庆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8月1日上午9时，在南昌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叶挺向大家报告了起义的经过，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周恩来、叶挺、贺龙、宋庆龄等2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为了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南昌起义前后还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等一系列重要宣言。

朱德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第九军共有两千多人，除了朱德领导的原教育团以外，还吸收了不少南昌市的瓷器工人和铁路工人参加，教育团的骨干许多是第九军指挥部的成员。

由于原定第九军军长韦杆一直没有到职，第九军实际上一直由朱德指挥。

原来由朱德指挥的南昌市公安局警察队400多人参加起义后，编入了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

8月2日，南昌市数万群众举行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朱德看到会场上旌旗蔽日，欢声震地，心中腾地掀起一阵热浪，无

比兴奋、振作……

这是一个致力于神圣事业的人由衷地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和自豪。

3 吃尽云南苦，投考讲武堂。四川的朱德落榜了，云南的朱德被录取了

朱德参与组织和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震惊世界的一枪，它使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然而，朱德的军事生涯早在南昌起义爆发前18年就开始了。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和超群的智谋、胆略，是在18年军旅生涯的风风雨雨中锤炼出来的。

1961年10月10日，朱德元帅在回忆辛亥革命时坦率地说：我就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朝末年训练新军的一所地方学堂，1909年（宣统元年）8月在昆明成立。这所讲武堂的创办者大多数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民主革命者，他们受到了日本的军事、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课程设置都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讲武堂设甲、乙、丙三班，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个兵科，学习期限分别为一年和两年半，学员除了学习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军事课程以外，还要学习国文、伦理、器械、算术、地理、历史、英文、法文等课程。教官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或者是受过同盟会影响的人。在本世纪初叶，云南陆军讲武堂对于那些热情钻研军事学说、关心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热血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

朱德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是在仪陇县县立高小教体育时听说云南省会创办了陆军讲武堂的。那一年，朱德23岁，他格外留意讲武堂之类的学校。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朱德是从学友秦昆那里得知云南那所讲武堂的信息的。1907年，朱德曾经到成都的一所体育学校学习，与同学秦昆相处甚好。第二年，朱德回到仪陇县以后，经常与秦昆通信，诉说个人的志向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有一天，朱德拆看秦昆的一封信以后，惊喜不已。秦昆在信中说，他本来是要去考成都军官学校的，但是由于家庭阻拦，不能如愿。秦昆在信中还讲到了云南昆明有一所陆军讲武堂，他劝朱德赶快到成都，俩人一起奔赴云南，远走高飞。朱德一阵激动，恨不得立刻赶赴云南。

那时候，尽管像朱德这样的青年“老想做个军人”，但当兵的地位十分低下。自古兵匪一家，欺压百姓，逐渐形成了一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朱德的家庭也反对朱德去当兵，希望他读书。朱德曾经回忆说：“由于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我家才决定让一两个孩子去念书。不论什么地方的农民，都希望孩子受教育……我小的时候，农村情况太坏，教育对于农民成了生死攸关的事。一族人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个男孩子，不论是抵挡税吏、滥兵，或者帮助家里打打算盘，都是好的”，如何说服家庭去云南讲武堂，成为朱德的一个难题。

不久，朱德听说吴绍伯也去投考云南讲武堂了。吴绍伯是朱德读私塾时

《朱德传》第19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4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的好朋友，因为担心家庭阻拦，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就竟自到云南去了。他的父母故意装作不知道这回事，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乡亲之间丢面子了，那个时候，哪一家有个孩子去当兵，全家都不光彩。

朱德也想从县立高小远走高飞，但当他要走时才想到还有另一个困难：没有钱。朱德出身于一个穷苦佃农的家庭，一家20口人靠租种地主的土地勉强糊口。为了供朱德上学，还欠了一些债。朱德从成都回到仪陇县立高小教体育以后，开始逐步为家里还债，身边只留下微薄的生活费，哪里有到云南去的路费呢？

思前想后，朱德决定立刻回家，向家人说明缘由，并保证在云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挣到钱，就可以帮助家里还债。但是，家人难以理解朱德的志向，千方百计地阻拦朱德。朱德决心坚决，他借到45块银元后，终于离开了仪陇县，离开了家乡，去投考他认为“可能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我已经选择了我的道路，义无反顾了。朱德说。

一到严寒季节，素有“红色盆地”之称的四川盆地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象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天气虽然晴朗，人们却浸沉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严寒中，嘴里边的呼吸也好像冒着烟似的。1907年初，朱德怀着从戎救国的满腔热情，辞亲别家，冒着严寒来到成都。

秦昆一见朱德，高兴得想把他抱起来，说，我已经偷偷租下了一条木船，咱们先走水路，再徒步翻山越岭。怎么样？

朱德听了，高兴地说：那好，那好。

秦昆沉思片刻，说：有一位同乡，也要去昆明，说是到一个法国人家里去当厨师。如果一起走，他可以分担一部分船资。

朱德是贫苦出身，很理解秦昆的难处，当然不会反对。

第二天拂晓，朱德悄悄来到岷江边，船夫和那名厨师已经在船上等候了。

岷江同嘉陵江、沱江和乌江一起，是长江在四川盆地中的四大支流，由南向北注入长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岷江支流大渡河，奔流在雪山峡谷之中，素有天险之称。岷江怒涛汹涌，河水急湍，船夫时时刻刻都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使渡船安全地顺江而下。

这是一条浅水小舟，两头翘起，中间有个席篷。朱德和秦昆时而在席篷里休息，时而又站到船头，游览一江景色。岷江两岸，峭壁屹立，松柏苍翠，即使是严冬季节，也让人感到美不胜收。

船行到宜宾，朱德同秦昆把铺盖衣服一卷，往肩上一扛，就弃船上岸，踏上了通往云南的漫漫山路。

当时，位于我国南部边疆的云南省由于地理条件十分复杂，交通尚不发达。俗话说：“吃尽云南苦”，就是指当地行路的艰难。朱德每天走的山路，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时不时地滚下来一块石头，另一边则是黑漆漆的深渊，随时都在张口噬人。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每一步都得格外留神。偶尔抬头远眺，映入眼帘的都是白雪覆盖的大山，山峰起伏不平，就像是大海中的怒涛突然之间变成了石峰。那山麓溪谷中的淙淙山水，突然之间就会爆发出一阵阵咆哮声。朱德从小受苦，早就听说过“吃尽云南苦”这句话，现在连日行走，也就不觉得那么艰难了。

一路上，人迹稀少。山路旁的村庄，也是几间低矮简陋的茅棚。使朱德感到吃惊的是，茅棚里的人烟容满面，都有大脖子病。他们都同羊、狗和不

计其数的寄生虫住在一起，让人不敢进村，进了村也不敢住宿。茅棚附近，到处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罌粟地。禁种鸦片的饬令早在三年前就颁布了，这些地方依旧我行我素，清朝政府也奈何他们不得。看到眼前这一幅幅贫穷落后的惨象，朱德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更加感到救民救国的责任重大。

在寒冬腊月中，朱德艰苦步行 70 多天，终于看见了一片平原，来到了被称作云南府的昆明城。

昆明位于滇他的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这里四季如春，苍翠满城，享有“春城”之誉。朱德等三人来到昆明时，红日已经西沉，春城周围的山峦披上了晚霞的彩衣，天边牛乳般洁白的云朵也变得火带一样鲜红。那名一路同行的厨师向朱德和秦昆告别，独自到法国人的厨房里谋生去了。朱德和秦昆开始在街上找住所。

一位伙计招呼说：客官，住我们这里吧，别看我们的店面小，但是臭虫比其它地方少得多。朱德似信非信，也只好住下了。

秦昆说，我有位朋友在讲武堂里，让他帮我们介绍到讲武堂去。朱德也听说了，云南讲武堂是一个新学府，如果没有当地的老住户和云南的大户人家介绍，外省人是进不了云南讲武堂的。

信发出以后，秦昆说：早就听说昆明的大观楼是天下奇景，现在到了昆明，为什么不去看看大观楼呢？朱德想，反正要等信，到市内外游览一下，也长见识嘛！

大观园在昆明的西郊，南临滇池，与太华山隔水相望。这里原来有一座明代的建筑。清朝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有一位名叫乾印的僧人到这里讲经，建起一座观音寺，游人就渐渐多起来。8 年以后，又将观音寺建成二层楼，题名为“大观楼”。不久又建成三层楼。来到大观楼前，最令朱德感兴趣的是门柱上那脍炙人口的 180 字的长联。秦昆早跑到楼上游玩了，朱德却一直站在楼前，一字一句地读那对长联。

这对长联是云贵总督岑毓英在 20 年前（公元 1888 年）托赵藩以工笔楷书刻成的木制联。

上联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与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言杨柳。

下联是：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草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喝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这对长联蓝底金字，书法遒劲，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海内长联第一佳者”。因为有这对长联，大观楼也声名远播。朱德对对联也极感兴趣，他反复诵读数遍，总想把它记在心中。朱德还向旁人打听，得知这对长联是自号为“万树梅花一布衣”的陕西三原人孙髯所写，心中油然升起几分敬意。

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朱德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

大观楼的南面，是远近闻名的滇池。滇池是位于海拔 1885 米处的一个湖泊，南北长 40 公里，东西平均宽 8 公里，是由盘龙江等 20 多条大小河流向南注入的。滇池两岸，金马、碧鸡二山东西夹峙，池上烟波浩渺，一碧万顷，风帆点点，景致极佳，被誉为云贵高原上的一颗明珠，朱德和秦昆在滇池边

上游览时，秦昆望着他中碧波，突然说：天下哪有这么大的池？应该叫作湖。

朱德说：这里也称作昆明湖嘛！

返回的路上，朱德一遍遍地朗诵明朝学者杨慎所写的《滇海曲》：苹香波暖泛云津，渔樵樵歌曲水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一天傍晚，秦昆的朋友找来了，高高兴兴地把朱德和秦昆带到了昆明市郊的巫家坝。讲武堂就设在巫家坝。这以后，朱德就想方设法同陆军讲武堂里一些四川籍军官拉同乡关系。这些四川籍军官在云南混迹多年，有他们保荐，进讲武堂就能顺利一些。

数天以后，朱德和秦昆在一名热情的四川籍青年军官的推荐下，一起参加了入学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秦昆都合格了。朱德非常高兴，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秦昆，却没有玉阶。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青年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

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

不对，你说得不对。朱德申辩说。秦昆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

秦昆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说：玉阶，这件事也怪我。

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朱德听了，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带的路费已经快用完了，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

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青年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军官说。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代珍的名，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并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因为这一个变故，后来有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当时，云南的驻军种类颇多，除了中央政府封派的地方军队外，几个主要城市里都组织了新军。新军采用旧军队镇、协、标的编制结构，镇统、协统、标统相当于师长、旅长、团长，标是一级重要编制。云南新军的骨干新编第十九镇中的一个川军步兵标，就同云南讲武堂一起驻防在巫家坝。朱德到这个标当兵时，主要进行士兵的基本训练。当时新军中尚有不少旧军队习气，训练十分艰苦。

朱德由于上过四川高等学堂，文化素质高，训练也刻苦，基本训练结束时就被提升为队部的司书生，相当于现在连队的文书。

但是，朱德在司书生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二十来天，标统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去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云南新军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曾经于1904年留学日本，在士官学校学习陆军。他是云南河阳人，在云南高等学堂肄业，很赏识上过高等学堂的朱德这位“云南”老乡。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

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

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所以很顺利地录取了。

这是 1909 年。同朱德一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共有数百名新生。

50 多年后，朱德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云南陆军讲武堂，原来是一九〇九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为了培养清朝政府的军事人才办起来的……当时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它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朱德是在这个“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中参加中国同盟会的。

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它是 1905 年 8 月由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的。同盟会推选孙中山为总理，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同盟会成立后，会员们很快从日本回国，积极进行革命宣传，联合爱国人士组织革命团体，准备武装起义。

在云南，同盟会会员于 1906 年创办了《云南》杂志，在杂志的发刊词中，公开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很快以昆明、腾越（今云南省腾冲县）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组织起许多革命团体，发动群众同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军队的重要性。朱德到云南的前一年，孙中山曾经委派著名人士、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黄兴等人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起义之初，驻守河口的清军纷纷投降，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河口城。后来在多路清军的围攻下，投降的清军又发生哗变，河口起义不幸失败。1908 年 12 月，同盟会会员杨秋帆等人准备在云南永昌发动一次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结果也没有成功。这些起义活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影响在云南日益扩大，云南陆军讲武堂中，也有了同盟会的秘密组织，及时发展会员。教官中的会员和学员中的会员自成体系，各分成七八个人组成的小组，独立活动。

朱德进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后，很快跟同盟会会员有了接触。“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〇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在讲武堂里，朱德感受到，新军的士兵虽然接受了近代化的军事训练，手中的武器也比清朝军队要新，部队都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看起来很威严，但是还没有一种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他们，也没有人在努力改变他们的思想。朱德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士兵往往是掌握在进步而又年轻的军官手中的牺牲品。军队中许多不识字的一辈子过着最困苦生活的士兵“始终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还同以往一样，时时遭到残暴的和侮辱性的殴打和责骂。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也认为普通士兵个个是歹徒，必须当作畜生来看

《朱德选集》第 378、379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

《朱德选集》第 378 页。

待”。朱德经过认真思考，大胆地向上级提出了以人道对待普通士兵的问题。朱德认为，新军要提高战斗力，调动广大士兵的积极性，就必须废除体罚，改变对士兵的态度，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朱德还同讲武堂的同学一起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取消上级对下级官兵的体罚。朱德的这一倡议得到了许多青年军官的拥护。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明确规定，在他隶属的军队里应取消对士兵的体罚。

中国地方大，地域和风俗的差异也很大，四川终究不同于云南，朱德进讲武堂不久，冒籍报考的事终于被教官们察觉，有几个云南籍的教官立刻把这件事向讲武堂总办李根源报告，并声言要把朱德除名。

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1909年回国以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很快又升任总办。李根源治校较严，听说朱德是个冒籍的云南人，十分生气，马上对勤务兵说：你把朱德给我叫来。

朱德听到风声以后，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秦昆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遭到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同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总办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李根源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军人，也是时时渴望民族自强的总办。法国殖民主义者修筑滇越铁路时，李根源带领讲武堂全体学员来到滇越铁路昆明车站，大声疾呼，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就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同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表现出了深切的爱国热忱。李根源听了朱德的诉说，立刻打消了开除朱德的念头，鼓励朱德在讲武堂要努力学习军事，振兴中华民族。

当时，满清政府为了支撑即将倾覆的封建王朝，极其残忍地镇压革命力量，对云南讲武堂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摧残。李根源苦心孤诣，凭着他的革命热诚和灵活的手腕，千方百计地保护云南讲武堂中的革命青年，对于朱德那种艰苦卓绝的求学精神十分赏识。他同朱德的接触也日渐增多。

春节的时候，陆军讲武堂也给学员放3天假。这对于整日严格操练的学员是多么难得呀！一大早，学员们都逛街去了，朱德却在宿舍里写信。每逢佳节倍思亲。自从离开仪陇家乡，朱德还没有给家里写过信。现在，自己的籍贯已经真相大白，大家都知道他是四川人，他越发思念竹林繁茂的故乡，思念母亲，思念家人……

学员宿舍静悄悄的，朱德的笔下写出了无限的思念之情。忽然，门被推开了，朱德一抬头，看见李根源总办同一位陌生的军人一起走进屋来，朱德连忙站起来，正正规规地给李总办敬礼。朱德，你怎么不出去？李根源问。

我给母亲写封信。

是给四川仪陇县还是给云南临安府？李根源故意问。

朱德难为情地说：四川。

李根源笑了，指着身旁的陌生人介绍说：这位是新到云南的蔡锷蔡松坡先生，现在住在我们讲武堂里。

朱德礼貌地向蔡锷敬一个礼，自我介绍说：学生朱德，字玉阶，特别班步科生。

蔡锷是湖南邵阳人，原名艮寅，字松坡，早年在长沙时务学堂学习时，

曾经拜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梁启超、谭嗣同为师。1899年，蔡锷赴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和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学习，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后来又回到日本的一所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并将原名良寅改为锷，意思是在起义中幸免于难以后还要砥而锋锷，重振旗鼓。1904年，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的军事学堂任职。现在，站在朱德面前的蔡锷已经是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步兵旅长。蔡锷治军有素，并在暗中协助同盟会活动。见朱德向他敬礼，也抬手还礼。

李根源又说：朱德是我们讲武堂的优秀生。为了进这个讲武堂，他从四川步行千里，还冒充云南人，险些被我除名。

蔡锷一听，脸上骤地增添几分喜色。蔡锷受维新思想影响，又目睹清朝末年外侮日亟、民族危亡的现状，立志要救国救民。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就很刻苦，与同期毕业的蒋方震、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听了李根源的介绍，蔡锷对朱德产生好感，坦率地说：看得出来，朱玉阶同学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

朱德见蔡锷很瘦削，那对相距甚宽的眼睛闪出诱人的气魄和潜力，双颊像女性，嘴角又显得严峻、刚强，心中铀然升起几分敬意。听到蔡锷夸奖自己，立刻表露出谦逊的微笑，说：学生只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下决心来云南学习军事的。

说得好！说得好。中国要谋求独立自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武装。蔡锷很欣赏朱德的朴实和坦率。临走时，蔡锷还邀请朱德到他的住处去看看。

朱德很高兴认识蔡锷。那一年，蔡锷只有27岁，只比朱德大4岁。朱德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蔡锷已经在进行他梦想中的大事了。

蔡锷的协统司令部就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每天晚上，蔡锷都要工作到深夜。由于得到李根源的允许，朱德经常到蔡锷那里借书看。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为朱德展现出了历史悠久的古罗马斗兽场，宏伟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风光旖旎的威尼斯水城……朱德对作者描述的多彩世界和欧洲的各种政治制度、社会风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1年以后，朱德终于到德国去留学。

有一天夜晚，朱德走进蔡锷的住所时，蔡锷正在伏案疾书。朱德转身要走，蔡锷放下笔，喊了一声：玉阶，你过来。

朱德坐下后，蔡锷问：玉阶，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人你知道吗？

朱德点了点头，憨厚地一笑。

蔡锷接着说：这几天，我受镇统（相当于师长）钟麟同委托，正在编写一篇训练部队的讲话稿。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个人虽然不是武将，但他们所讲述的兵家之事见地颇深，他们讲到的治兵方法值得借鉴。我把曾国藩和胡林翼著述中有关治兵的言论辑录下来了，加了一些按语。你看看。说着，蔡锷把稿子递给朱德。

朱德接过稿子，聚精会神地翻看起来。朱德很钦佩蔡锷对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言论的精辟分析。

从那时候起，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就在中国军队中流传开来，有的军事院校甚至把它列入训练军官的一本教材。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已是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身上还时常带着蔡锷所编的《曾胡治兵语录》。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期间，朱德尽管是一名特别班步科生，但他同讲

武堂总办李根源交往甚多，救国救民的信念使学员和总办之间建立了赤诚与共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和发展到两位将军的晚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经担任陕西省省长、广州卫戍司令的李根源主张抗日，得到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称赞。1938年6月，李根源患心脏病在西安医治，身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从临汾前线回来以后，先后两次到西安郊外的宋家花园看望李根源。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和李根源的友谊得到不断发展。1940年，李根源虽然离开了军队，但这位老军人时时都在关注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每天都企望得到抗日将士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喜讯。1939年，李根源从昆明回到老家腾冲，当他在一名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中看到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时，欣喜万分。这封信是朱德33在抗战前线写给他40年前的同学的，朱德在信中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况，朱德还欢迎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到解放区去参加抗日工作。

接连几个月，李根源都为八路军将士在抗战前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兴奋。抗日战争三周年之际，李根源因感而发，接连写下五首七绝，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寄慰前敌将帅。这五首七绝是：

其一：三年血战挫天骄，杀气如云万丈高。

再接从今还再厉，会须入海斩鲸鳌。

其二：欧西法国夙称强，战未尽年竟败亡。

我抗东倭卅六月，神英诸将自堂堂。

其三：前方抗敌后方向，西缅甸交已伏戎。

我老据鞍犹矍铄，好偕袍泽赋秦风。

其四：攘夷大义秉春秋，雪耻争存报国仇。

痛饮黄龙一樽酒，从容收拾旧神州。

其五：中原父老望旌旗，说到倭夷愤不平。

努力齐心争后着，宝摧顽寇奠新京。

远在华北前线指挥八路军同日寇作战的朱德总司令看到从重庆带来的《大公报》上的这五首七绝，深为李根源先生的民族正义感所感动，顿发诗兴，也和了五首七绝。

朱德先写了一段序：“读《大公报》载印师‘七七’三周年纪念赠抗战将士七绝五首，民族正义，溢于词章，拜读之下，莫名钦感。谨和原韵，邮呈指正。”

接着，朱德写下了五首七绝。

其一：败不馁兮胜不骄，荡平倭寇气犹高。

军民一致复华北，铁腕齐挥歼海鳌。

其二：法军将帅在称强，反共仇苏自取亡。

新史当为吾国鉴，运筹决胜在朝堂。

其三：报国仇同志亦同，精诚团结伏强戎。

吾师气壮身犹健，扫寇归来唱大风。

其四：苦战三年春复秋，河山还我慰同仇。

他年痛饮龙江外，长戍边疆卫九州。

其五：当年父老授旗旌，诲我谆谆将寇平。

前线后方齐努力，定驱暴日追东京。和作写完了，朱德的心潮久久难以平静，身处抗日前线，朱德有许多话要向这位当年讲武党的总办诉说。于是，朱德又给李根源先生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全文是：

印泉吾师钧鉴：

西安拜别，瞬经两载。犹记病榻之侧，谆谆训示，受益良多。三年以来，德转战华北，坚持敌后，虽不敢自言有功，幸尚未辱钧命耳。倭寇进占越南，威胁滇中，西南局势紧张万分。德等已于八九月间发动百团之兵力，大战于平汉、正大、同蒲、平绥、津浦铁路主要交通线上。赖军民一致，稍有成绩。正太铁路全部破坏，并隘煤矿亦被炸毁。寇之随营商业，皆受重大打击。非但交通战得到胜利，即经济战亦大有成功。且予敌进攻我大后方之战略企图，牵制不小。此次战绩聊可告慰国人，亦可告慰吾师也。越南为西太平洋之战略要地，若为敌占，荷印形势，自必日愈严重。日美矛盾亦将更形尖锐。此次大战不仅将及于美、澳、非洲，更将及于全亚。战事绵

长，已可决言。我国抗战，处此环境，惟有全国团结一致，发动广大民众共同奋斗，德深信抗战建国之大业必能完成，吾师遍处南滇，日寇威胁昆明，当有制敌良策。

德为防滇计，尚请吾师设法发动帮助越南、缅甸、印度之广大民众起来抗战。吾师以为然否？专此敬颂勋安

李根源看到朱德的这封信，不仅为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中取得巨大胜利而兴奋，还深深钦佩朱德对抗战形势的深刻判断。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李根源耳边时常响起朱德的那几句话：惟有全国团结一致，发动广大民众共同奋斗，德深信抗战建国之大业必能完成……这时候，李根源眼前总会浮现出朱德冒籍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情景。

朱德是讲武堂的优秀生。李根源一次次地在心里说。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萧菊芳结婚。

那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少校的婚事。有一天，滇军里的一位朋友悄悄走到朱德面前，神秘地一笑，说：玉阶，我妹妹来信了，她到师范学校读书去了，今年18岁。

朱德瞄了对方一眼。他知道这位朋友出身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是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不知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还是触动了哪一根敏感的神经，他说：能到师范学校学习，不容易嘛！她叫什么名字？

萧菊芳。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本世纪初叶，中国的姑娘一般不肯在结婚前同未婚夫见面。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婚事是由萧菊芳的哥哥帮助操办的。当时，朱德的父母远在四川省仪陇县，他们甚至不知道朱德结婚的详细情况。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

《朱德》第201、20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朱德》第202、203页。

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朱德和萧菊芳只有星期天这一天时间能团聚。这时候，他们俩人总是有说有笑，亲密无间。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在率领部队行军作战的风雨岁月中，朱德同萧菊芳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即使是在昆明，朱德也往往是白天忙碌一天，夜晚才能回家同妻子相会。

1916年初，身为第一军第三梯队团第六支队长的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开往朱德的家乡四川，参加泸州、纳溪大战。萧菊芳当时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37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大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当朱德和朋友一起骑马到泸州西面的南溪去时，他的朋友三番五次地说：我妹妹聪明过人，但也很任性。这几年有不少亲戚朋友给她提婚，她都拒绝了，一年一年地拖下来，今年已经21岁了。21岁，当时算得上老姑娘了。他的朋友是希望朱德见到陈玉珍时多个心眼。其实，他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在朱德看来，陈玉珍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令人尊敬。朱德特别欣赏陈玉珍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朱德注意到，这个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的姑娘，很早就接触了革命运动。他同陈玉珍谈话时，感觉到对方读过许多书，爱好音乐，他俩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还有一时说不上来的“许多共同的地方”。

朱德同陈玉珍面谈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保柱蹒跚学步时，朱德回家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清晨或者傍晚，每当朱德有空吹箫、拉胡琴时，陈玉珍也会在一旁弹一首《牧羊曲》，那曲调欢快、悠扬；当俩人弹、拉起《小夜曲》时，人们常常可以听到一阵阵清亮的琴声，悦耳的箫声，那乐曲是多么甜蜜、亲切……后来，他们又开始学习风琴、吉他等乐器。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时，朱德的薪俸比较高，陈玉珍手头也有些积蓄。俩人虽然都很节俭，却舍得买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来款待客人。这些客人大多是当地有自由思想的人，他们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

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及其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夏天，当朱德忙碌一天回到家里时，陈玉珍就抱起琵琶，来到幽静、清香的小院里，在皎洁的月光沐浴下弹一首朱德爱听的曲子。每当这个时候，朱德也会拿起一把胡琴，乐滋滋地来到玉珍身旁，很自然地陪着玉珍演奏同一支曲子。

月亮出来了，星星出来了，泸州城静静地躺在星星和月亮的怀抱里，像婴儿睡在母亲怀里那样安宁和香甜。随着朱德和陈玉珍的演奏，黄莺也在枝头轻鸣，蟋蟀哼起了小调，小院里的一切都融化在欢乐之中，朱德和陈玉珍也忘记了自己，沉浸在甜蜜的乐曲之中。

朱德的寓所里也有激烈争吵的时候。“五四运动”前后，许多青年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经常聚集在一起，对书报杂志上的一些新思想展开辩论，当他们来到朱德家里时，朱德和陈玉珍很自然地加入了争论的行列，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争论。在这种形式的争论中，朱德和陈玉珍萌发了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要发展工业和文化等思想，也丰富了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朱德回忆起这一时期的生活，颇有感慨地说：

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他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 39 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当然，旧的封建势力把我们说成是放荡不羁；其实我们都是最规矩的……全中国都在谈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我们在泸州的学习小组也不曾想象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仆役、苦力和盐工。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朱德独自一人在书海里徜徉，有时候他和陈玉珍一起走进书屋，各看各的书，谁也不干扰谁。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为民族英雄岳飞的爱国行动喝彩，为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的英勇斗争精神而深受鼓舞……

1922 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从此以后，朱德再也没有见到她们。

4 杨森虚席以待，恳请朱德去当官。朱德 义无反顾，坚持去欧洲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海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早在北宋末年，来往于上海（当时称力镇）的中外商船就日渐增多。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各划租界，城市畸形发展，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青少年时期，朱德一直在西南和华西活动，上海、南京、北京这些城市，朱德是从报纸上得到印象的。本世纪20年代，西南一带盛传上海是一座用近代科学技术建筑起来的都市，是一棵摇钱树。

朱德是1922年6月乘船到达上海的，他的上海之行很不容易。

1922年1月，云南的滇军接到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以其主力东征，打击军阀和帝国主义，昆明只留下少数老弱病残人员，但身为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警察厅厅长的朱德由于准备出国学习，仍然留在昆明。

谁知半月以后，风云突变，“云南小皇帝”唐继尧突然率领地方民团和土匪向昆明进攻。由于寡不敌众，滇军总司令顾品珍阵亡，朱德身佩枪支，带着准备前往欧洲留学的旅费，骑上他那匹心爱的战马，乘昆明城陷落之前，率领骑兵队伍冲出西门，直奔楚雄。这一行人当中，有曾经担任四川省督军兼省长的罗佩金将

突出重围以后，朱德主张立刻北上，穿过西康和四川西部，再到上海去，到广州去，去找孙中山，找共产党员。罗佩金认为，北上之路都是荒山恶岭，到处有盗匪出没，少数民族地区不好通行，统治四川的刘湘和杨森曾经是战场上的对头，因此主张西奔楚雄。朱德难以说服罗佩金，只得与其分手。

朱德一行穿过滇北的高山激流，摆脱了唐继尧的追兵，一路冒险跋涉，经过一百多天的艰苦行程，终于回到四川南溪。

这时候，朱德一心准备出国留学。正当他收拾行装之际，忽然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邀请朱德“念在旧交”到重庆去作客。朱德知道四川军阀的暗探很多，自己的行踪难免不被杨森觉察，杨森没有动手抓他就是很大的面子。杨森邀他去重庆作客，不会有什么好事。

朱德的一些朋友和家人劝阻说：杨森是在摆鸿门宴，你不能去。但朱德为了争取一个机会到欧洲留学，毅然告别家人，前往重庆，朱德哪里想得到，这一走竟然是同家人永别。

杨森是四川有名的军阀，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16年，杨森参加护国战争，担任滇军第二军参谋长，深知朱德的军事才能。1917年，杨森又参加了护法战争，担任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团长。三年以后，杨森投靠四川军阀刘湘，在川军中先后担任第九师师长、永宁道尹、第二军军长等职。这一次，杨森对朱德特别热情。朱德乘坐的船刚在重庆靠岸，杨森就在卫队的簇拥下出现在码头上，欢迎场面十分隆重。

那天，刘湘刚从成都参加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返回重庆，晚上就设宴会欢迎朱德。刘湘和杨森早已仰慕朱德的赫赫威名，钦佩朱德的卓越军事才能，想方设法收买、拉拢朱德。宴会后，听歌看舞，还特意摆了一桌麻将。第二天，刘湘和杨森一起陪同朱德观看划龙舟比赛。其间，刘湘和杨森甜言蜜语，封官许愿，千方百计拉朱德入幕。刘湘比朱德还小3岁，是四川大邑县人，先后在四川新军弁兵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1918年升任川军第二师师长，两年前又担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川军总司令，

并主持四川民政。为了达到他称霸四川的个人目的，他多么需要朱德这样的军事人才呀！

然而，刘湘和杨森都失望了。朱德反复声明：我要到欧洲去留学，要去寻找新的生活。

刘湘冷笑一声，说：朱将军何必要到欧洲去浪费时间和金钱呢？在峨眉山上休息休息不就够了吗？当时，有些失败的军阀和政客常常到类似峨眉山这样的地方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卷上重来。但朱德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去寻求真理。

杨森故作姿态：朱将军一定要去外国留学，那么回国以后，我们一定虚席以待。

在那种场合，朱德处理不当，他和家人就有生命危险。

一星期以后，朱德终于来到上海。这一年，朱德 36 岁。

第一次来到上海，朱德立刻坐人力车到法国医院去看病。数天后，朱德出院了，他以一种求索的心情在上海街上浏览，朱德的足迹踏遍了外国在上海的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以前只是在朋友之间互相谈论的摩天大厦，看到了平坦的街道、电灯和自来水。朱德还来到工厂和工人住宅区，看到了来自灾区和战区的工人和童工为了糊口而像奴隶一样地工作，看到了无家可归的工人夜间不得不睡在便道上，看到了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的整个工人阶级。看到这一切，朱德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后来谈到上海时，朱德直言不讳他说：上海大烂，不成样子！朱德还从上海这个现代化的城市想到了国家的命运。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惨。朱德说。

不久，朱德经孙炳文介绍，拜会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孙炳文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工作多年，当时在北平的一家报馆工作。为了把朱德介绍给孙中山先生，孙炳文特地从北平赶到上海，同朱德和金汉鼎一起，来到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法租界的一间寓所里。

当时，孙中山正在上海筹划驱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大业，希望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权，孙中山先生已经 56 岁了，比朱德大了 20 岁，他为了中国革命劳碌奔波了 37 年，虽然屡遭失败，他对未来仍然极为乐观，思想和行动敏捷有力。孙中山听了孙炳文的介绍，很高兴，说：朱玉阶真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呀！我想请你重返滇军，到广西对滇军进行整编。怎么样？

朱德沉思片刻，摇了摇头。

孙中山微微一笑。说：我可以先付 10 万元整编经费。

朱德身旁的金汉鼎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心中乐滋滋的，朱德依然表示不回滇军。

为什么呢？孙中山先生和气地问。

一句话引起了朱德对十年往事的回忆，这些年，朱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保卫民国的战斗上，用在建立孙中山提出的民主政治上，结果“大夫所望”。在挫折和失败中，朱德认识到孙中山的办法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决心赴欧洲。他对孙中山说：同这个军阀或者那个军阀搞同盟的策略，结果往往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朱德告诉孙中山先生，“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当中有掌握我们从未听

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孙中山先生很认真地听着朱德拒绝去滇军的理由，他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他问朱德：你既然决定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孙中山先生曾经多次去美国。

我没有到美国去念书和居住的款项。朱德回答。我愿意到欧洲去，听说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欧洲很强大，这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中山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朱德的意见。孙中山先生还说：我正在制订国民党的新政策。当时，朱德并不知道孙中山所说的新政策，两年以后，他才得知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这是朱德和孙中山之间唯一的一次见面。孙中山“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德说。

参加会见的金汉鼎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回到滇军去了。

告别孙中山先生，朱德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11年戎马生涯中的腥风血雨，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1911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四川的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满清封建朝廷一度对一些地方失去控制，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恐慌。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第一批一百多名学员提前毕业，分派到军队中去，其中有18人被分配到蔡锷指挥的新军第七十四标。封建军队的旧军官对讲武堂的青年军官怀有戒心，不让这些毕业生直接带兵，而是把他们零零散散地安排到新军里去见习，甚至给高级军官听差。

朱德被分配到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统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这个标的标统（相当于团长）是罗佩金。管带（相当于营长）是刘存厚。由于蔡锷对朱德比较了解，数星期后又把朱德调到协里担任司务长。

朱德发现，云南新军的士兵大多数是从农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没有条件学文化，对于清朝政府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剥削深恶痛绝。当兵以后，他们对于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极为不满。这是同盟会争取新军的政治基础。当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争取新军的重要性，布置同盟会会员开展秘密的政治活动，朱德也接到了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指令，要他抓紧在士兵中做政治思想工作。

同盟会在川军中活动的风声很快传到了云贵总督李经羲的耳朵里，李经羲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侄子。由于有李鸿章这棵大树，李经羲官运亨通，先后担任清朝政府的四川永宁道、湖南盐粮道、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云南巡抚等要职，是满清王朝的忠实走卒。当他得知新军里有同盟会会员活动时，立刻发布密令，在新军中层层布网，捉拿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分子。朱德在士兵中开展活动，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

朱德首先找到了在川军步兵标里认识的三位朋友，再利用秘密的民间组织哥老会广泛接触士兵。

那些天，朱德一有空隙，就和士兵们到僻静无人的地方促膝畅谈。朱德询问士兵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也向士兵们介绍自己投考讲武堂的经历，讲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还给士兵们写家信，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困难。当

然，这一切都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

朱德信任那些穷苦的士兵，士兵们也千方百计地保护朱德。

一天晚上，朱德和几名士兵又来到一片小树林里谈天。月亮很圆，像顶在材梢上的银盘。一名士兵悄悄对朱德说，这支部队曾经被派往河口，名义上是增援边防部队，实际上是去镇压河口起义。我们到达河口后，发现起义的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也有商人。他们的臂上都挂着“敢死”的臂章，作战很勇敢，大伙儿拿着枪一间屋一间屋地战斗。

另一名士兵绘声绘色地说，起义军还高呼口号：“打倒满清，中国人万岁！”他们都不怕死。

朱德知道，河口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了，残剩的起义部队也退到印度去了。朱德抓住机会向士兵解释领导河口起义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本思想，启发他们逐步认识到镇压起义军的错误，用起义将士的革命精神激发士兵们对清朝政府的反抗情绪。

月亮安安静静地挂在天上，悄悄地向人间撒着银辉。士兵们听朱德讲得入迷了，竟然忘记了归营的时间。

那时候，曾经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铁路借款事件”。清朝政府以国有为借口，把全国的铁路建筑权和所有权拱手出卖给美国、德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朱德利用这些事实向士兵们揭露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启发士兵们树立爱国主义思想。

渐渐地，朱德在士兵中威望越来越高。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发展。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以满腔爱国热情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腐朽的清政府，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唤起了中国人的觉醒。随着兴中会、同盟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创立，民主革命的思潮在全国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1911年，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蓬勃发展，清朝政府一度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到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湖北省的防务空虚。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和孙武领导的共进会抓住时机，积极准备在湖北举行武装起义。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试制炸弹时，突然发生爆炸，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立即派出军警，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起义的指挥机关也遭到了破坏，形势十分危急。10月10日晚上8时，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在熊秉坤率领下，毅然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并推举日知会成员、新军连长吴兆麟为总指挥，激战一夜，控制了武昌。

12日，起义军攻占汉口。13日，起义军又攻占了汉阳，并且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举行武装起义。11月下旬，全国已有15个省区先后举行起义或独立，脱离了清政府。朱德所在的云南省就是其中之一。1911年是夏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这使云南人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积极在新军中特别是在士兵中开展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立即下令停止新军按惯例要进行的秋季演习，收回了发给官兵的弹药，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被撤换，还准备把他放逐到边境去。与此同时，李经羲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把分散在外地的营防军全部调到昆明，发放了新式

步枪和弹药。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

李经羲万万没有想到，他调到身旁担任总督衙门守卫的机关枪营管带（相当于营长）李凤楼就是秘密的革命党人。李凤楼悄悄把李经羲要把所有被怀疑为革命派的人全部杀掉的计划告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朱德认识到，在云南举行“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看到李经羲下达的停止秋季演习的命令，下约而同地去找李经羲。蔡锷很策略地说：总督先生，历年必有的秋季演习最好照常进行，弹药也应该按要求发给新军。不然，别人以为政府害怕了，只能采取收缴弹药这一类的办法。蔡锷还故意警告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千万不能仓促行事，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处分了几个共和派才爆发的。

在李经羲看来，蔡锷和李根源都是忠实于满清政府的人。听了蔡愕几句话，李经羲沉思良久，终于答应举行秋季演习，重新发给新军弹药。

那些于，朱德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云南巡营一个镇统的卫兵中开展政治鼓动宣传，朱德对士兵们说：现在，中国已经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地卷入了革命，“光复”和“翻身”两个新名词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从政治上看，“光复”和“翻身”的意思就是要推翻满清朝廷，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朱德的宣传深入人心，士兵们开始觉醒了，他们勇敢地拿起枪来，枪毙了反动军官，投身于革命的潮流中。

1911年10月30日，这一天正是夏历的九九重阳节。

秋季演习结束了，部队都回到了巫家坝和北校场的两处兵营里。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已经暗暗潜回昆明，回到了原来的官兵中间。一场为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即将在昆明爆发。

朱德接到通知以后，先到陆军讲武堂，紧急动员讲武堂的两班学员迅速做好起义准备，要求他们与北校场、巫家坝两地的起义军互相呼应，配合作战；然后返回巫家坝第七十四标，督促士兵做好起义准备。

起义的枪声原定于30日夜11时打响。谁知当晚8时，蔡锷突然接到李经羲总督的电话：蔡协统，刚才有人向我报告，新军中的革命派要在今晚举行暴动。

蔡锷先是一惊，随即又若无其事地说：有这种事？我这里一切平静呢！

蔡协统，我命令你把新军中的革命派嫌疑分子全部抓起来，今晚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李经羲急得话音都变了。

好吧！一个钟头内我全部把他们抓到。蔡锷放下电话，立刻下达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命令。既然有人告密，起义被迫提前进行士兵们剪掉了辫子，举起写着“汉”字的大红旗，赶往指定地点集合，满清统治者把辫子视作命根，汉族人剪了辫子，是要杀头的。

不到9点钟，北校场上空突然向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引起一片慌乱。蔡锷来到南校场，起义部队很快平静下来。

李经羲听到北校场的枪声，知道大事不好，立即打电话向蔡锷求援，蔡锷冷笑一声，放下话筒，站上指挥台，庄严宣布：云南起义开始！

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开始向省城进发，攻打城门。朱德被指定为队官（相当于连长），同其它部队一起攻打省城的东南门。附近的炮兵第十九标由于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全标一起参加了起义。

起义军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李经羲派来的骑兵协。蔡锷大喝一声，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到哪里去？

对方回答：我们是新军骑兵协，奉命向蔡协统报到，去肃清匪帮。

我就是蔡协统。

骑兵协统大吃一惊，问：那你们到哪里去？

进攻昆明府，灭满兴汉。蔡锷果断地说。

骑兵队伍立刻大乱起来。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士兵早就同革命党人有联系，有的见机加入了起义军，有的对天放空枪，许多人在黑夜的荒野上乱跑。

陆军讲武堂的一些学员早已带着武器潜入昆明城内，看见起义队伍到来，立即里应外合，大开城门。黎明前夕，起义部队全部进入昆明城，并且占领了所有的城门。

东方的天空渐渐发白了。太阳还没有露脸。朱德率领部队攻到了云贵总督衙门前。由于总督的卫队营事先同起义军有秘密联系，朱德曾经在卫队营中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卫队营军官李凤楼看见朱德率领起义军到来，命令不许抵抗。朱德很快率领部队翻入总督衙门的高墙之内。在搜查中，穿着苦力衣服躲藏到床底下的李经羲，被起义官兵揪住辫子拉了出来。总督衙门顺利攻克昆明城内，五华山和军械局这两个敌军据点也先后被起义军攻克了，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起义军击毙。不久，大理、临安（今云南省建水县）等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附近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11月1日，昆明召开由军队和各族人民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云南军政府，蔡锷为云南军政府都督。

朱德对率军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记忆深刻。50年以后，朱德曾为此赋诗两首：

云南起义是重阳，
下定决心援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
功成一夜好开场。
靳逃钟死人称快，
举出都督是蔡锷。
五华山上树红旗，
出师两路援川鄂。

在云南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的革命浪潮中，满清政府陷入灭顶之灾。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王朝被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社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辛亥革命以后，地处中国西南偏隅的云南省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开始革除弊政，经理财务，振兴实业，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景象。朱德以为他所憧憬的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共和国就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谁知，残酷的现实很快打破了朱德的幻想，使朱德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感到失望。

云南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很快调动军队，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清政府督办粤汉、川汉铁路的大臣端方已经率领清军进入四川，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手下也还有相当强大的反革命

军事力量。在清军进攻面前，四川的起义军受到了一些损失。云南总督蔡锷了解情况以后，立即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8个营进入四川作战。这8个营中，其中有两个营是川军。另外，蔡锷已经事先安排了陆军讲武堂的四川籍学员回四川，支援四川的革命军。

援川起义军共分两路。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另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朱德所在的第一梯团为第一路，梯团长是谢汝翼。

朱德在援川军中仍然担任队官。1911年11月16日，朱德率领部队经东川、昭通，叙府进入四川，一路上，他们打败了清朝的巡防营。（亦称巡防队，是清朝末年各省的地方部队）。叙城一战，朱德率领的部队曾遇二倍于己的敌人的阻击，但由于敌人手里大多是“在空葫芦里装几把炒豆弄弄声音吓唬人”的老式火枪，经不住起义军新式步枪的打击，四散奔逃，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叙府。一路上，朱德表现出了很高的带兵艺术和用兵才能，深得士兵爱戴。

占领叙府以后，第一梯团就向自流井（今四川省自贡市），富顺进击。自流井地区驻扎着赵尔丰指挥的一个巡防营。但这个营同朱德率领的一个连刚一交火，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朱德指挥一个连成功地击败了一个营。

朱德刚刚进入自流井，就得知督办粤汉、川汉的铁路大臣端方在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县）被起义军杀死了。当时，他身边还有一个标的部队保护，却没有保住这个满清大臣的命。

朱德率领部队在自流井的盐井地区巡逻了3个月，与来袭的几股土匪打了几仗，稳定了民心，千方百计地帮助停产的盐井恢复生产，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1911年4月，四川同盟会会员和立宪派在成都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不久，支援四川的滇军就返回昆明。

1912年5月，滇军在云南召开全军大会，庆祝援川部队凯旋。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因军功卓著被晋升为少校，荣获“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

会后，蔡锷特地来到朱德面前，向朱德表示祝贺，他还询问了朱德的家庭情况。朱德告诉蔡锷，他已经和家里取得了联系，并且把大部分薪俸寄回家了。分别时，朱德忽然说：蔡都督，你的脸色不怎么好，会不会有什么病？

蔡锷听了，漠然一笑。

回到云南以后，朱德开始紧张地训练新兵。为了巩固和建设云南新政权，新军要利用春季和夏季训练新兵，以便提高战斗力。

秋天，陆军讲武堂重新开学了。蔡锷又把朱德调到讲武堂，担任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那一段时间，朱德非常忙，他不但要管理学员，还要讲授战术学、射击技术，要组织学员进行野外实习。学员中，有许多是一年前没有完成学业就回到家乡参加革命，现在又回到云南继续完成学业。有一部分学员还是朱德在讲武堂时的同班同学，有些则是因为拥护共和而遭到贬逐的青年学生。朱德一有空就同学员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听他们讲述辛亥革命时各地的见闻。有时候，朱德同学员们一起揭露袁世凯逮捕、监禁、虐杀革命党人的暴行，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

为了使大家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情况，朱德特别邀请曾经到法国学习的那几名讲武堂教官给学员们介绍法国的议会制度和大革命经过，和大家一起共同研究法国的革命历史和政治制度。

那时候，讲武堂共有五个区队，每个区队一百多人。朱德在讲武堂一直

工作到 1913 年夏天，返回部队以后，朱德就升为营长了。

云南是一个山地、高原约占全省面积 93% 以上的省份，山间盆地星罗棋布，仅为全省面积的 6%，是当时很穷困的一个省份。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许多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几乎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军队从前方转战回来，也没有钱发饷。蔡锷和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认识到，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情况，就必须彻底废除帝制，就必须彻底废除封建的经济制度，实行土地改革。作为云南都督，蔡锷曾经从政权内部进行了若干改革。

蔡锷大胆撤换了那些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了一批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军队中，蔡锷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在待遇上，蔡锷极力提倡勤俭节约，营以上军官每月只领取 60 元月薪，蔡锷自己也不例外。

朱德极其赞成蔡锷的这些改革。朱德看到，由于蔡锷的这些新建树，云南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但是，局部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全局的形势，“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但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就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就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

袁世凯得知远在云南的蔡锷都督是一个“危险的天才”时，几经谋划，拒绝了暗杀蔡锷的方案，决定把蔡锷调到北平，名义上是担任经界局督办和将军府将军，实际上是把蔡锷看管起来了。蔡锷明明知道这是袁世凯玩弄的一个阴谋，但是为了保存云南的革命力量，决定置生死于不顾，前往北平。离开昆明以前，蔡锷把朱德所在的第一师部署到滇越铁路沿线。这么一来，朱德在滇越边境上同法国人用新式步枪武装起来的土匪打了两年仗，一直到蔡锷从北平秘密返回云南。

滇越边境，山峦重叠，天气酷热。朱德到达滇越边境时，正是疟疾猖獗流行的季节，山谷中瘴气甚重，加上水土不适应，许多官兵患了严重的肠胃病，有的还传染上了肺病。朱德总是千方百计地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大家练兵的积极性。朱德还经常派人到蒙自去购买报纸和书籍，了解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情况。那时候，欧洲大陆已经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平定土匪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蒙自一带，惯匪头子方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地居民深恶痛绝。朱德下决心要剿灭这股土匪。

1914 年 11 月的一天，朱德摸清敌情以后，率领部队把这股惯匪四面包围。土匪头子方位作恶成性，占据了一间孤零零的房子以后，负隅顽抗。朱德为了使部队和乡亲们少受损失，大胆采用火攻，把这股土匪活活烧死。

建水地区的匪首白万莫卜凶狠残忍，常常带领匪徒血洗村寨，当地少数民族对其恨之入骨。1915 年 9 月 18 日，白万莫卜又纠集了五六百匪徒，突然进攻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土寨渣腊。渣腊人不分男女老少，纷纷拿起土枪和棍棒，进行自卫。但是寡不敌众，土寨被攻破了，土匪任意烧杀抢掠。朱

德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带领全营进抵渣腊，仔细察看地形以后，指挥部队从两个方向围歼了这股土匪。当地群众得知匪首白万莫卜被击毙，无不拍手称快。

每次追剿土匪，朱德总是根据土匪的活动特点和地形情况，精心研究对策，周密制定歼灭土匪的计划。每次作战，或声东击西，灵活机动；或忽进忽退，秘密迅速，经过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斗，平息了一股股匪患。

这一时期，朱德积累了丰富的运用游击战术的经验。

公元 1915 年，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维护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朱德在护国战争中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1913 年，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爬上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向封建帝制迈进。到 1915 年，袁世凯丧权辱国，恢复帝制的活动更加猖獗，想当皇帝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远在云南边境的朱德对袁世凯称帝忧心忡忡，感到非常失望和苦闷。

12 月中旬的一于，朱德在蒙自街上察访时，忽然碰上一位故友。朱德正想开口，那人就象第一次见面似的向朱德行鞠躬礼，就在他鞠躬的同时，朱德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玉阶，今晚务必带着最信任的共和派军官到城外小庙碰头。说完，那人急匆匆走了。朱德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按约到小庙去看个明白。

夜幕悄悄地垂下来了。广袤无垠的夜空里，繁星闪耀，星星发出的毫光，显得那么遥远、深沉，充满着神奇的色彩。朱德带着两名军官来到城外的那座小庙旁，小庙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朱德正疑惑，忽然从树丛中闪出一个人。朱德下意识地按了按腰间的手枪，仔细一看，正是白天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

来人见了朱德，急忙从腰间取出一块碎布递过来，朱德仔细一看，这是蔡锷写给他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12 月 25 日拂晓，蔡锷将率领昆明地区的部队举行起义，宣誓效忠共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袁世凯。蔡愕还要求朱德按照传令人的命令行事。

朱德惊喜万分，问，蔡锷将军回到昆明了吗？

蔡锷将军已回昆明，他要求朱德将军务必于 25 日前返回昆明，参加起义。

原来，蔡锷是由天津辗转日本，潜回云南的。1914 年 5 月 20 日，袁世凯设立立法机关“参议院”以后，在称帝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5 年元旦，“参议院”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每届任期 10 年，还可以连选连任。总统的继任人由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就可以像世袭皇帝一样传位给他的子孙，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变成袁家的“中华帝国”。12 月 11 日，“参议院”以“国民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上“劝进”书，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第二天，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并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国将领蔡愕巧妙地摆脱了袁世凯安插在自己身旁的密探，先到天津，在天津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轮船，再取道印度支那，经过滇越铁路回到昆明，凭借他以前在云南积蓄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

蔡锷潜回云南以后，立即促使云南督军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与罗佩金、李烈钧、何国钧等人组成护国军。朱德也于 25 日黎明率

领一支精锐部队向师部发起进攻，赶走了拥护封建帝制的军官，集合了蒙自的全部军队，朱德向官兵们讲清讨袁大义，宣誓效忠共和，随即指挥部队登上火车，赶往昆明。

当朱德走进蔡锷的护国军司令部时，只见蔡锷面色苍白，两颊下陷，脸上只有两只眼睛还闪闪发光，同两年前分别时判若两人，朱德感到十分惊讶。

朱德，部队都带到昆明了吗？蔡锷的声音很微弱。

朱德点点头，当他得知蔡锷的喉疾和肺结核病已经相当严重时，难过地流下眼泪。在简短的交谈中，朱德感到蔡锷虽然疾病缠身，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护国军主要有两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罗佩金为该军参谋长，当时确定该军的任务是北出四川，然后再进攻武汉。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何国钧为该军参谋长，这个军先出广西、广东，然后相机进取湘赣，得手后再与第一军在武汉会师。朱德被蔡锷安排在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担任支队长（相当于团长）。当时这个军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

1916年元旦，正当袁世凯在北平改称“洪宪”皇帝，接受百官朝贺时，蔡锷在云南昆明的校场上组织护国军誓师，出兵讨伐袁世凯。

当袁世凯得知蔡锷发动“云南起义”时，立刻密令驻守江西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领3.9万人向湘西进攻；密令驻守南苑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第二路军总司令，率领4.2万人向四川方向进攻；密令驻守岳阳的第三师师长、虎威将军曹錕为第一、第二两路军总司令，指挥对滇军作战。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四川。1月16日，蔡锷总司令率领部队向四川进军。第六支队同总司令部一起，日夜兼程，奔赴泸州等地。行军途中，朱德经常对大家说：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朝，打倒了封建皇帝，现在袁世凯又要当皇帝，我们要推翻袁世凯。官兵们由于懂得了护国讨袁的意义，一路上翻山越岭，士气高昂。

共同的革命理想使朱德和蔡锷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当护国军来到四川省叙永县雪山关时，朱德与蔡锷一起登上雪山关，放眼远望，只见雄关巍峨壮观，蜀山层层叠叠，连绵不断。两位将军触景生情，当即合作了一副对联：

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西蜀千军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这一副44字的对联，阐发了朱德与蔡锷讨伐袁世凯的凌云壮志和始终不渝效忠共和的赤胆忠心。

当朱德率领部队来到川滇交界处时，同川军的两个营遭遇了。朱德原以为有一番恶战，谁知这些川军一枪不放，在欢呼声中加入了护国军的队伍。一名军官主动说：敌军司令部就设在长江以南的川南小城纳溪，纳溪有一个电报局，蔡锷将军可以用电报同南方各省的革命军进行联络。

2月17日，朱德率部抵达四川护国战争中的主要战场纳溪附近后，担任第二梯团第三支队支队长职务，指挥部队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纳溪位于泸州南面，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城镇。当时，敌人有四个旅的兵力防守纳溪。2月23日，蔡锷总司令来到纳溪前线视察。当朱德和蔡锷来到前沿阵地上时，蔡锷抬头远望，忽然用手指着陶家大瓦屋问朱德：能不能攻下那处阵地？

一定能攻下。朱德回答。

蔡锷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朱德再一次察看了地形以后，很快挑选 80 名战士组成敢死队。朱德亲自向他们宣传护国讨袁的意义，激发大家的求战热情。他对敢死队员说：“北洋兵师出无名，他们从北方大平原来到南方山地，脚穿大皮靴，连走路都成问题，而我们是护国讨袁的正义之师，人民站在我们一边，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听了朱德的这席话，敢死队员们士气激昂：

深夜，纳溪周围雨雾濛濛。敢死队员们按照朱德选定的路线，悄悄地潜伏到陶家大瓦屋的工事旁。朱德一声号令，敢死队员如猛虎一般突然跃入敌人阵地。正在酣睡的北洋军得知朱德将军的部队已经冲到眼前，一个个晕头转向，仓皇逃窜。这时候，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势如破竹，冲进敌阵，很快占领了棉花坡、陶家大瓦屋等要点，占领了纳溪。

号称“虎威将军”的北洋军总司令曹锟得知纳溪失守，急忙调遣北洋军的精锐部队第七师进行疯狂的反扑。那些天，纳溪前线的敌情十分严重，朱德总是在最关键的地方指挥作战，有时候。连续数餐顾不上吃饭，就投入了战斗；有时候，朱德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朱德不仅同士兵们同甘共苦，还反复向大家宣传：曹锟、张敬尧调集军队向我们进攻，是助纣为虐。别看他们人数多，但北洋军士气低落，丧失民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仇敌汽，就一定能打败北洋军。

朱德的模范行动深深赢得了士兵的心，越是在战斗紧张的时刻，士兵们越是不愿离开朱德。他们爱戴朱德，千方百计地保护朱德，许多负伤的士兵也不愿离开阵地。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朱德总是巧妙用兵，以谋制敌。他常常以一两个连的兵力利用地形巧妙地同敌人“捉迷藏”，迷惑敌人，创造战机。有一天，朱德只带了两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在棉花坡山顶上巧妙地抵制了一个旅的敌人的进攻。

敌人用密集的炮火轰炸护国军的阵地，朱德在指挥炮兵连进行反击时，看见士兵们堆放在前沿阵地上的一排排石头，灵机一动，要大家在每块石头上扣上一顶护国军的大沿帽。士兵们你看我、我看你，不情愿地把帽子扣在石头上，朱德又命令大家迅速撤离阵地。不一会，敌人的炮弹猛烈地落在那些盖有大沿帽的石头上，士兵们恍然大悟，一个个拍手称快。

敌人的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朱德趁机组织部队进行有力的反击。在朱德的巧妙打击下，北洋军张敬尧的精锐第七师被歼灭了 4000 多人，残敌再也不敢同朱德率领的护国军作战了。

棉花坡前线 20 多个日日夜夜的苦战，打出了滇军的赫赫声威。朱德将军的名字威震敌胆，在四川和云南一带广为传颂。

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朱德出生入死，历尽风险。有一次，朱德率领的一团人遭到强大敌人的进攻，被迫退进一个小山窝。朱德集合部队时，发现身边只有六个连了。士兵们疲惫不堪，敌人又开始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朱德发现山坎上有一间茅草房，就决定同几名士兵一起暂时到茅草房里休息片刻，摸清敌情再突围。

朱德刚坐下，突然间“轰——”的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茅屋旁爆炸了，房子在火光中倒塌了，两名士兵也牺牲了，朱德幸免于难。

朱德顾不得抹去满身尘土，立刻把部队带进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这个

山谷，梯田重重叠叠，地形错综复杂。傍晚，朱德让一些士兵脱去军装，戴上斗笠，乔装打扮成农民，到溪沟里去摸鱼，趁敌人不注意，察看了突围路线，并让他们悄悄地把梯田里的水放干了。

黑夜降临了。远山、近村、丛林、上丘全都朦朦胧胧，像罩上了黑色的头纱。朱德带领士兵，踏着放干水的田地，悄悄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泸州，是北洋军在川南的一个重要据点。护国军打了纳溪以后，与泸州隔江相望。3月17日，蔡愕下达了进攻泸州的命令，护国军兵分三路，向泸州发起猛攻。

这是一场有名的恶战。朱德率领部队担任主攻，在血战中，炮火把朱德的衣服帽子都打烂了，战马也被打死了，部队伤亡很大。在战火中，朱德及时调整队形，终于率领部队首先冲进泸州城内。

敌人被歼灭了，朱德勇猛善战的声誉在泸州内外传扬开来，泸州的人民群众张灯结彩，燃放鞭炮，扶老携幼，在道路两旁欢迎朱德率领的护国军。

40多年后，朱德在回忆护国战争时说：由于护国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战斗力也比较强。第一军入川不过六千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

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领部队在云南，广西边境阻止了北洋军的进攻，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在湖南西部的护国军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牵制了北洋军两个师又4个混成旅，而且连克湘西数县。与此同时，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也相继独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兴兵讨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英国、法国，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反当初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联合起来反对袁世凯，暗中支持反袁力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了帝制，不久，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

1917年8月，滇军改称靖国军，朱德升任少将旅长。旅部设在泸州市三牌坊白塔寺侧面的泸州中学堂。旅部门口，高悬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着：“护国军第十三混成旅长朱”。

袁世凯被打倒以后，反对袁世凯的联合阵线也开始分裂。朱德看到，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在革命党内部也开始呈现出分裂状态。许多所谓的革命党人在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新的军阀，这使朱德感到非常失望。1961年10月10日，朱德在回忆辛亥革命时说：“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凯，在中国继续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统治”。

朱德对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一次感到失望当时，朱德辽为蔡锷的健康而深深担忧。护国战争结束时，蔡锷已经病入膏肓了。蔡锷被抬到朱德的司令部附近的住所时，虽然卧床，辽常常把秘书和参谋长叫到床边，研究重建四川的规划。朱德劝了他好几次，蔡锷总是微微一笑，依旧坚持工作。

蔡锷在泸州停留的那几天，朱德时常陪伴在蔡锷的身旁。由于蔡锷的病情日益恶化，他们之间说话下多，但朱德却把对蔡锷的尊崇和爱戴倾注在细

致入微的照料之中。

8月下旬，蔡锷准备赴上海，再东渡日本治病。码头上，朱德握着蔡锷的手，依依难舍。蔡锷声音嘶哑地说：此次东瀛，费时又费钱，是否能够痊愈，难以逆料。古人说，武将不惜死，我能够看到护国战争的胜利，也算满足了。

轮船渐渐远去了，朱德还久久地仁立在码头上，他多么希望蔡锷能早日病愈归来呀！时间仅仅过了3个月，正在四川南溪训练部队的朱德突然得知蔡锷在日本病逝，禁不住失声痛哭。

悲哀之际，朱德提笔写了一副挽联，寄托对蔡锷的思念。朱德写的挽联是：

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

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太难言。

蔡锷的遗体不久运回上海，在上海举行追悼仪式以后，安葬在他的故乡湖南长沙岳麓山。这一年，黄兴将军也病故了。护国战争结束不久，朱德又参加了“护法战争”。这又是一次使朱德感到失望的战争。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在北京城中心那座殿宇重重、楼阁层层、千门万户、巍峨庄严的皇宫内，还保存着一个从事复辟活动的小朝廷，麇集着以张勋为头目的一群晚清遗老遗少。他们在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1916年6月至1917年5月，封建军阀张勋先后在涂州召开了四次准备复辟的会议。7月1日凌晨，张勋身穿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文武官员300多人涌入清宫，拥戴清逊帝溥仪复辟。一些遗老遗少也穿上清朝袍褂，粉墨登场，他们脑后拖着发辫，满街弹冠相庆。一时间，北京城内光怪陆离，乌烟瘴气：

张勋的复辟丑剧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报纸无不“口诛笔伐，痛斥叛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召开会议，明确主张维护《临时约法》，一致声讨清帝复辟，同时制定兴师北伐，“扫穴犁庭”的军事计划，议决派军舰赴秦皇岛相对抗。滇、桂两省的军阀为抵御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也暂时依附在护法的旗帜下，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接着，中华民国军政府领导滇军、粤军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开始讨伐北洋军阀。

1917年9月至1918年4月，四川、湖北、安徽、浙江、湖南、山东、福建、河南等10多个省也兴起了护法军或靖国军，讨伐北洋军阀的烽火遍及全国。那时候，朱德担任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战争中，朱德看到滇桂军阀并非真心护法，而是私自与直系军阀妥协，通电主和。他们还于1918年初组成“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同护法军政府对抗，并派凶手暗杀拥护孙中山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这使朱德非常失望，从内心感到这样的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

1918年初，滇军虽然攻下了自流井，但部队中士兵严重减员，弹药、粮饷十分短缺，部队士气低落。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建议部队在自流井进行休整，认真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数天后，朱德和金汉鼎出面，在自流井召开军官会议。会上，朱德提出了“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的主张，建议停止军阀混战。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傍晚，会议结束了，军官们都三三两两地散去了，朱德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几年来，无数次的征战换来了什么？枪林弹雨中又有多少人能余生？朱德默默思索着连年军阀混战，不由得从心中升起一股厌战之情。他毅然提笔，抒发心音：

百战余生者，
群才可撑天。
从征凭两两，
大将剩三三。

这首诗的末尾，署名：蜀北武夫。诗中的“两两”。是指滇军的第一军、第二军，“三三”是指朱德。金汉鼎等几个军官。后来。朱德还把这首诗写在照片上，送给参加会议的军官。

对于当地罪恶累累的土匪，朱德主张坚决剿灭，毫不手软。1918年2月，惯匪李得屯纠集上千匪徒，渡过长江来攻打泸州，朱德得知后，命令部队在泸州城南门坚决阻击匪徒，激战一个多小时，击溃了这股土匪。当残匪渡江逃窜时，朱德又指挥小分队乘胜追击，使匪徒纷纷落江，葬身鱼腹。

初夏，忠信一带出现土匪骚扰百姓时，朱德亲自率领一个营驻守忠信，在村头路旁张贴出“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诚者免死仍给枪价”的剿匪政策。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土匪的嚣张气焰就被打下去了，忠信一带的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5月底，朱德又率领两个团来到况场、和丰、南城、水冲坝、石棚、大碑、马岭一带剿匪。朱德在况场设立了剿匪司令部，门前竖起一杆大旗，士兵们到各村各庄宣传“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诚者免死仍给枪价”的政策，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把查获的土匪和窝藏土匪的人纷纷押送到朱德的剿匪司令部。对于这些人，朱德常常亲自审理，有恶迹的依法处治。无罪业的当时释放。有一次，朱德在审问一个名叫徐焕廷的人时，经过查问，得知徐焕廷的家庭很贫穷，是被迫当匪丁的，朱德对徐焕廷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以后，把他释放了。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当地的匪患基本剿灭，社会秩序也开始稳定了。当人民群众得知朱德要率领部队返回泸州时，纷纷张灯结彩，燃放鞭炮，摆酒送行，朱德被挨家挨户地请去喝一口酒辞行。忠信、宜民两个乡的民众还各为朱德旅长立了一块德政碑，赞颂朱德的剿匪功绩。

9月中旬，忠信乡各界民众为朱德立的德政碑，正面镌刻着“救民水火”四个大字；另一面的碑文是：

仪陇朱旅长玉阶，勇于治匪。自奉令清乡，不阅月。

而匪焰息。回忆吾泸自去夏至今春，受匪患最深。而忠、崇、宜三镇尤甚。忠信介崇宜之间，为匪集中地，故被害益烈。今者士民安靖，无异畴昔，果谁之赐欤？其于旅长又焉能已于言也，因铃“救民水火”四字于石，以垂不朽。为旅长颂，且志吾痛焉。

忠信阁镇士民恭颂

中华民国七年九月中浣立

宜民乡也为朱德立了一块德政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除暴安良”四个大字；另一面的碑文是：

靖国第二军第十三旅兼四川下南清乡司令官

朱大人玉阶德政

除暴安良

宜民全镇人民同建

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四号谷旦

自从护国战争以来的五年里，朱德在治军之余，忙里偷闲，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主要有两类书，一类是历史书籍，另一类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的政治书籍。

在历史书籍中，朱德经常看《三国志》、《太平天国》等一类书。朱德看《三国志》看得极仔细，常常有感而发，在书上作下眉批，例如，朱德读《三国志·魏本·武帝纪》时，当他读到曹操“置扬州郡长吏，开芍陂（今安徽寿南县）屯田”这一句时，认为曹操当年用大规模屯田来解决军粮是个好办法，就提笔眉批“留薪办法”四个字。当他读到“（建安十八年）刘备袭刘璋，取益州（今成都），遂据巴中”这一句时，认为刘备比曹操和孙策晚二十年建立根据地尽管有其客观原因，却严重影响了刘备的发展，就在一旁眉批：“此时方得根据地，可谓差矣。”当他读到“（初平四年）孙策使袁术使渡江，数年间遂有江东”这一段文字时，深受启发，在一旁眉批：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

从这些三言两语的眉批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朱德对三国时期纷繁复杂的战争情形的深刻见解，也显露出了朱德以史为鉴，从曹操、孙策等人屯兵屯田、积蓄力量、以图发展中，萌发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朱德的这一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得到重大发展，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中“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下真正的出路”的朱德，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开始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那一个时期，中国也有人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毛泽东曾经指出：那个时期，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都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朱德就是受十月革命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名“中国的先进分子”。朱德在回忆离开旧军队、到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寻求革命真理时，寓意深刻他说：“我自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我当时担任云南军队的旅长驻防在四川……当时由于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之间的矛盾，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到了一九二一年滇军回滇时，我就在这年的八月离开了军队”。

《朱德选集》第385页。

《朱德选集》第385、386页。

1922年初，朱德离开昆明前夕，来到昆明市东约3公里的昙华寺游览，昙华寺位于金马山麓的金汁河畔，原是明代光禄大夫施石桥的别墅，崇祯年间才建成一座寺。寺内有一棵优昙树，这棵树相传从印度移植而来，栽在大雄主殿旁藏经楼的偏院内，寺院也因此而得名。情朝未年的注持和尚映空以“善艺花，”而闻名于云南，昙华寺内花木亭亭，四时不谢。

朱德在寺内游览时，看到绚丽多彩的名花佳木，置身于幽静的寺院雅境，不由得回想起多年征战的风风雨雨，心情越来越激动。朱德向映空和尚要了笔墨，当即写下一篇诗文，赠给映空和尚。

这篇诗文后来镌刻在一块青石上，青石立于昙花寺山门内弥勒殿的南壁间，高二尺七寸，宽一尺五寸，甚为壮观。青石上书法挺秀的诗文是：

敬赠映空大和尚雅鉴

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詎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

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万端待

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常谐友游宴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沟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见，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亡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

这篇诗文，表达出了朱德当时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军界奋斗，但结果是国事日非，无济于时艰，内心极为优忿，为找不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而彷徨；同时，朱德又借赞扬映空和尚愤世嫉俗、刚直不阿来激励自己，表现出了朱德放眼国家，寻求真理的鸿鹄之志。

正因为如此，朱德在同孙中山先主的历史性会见中，谢绝了孙中山要他再回滇军的邀请，坚持要出国留学，去寻求革命的真理。

5 马克和美元的兑换出现天文数字。 一位中国将军在德国反思：什么道路 能够救中国

公元 1922 年 9 月。

正是初秋时节。上海连续下了几大雨，外滩显得格外的阴郁和潮湿，像是被一层薄薄的雾雨网住了。朱德踏上了停靠在外滩码头的那艘法国籍“安吉尔斯”号邮轮，到异国土地上去学习知识，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呜——。汽笛长鸣。“安吉尔斯”号缓缓驶出了黄浦江。朱德凭靠在栏杆上，默默地向这座一度使他神往而现在又使他失望的大城市告别。黄浦江的秋景是动人的，明清时候，“黄浦秋涛”一直被誉爲上海的八景之一，每年农历 8 月 18 日，在陆家嘴一带可以看到“银涛壁立如山倒”的景色。今天，朱德丝毫也没有观涛的兴致，而是在苦苦思考着自己的理想和中国的前途。

“安吉尔斯”号驶到了公海上。朱德第一次见到烟波荡荡的大海。以往，他以为大海是一个诡谲多变的怪物；眼前，却是一片黄滔滔的浊浪。风下大，海面上荡漾着一朵朵银白的浪花。海燕贴着水面低飞觅食，海蜃像一把把肉伞似的在海水中飘浮着……孙炳文走过来，轻轻地在朱德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关切地问：玉阶，想家吗？

朱德摇了摇头，两眼依然傲视那海天一色的神秘世界。朱德是同孙炳文结伴同行的。他与孙炳文是挚友，5 年前，他在滇军中担任团长时，就和孙炳文熟悉了。

那一年，朱德的部队驻守在四川省南溪县，孙炳文是回乡探亲时慕名前去拜访朱德的。孙炳文毕业于北平京师大学堂，比朱德大一岁，曾经担任同盟会京津分会文牍部长，积极进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活动，后来因为预谋刺杀原摄政王的事情败露，被袁世凯政府缉捕，潜回四川，以教书谋生，朱德敬佩孙炳文的博学 and 言谈，初次见面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聚谈。五四运动以来，朱德正是在孙炳文的帮助下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知道俄国正在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那时候，他同孙炳文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救国，他们两人都认为，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孙炳文又同他一起踏上了奔赴欧洲大陆的航程，他对自己的选择更加充满信心了。

海水渐渐地呈现出暗绿色，海洋好象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青翠的草原。“安吉尔斯”号航行在南洋的海面上，驶入了新加坡等国的港口。在朱德的脑海里，南洋曾经被看作一个富裕的地方。那时候，有些人一度把南洋看作是天堂，成千上万的华侨来到南洋经商、“挖主”。今天，当朱德踏上这块土地时，才知道有许多来自祖国的人在矿井里、在大种植园里、在风雨溽暑中，干着当地人和白人都不愿干的苦活，祖国同胞在他们用血汗建造的摩天大楼和宫殿般的住宅的阴影下，过着贫困和污浊的生活。严酷的现实仿佛把朱德又置于上海这样的城市中……

“安吉尔斯”号在新加坡停靠了一天，这个“英联邦”的成员位于马来半岛南面，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是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朱德注意到，这个一度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地方，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海洋上的航行是漫长的，也是寂寞的，可是朱德的思维一直很活跃。他

回忆停留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除了拜访孙中山，他还见到了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个国民党的要人物。

胡汉民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曾经两次到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评议部评议员、书记部书记、南洋支部长，当时任中华民国政府的总参议兼书记长，由于胡汉民曾经策划了粤、桂、滇等省的起义，参加了广州黄花冈起义、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朱德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朱德在上海见到胡汉民时，认为胡汉民“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人物”。

汪精卫当时担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是国民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一名重要人物，朱德抱着一种对知识分子很尊敬的心情去访问汪精卫，见面以后，他很快就失望了，他认为汪精卫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

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之后，朱德更加想到欧洲去寻求革命真理了。

洋面上张起了一层淡淡的薄雾，掀起了无数三角形的波浪。海风吹响着桅杆，一阵接一阵地刮过去。在海风和巨浪的“护送”下，“安吉尔斯”号驶到了印度。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大国。朱德在一座座高耸的宫殿之间，看到了布满在黑暗的小巷里的贫民窟，看到了无数赤身裸体的苦力在灼热的阳光和皮鞭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贫穷和被奴役的黑人又映入了来德的眼帘。这引起了朱德的深刻思考，朱德对孙炳文说：看起来，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充满了贫穷、奴役和苦难，中国并不是唯一最悲惨的国家。在漫漫航程中，朱德默默立下誓言：要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奋斗终身。

“安吉尔斯”号在法国的马赛港靠岸了，朱德和孙炳文踏上了这个以法语为国语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自从1789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曾经先后建立过五次共和国和两次帝国，1871年3月18日，法国工人阶级举行的武装起义，曾经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现在，当朱德亲临这个传闻中的近代科学的天堂时，他发现法国工人阶级虽然比中国工人穿得好、吃得好，但同样被资本家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烟刚刚熄灭，法国是战胜国之一。当朱德以军人的敏锐踏进欧洲大战的旧战场时，发现这里并没有留下战争胜利的喜悦，人们把灾难作为谈论战争的一个主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下子打垮了三个王朝，作为战胜国的法国也元气大伤。在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四肢残废的士兵、寡妇和孤儿在游荡……

朱德和孙炳文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里住下了。起初，他们想去游览欧洲大陆上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美丽宁静的塞纳河，雄伟壮观的凯旋门，这些闻名世界的名胜和风景对于朱德和孙炳文多么有吸引力呀！一个偶然的机，朱德得知有一批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旅欧共产党组织，连忙四处打听这个组织的情况。当朱德得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时，再也无心游览巴黎的美丽风光，急急忙忙乘火车前往柏林，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是在1920年11月7日从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号，在邮船最底层的统舱里苦熬了整整36天，才到达法国马赛的。由于有留法教育会的学生干事迎接，周恩来第二天就到了巴黎，当时，周恩来认为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甚至把伦敦看作“世界之缩影”，因此，周恩来于1921年1月5日渡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在英国首都伦敦入学。

同朱德一样，周恩来刚到欧洲，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以尖锐的形式在各个领域爆发，使周恩来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在给天津《益世报》的一篇旅欧通信中谈了自己的感想：“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夫业交困于内外，而覆盖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对于伦敦这个“世界最大都城”，周恩来感觉到，“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但是，由于伦敦的生活费太贵，周恩来又准备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学习。

朱德和孙炳文到法国以后，为什么要到德国去找周恩来？原来，周恩来只在英国留居了近两个月，就回到法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流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很容易找到，各种不同的思潮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是非常能启发人们深入思考的。周恩来在法国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经过深入思考，周恩来终于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留法勤工俭学的许多学生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法国还组织起了自己的社团，以蒙达尼和克鲁邹为中心开展各种活动。

蒙达尼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镇。1920年以来，蔡

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向警予、蔡畅等 140 多名中国留学生先后来到这里学习，这里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比较便宜。李维汉、李富春等人还在这里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制定了“以实行社会革命力宗旨”的章程。蔡和森那时候正在“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也经常参加李富春等人组织的活动。

克鲁邹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赵世炎、李立三、邓希贤（小平）、陈公培、刘伯坚等人都是在该地的施乃德钢铁厂做工的勤工俭学学生。赵世炎在出国前见过陈独秀，到法国后一直和党中央保持联系，国内的党组织也经常寄一些文件给他。

周恩来是从英国回到法国以后，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由于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三分之二以上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停发维持费，这使生活本来已经十分窘困的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上陷入绝境，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纷纷到巴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前请愿示威。在这次大规模斗争中，勤工俭学中的先进分子发出了“赶快团结起来”的呼声。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傅钟等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周恩来最初提议把这个组织称之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确定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次会议还选出了3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当时，周恩来往在德国柏林南郊的一个小镇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马克比价一日数变，大量贬值，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比较低廉，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到柏林可以用3个月。周恩来到德国以后，经常来往于巴黎与柏林之间，在学生中演讲。朱德得知周恩来在柏林时，就急匆匆地赶去了。

在旅途中，朱德忽然想起了在上海与陈独秀见面的情景，那一天，他是怀着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情去拜访陈独秀的。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创办并主编《新青年》，并于次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0年，他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了找到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组织，朱德费尽周折，终于来到了位于上海闸北区的那间简陋的小屋。

朱德轻轻地叩门，等待，又敲门，又等待，好一会，房门才开了一条缝。朱德看到，门缝中有一张略显疲倦的黧黑的面孔，连忙礼貌地凑上前：

请问陈先生在家吗？

那张脸上，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朱德，语调格外沉静：你找陈先生有事？

朱德满脸含笑地说：我是从云南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和陈先生谈，请你转告陈先生一下。

门随即开大了，朱德面前是一位穿着一身陈旧而笔挺的绽青色绸袍的中年人。他笑了笑，表示歉意，说：我就是陈独秀，你请进。

朱德跟随着陈独秀穿过一段狭窄昏暗的过道，走进陈独秀那间零乱地塞满各种书籍的房间，陈独秀指了指书架旁那把旧藤椅，和气他说：请坐，不知你有什么事情要同我谈？说着，他拉开写字台前那把木椅，稳重地坐下了，两眼凝望着朱德。

面对这位崇仰已久的共产党的主要人物，朱德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思考片刻，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的前后经过都讲了出来，明确表示到上海来寻找共产党，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愿望。

起初，陈独秀十分认真地听朱德讲解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但当他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旅长时，脸色骤变，双眉蹙在一起。陈独秀片面地认为，这位“军阀”一定是在滇军里混不下去了，才来找他另谋生路的，对于朱德提出想参加共产党的请求显得很冷淡。

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以后，陈独秀说：我可以坦率地对你说，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无数的艰难困苦呀！

这没有什么，朱德立刻豪爽地说，只要中国的百姓能够得到解放，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昌盛，我个人吃苦也甘之如饴。

陈独秀点了点头，忽然抬高嗓门说：参加共产党，就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力自己的世界观。你是一名行伍出身的旧军人，恐怕还要有一个脱胎换骨般的思想转变呀！

朱德笑了，话语格外恳切和真诚：当然，我要与广大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起共同战斗，是需要进行思想转变。但是，我申请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已

经思考很久了，请你们相信我的决心。

陈独秀点燃一支烟，一边抽一边默默地思考。他喷出来的烟雾中似乎有无数个问号：这个来自云南边疆的一旅之长，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共产党呢？他狠狠吸了一口烟，两眼凝望窗外，字斟句酌地说：朱先生，这件事是不是以后再说？

一阵难忍的沉默。

朱德把冲到喉咙口的话又收了回去，他没有再说什么。他感到意外，他敲开了革命的大门，但这扇门却对他紧紧地关闭着，难道像他这样行伍出身的军人就没有资格参加革命？

他没有失望，当他走出那间沉闷的斗室时，迎面射来一束耀眼的阳光时，他兴奋地抬起头，仰望无限广阔的蓝天，他觉得自己的革命信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了。

今天，他要在异国的土地上去寻找周恩来，周恩来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了，会下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他拒绝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消散。

列车进入柏林时，已经黄昏了。火焰一般燃烧的晚霞遮掩了半个天空，地平线上显得更明亮更清湛了，半圆的月亮渐渐地露出一张金黄的脸，朱德和孙炳文一起来到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轻轻敲了敲一幢楼房的门。

门很快就开了，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人很有礼貌地问朱德，你们找谁？

我们找周恩来。

我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作了自我介绍以后，热情地把朱德和孙炳文领进屋，一边沏茶一边说：坐，快坐下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朱德见周恩来热情而又诚恳，心中的疑云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俩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朱德诉说，当他听到朱德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时，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愿意当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11月，朱德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同孙炳文一起，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朱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朱德在柏林住了一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德的共产党员身份对外界是保密的，但他经常同周恩来等人接触，接受党的指示。那个时期，朱德带着中国驻柏林领事馆的介绍信，到柏林及其附近的工厂、矿山进行访问，他还常常同德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条件，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马克贬值和繁重的苛捐杂税把劳动人民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柏林，资产阶级和官僚政客倚仗权势，欺压人民，过着豪华奢侈的腐朽生活，劳动人民却相当清贫和困苦。

每一次出去采访，朱德总是把了解到的各种情况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朱德进一步认识到，国内一些人传说的认为“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生活过好”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朱德在访问了德国许多地方以后，深有体会地说：我放弃了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中国的信念。在我看来，像这样拥有熟练技术，这样有纪律、有文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本身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在战争中仍然是败下阵来，却又让中国也步

其后尘，岂不非常愚蠢？

朱德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却遇到了语言这只拦路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没有翻译成中文，要学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首先要闯过语言这一关。

那一年，朱德已经 36 岁了，在这个年龄段里，要克服记忆上的困难，像中学生那样长时间地埋头在书堆里，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经埋怨德文和中文毫无联系，但他很快在若尔提夫人和留德同学的帮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去攻读德文。他像当年学习古汉语一样有条不紊，他甚至把柏林地图上的每一条街、每一处机构都标上了中文注音，他还参照地图徒步考察沿路的博物馆、学校、画廊和啤酒酒店。走访当地的居民时，朱德不但了解了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对他学习和提高德文也有极大的帮助。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朱德不仅能用德语会话，也能熟练地阅读德文报纸了，他开始更加认真地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每当读到一些重要的段和句，他都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他开始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分析十多年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

有时候，朱德学得实在大疲倦了，就放下书本，到美术馆、歌剧院、工厂或者大街小巷去“换换脑筋”，甚至到郊外的布登湖、绿森林等地去旅行，但朱德去得最多的是柏林的军事博物馆。

一天，朱德信步所至，又来到柏林军事博物馆。当他仔仔细细地研究博物馆中陈列的武器和德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缴获的旗帜时，突然看到了德国强盗 1900 年在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缴获的旗帜和武器，他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目瞪口呆。在这几面中国人用来号召反抗侵略的旗帜面前，朱德凝视了许久许久。他仿佛回到了义和团的勇士们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岁月，他自己也在这支队伍里奋勇冲杀，经过一次次顽强战斗，终于把外国侵略者赶下海去了……

这以后的许多天里，每当朱德来到柏林军事博物馆附近时，眼前总会出现那种带领军队浴血奋战的幻想，他似乎看到了一些德国士兵竟然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了，他指挥大家奋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敌人常常闻风而逃。

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朱德回忆起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时，总是这样说。

在柏林，朱德把邓演达看作一位新朋友，常常拉着他出去散步，去访问工人。邓演达是广东惠州人，比朱德小 9 岁。在旅欧学生中，邓演达被看作一名才华横溢的青年军官。邓演达 12 岁进黄埔陆军小学，后来又相继毕业于广东短期军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1920 年曾经参加广东政府的护法军队，担任护法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和步兵营营长。那时候，朱德同他一起，都是为了护法而在战场上搏斗，但彼此并不相识。到达柏林以后，两人讲起护法战争，就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演达，出去遛一圈。

朱德发出邀请时，邓演达总是站起来就走。散步时，邓演达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参加护法战争的那些精彩片断，讲述陈炯明叛变时的腥风血雨，讲述他在“永丰舰事件”后见到来庆龄和受到孙中山先生重用的情况。朱德

有时候听得极耐心，有时候又回想起一连串难记的德文单词，他甚至想把邓演达的话翻译成德语，他默默地背诵着、思考着。每当这时候，朱德甚至可以走一个下午、一个晚上，邓演达却没有这种耐心，有时候，他强拉着朱德回宿舍；有时候，他干脆自己一个人往回走。

有人寻找朱德时，邓演达总是说：这个城里哪里都能见到他。邓演达很早就回国了。黄埔军校成立后，邓演达曾经担任教育长。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邓演达曾经著文号召讨伐蒋介石。他的反蒋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嫉恨，1931年被蒋介石下令杀害。

1923年5月，朱德来到德国南部哥廷根市最古老的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在社会学专业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只要有时间，朱德还研究军事，去听其它课程，他觉得这样收获更大，还可以进一步学好德文。每周三晚上，这个学校的中国共产党支部成员在一起举行讨论会。讨论会异常热烈，大家在学习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通信集》等著作和共产国际出版的《英特纳雄耐尔》、《国际通讯》等刊物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等一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讨论中，朱德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

这个时期，朱德住在马克思·菩朗克大街3号的一座古典建筑样式的三层楼房里，学习非常刻苦。多年以后，这层楼房的主人还回忆说：当年有一个很有礼貌的中国房客住在这里，他从不打扰别人休息。他总是一个人手不释卷地坐在窗前读书，只有星期日有中国朋友来聚会时，才会听到他的谈话声和爽朗的笑声。这位中国人爱做咖喱饭，爱吃辣子。

1924年春寒乍暖的一天，朱德正在宿舍里聚精会神地看书，忽然听到几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孙炳文，孙炳文身后还有一位朱德不认识的中国人。

孙炳文一边进屋一边说：玉阶，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刘鼎同志，是大家选出来的中共旅德支部书记。朱德连忙招呼刘鼎坐下。

刘鼎刚到德国，他给留德学生带来了许多国内的新闻。为了推动国民革命，他还先后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传达了国内的一些文件。当时，国民党旅德支部早已涣散，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建议进行改组，吸收了赞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员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被选为旅德支部的组织主任，今天，孙炳文是特意陪同刘鼎来看望朱德的。

异国相逢，朱德格外热情，他紧紧握住刘鼎的手说，欢迎！欢迎！你来了，我们这里的力量就更强了。

三人坐定以后，刘鼎介绍了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情况，又拿出几份文件递给朱德。接着，他就讲起了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决心同俄国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开始整顿和改组国民党的情况，讲到了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新政策。

朱德听了，十分兴奋他说：浚明（孙炳文同志的字），你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在上海同孙中山先生那次见面吗？那时候，孙先生就感到军阀势力靠不住，国民党要吸收新生力量，国民革命要找新的出路，采取新的政策。现在，孙先生的新政策果然提出来了。好呀！说到这里，朱德高兴得笑起来。我赞成党的国共合作政策。不过，推进国民革命，任重而道远哪，我们这些身在国外的人也得抓紧呀！

那些天，孙炳文和刘鼎就住在哥廷根，住处离朱德寄宿的地方不远，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朱德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对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也抓得很紧，一些中间派甚至少数右派国民党学生经过朱德的宣传教育，纷纷加入国民党旅德支部，中国共产党在哥廷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也日益增长。

在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朱德的学习精神和品行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朱德认真学习的毅力和意志使熟悉他的德国人深受感动。他们说：一个中国将军到德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么刻苦，我们德国人更应该好好学了。

在轰动哥廷根城的“退楼事件”中，朱德的品行又感动了当地居民。

原来，留德学生会曾经用5美元买下了当地一栋不算小的楼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在沉重债务的打击下，德国经济崩溃了，马克大幅度贬值，一度跌到2.4亿马克兑换1美元，直至跌入用天文数字来兑换。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借机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使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也换不来几片面包，饥肠辘辘的德国人民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朱德十分同情德国人民的这种处境。

有一天，朱德忽然听说房主已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这栋以5美元卖出的楼房，法院已经送来传票。当时，一些学生感到很气愤。

有的说：买卖楼房是双方情愿的事，怎么能反悔，有的说：给他马克吧，他要多少给多少，反正马克不值钱。

朱德经过冷静的思考，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给房主。他对大家说：世界上哪有五个美元买一栋楼的便宜事？德国经济崩溃，老百姓可遭殃了。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才使马克和美元的兑换出现天文数字。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退还原主。朱德还表示，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做，就由他出钱赎这栋楼，再交给房主。

朱德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深思考，大家都同意朱德的意见。

法院开庭那天，朱德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学生会代表实际上是在法庭上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们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野蛮的经济掠夺，公开声明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同情德国人民，当场宣布不要赎金，把这栋楼退给房主。

中国留学生的举动使许多旁听的德国人非常感动，房主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个劲地点头致谢。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哥廷根城。当他们知道退楼是朱德将军的主意后，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朱德。在德国人看来，将军是同公爵一样显赫的重要人物呀！许多德国妇女在街上遇见朱德，都向他行礼致意。

在留德学生中间，朱德年龄大，阅历丰富，认识问题更为深刻、更为现实，每当大家对某个问题发生分歧时，都想听听朱德的意见。有一次，大家在讨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争论不休。

有人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到处都安上了营养输送管，吃饭就不成问题啦，肚子饿了就把龙头拧开，就像喝自来水似的很快就饱了。

有人说：科学技术发展了，反动统治阶级就被打倒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都不存在了。

朱德听了微微一笑，十分认真地说：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我们征服自然的

重要成果，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会被资本家当作压榨工人阶级的桎梏。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我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中国太贫穷落后。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中国如果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和帝国主义，中国就难以改变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

同学们听了，都钦佩朱德的真知灼见。

1924年，朱德离开哥廷根市，回到柏林，开展组织新建的国民党支部的工作。那时候，朱德已经能用德语会话，能够理解专业性很强的德语学术讲演了，因而他又承担起了新的工作。

自从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后，国共合作的进度加快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却千方百计地阻止国民革命的进程。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批受国内反动派怂恿和操纵的官僚、地主的子弟开始组织青年党，与国民党左派相对抗。为了大造革命舆论，与这些官僚、地主的子弟进行有效的斗争，朱德开始创办和发行一份中文周刊——《明星》。

办刊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宣传工作，朱德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主办这份油印的刊物上。有时候，朱德写文章、刻蜡板、操作油印机，弄得衣服上也沾上了油墨；有时候，朱德又去写邮寄姓名、地址，包扎，贴邮票，送刊物，从发行主任到零碎的杂活，朱德样样都干。这份刊物，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旅欧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为了坚守这个办刊物的阵地，朱德曾经同右派学生力争夺留学生总会办公室而发生了面对面的斗争。

中国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繁华的康德大街的一栋楼内，一共有七八间房子，地方较为宽敞。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的学生都有钥匙，到这里来参加活动时，各自开锁进门，自由出入。

一于，几名国民党右派学生突然宣布占领学生总会，还把门锁换了。他们贴出布告说：过去这里被共产党霸占了，现在他们要收回去。

面对右派学生的无理取闹，朱德和孙炳文等人决定重新换锁，同时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声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旅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会所。

右派学生不甘心。有一天，他们趁朱德、孙炳文、刘鼎等人正在总会会所装订刊物时，突然结伙闯进来，寻衅打架，由于朱德的英勇无畏，把这帮国民党右派学生吓跑了。事后，刘鼎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朱德同志一看来者不善，迅速抓起一把椅子往地上一摔，随手抄起两根椅子腿，往墙根一站，像一尊怒目金刚，冲着那群右派学生大声喝令：

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那群右派学生定眼一看是朱德，没敢轻举妄动，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我们开玩笑说：朱将军，你真把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威风拿出来了。

朱德同志听了哈哈大笑。

这以后，国民党右派学生再也不敢来干扰朱德他们主编和发行《明星》这份刊物了。

在德国，朱德不仅在国民党右派学生面前显得那么刚毅、坚定，对于德国当局那些损害中华民族声音的行为也毫不妥协。有一次，一些别有用心分子竟然将亚、非、拉一些国家和地区落后的东西收集起来举办展览，

其中有中国女人的小脚鞋、男人的长辫子、鸦片烟具等，有意丑化中华民族，败坏中国的声誉。这件事激起了留德学生的愤慨，朱德决定组织大家举行一次抗议行动。

星期天上午 10 时，一些中国留学生冲进展览会，把所有丑化中华民族的展品全部弄出来，就地焚毁。德国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包围了展览会，逮捕了好几名中国留学生以后，朱德又以学生会的名义迫使北洋政府驻德公使出面，同德国当局进行交涉，把被捕的学生都营救了出来。

朱德身在异国他乡，对中国国内的革命依然十分关心。1925 年，当朱德得知孙中山先生为了推进国民革命，抱病北上，于 3 月 12 日 9 时 30 分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 5 号因患肝癌不治，溘然与世长辞时，心情非常悲痛。上海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他和孙中山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为了悼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同留德的海外学子一起在柏林举行追悼会，用中文和德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登载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他致苏联的遗书，追述了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为拯救中国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在追悼大会上，朱德沉痛他说：四十年来，孙中山领导着中国革命，现在，他的决定性的双手离开了国家生活的舵轮。人们像失去亲人一样悲痛和哀伤。

追悼会以后，朱德和学生们一起举着旗帜和大标语，迈着庄严的步伐，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北洋政府驻德大使馆门前时，一些学生挺身而出，在街头举行演讲。一时间，追悼会变成了声讨会。

1925 年 5 月 15 日，上海日本纱厂顾正红等 10 多名中国工人被资本家打死打伤，引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30 日，上海各界上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美帝国主义当场打死打伤游行群众数十人，造成了著名的“五卅惨案”。这一消息传到柏林，中共旅德支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中国留德学生的名义通电全世界，强烈抗议英、日帝国主义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朱德还提出，党支部应暂时放弃其它工作，“全力投入这一运动”。

会后，朱德又组织留德学生把北洋政府驻德大使馆团团围住，强烈要求魏宸祖公使支持留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要他公开谴责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行为，还要求他在留学生的通电上签字。当卖国公使魏宸祖躲而不见时，留学生在使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从一个柜子里把魏宸祖拖出来，迫使他在“通电”上签字。这件事在中国旅欧学生中影响很大，法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也纷纷举行游行，发表爱国通电，也要求驻该国公使在通电上签字。

当朱德看到英国的一家报刊诬蔑“五卅”运动“是中国盲目的仇外运动”时，又以留德学生会的名义致函柏林报界，郑重声明：“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当英、法帝国主义者把许多声援“五卅”运动的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时，朱德主动与德国共产党联系，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留学生送到苏联。

朱德还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希望能到莫斯科学习军事。当时，朱德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朱德虽然没有立即离开德国，但他的革命生涯完全实现了“终身为党工作，作军事运动”的宏愿。即使身处德国，朱德也十分关注军事活动。

有一天，朱德参观了德国共产党举办的“军事检阅”。这是一次由德国

青年工人组成的“红色前敌”组织所进行的一次群众性活动。这个组织约有20万人，他们在德共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的率领下，自带干粮和帐篷，在柏林进行野营军事演习。演习持续了10多天，每天参观演习的人达数万之多，许多人还主动给“红色前敌”的战士们送面包等食品。朱德观看了异国他乡的“军事检阅”以后，深有感慨地说：在中国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演习场面，了不得。现在这些人全部拿着棍棒，一旦拿起武器，就是工人阶级的军队，夺取政权是完全可能的。中国革命也需要建立武装。

朱德参加的这些革命活动，引起了德国当局的关注和不安，他们很快开始压制和打击中国留德学生的正义斗争了。7月初的一天，朱德和9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到柏林体育馆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一次群众抗议大会。集会结束后，朱德刚刚走出体育馆，就被数名德国警察围住了，警察把朱德带进了一辆黑色的囚车。朱德责问警察，警察恶声恶气地说：德国政府已经发布特别命令，中国人不能参加这类集会。

自从来到柏林这个地方，朱德曾经两次被捕。

第一次是在出席世界学生大会时，德国宪警借口有人要在一个大教堂里炸死一名保加利亚人，拘捕了包括4名中国人在内的30名学生，朱德也被宪警拘捕了。28小时以后，德国宪警无可奈何地把朱德释放了。

第二次是参加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会后，朱德也被德国警察拘捕了，这一次，朱德被拘留了30个小时。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朱德又第三次被拘捕。

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囚车向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监狱急驶。朱德在想，在参加集会之前，《明星》周刊还有两篇文章没有编好……

28小时过去了。

30小时又过去了。

德国当局没有释放朱德，而是绞尽脑汁地要找出一点法律根据，来拘留朱德。对此，朱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十多年以后，朱德在回忆这次被捕时，风趣地说：“我以前被关过两次，每次都被释放了。”“这次被捕，我一点都不着急。我倒好奇地想见识见识关在牢里是什么滋味，狱中平静、安宁，我苦干了几个月，倒是借此补充了睡眠。每天早晨，一个看守走进我的小牢房，在桌上放下一杯稀淡的咖啡和一块黑面包。吃完后，我就做体操，唱几首歌来消磨时间，然后又上床睡觉。中午和晚上，看守又进来，在桌上放下一盘豆子和一块黑面包，便走出去了”。

这样的日子一共过了10天，朱德和其它被拘留的人都被带到法庭上，法官胡乱问了几句，就说：你们都是捣乱分子，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德国。

出狱后，朱德才知道，由于德国共产党的多方营救，德国政府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被迫释放中国留学生。德国共产党还以德国红色救济会的名义替朱德买好了火车票和船票，办理了进入苏联的护照。

1925年7月，朱德带着三十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横渡波罗的海，前往列宁格勒。

苏联是中国的邻邦。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这是朱德的一个心愿。

朱德到达苏联以后，很快来到莫斯科郊区的莫洛伙夫卡村，参加共产国际在东方大学举办的短期军事训练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把旅欧总支部先后到达莫斯科的几十个人编成一个队，由朱德担任队长，在东方大学学习军事。

东方大学的许多教员都是由共产国际选派的知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职业革命家和游击战专家，各门课程要求都很严格。朱德在军事上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造诣，上课下课，朱德都能熟练地掌握课程内容，融会贯通。有的同志学习上有困难，朱德总是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为他们“开小灶”，许多人称赞朱德是“我们的实际教官”。

课余时间，朱德辽同大家一起操练步枪、机枪、迫击炮，投掷手榴弹，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军事技艺。

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朱德曾经提出，回国后将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于2月下旬在北平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朱德与房师亮等人一起，在5月18日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轮船返回祖国。三年半过去。朱德将军对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中国革命应怎样进行等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把这一时期看作人生旅途的一个重大转变。他回忆说：“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它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6 蒋介石到军官教育团训话：我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最革命的主义”。朱德告诫学生：要防止扒手强夺革命果实

7月的上海，天气很热，阳光很足，人们都想法子往荫凉的地方走，街上也显得安静多了。朱德已经40岁了，但当他回到离别4年的上海时，心中依然有几分激动了。

4年了，朱德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迫切希望党组织尽快分配任务，尽快加入到中国革命斗争的热潮中去。他来到上海闸北区的一所房子前，按照预先约定的联络办法，去寻找党组织。

4年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26年初，广东、广西统一以后，广州革命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广州革命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反动军阀，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有20万人，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陕西一带；孙传芳有20万人，主要控制了东南五省；张作霖有35万人，主要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地区。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了扑灭南方的革命烈火，准备联合起来“南伐”。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确定了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将北洋军阀各个击破的战略，调集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人，先发制人，出兵北伐。5月份，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首先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正式开始北伐战争。

7月份，北伐军顺利打下了长沙。为了尽快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军非常需要北洋军在上海的兵力部署情况。党组织考虑到朱德的特殊身份，决定要朱德在上海搜集北洋军的各种情报。

朱德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这一任务以后，决定先去找过去滇军中的同事和讲武堂的同学。朱德在云南担任过宪兵司令、警察厅长，在护国军中也颇有威望，旧时的许多同事都在上海，有的经商，有的在军界，这些人见了朱德，都分外热情。朱德在同他们叙旧和闲谈中，了解到了许多有关北洋军阀的情报，这些情报对在前线作战的北伐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一带，当时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1921年升北洋军第十八师师长。1923年率领北洋军进入福建，驱逐了在福建的皖系势力，自任福建督理。第二年又通过齐卢战争增强了实力，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1925年10月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只用5天时间就驱逐了驻守在沪宁的奉军，占领了福州，控制了东南五省，成为北伐后期的最大军阀之一。江、浙一带，也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迹的地方，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向湖南、湖北进军的同时，第一军也开始向福建、浙江进军，北伐军很需要了解孙传芳的有关情况。有一天，一位同事把朱德介绍给孙传芳的一名参谋时，朱德逢场作戏，同这位参谋一谈就是3个小时，富有军事经验的朱德在言谈之中，把孙传芳的实力和军事部署摸得清清楚楚。不久，当孙传芳指挥部队在南昌、九江与北伐军发生激战时，朱德作出的军事判断对北伐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8月上旬，北伐军李济深军长率领的第四军、李宗仁军长率领的第六军和唐生智军长率领的第八军沿汨罗江与吴佩孚的北洋军对峙，当时任讨贼联

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的态度如何，对北伐军继续北上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说服杨森不反对北伐军进军湖北，不支持盘踞在武汉三镇的吴佩孚的军队，党组织决定派朱德前往四川万县，做杨森的工作。

朱德同杨森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朱德出国前，杨森曾经希望朱德回国后再回四川，他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当时杨森带领10万军队驻守在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一度与长江中游的吴佩孚有默契。出于上述考虑，组织上决定让朱德去劝说杨森。

朱德乘轮船西进时，曾经在汉口上岸。武汉三镇已经戒严，北洋兵不分昼夜在街上巡逻，任意搜查行人，一旦发现有人拒绝搜查或逃跑，就开枪射击。见这情形，朱德干脆打扮成阔商模样。在武汉见了几名负责军事和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朱德在街上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北洋兵去查问。

8月11日，朱德到达万县。

杨森得知朱德回国以后果然来找他，以为朱德有意和他合作，非常高兴，把朱德当作嘉宾接待。

当朱德把国民党代表的证件递给杨森时，杨森满脸堆笑，连声说：好说！好说！我杨森也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嘛！

朱德深知杨森是个善于投机取巧、朝秦暮楚的两面派，月前刚刚宣布就任吴佩孚委派的四川省省长一职，现在又说“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对于杨森的这一态度，朱德心里还打了一个问号。言谈之中，朱德不断地向杨森讲述北伐战争以来的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朱将军，国民党能给我多少钱？部队要有钱发饷呀！果然，杨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钱的问题。杨森同其他军阀一样，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就同谁站在一起。他以为朱德一定给他送钱来了。为了钱，杨森几乎不择手段，在川东一带，他不但收老百姓的税，而且对所有的过境货物都收“过境税”。英国和其它外国船只过长江时也要收“过境税”，这在外国人享有特权时是一个大胆的行动。

我并没有带钱来。朱德说得很干脆，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一定胜利。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

杨森听了，没有表态，但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北伐军能不能像朱德所说的那样取得全胜，他还要骑墙观望。国民政府没有给他钱呀，一旦他宣布效忠武汉政府，吴佩孚就不再接济他，他杨森不干这种事。

出乎杨森意料之外的是，北伐军进展神速，朱德接连告诉他一个接一个惊人的消息。朱德还说：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吴佩孚是爬上火车逃回武汉的。对此，杨森很惊讶。汀泗桥是鄂南的门户，粤汉铁路上的一道天险，易守难攻，吴佩孚亲自率领主力2万余人在汀泗桥固守待援，想不到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突破了吴佩孚部署的坚固阵地，顺利攻克了汀泗桥。

但是，杨森还是踌躇不决。

朱德对杨森说：北伐军很快就要打下武汉了。

杨森只是一声冷笑，似乎看不到吴佩孚的末日。

正在这时候，四川万县发生了“万流轮”事件。朱德因势利导，促使杨森的部队转向革命阵营。

“万流轮”是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商轮。1926年8月29日，“万流”号沿长江上驶万县。杨森部官兵分乘两艘本船，准备搭乘“万流”号回万县。谁知当“万流”号接近木船时，突然加快航速，浪沉了杨森所属的两只木船。这两艘木船上装有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的盐款及粮税各款85000元，枪支56支，子弹5600发。船沉没后，不仅款银和枪支、子弹丢失，船上58名官兵全部溺水而死，杨森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询问朱德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朱德也义愤填膺，鼓励杨森坚决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正义的抗争。

当“万流”号驶抵万县时，杨森命令轮船检查长率领8名士兵前往检查，并询问在云阳肇祸的经过。谁知停泊在万县港口的“柯克捷夫”号军舰也派全副武装的海军官兵登上“万流”轮，强行解除了杨森所属官兵的武装，还开枪打伤两名士兵，并让“万流”轮离开万县上驶。

杨森更加愤怒，命令部队立即扣留英商太古公司的“万县”、“万通”两艘轮船，当“万流”轮停泊在陈家坝码头时，杨森也派部队将其扣留，并向太古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

但是，谈判毫无结果。

针对这个事件，朱德对杨森和他的士兵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国的宣传教育，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川军58名官兵惨死的第4天，朱德还同陈毅一起在万县图书馆阅览室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商人、士兵等各界代表50多人参加的会议。陈毅那年曾在中共北平地委工作，后来受李大钊派遣，随他留法的学生、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从北京来到万县，在万县第一次见到朱德。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争取杨森。朱德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帝国主义列强派出军舰侵略中国，他们敌视中国人民，在我国内河肆意横行，草菅人命，撞沉我船只，这是对中国人民的直接迫害。这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独立和人民生存的大事。我们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独立，人民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朱德还号召，大家要坚决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杀人罪行。

朱德和陈毅还派人到重庆、成都等地呼吁声援，形成了一股震撼巴蜀大地的反帝惊雷。

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9月5日，英方将原来停泊在宜昌的“嘉禾”号军舰调到万县，在“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的掩护下，突然向被川军扣留的“万县”、“万全”两艘轮船冲击，抢走两艘轮船上的全部船员，毙伤了几十名川军士兵。当他们的暴行遭到川军抵抗时，英国军舰竟然对长江两岸的南津街、陈家坝、万县县城和杨森省长的公署用排炮轰击，炮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时间，万县城内一片火海，千余家民房被击毁、焚毁，人民死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十分惨重，制造了一起罕见的“万县惨案”。

那天下午，朱德正在寓所阅读一部《太平天国》，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即刻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杨森的指挥部。朱德对杨森说：英帝国主义竟敢如此狂妄地屠杀中国人民，你应该立即派兵封锁长江，截击英国军舰，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些杀人凶手。

在朱德的敦促下，杨森命令炮兵部队和江岸部队互相配合，坚决还击，将一艘英国军舰击伤，杨森的宪兵司令于渊还率领手枪排同英军进行搏斗。

英国侵略者一手制造“万县惨案”的消息传开后，全中国人民无比愤慨，重庆、汉口、上海等地的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一份措

词强烈的声明，抗议英军的暴行，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历数和抗议英国军队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下丢失武汉、逃到河南郑州的吴佩孚为了博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公开倒行逆施，责令杨森立即释放被扣的英国轮船。

朱德知道后，在杨森面前严厉谴责吴佩孚的倒行逆施，反复劝说杨森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向北伐军靠拢。

杨森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吴佩孚已经遭到惨败，就明确向朱德表示，愿意“效忠”广东国民政府，拥护北伐。朱德见杨森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经做出抉择，就到武汉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报告杨森的意图，邓演达听后很高兴，高度评价了朱德的工作成就。

由于杨森拥护北伐，使长江上游的形势趋于稳定，北伐军能够集中兵力歼灭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

杨森是个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人，当朱德再次返回万县时，险遭杀身之祸。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广东国民政府得知杨森愿意效忠国民革命、拥护北伐战争以后，即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委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代表兼该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朱德就可以用合法的身份在杨森的部队里开展政治工作了，朱德临走前，邓演达要他挑选了三四十名政工人员随行，以便在杨森的军队里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

杨森接到朱德带回来的委任状和关防时，还显得很高兴，可是当他看到国民政府派出了几十名政工人员，又听说这些人要按照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就惶恐不安起来，竟然派出了暗探和特务去监视朱德和政工人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设立政治部，这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而建立的一种制度。孙中山的本意是防上军阀的兴起。孙中山在斗争实践中看到，以往有的将领把军队看作私人财产，从而演变为军阀，设立政治部是为此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孙中山还希望这些政工人员给广大官兵讲解革命的纲领、政策、目标，要求政工人员动员工人和农民支援北伐战争。当时，许多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和左翼国民党员。对此，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和杨森等人犹如芒刺在背，不择手段地阻挠政工人员开展工作。

朱德不顾杨森采取派人监视、暗探等种种法西斯手段，巧妙地利用合法身份，在川军中宣传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帮助官兵理解和掌握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军阀，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道理。杨森对此很反感，有一天，终于同朱德面对面地发生了争执。

朱将军，国民政府让你带多少钱来改编我的部队？杨森皮笑肉不笑地问。

朱德也淡然一笑，说：没有钱呀！你也知道，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北伐战争，面临严重的经费困难。

可是，我的官兵总得发饷吧？

这句话，杨森在朱德面前不止说一次了，今天，朱德直截了当他说：对，官兵需要粮饷。可你在川东收的捐税和田赋，完全能够维持部队的粮饷。

杨森又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和刁难朱德，明知国民政府没有给钱，却开口就向朱德要钱。他哪里知道，朱德当时拿的军饷，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当时，国民政府曾经命令杨森调部队去攻打吴佩孚的北洋军。当时，吴佩孚的主力已经被北伐军打垮了，川军出动，只是加速北洋军的崩溃，但杨森百般敷衍，勉强调一师兵力到宜昌附近，又按兵不动，却向朱德诉苦说：吴佩孚是我的老朋友，他曾经帮助我在四川站稳了脚跟，谁也不忍心打老朋友呀！

朱德深知杨森的行为反复无常，就抓紧时机在川军官兵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官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一位参谋还悄悄告诉朱德，在朱德回武汉时，杨森曾经同吴佩孚的代表秘密接触。这个情况引起了朱德的高度警惕。

一天夜里，朱德刚刚上床休息，忽然听到有人轻声敲门。

谁？朱德一骨碌坐起来。

朱将军，是我呀！

朱德一听，知道是杨森的参谋，正想点灯，却被来人制止了。黑暗中，那人说：朱将军，杨森又把赌注押到吴佩孚身上了，他将和吴佩孚一起率领部队向武汉反扑。为了表示他脱离国民政府的决心，他还要对你和全部政工人员下毒手呢！朱将军。你千万要小心呀！说完，那人转身走了。

朱德回忆起杨森这些天的举动，认为来人通报的消息是确实的，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杨森的一些不正常举动，于是马上通知政工人员，连夜撤出第二十军，离开万县，翻山越岭，直奔武汉。

10天以后，朱德在武汉给杨森拍去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只有17个字，却使杨森心惊肉跳。

兹警告，如敢与我为敌，必将全部消灭你们。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上，并试图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决定让朱德再回四川，同刘伯承，杨闇公一起领导泸州、顺庆起义。

当时，四川被杨森和刘湘的部队控制。杨森和刘湘的野心都很大，每时每刻都想吃掉对方，独霸四川，在北洋军阀的势力急遽衰败，杨、刘两人之间的摩擦日益表面化的情况下，中共重庆地委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军事斗争，策应北伐。

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省内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数量，驻防地域，派系渊源、政治态度和战斗力情况。8月上旬，刘伯承和吴玉章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也提出了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者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的设想。重庆地委还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著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重庆地委还提出了在泸州、顺庆一带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对重庆地委的建议十分重视，看到了“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决定派人加强四川的军事运动，组织部队配合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同杨闇公、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211页。

《刘伯承传》第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11月中旬，朱德来到重庆浮图夫，同杨闇公一起在刘伯承家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朱德、杨闇公、刘伯承三人组成，负责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杨闇公，名尚述，是四川潼南人。他虽然出身封建地主家庭，但少年时期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远赴南京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1917年又东渡日本，在学习军事的同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回国后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朱德对杨闇公早有所了解，现在一起组织沪顺起义，朱德感到很高兴。

朱德和刘伯承是老相识了，早在1916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万县时，朱德又见到了刘伯承。由于多年不见，刘伯承走进朱德的办公室时，把共产党员的证件往桌上一放，又在朱德肩上拍了一巴掌，大声说：玉阶，还记得我吗？几年前我们在川南见过面。那时候，我还代表成都军阀和护国军商量怎样对付云南、贵州呢！朱德得知刘伯承是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回到四川来策划军事起义时，兴奋极了，连声说：好呀，好呀，这一次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那些天，刘伯承经常到“宝隆洋行”朱德的办公处碰头，秘密分析四川的军事形势，当朱德讲到杨森秉性好狡时，刘伯承多次提醒朱德，要朱德千万小心。现在，两人都要为共同的任务去奋斗了。

朱德、刘伯承和杨闇公在一起召开的第一次军委会，主要研究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问题。刘伯承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利用川军的矛盾组织沪顺起义的战略构想和具体策略。朱德同刘伯承和杨闇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先争取驻守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起义，在四川中部站稳脚跟；再发动驻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互相策应；然后把这两部分起义军扩编为6个师，组建四川国民党的左派军队。

为了配合庐顺起义，国民党左派莲花他省党部于11月25日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在重庆造革命声势。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和刘伯承、杨闇公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两天以后，顺庆起义由于时机泄露，也不得不提前举行，沪、顺两地12000多名军人从旧军队中杀出来，把枪口对向腐朽的北洋政府。12月9日，刘伯承根据事先计划，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在四川反动军阀的疯狂反扑面前，朱德同刘伯承一起领导沪顺起义军坚持战斗167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也为我党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初，朱德遵照党的指示，来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

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是一个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汉初时已为南方昌盛之地，固而得名南昌。当时，滇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军长朱培德率领，警卫江西全省，并在南昌开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培德还担任江西省省长。他听说护国军少将混成旅旅长来到南昌，就想利用朱德的军事才能来培训滇军军官，利用朱德在滇军中的老关系招收官兵，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很痛快地委派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团长。

朱德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数年，又留学欧洲，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都很丰富。他了解了南昌市的基本情况以后，选定南昌市永和门内花园角的讲武堂为校址，建立了教育团的机关和分队，党代表魏瑾钧。副团长兼参谋长刘介眉也相继到职。

朱德在青年军官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后，原滇军各部的许多进步青年欣喜万分，奔走相告，纷纷要求来教育团学习。江西各地的进步青年也日夜兼程，赶来报考。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教育团就招收了1300多名学员。为了早日开学，朱德日夜为整修校舍和置办教学设备而奔忙。

第一期招收的学员许多都是班长、排长和连长，计划经过8个月的训练，将他们分配到南昌警备部队服役。这样，朱德就很自然地担任了南昌市警备司令。另外，朱培德考虑到为了统一管理所有的治安机构，还以政府名义派朱德兼任南昌公安局长。朱德还奉命创办一个负责训练400多名警察的警官教导团。由于朱德身兼数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还吸收朱德为省党部委员。

教育团在举行开学典礼以前就正式开课了。那些天，朱德从早到晚都忙于处理开课的各种事务，节假日，朱德还亲自给大家讲演，有时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为学员讲政治课，想方设法利用教育团为党培养更多的武装干部。

朱德深知教育团团长的责任重大。全团三个营中，第一第二营700多人，大多数是滇军的连、排军官、军佐，他们穿上军装以后转战数省，多年流亡在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趋向革命，个别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以为自己的出路在于老老实实地苦学苦干；也有少数人对革命不满意，时时流露出落后思想。第三营400多人多数是从各地选送来的有革命志向的青年，也有江西军阀李烈钧保送的富家子弟和僚属子弟，这些有点文化的青年都是想到教育团来学本事，为自己升官发财铺路。朱德认为，这些学生虽然阶级成分和个人经历复杂，大多数人经过教育后能够趋向革命，极少数受社会恶习影响较深的人也是可以改造的，不应该对他们失去信心。

教育团副团长刘介眉是个军阀习气很重的旧军人，不重视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在制定教育计划时，朱德明确指出，教育团的各种课程不能因袭旧规，必须重视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只有这样，他们学到的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朱德决定增加政治教育的内容，把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作为政治教育的主题，邀请进步人士和工、农、教育界等社会知名人士到教育团演讲。朱德还抽出时间给学员讲党课，传授党的基本知识，在学员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培养党的积极分子。

军官教育团的许多教官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的左翼分子，他们常常要在军官教育团、警官教导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三个地方讲课。朱德提倡教官和学员之间一律平等，教官要坚持耐心说服教育，严禁打骂、体罚和变相体罚学员，学员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教官直至团长当面提出，师生之间要树立互尊互爱的新风尚。起初，有的教官对这些规定难以理解，但看到朱德处处与学员同甘共苦，经常以普通学员的身份出现在食堂和宿舍，野外演练时，朱德同大家一样往返五六十里，从不骑马，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和体弱的教官或学员骑，深深为朱德的模范行为所感动，纷纷按照朱德提出的要求去做。

有一天，几名学员正为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争吵得面红耳赤，看见朱德，都围了过去。有人问：团长，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主

义吗？

另一个人问：团长，无政府主义值得赞扬吗？

朱德一听，知道这几名学员的思想非常混乱，就同大家一起坐下来，耐心地说：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同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乱臣贼子的主义，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人人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信仰的唯一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主义。

几名学员听到朱德又给大家讲解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显得兴奋起来，异口同声地问：团长，革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朱德笑了，语重心长他说：中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呀！我们要看到，反革命的力量还会长期存在。我们在这里把它消灭了，它还会换成另一种形式在另外一种场合出现；这样辗转反复，直到最后把反革命势力消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的。即使革命取得成功了，我们也不能解除思想武装，还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战斗。中国现在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我们要有长期革命的思想准备，要有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坚强意志呀！

那一个时期，蒋介石也在南昌。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来，野心更大，每时每刻都梦想扩充反革命力量，他得知朱培德的第三军在南昌开办军官教育团时，就想利用开学典礼的机会到教育团来训话，进行反动宣传，朱德知道蒋介石不怀好意，自从去年3月份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来，公开排斥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反共阴谋日益暴露。为了抵制蒋介石的反动宣传，朱德多次以“筹备工作未完”为借口，迟迟不举行开学典礼。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迫于蒋介石的权势，一再催促朱德尽快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决定针锋相对，抓住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蒋介石大放厥词，他利用北伐军取得的初步胜利，大肆吹嘘自己在北伐战争中的“功劳”，他厚颜无耻他说：我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最革命的主义”，你们要“绝对服从”我的指挥。

面对蒋介石的一派胡言，朱德针锋相对他说：北伐军出师以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是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特别是北伐军先锋团——叶挺独立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坚决打下了吴佩孚用重兵防守的汀泗桥、贺胜桥，并乘胜进攻武昌，占领了武汉三镇。该团将士在北伐战争中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北伐战争胜利了，我们大家还要提高警惕，要防止扒手把广大人民已经得到的革命果实强夺过去。

朱德还对学员们说，蒋介石标榜的“三民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最革命的主义”。我们要实行国民革命，必须动员工农群众去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听到朱德的这番话，蒋介石无可奈何，红着脸离开了会场。

但是，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反动武装，很快开始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

3月11日，拥护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迫解散，南昌市的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女协会等机关先后被“反布尔什维克”的AB团分子捣毁。

3月17日，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国民党特务分子强占……

一时间，南昌上空黑云滚滚，天昏地暗。

在这种形势下，朱德认为，反动派已经动手杀害革命同志，我们就要准备还击。他对军官教育团的一些骨干说：AB团的捣乱表明，敌人已经手进南

昌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3月18日，南昌市各界革命团体和数万名群众召开“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身为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坚决支持并参与了这次追悼大会，鼓励高擎烈士血衣的群众上街游行，向反动势力示威，还公审了AB团的一名头目程天放。

当蒋介石留守南昌的宪兵团镇压群众时，朱德果断命令军官教育团和工人纠察队于3月30日解除其武装，并将宪兵团代理团长关麟征逮捕押送到总工会。3天以后，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的群众还推翻了反动的国民党省党部，逮捕了一些AB团分子，迫使蒋介石留下来的心腹段锡朋化装逃离南昌，省政府主席李烈钧逃往上饶。

看到工农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蒋介石丧心病狂，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公开叛变革命。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立即同帝国主义进行肮脏的交易，蒋介石对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恨得咬牙切齿，他召集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古应芬等心腹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由吴稚晖等人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要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蒋介石还纠集上海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仙等成立“中华共进会”，派流氓董福开等人成立“上海工界联合会总会”，以反对上海总工会。与此同时，蒋介石把同情工农运动的部队调离上海，让新近投降的军阀周凤歧的部队担任“沪上防务”。蒋介石还暗中策划，公布了上海的戒严条例，禁止进行集会、罢工和游行。玩弄了种种阴谋以后，蒋介石公然对上海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的残酷屠杀。

4月12日黎明前夕，停泊在上海高昌庙一艘军舰的上空，骤然升起了开始大屠杀的反动信号。一霎那，预先埋伏在租界内全副武装的打手，臂缠印有“工”字符号的白布，冒充工人，一窝蜂似地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工人纠察队的驻地

冲去。当无畏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胁迫和武力镇压等卑劣手段，向工人群众射出了罪恶的子弹。片刻之间，300多名工人在“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为了解放”的呼喊声中，倒在血泊里；1700多条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全部被收缴。

4月13日，上海滩寒风习习，大雾迷漫。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怒了的上海丝厂、烟厂、电车厂的工人和海员、店员等20多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6万多人冒雨上街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前进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一阵阵枪声夺取了千百名革命志士的生命，也彻底撕开了蒋介石反革命反人民的丑恶嘴脸。一时间，宝山路血流成河。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南昌。

朱德十分愤慨。在朱德看来，刘湘在四川杀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上海毕竟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啊！朱德决定组织军官教育团在南昌举行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会上，朱德对大家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革命。

我们必须担负起革命的重担，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政府。

声讨大会结束以后，朱德还组织了80多人的宣传队，每4人一组到南昌街头向群众进行宣传，明确提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

“打倒蒋介石”等口号。为了对付反动分子的破坏和捣乱，军官教育团的宣传队还与第三军炮兵团中的进步士兵建立秘密联系，同地方各学校的进步师生，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联合行动，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激情。

在朱德的领导下，赣水两岸的反蒋怒涛一直持续到7月初。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把新旧军阀都拉了过去，让他们互相牵制，自己始终居于举足轻重的权力中心的地位。跟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权在握的情形一样，蒋介石由外国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混合力量支持上台”。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表面上依然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投靠蒋介石。朱培德看到工农运动在江西迅速发展，就别有用心地要朱德带领教育团到赣东去“剿匪”，妄图使教育团和农民运动发生矛盾，甚至希望他们之间互相残杀。

朱德一眼看穿了朱培德的诡计。他率领教育团的部分学员和警察到抚州以后，马上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召开剿匪会议，倾听大家对剿匪工作的呼声和建议。朱德在会上说：土匪祸国殃民，我们必须清剿地方反动武装、四乡惯匪和散兵游勇，才能保卫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才能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朱德还把农会干部、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进步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举办党性教育训练班，动员人民群众建立自卫武装，协助剿匪。

朱德领导的剿匪工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资溪、进贤、丰城等地的剿匪工作全面展开以后，当地群众主动侦察匪情，及时向教育团报告土匪的行踪。朱德采用“剿抚”并施、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很快瓦解了流窜在赣东的上匪，罪大恶极的匪首被击溃、被镇压。被迫上山为匪者也纷纷投案自首。一个多月以后，赣东的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6月5日，朱培德在蒋介石的利诱下，公开打出反革命旗号，南昌城头一片白色恐怖。为了应付万一，朱德带领教育团的官兵和警察于6月中旬返回南昌。

当朱德得知朱培德派出便衣警察秘密逮捕了共产党员魏瑾钧，并蓄谋解散军官教育团时，大义凛然，亲自出面同朱培德讲理，迫使南昌反动当局释放了军官教育团党代表魏瑾钧，并把魏瑾钧安全送出南昌城。

北伐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新军阀掌握了远远超过北洋军阀的大批反动军队，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和特务组织。朱培德为了增强第三军的力量，进一步控制南昌，决定将军官教育团提前毕业，把学员分配到各部队去。

面对反动势力的公开挑战，朱德不仅为提前毕业的一。二营大部分官兵做出了精心安排，调拨部分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还果断决定把三营的400多人留在南昌“继续学习”。这部分学员在朱德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南昌起义。

7 要革命的跟我走！有两百人同生共死，就是胜利。“红军之父”朱德带着一支孤军，在赣南山道上艰难行进

闽、粤、赣边境，群山起伏，水流湍急。

朱德率领一支孤军，翻山越岭，在闽、粤、赣边境的山林中与敌人周旋。

参加南昌起义的 2 万多部队除了千余人进入海陆丰以外，只剩下朱德身边的 2000 多人和 1000 多支枪了。朱德指挥的起义部队在三河坝与优势敌人激战三天三夜，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四面受敌的险情。

秋雨哗啦啦地下着，好像一把大刷子在洗擦干燥的地面一样。云层很低，简直就是罩在森林上。前方的山头上落下了一块不样的暗影，忽然又闪出一道耀眼的电光，好象暴风雨的天使还挡不住急躁的雷神的嘶喊和咆哮。朱德看了看雨中行进的队伍，脑海里又回想起三河坝分兵的情形。

三河坝位于广东省大埔县的梅江、汀江、梅潭河的汇合处的一个大镇子，它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三河坝对岸的笔枝尾山高 80 多米，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可攻可守，真是一山镇三江，自古力兵家必争之地。南昌起义的部队占领三河坝以后，根据长汀会议的决定在三河坝兵分两路，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队留守在三河坝，监视在梅县的国民党钱大钧部队，掩护全军的侧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率领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直下潮汕。

这次分兵，不仅把参加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朱德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之间分开了，也把起义队伍中战斗力最强的第十一军的两个师分开了。第十一军是由北伐战争中威震敌胆的先锋团——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占领武昌城内的蛇山以后，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称。1927 年初，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二十四师，该师辖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由叶挺担任师长；再调出一部分骨干成立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独立团的其余部队编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林彪当时就在这个团担任排长，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担任师长。南昌起义后，以上两个师同蔡廷锴指挥的第十师编成第十一军，由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三河坝分兵，把这支主力部队的两个师分开，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起义军到达三河坝时，还有十五六个团，当时围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阀部队也不过十六八个团，起义军的战斗力又比军阀部队强，只要集中力量，完全可能把反动军队击败。兵分两路，起义军的力量就削弱了。

被暴雨洗过的山林显得非常翠绿，天边挂起了一道弯弯的彩虹，混浊的山水发出淙淙的声音，直往沟里奔腾。部队准备在丛林中露宿，朱德又开始思考起义部队在这两个月里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他已经多次思考了这段经历，可是思绪还象潮水般地在脑海里翻腾……

南昌起义以后，武汉的汪精卫急忙命令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等率领部队向起义军进攻。中共前委按照原定计划，决定率领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南挺进，先占领广东的东江地区，控制海口，以便得到国际援助，扩充实力，再攻取广州。中共中央 8 月 4 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中也讲到：“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指朱培德的第三军。作者注）后直奔东江。中央昨日会议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

起义军南下广东，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路线是沿赣江南行，经过樟树、吉安、赣州等比较富庶的地区，取道韶关，直下广东。这条路线虽然好走，但是敌人已经驻扎了重兵。朱培德的第三军主力在吉安，钱大钧的部队在赣州，李济深可能利用粤汉铁路集中兵力在粤北与起义军决战，张发奎的1万多部队也会沿着这条大路尾迫起义军。起义军走这一条路线，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苦战之中。另一条路线是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当时，赣东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东江又是广东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起义军领导人对东江的情况比较熟悉。直取东江可以很快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补充新兵。因此，周恩来等多数人主张起义军从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

8月3日，未经整顿的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沿抚河南下。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起义军指战员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35年以后，朱德元帅在回忆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的艰难历程时，深刻指出：“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8月的江西，酷暑笼罩。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就好像着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道路干巴巴地发着白光，尘上飞扬起来，与天上的灰气联接着，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指战员的脸，起义军南下以后，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袭来，对部队的战斗力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多带装备，起义军每个战士身上都背了300多发子弹，有的指战员还要扛机枪、大炮，整天下停地，在山路上行军，大家都感到极度疲劳。由于反动派散布谣言，沿途居民纷纷走散，部队行军途中连茶水也喝不到，许多人经受不住江西的酷暑骄阳，患了赤痢，脱离部队的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多，行军3天，起义军的实力损耗了三分之一，因为运输困难，在南昌缴获的许多武器弹药也不得不抛弃了。

更为严重的是：当起义军前进到进贤时，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突然命令第十师脱离起义部队，折往浙江。蔡廷锴的这个举动，一下子拉走了起义军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朱德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气愤。蔡廷锴这支部队原来是陈铭枢的部属，后来虽然归张发奎指挥，但蔡廷锴本人同陈铭枢的关系还很密切，并不是真心拥护南昌起义。7月30日，当蔡廷锴率领部队赶到南昌时，本来计划对这支部队加以调整，但是起义前夕头绪繁多，起义部队都来不及整顿，叶挺又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地信任他。起义军南下时，叶挺觉得蔡廷锴对打回广东很热心，又让蔡廷锴率领第十师担任前卫，现在竟然被蔡廷锴带着部队投奔他的上司陈铭枢去了，这么一个疏忽，就使起义军减少了一个师，朱德又气愤又难过。

由于当时全中国的形势都很混乱，蔡廷锴率领部队离开起义队伍的消息传开以后，有的官兵以自己的家乡需要应付白色恐怖为理由，离队了；有的人认为广州离家太远，不愿继续南下。林彪也一度脱离队伍，只是由于走错路而不得不返回。但大多数指战员上气仍然很高，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表现出

了顽强的斗志。

8月12日，起义军进抵宜黄。部队开始宿营了，周恩来同总政治部的同志一起，继续修改《土地革命宣传大纲》。自从离开南昌以来，周恩来白天随部队行军，夜晚也得不到休息。一名从南昌出发后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的老战士回忆说：“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这天晚上，周恩来刚刚拿出一份《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稿子准备修改，警卫员走过来，轻声说：首长，陈毅来了。

周恩来一听，连忙放下笔，迎了出去。

陈毅当时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以后，陈毅转赴江西，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由于途中受到种种干扰，没有及时赶到南昌，竟然与起义军在途中相遇了。陈毅见到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说：恩来，我来迟了一步，你分配给我什么工作呀？

周恩来拉起陈毅的手，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起义军非常需要陈毅这样的人呀！周恩来略一沉思，说：陈毅同志，你先到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团担任指导员。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呀！

陈毅爽快地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三河坝分兵以后，陈毅就同朱德一起整顿部队，转战在闽、赣、粤、湘边区。

起义军在临川经过短暂休整以后，继续南下。一天傍晚，朱德同几名战士一起走进大庾岭下一户贫困农民的家，屋子里黑漆漆的。朱德看见床上躺着一位骨瘦如柴的妇女，这个妇女的身旁围着几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孩子们面黄肌瘦，十分可怜。朱德连忙示意战士们把身上带的干粮送给孩子们，亲切地说：大娘，我们是起义军，我们看你来了！

好一会儿，床上的妇女才问：你们是起义军？你们还走吗？短短两句话，道出了这位普通妇女的担心，他们担心起义军走后，反动军队又来欺压百姓。朱德对她说：你放心吧，我们走到哪里都要领着穷人打土豪、分田地。

然而，起义军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国民党驻守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遣钱大钧部约9000人，从赣州前进到会昌、瑞金，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到壬田；调遣黄绍竑部的9000人，从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企图堵击起义军。朱德率领先头部队继续南进时，在瑞金以北的壬田附近地区与敌人遭遇了。

朱德判断这股敌人至少有3个团，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朱德一边从受伤的战士手中接过武器向敌人射击，一边指挥一支部队从壬田城的东北方向向敌人发起突击。在一阵阵激烈的枪声中，朱德身先士卒，号召大家勇敢战斗，奋勇杀敌。

敌人被打退了，起义军也伤亡了数百人。这是起义军离开南昌以后的第一次战斗。

8月27日，朱德、贺龙等人率领起义军占领了瑞金。

起义军从缴获敌人的许多文件中得知，钱大钧、黄绍竑等人准备在离瑞金下远的会昌集结18个团，阻击起义军，钱大钧的部队已经到达会昌，黄绍竑的部队正在向会昌前进。这时，有人担心起义军继续南下时，敌人会从背后发起突然袭击。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周恩来、贺龙等人决定先发起会昌战

役。

30日，起义军向会昌发动进攻。部队接近会昌城时，有人对朱德说：副军长，我们是不是绕过会昌？会昌城里部队不少，敌人刚刚吃了败仗，绝下会善罢甘休的。

朱德听了，率领几名团长到前沿侦察后，说：敌人在壬田吃了败仗，惊魂未定，我们应该按计划发起进攻。

周恩来也到前沿阵地指挥攻城。担任主攻的第二十五师因为夜间走错了路，赶到会昌时，部队就要发起攻击了。周恩来对周士第师长和李硕勋党代表说：你们多走了路，部队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

周士第和李硕勋都表示：我们一定打下会昌。

钱大钧部驻守会昌的9个团踞山凭险固守，起义军担任主攻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的指战员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在下午5时攻占会昌，并派部队尾追到筠门岭。这一仗，起义军歼敌四个团，俘敌官兵900多人，还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但是，起义军也伤亡了1700多人，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20多天行军作战，起义军减员近万人。朱德注意到，起义军从寻邬南下东江的行军计划由于叛逃的军官向敌人告密，已经被国民党在许多报刊上披露，敌人已经在起义军的前进道路上驻扎了重兵，而福建一带敌人的兵力比较空虚。从寻邬到东江都是山路，起义军的大批伤员和缴获敌人的5000多支枪运输困难。如果从长汀、上杭顺鄞水进入东江，就可以用船只运送伤员和战利品。上杭一带也比较富饶，部队的给养好解决。因此，当中共前委和参谋团讨论起义军行进方向时，朱德也认为应该改变道路，经福建长汀，再沿汀江、韩江进入东江地区。

9月上旬，起义军击退了黄绍竑部队的进攻，经过瑞金到达长汀。长汀县的人民群众对起义部队非常热情，到处送茶送水，傅连璋主持的长汀福音医院接收了起义军的数百名伤员，许多病人得到救治。

在长汀休息时，朱德、周恩来等人又对攻取东江的计划进行讨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对起义军的行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这种意见的核心是把起义部队兵分两路，周恩来和叶挺认为，当时潮汕地区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又无险可守，有利于起义军攻克；如果先以起义军主力攻取潮汕，再折回来取兴宁、五华等地，攻惠州，就会使敌人有时间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使起义军陷于被动。因此他们提出另一种意见：“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但是，由于随军行动的苏联顾问坚持第一种意见，有些军官在艰难行军以后也渴望有一个地方休息，就赞成分兵行动，并决定由朱德率领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

朱德指挥第二十五师向三河坝前进时，在韩江边上与从会昌逃跑的敌人相遇，这股敌人在逃退中又纠集了一些反动军阀的部队，企图阻拦起义军，朱德仔细查看了韩江两岸的地形，果断命令部队渡过韩江，抢占笔枝尾山、龙虎坑、大麻等地，争取了主动。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敌人狼狈逃窜，起义

军顺利占领三河坝。

不久，周恩来、贺龙、叶挺、聂荣臻等人率领起义军主力顺利进入潮安（潮州），朱德和陈毅指挥第二十五师等 3000 余名指战员在三河坝同钱大钧的残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离开南昌以来，起义军同钱大钧的部队多次交手，朱德对敌情了如指掌，起初，朱德为了让主力部队顺利南下，千方百计吸引住敌人进行打击。有时候敌人到韩江西岸进行休息，朱德一面调动部队切断敌人的退路，一面集中船只出其不意地过江打击敌人，使敌人不知所措。

激烈的战斗进行到第三于，几名战士突然满头大汗地跑到朱德面前报告：副军长，主力部队在汤坑遇到敌人阻击，伤亡很大。

朱德的心“突”地一提，神色也变了。他详细问了问起义军主力的情况，命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赶往汤坑去接应周恩来、叶挺他们。

原来，起义军主力离开三河坝时，黄绍竑就集中了 3 个师和潮、梅地区的警备部队共 1.5 万多人，在汤坑（今丰顺）一带设置了阻击线。起义军汤坑东南的白石同敌军遭遇，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组织了敢死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整队整队地向起义军发起冲击。起义军中不少部队是二十多天前才组建的，新兵多，没有经过大战恶战的锻炼和考验，指战员们尽管拼得很凶，但由于四面受敌，没有支援，没有粮弹补充，伤亡越来越大，有的战士没有子弹了，不得不在烈士的遗体上翻拣子弹。激战三昼夜，起义军伤亡 2000 多人，无力再战，被迫向潮州撤退。

当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率领部队向潮州前进时，半路上遇到贺龙的一名副官。他报告说：潮州已经被反动军队占领了，汕头也很难守任，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转移了。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又调头向西，到流沙去。

流沙战斗中。起义军被打散了，第二十四师余部 1200 多人到达陆丰以后，与当地的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聂荣臻和叶挺护送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到达香港。

朱德率领部队去接应起义军主力时，汤坑战斗和流沙战斗都已经结束，朱德只在途中收容了一些零散的官兵。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朱德，怎么能忘记呢？

1963 年，在当年来德率领起义军指战员同敌人激烈战斗的三河坝笔枝尾山的旧战壕旁，叠立起了一块高约 8 米的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碑文由朱德元帅题字，当年担任师长的周士第题词。站在纪念碑前，可以观望三河坝全景。

秋深了。太阳黯淡了。在 10 月的云雾之下，自然界也开始慢慢萎谢了。山林深处，一只孤单的鸟怯生生地叫着，仿佛预感到冬天快要来了，朱德和陈毅率领这支二千多人的起义队伍，经过大埔、蕉岭，缓缓地向江西境内前进。

当起义军到达福建省武平县旧城时，遇到了一股袭扰的土匪。匪首钟绍奎作恶多端。朱德查明情况以后，指挥起义军很快把这股土匪打垮了。然而，起义军向西北前进的行动方向也被军阀部队发觉了。在闽赣边境，敌人派出了一个师，紧紧追赶朱德率领的起义军。

起义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汤坑战斗的情况传开以后，沿途的土匪、土豪劣绅组织的民团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不时地袭扰起义军，会昌战斗中被朱德打得落花流水的钱大钧残部也乘机纠集起来，像幽灵一样向

起义军放冷枪，在起义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行军途中，听到突然迸发出来的枪声时，部队往往会引起一阵混乱。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乘机离开了起义队伍。

“叭——！”树林里传出一阵清脆的枪声，行军队伍中突然有数名战士倒下了。

必须扫除这些障碍。朱德坚定地对陈毅说。

第二十五师是一支久经战火考验的部队，该师的第七十三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武装力量。这支部队自从1924年组建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汀泗桥、贺胜桥这样的“硬钉子”都被他们拔掉了。今天，在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散兵的袭击面前，也无力进行战斗了。朱德的心情格外沉重。

一名战士悄悄问：班长，起义失败了，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还往哪里走？

往哪里走？向北。你不是向北走吗？话虽这么说，这名班长心里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一支孤军艰难地行军在赣南的山道上，没有援兵，没有供给。怎么办？

起义军走一路打一路，经过筠门岭，来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

排以上军官河坝子里集合，我有话要说。朱德下达这个命令时，显得有几分急躁。朱德看到，这支“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的部队七零八落，没有组织，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更涣散了，再不整顿，后果难以想象。

军官们陆陆续续来到河滩上，有的坐着，有的懒洋洋地躺着，互相交头接耳，谈论着什么。

朱德走过来了。陈毅和王尔琢、周士第等人跟随着朱德来到河坝子上。

朱德穿一身灰布军衣，背上顶着一个斗笠，脚上那双草鞋早破了，是用一条带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的。连日行军，朱德的脸颊瘦了，胡子也长了，那双眼睛依然那么和蔼、慈祥。朱德招招手，让大家坐拢些，严肃他说：同志们，我把大家集中起来，是有些问题要讲一讲。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

说到这里，朱德的声音显得激昂起来：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坚持战斗。不战斗怎么行呢？在中国，工人和农民穷得已经到了不作战就要死亡的地步，打死了总比折磨死光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心头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他们需要领导。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就是出卖了革命。

朱德稍一停顿，压低声音说：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动员起另外的人。我要坚持到底。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是革命的队伍，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刹那间，河坝子静极了。许多人痛苦地低下了头，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竹林的沙沙声。

我希望大家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朱德缓缓地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今天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1917年，俄国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中国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人群里有人低声问：我们也不想保存实力，可是现在怎么办？

朱德听到了。他向说话的方向瞄了一眼，信心十足他说，打游击呀！闽赣边这一带，农民运动的基础很好，只要我们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一个地方站稳脚跟，就一定能发展。

听到这段话，有几名军官兴奋起来，互相之间议论着什么，忽然有人大声问：军长，反革命的军队天天在屁股后头追我们，我们能站住脚吗？

一定能站住脚。朱德说，中国的封建军阀协调不起来，等他们互相之间打起来了，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整整一个小时，朱德反反复复地对大家讲革命的前途和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讲到农村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斗争方法；讲革命军队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希望大家坚定革命的信念。陈毅对朱德的这一讲话作了极高的评价。

陈毅说：朱德同志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粟裕大将在回忆起当时亲耳聆听朱德的讲话时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途，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1944年，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回忆起这一时期的艰苦奋斗时，深有感触他说：“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虽然有很多枪，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当时正是伏天，行军掉队多，起义军中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不愿去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下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去打大城市。”

经过天心圩的初步整顿，起义军的情绪受到了鼓舞，部队沿着赣南山道，继续向西疾进。但是，这支军队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

夏天一旦过去，山林就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准备过漫长的冬天。天空红艳艳的，大地上覆满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树叶好象一夜之间完全落光了，一阵冷风掠过，更增加了阴郁的气氛，山雀的叫声也走了调，仿佛感到了漫长的严冬的气息。朱德和全体官兵一样，身上还穿着八一南昌起义时发下来的单衣，两个多月的艰苦征战，衣服上沾满了汗污，裤腿和袖子也磨损得现出了几个破洞。可是，朱德却感觉不到初冬的寒冷，精神饱满地同大家一起行进在山道上。

艰苦的战斗生活，把战士们的军装磨损得破烂不堪。裤腿撕开了，有的还遮不住腿肚子。鞋子早已破烂了，没有材料，也没

有时间去打草鞋，有的找一块破布把脚包起来，有的干脆赤脚行进。

宿营了，战士们攀摘了一大把树叶垫在地上，怀抱枪支，那身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不脱，几个人背靠背地挤在一起，互相暖着身体进入了梦乡。夜凉露寒，一夜之间往往会冻醒好几次。

粮食非常困难，一路行军，指战员们大多数时候是饿着肚子，痢疾、打摆子，许多难耐的疾病像恶魔一样折磨着这支部队，由于缺医少药，有的病

人不得不寄养在老乡家中，有的病人痛苦地靠在一棵树干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天，朱德看见一名战士每走一步都要咬牙皱眉，似乎有说不出的痛苦。朱德上前问：小同志，怎么啦？

脚上都是泡，痛死了。

朱德连忙扶住这个战士，一起行走。他心里想，今天宿营，还应该想办法多烧一些水，让战士们洗洗脚，解解乏。他在想：有什么办法改善伙食呢？只要让大家吃饱了，疾痛也会赶跑了……朱德身上已经帮另一名战士扛着枪，他显得有些累了。

忽然，一名班长追上来，拉过朱德扶着行走的那名战士，大声说：谢谢你呀，老伙夫，我看你也够累的了，让我来扶他。

那战士回过头，十分生气地对班长说：他不是伙夫，他是咱们的朱军长。

班长的脸刷地红了，内疚地喊了一声，军长，对不起。他是从国民党的军队中改编过来的。在国民党军队里，军官欺压士兵，哪里有军长扶士兵行军的？

朱德却和蔼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这支军队，官兵平等。

可是，当时条件太艰苦了，朱德提出的一些先进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士兵接受，起义军尽管保持着团、营、连的建制，但队伍显得比较松散，行军出发时有的连队人员还比较齐全，走着走着人就少了，到晚上宿营时才慢慢多起来。个别意志薄弱的人经受不了艰难困苦的考验，行军途中遇上岔道，就不辞而别了。

有一天，一名湖南籍战士随队行军还不到一小时，就离开大路独自走了。连长见了，追上去大声喊：你回来！

谁知那士兵突然转过身，举起枪，“哗”地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厉声说：你敢过来？

连长站住了，十分生气他说：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的武器呀！

那士兵想了想，把手中的枪往地上一扔，走了。

朱德和陈毅一前一后，跟随大家行军。有的人把枪丢下了，朱德就拣起来自己背着走。陈毅也是走一路同士兵们讲一路的革命道理，部队宿营时，陈毅还经常找党员谈话，开小组会，帮助大家树立革命的信心。

在如此艰难的战争环境中，朱德和陈毅总是告诫大家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对于违反纪律的现象从不迁就。部队到达信丰城里，有几名从旧军队改编过来的士兵看到城里有一家当铺，竟然一哄而上，有的抢钱，有的抢东西，乱成一团。陈毅知道后，气愤他说，这哪里像革命军队，简直同土匪一样了。他立即下令吹紧急集合号，把部队拉到城外进行整顿。陈毅严肃他说：起义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遵守群众纪律就难以生存，难以发展。

在陈毅的教育下，那几个违反纪律的人都作了自我批评，纷纷把抢来的东西交还给老百姓。

10月底，起义军到达大庾。

部队集合的时候，朱德看到总共只有900来人了，在饶平三部分部队集中时的2000多人已经走散了一半，许多重武器也丢损了，只有两挺水机关枪孤零零地摆在队伍的一侧，有一挺机枪还没有脚，战士们身上背的子弹带早已瘪下去了，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神里却显出无比的刚强和力量。

朱德站在队伍中间，炯炯有神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带着几分激动的口气说：同志们，南昌起义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已经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我原来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的；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也不能消灭我们！

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指战员们望着朱德那张刚毅而和善的面孔，心中顿时充满了信心，情绪也显得乐观起来。

朱德接着说：同志们，中国革命是有前途的。我们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到底。现在，我们要保存自己，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一个多月来，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苦，但是，战胜困难的办法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经过朱德和陈毅的动员，起义军又活跃起来，在大庾休整期间，沿途走散的人们又陆续回来了，朱德和陈毅商量以后，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整编的第一项工作，是整顿起义军中的党组织和团组织。起义军重新成立了党支部，要求共产党员在困难时期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整编的第二项工作，是把散乱的各单位编为一个纵队，朱德担任纵队司令，陈毅担任纵队指导员（即党代表），王尔琢担任纵队参谋长。纵队下属三个步兵支队，支队以下是大队、中队和班。另外还编了一个特务大队和一个机炮大队，机炮大队实际上是由两挺俄式水机关枪（其中一挺缺腿）和一门八二迫击炮编成。

11月初，这支经过初步整编的军队又转到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

上堡、文英、古亭等地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带，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朱德站在一个山岗上，望着眼前那一片片连绵起伏的峰峦，心潮澎湃，他在心里说：这正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呀！

起义军上山以后，朱德果断提出，部队要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朱德常常对大家说：我们要由硬打硬拼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仗时就“游”。

为了提高起义军的战斗力，朱德又同陈毅一起对这支部队进行整训，把一部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以便加强基层工作。部队的任务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起义军常常以连或排为单位分散行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器。

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实践，朱德明确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这是朱德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

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起义军在上堡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起义军从此开始转入了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采取了“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策略，使革命力量得到发展。

1962年6月，朱德元帅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战斗历程时说：“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十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

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上堡整训以后，起义军的情绪稳定了，作战方法改变了，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是部队的物资供应仍然非常困难，许多战士还是穿着单薄的衣裤，脚上没有鞋袜，晚上没有毯子，粮食、弹药都得不到补充，医药奇缺，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那些天，朱德和陈毅几乎天天都要商量如何解决这些困难。

有一天，朱德刚给战士们讲完军事课，特务大队的一名军官跑来报告：军长，国民党第十六军派人来了，陈毅指导员要你快去。

朱德心里打了个问号，自言自语：十六军，范石生，他果然主动和我们联系了！他有什么打算呢？

国民党第十六军驻守在湘南。军长范石生是云南河西（今峨峨）人，是清朝末年的秀才。1909年，范石生同朱德一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朱德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云南新军第七十五标，同朱德一起参加辛亥革命。1923年，范石生出任滇军第二军军长，在广州大花桥战斗中，击败陈炯明的部队，被孙中山授予上将军衔。1926年，范石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参加北伐战争。这期间，范石生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第十六军内也仍然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南昌起义前夕，范石生曾经有同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起进入广东的意图。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前，周恩来曾经给朱德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在需要时通过党组织同范石生的部队取得联系，想不到今天有人主动找来了。朱德心中暗暗钦佩周恩来想得周到。

朱德刚进屋，来人连忙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朱军长，我叫韦伯萃，是范军长要我来找你们的。

陈毅把一封已经拆了口的介绍信递给朱德，说：他是在十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

朱德看了介绍信，问：范石生军长派你来是什么意思？

范军长希望同你们合作，韦伯萃说。

这个情况多少有些意外。朱德、陈毅、王尔琢反复商量后，决定由纵队的党组织来讨论决策。

第二天，朱德带着学生队的五六十名战士，亲自到汝城去同范石生谈判。

朱德走后，起义军官兵心中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担忧。上堡到汝城，一路大山区，土匪很多，途中会下会有什么风险？范石生是国民党的军长，会不会设下圈套伤害朱德？

陈毅安慰大家说：你们都放心，朱军长吉星高照，谁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其实，陈毅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朱德。

两天以后，起义军突然得到一份情报：朱德在去汝城途中遭到了土匪袭击，生死不明。

听到这个消息，起义军指战员万分紧张，纷纷去找陈毅和王尔琢，急着要去救援朱德，消灭土匪，第二天天还没有亮，起义军就整装出发了。

朱德遭到土匪袭击的地方离上堡有 90 里路。当部队赶到时，土匪武装已经闻风逃窜了，起义军又向汝城急进，行军队伍中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都为朱德的安全担忧。

部队接近汝城县城时，侦察员发现广东军阀黄绍竑的部队已经进入汝城。这真是冤家路窄呀，一个多月来，黄绍竑到处找南昌起义留下来的部队，千方百计要歼灭这支革命力量，起义军无论如何不能往汝城前进了，只得改变方向，急奔资兴。

可是，朱德在哪里呢？黄绍竑的部队是不是奔着朱德而来呢？

朱德已经到了资兴县城。

那一天，朱德和随行的五六十人在一家祠堂里宿营时，被土匪头子何其朗的匪兵发现了。当天晚上，何其朗率领匪徒包围了这家祠堂，由于哨兵没有及时发现土匪，起义军官兵突围时，土匪已经打进祠堂里，情况非常危急。朱德住在祠堂里侧的一间小屋里，刚想往外冲，远远看见一群土匪围过来，躲也没有地方躲了。紧急之中，朱德顺手拉起一条伙夫的围裙往腰上一系，就大着胆子往外走。

抓朱德，别让朱德跑了。

随着一阵刺耳的喊声，朱德被几个匪兵迎面堵住了，厉声喝问：站住，你是谁？

我是伙夫头。朱德冷笑一声。

几个土匪见朱德胡子很长，衣服也破烂，信以为真，又问：朱德在哪里？后头。朱德指了指里面那几间房子。

匪徒们急忙冲了进去。朱德乘机打开窗子，跳窗逃走了。

天蒙蒙亮时，突围出去的战士们集合在一起，向土匪发起了反击。土匪逃窜了，朱德也和大家会合了。

在资兴县，朱德化名王楷（根据玉阶两个字改的），同范石生进行谈判。范石生同意起义军用第十六军第一四团的番号，按规定发给军饷和服装、粮食。朱德在同范石生签订协议之前明确指出：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有条件的，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你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你不得进行干涉。

范石生尊重朱德代表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协议签订以后，范石生就拨给起义军一部分服装和弹药，起义军的服装和装备得到了补充。起义军主力到达资兴县时，每人发了一套草绿色的新棉衣，一件绒线衣，水壶、军毯、绑腿、干粮袋、子弹袋全部换成新的；每个军官还发了武装带、指挥刀，20 元毫洋；每个士兵发了 5 元毫洋，200 发子弹。领东西那阵子，大家热闹得像过年似的。起义军长途跋涉中没有解决的物资供应的困难，暂时解决了。

起义军在大庾休整时，伍中豪率领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营从井冈山来到大庾，同起义军会合。伍中豪是湖南耒阳人，他给大家带来了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工农群众闹革命的信息，鼓舞了起义军的勇气和信心。起义军到达汝城后，朱德、陈毅等人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和布置进行湖南暴动问题。范石生知道后，没有过问。

起义军在广东仁化打土豪、杀地主恶霸时，范石生也没有过问。

1927 年 12 月，朱德、陈毅根据党的指示，率领起义军脱离范石生的部队，转入湘南。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朱德送来一封信。信中说：为了避免部

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在蒋介石“围剿”红军期间，范石生于1934年辞去军职，任中央军事参议院参议，曾经在庐山、昆明悬壶行医。1939年3月17日，这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上将在昆明出诊途中，被人刺死。

朱德认为，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起义军是有好处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求得休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范石生给起义军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起义军临走时，范石生又给了起义军一万元现洋作为路费。

1927年底，朱德和陈毅一起率领起义军南下，准备参加广州起义。但是，当部队前进到广东北面的韶关时，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朱德就命令部队在韶关西北的犁铺进行短期休整。

元旦刚过，朱德率领的起义军隐蔽在第十六军的事终于被广东军阀发觉，黄绍竑命令范石生立即缴起义军的枪，朱德就率领起义军调头北上，在乐昌附近的长来圩渡过北江，来到湘南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三九隆冬，大雪纷飞。起义军在岭南大瑶山的茫茫林海里行进。

为了在湘南找一块根据地，朱德和陈毅等人决定举行宜章暴动。宜章县的农会主席杨子达当时就住在杨家寨，杨子这一听说南昌起义军要在宜章组织暴动，非常高兴。他对朱德说：朱军长，本地有一个人叫胡少海，曾经在程潜的部队当过营长，有一点影响，宜章县城的劣绅们都知道他，要不要同他联系一下？

朱德一听，喜上眉梢，说：干脆，我们把队伍伪装成国民革命军，公开进入宜章城。

宜章城里，没有驻守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反动的县长、县保安队和挨户团团团长听说胡少海率领国民革命军进城来，连忙纠集县城的劣绅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城外迎接“正规军”。他们把“正规军”接进城以后，大摆筵席为全体官兵“接风”。

劣绅们刚入席，朱德突然拔出手枪，一声令下，把这些劣绅和反动官吏全部抓起来；紧接着，起义军又消灭了宜章城里的地主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革命群众。在朱德的精心筹划下，起义军智取宜章县城。

宜章暴动之后，在朱德和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中共宜章县委大力帮助，很快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从此，起义军官兵撕掉了旧帽徽，颈上围上了一条红带子。

驻守在坪石地区的国民党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得知朱德、陈毅等人在宜章举行武装暴动，立刻率领6个团的兵力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

许克祥是一个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是湖南湘乡人，早年毕业于湖南讲武堂，参加辛亥革命时因功升官，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33团团团长，5月21日，许克祥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穷凶极恶地捣毁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法庭等革命组织和机关，释放了被关押的全部上豪劣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夜之间，长沙市竟有100多人被杀，40多人被捕。革命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许克祥早已恨之入骨，一听要去打许克祥，大家磨拳擦掌，士气很高。

坪石是一条峡谷，峡谷两侧连一条象样的交叉道路都没有。朱德到前沿

侦察时，看到许克祥把6个团摆成一字长蛇阵，心中暗暗高兴。这一仗，朱德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法，把工农革命军部署在峡谷两侧的有利地形上。枪声一响，许克祥的先头团很快被打垮了，后面几个团撤退无路，在峡谷里乱成一团。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紧追不舍，在坪石的这条峡谷里，敌人逃一路，革命军打一路，一直打到乐昌河边。

这一仗，工农革命军抓了许多俘虏。许克祥这个师在坪石的后方仓库也全部被缴获了，广大指战员喜气洋洋地把仓库里的机关枪、子弹、迫击炮和大炮都搬出来，补充和武装了自己。

战斗结束后，朱德看到部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风趣他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许克祥的第三师在坪石遭到工农革命军歼灭性打击的消息传开以后，湖南各地的地方党组织纷纷找到朱德和陈毅，要求建立地方武装。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朱德和陈毅与中共湖南特委取得联系以后，决定发动湘南起义。

在朱德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首先帮助宜章县组织了一个地方团。夺取郴州县城以后，又帮助郴州组织了一个团。随后，工农革命军又协助资兴、永兴、耒阳等县的农军夺取了县政权。

随着革命武装的发展，湘南特委当即把这些地区的农军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和两个独立团，并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

在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的发动下，安仁、茶陵、酃县、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等县的部分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义，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组织自己的地方武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湘南地区的起义风暴风起云涌。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的座谈会上说：“我们把队伍由韶关拖出来，先打仁化，不久即转入湖南宜章，举行了湘南起义。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萧克将军回忆湘南起义时，感慨万分。他说：“从一九二八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共万余人，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历时三个多月……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人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

1928年3月初，工农革命军二打耒阳之后，朱德同伍若兰结婚。

伍若兰是来阳县人。耒阳县的地主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十分残酷，革命军进攻耒阳县城时，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支援革命军。耒阳解放和宋阳苏维埃成立时，农民们一直庆祝了两个星期。那些天，朱德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到群众大会中去演讲。就在这时候，朱德认识了一名叫伍若兰的女宣传员。

伍若兰当时25岁，在当地农民中很有名气，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农民运动组织者。伍若兰也像朱德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大会上去讲演。朱德注意到，伍若兰的演讲富有魄力，充满了才智，她也有一双大脚，体格很健壮，头发总是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几个麻点。她并不好看，但那双大眼却

《朱德选集》第125、126页。

《湘南起义史稿》第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闪烁着智慧与果断的光辉。

当有人把伍若兰介绍给朱德时，朱德才知道伍若兰出身于大革命时期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家庭，她还是个作家，她的两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军。

朱德和伍若兰在耒阳结了婚。婚后，伍若兰参加了革命军，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

到井冈山以后，伍若兰在红四军的政治部工作，她还经常到乡村中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29年2月，朱德和毛泽东一起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北出赣州。伍若兰在湖南做群众工作时，被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包围。突围时，伍若兰受伤后被反动军队抓住了。

敌人对伍若兰施用酷刑，又砍下了她的头，并且悬挂在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

每当想起这件事，朱德非常难过。伍若兰为朱德做的那双鞋子，朱德一直带着。

8 龙江书院前，朱德和毛泽东两双有力的手掌一合，开始和国民党军队“捉迷藏”

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一次著名的工农武装暴动，是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把秋收起义列为《20 世纪中国 100 件大事》之秋收起义的部队是由毛泽东领导的，是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之前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为了了解朱德和毛泽东具有历史意义的井冈山会师，先让我们看看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井冈山的光辉历程。

南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临时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为了响应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在“八七会议”的号召下，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酝酿了一个时期以后，于 9 月 9 日爆发。爆发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当天，起义部队按照预先的编制分三路向长沙进攻。第一、四两团在向平江进军途中，由于夏斗寅的残部第四团叛变，第一团腹背受敌，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第二团攻占醴陵、浏阳县城以后，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部队损失很大。第三团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 9 月 11 日从铜鼓出发，接连攻占浏阳东北的自沙镇、东门市，歼敌靖卫团一部，不久又攻占醴陵县城，后来在敌第八军第一师第二团进行反扑时，损失较大。

毛泽东看到三路进攻部队都受挫，就于 9 月 17 日下午果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的文家市集中。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以后，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找起义部队的立足地。

24 日，起义军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到国民党朱培德部队的袭击，损失数百人，起义军领导人卢德铭不幸牺牲，29 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时，人数不到 1000，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遣散了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后，把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建立各级党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还设立了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参与管理。这次改编和整顿，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工农革命军的绝对领导，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为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整顿和改编以后，起义部队继续向南转移，于 10 月 3 日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同当地党组织领导人的会谈中，得知井冈山地区还有王佐、袁文才两支农军在活动，马上派人同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取得联系，并且决定把随队行军的部分伤员安置在茅坪。

王佐是江西省遂川县下庄（今属井冈山市）人，早年在井冈山拉队伍，与土豪劣绅作斗争，1927 年，王佐把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是江西省宁冈县茅坪人，早年为了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一年多前，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了农民自卫军，袁文才担任总指挥，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7月，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根据党的指示，攻占永新县城，打开监狱，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国民党曾经数次派部队“追剿”这两支农民自卫军，由于王佐和袁文才对井冈山的地形很熟，又掌握了一套游击战术，国民党军队也奈何他们不得。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以后，团结和改造了王佐、袁文才这两支农民自卫军，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井冈山在江西、湖南两省边境，从罗霄山脉中段拔峰而起，山势雄伟险峻，包括江西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等地。这个地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受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影响较大，不仅有党的组织基础，人民群众也有一定的革命觉悟。井冈山地势险要，控制井冈山的要点以后，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力量，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到湖南、江西乃至湖北等地。

1927年底，湖南、江西两省的大部分敌军都卷入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 and 唐生智之间的混战，井冈山地区只有战斗力很弱的保安队、靖卫团和挨户团。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茨坪以后，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到1928年2月底，初步创建了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战争中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一直非常关心朱德、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队伍，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以后，很快就派人去寻找南昌起义后留下来的革命武装。朱德回忆说：“在湘南起义以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当我退出广东东江后，他派他的兄弟毛泽覃来和我取得联络，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泽东的仅有一次的联系。”毛泽东还两次要何长工到湖南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与朱德取得联系。

1927年底，何长工寻找朱德的经历颇具有戏剧性，但他终于见到了朱德，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朱德。

何长工从井冈山出发，在长沙向湖南省委汇报了秋收起义的经过后，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广州，正巧赶上广州起义，国民党从江西、湖南调部队到广东去镇压起义，广州的形势非常混乱。何长工躲过反动分子的搜查，来到韶关。当时，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正好驻扎在韶关。

一天，何长工到韶关的一家澡塘去洗澡。连日奔波，何长工十分疲劳，他泡在热水里，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不一会儿，他隐隐约约地听到进来一群人，想睁开眼看看，澡塘里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

你听说了吗？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

什么王楷？他的原名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

一听到“朱德”两个字，何长工立刻警觉起来，离开井冈山已经一个多月了，他在湘南、广东等地到处打听朱德的下落，至今还不知道朱德在哪里，想不到澡塘里还有如此重要的消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功夫。这些人是谁？难道是范石生的部属？想到这里，何长工摸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顿时兴奋极了。他正想站起来，又听见有人说：

同学是同学，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们是严密戒备的。

听到这里，何长工顾不得洗澡，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离开了韶关。

从韶关到犁铺头有40多里路。何长工心急加人，连夜赶路。路上，国民党部队已经设置了关卡，何长工穿着一身西装，外披黄呢子大衣，脚穿黄皮靴，手里挟着一个包，看起来像个小康人家的子弟。这么一打扮，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到了犁铺头。

当哨兵把何长工带到部队司令部时，何长工一眼看见一个满脸大胡子、两肩披着长发的年轻人，他以为眼前这个人就是传奇式的人物朱德，正想开口，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老何，你怎么来了？

何长工转头一看，是蔡协民。蔡协民同他一起在湘西洞庭湖一带工作过，在革命遭受挫折之际，两人在军队中见面，格外热情，蔡协民一边同何长工握手，一边介绍说：这是我们参谋长王尔琢同志。

何长工听了，风趣他说：王参谋长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

蔡协民说：参谋长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

正说着，从里屋走出来一位着装整齐的军人。蔡协民又介绍说：这就是你要找的朱德。

何长工一听，喜出望外，连忙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又向朱德详细地报告了毛泽东要他下山来寻找南昌起义队伍的经过。

朱德听了非常高兴，紧紧握住何长工的手说：好极了，好极了！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增加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这支队伍里湖南人多，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领袖，不少人还读过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影响很大。这段时间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好地方落脚，大家都希望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前些天，毛泽覃同志还到井冈山去联系了。你来了，好极了。

看到朱德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看到眼前这支部队，何长工心中的那块石头落了地。

朱德又询问了秋收起义的情况、井冈山的环境等情况以后，就让陈毅安排何长工休息。

第二天，何长工带着朱德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和一些路费，离开了犁铺头。临走时，朱德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长工同志，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联系。

第二次是在1928年3月，何长工随第三十二团下井冈山以后，同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来到苍市、实现了朱、毛红军的历史性会师。

3月上旬，湘南特委的代表突然来到井冈山，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命令毛泽东为师长，率领第一师去支援湘南暴动。部队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合以后，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对大家说：一道篱笆三十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说完，第一师兵分两路，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楔入桂东、汝城之间，何长工随第三十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三十二团有千把人，主要由王佐、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改编，这是这个团第一次离开井冈山作战。当部队到达资兴附近时，突然碰到一支约有数百人的队伍，这支队伍的主要武器是土枪和梭镖，一询问，才知道他们是朱德领导的湘南工农革命军第六师，师长是邓允庭，指战员大部分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这两支部队互相报告了各自的情况后，在第三十二团的统一指挥下，继续前进。

行军途中，他们和敌人打了一仗。当撤退到资兴附近时，又和陈毅率领

的一部分参加暴动的农军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人员会合了。何长工在队伍里寻找了好一会儿，没有看见朱德，急忙问陈毅：朱德同志呢？

陈毅说：朱德和总指挥部的人员一起还在郴州，但他们很快会带着主力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的。

当何长工和陈毅率领的队伍一起，来到酃县的沔渡附近时，事先派出的便衣侦察员喜滋滋地回来报告说：朱德指挥的队伍已经到了沔渡。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的脚步更快了。

沔渡是靠近江西的一个小镇。何长工等人来到沔渡时，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有许多军人，还有一些人虽然穿着灰色和黑色的便衣，脸上的神色却不象当地的居民。何长工知道朱德的部队已经顺利到达了。

朱德身上的灰军装已经不大整洁了，绑腿却打得很结实，脸色也比两个月前黑了。他看见何长工同陈毅、邓允庭等人一起走进屋，马上站起来，乐呵呵地同大家握手。

何长工问：这次行动，你们没有受损失吧？

朱德摸了一把胡子，笑着说：部队没有受损失，家当还大了，缴了些武器，干部也充实了。就是跑得没有时间理发，你们看，胡子都很长了。

何长工说：湘粤两省敌人“会剿”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和我们一起来接你们，想不到你们撤得这么利索。

朱德笑眯眯他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撤退。噢，毛泽东呢？毛泽东同志在哪里？

毛泽东指挥部队在后面掩护呢！何长工说。

4月24日，何长工随第三十二团回到耒市。第三十二团派出一部分部队向江西方向担任警戒以后，就开始动员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迎接朱德的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两天后，朱德和陈毅也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来到耒市周围的村庄住下清明一过，这山区的世界也变得甜蜜可喜了，空气湿润润的，呼吸起来感到格外清新爽快，山坡上，青草好象一道道绿波，在缓缓地滚动。树林子青翠欲滴，杜鹃飞来飞去，用它那圆润、甜蜜、动人心弦的鸣啭来唤醒人们的希望；画眉一群一群的，在百花深处争鸣不已。没有风，树枝似乎是在故意轻摆，像逗弄着田野里的绿意。春天的诱惑力给耒市增添了新的迷惑，也打开了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心灵，带来了革命斗争中的欢乐与兴奋。朱德以前没有同毛泽东见过面，当地听说毛泽东于4月28日率领部队返回耒市时，早早地拉着陈毅来到龙江书院。好一个晴朗的天气，巍巍井冈山像被水洗刷过一般清新，太阳喜洋洋地挂在空中，葱绿的稻田散发出一片清香。毛泽东带着何长工等人，健步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一见，连忙偕同陈毅到门外来迎接，何长工悄悄对毛泽东说：最前面那位就是朱德，朱德左边的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听了，微笑着向朱德招手。忽然，朱德抢前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两人都远远地把手伸了出来。一刹那间，朱德和毛泽东两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好一会儿，朱德和毛泽东才把各自身边的干部互相作了介绍。毛泽东带着祝贺的口吻说：朱德同志，湘粤两省的敌人竟然没有把你整倒？

朱德听了微微一笑，说：我们能顺利转移，也全靠你们掩护呀！

毛泽东和朱德谈了好一阵，转身对何长工说：两军会师，咱们要开一个热热闹闹的联欢大会。长工同志，你负责准备一下，要把附近的群众都请来嘛！

苍市南面的一块草坪上，用门板和竹竿临时搭了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两边插满了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标语。草坪周围，红色的山茶花，黄色的油菜花，绿色的秧田，清清的溪水，把会场点缀得更加美丽可爱。一大早，苍市附近的人们就三五成群地向会场上涌来，把一块能坐下上万人的草坪挤得满满的。

太阳越升越高，把火一般的红光倾泻到树木上，草坪上，山林里散发出一种春天的甜香。当由党、政、军、工、农各界人员组成的主席团成员走上主席台时，大会司仪何长工大声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

话音刚落，挂在树枝上的一串串鞭炮噼噼啪啪地响起来了。主席台前，上百名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军号，嘹亮的军号声在山谷间回荡，会场显得更加威武雄壮。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讲话。陈毅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在这里开大会庆祝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陈毅还宣布了部队改编的决定。

朱德接着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今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非常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现在我们胜利会师，革命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井冈山作根据地，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打击敌人，扩大革命力量。我们这两支队伍一定会更加团结，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以后的利益，朱德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在大会上说：两支革命队伍会师，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今后，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目前，红军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还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马列主义，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他们。说到这里，毛泽东风趣

地一笑，敌人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呀！十个手指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的兵力分布也是有弱有强的。一旦抓住了敌人的弱点，我们就要狠狠地打它一顿；打胜了，就分散队伍，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就能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大家心花怒放，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两支工农革命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不久担任军委书记。所有部队改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师，共6个团，约11000多人。5月下旬，因给养困难，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师的番号撤销。第四军直辖4个团，共6000多人。具体编成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编力第二十八团，宜章的农军编为第二十九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第三十一团，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编力第三十二团。

5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从此以后，红军的威名传遍全中国。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朱德和毛泽东的指示信，肯定和支持了红四军的工作，指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红四军成立时，国民党除了在湖南的株洲、衡阳、宜章一带部署了重兵以外，还将其第八军第一师占据茶陵、酃县，江西的第二十七师占据永新、吉安、遂川等地。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的消息传开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万分惊慌，连忙调集军队一次接一次地对红军进行“进剿”。

井冈山方圆数百里，山上松柏成林，蔓藤附葛，青竹处处，一座座山峰耸立在云雾环绕之中，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剿”面前，朱德同毛泽东一起，凭借井冈山上茂密的丛林和有利的地形，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同敌人开始玩“捉迷藏”。这种把敌人放在红军“手心里玩”的巧妙战法，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且看井冈山会师以后，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军同敌人“捉迷藏”的实战实录。

一、五斗江破敌。

五斗江是江西省遂川县的一个城镇，4月下旬，当敌人得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以后，马上命令赣敌第二十六师派遣第七十九、第八十一团从永新、遂川出发，向井冈山发动“进剿”。朱德和毛泽东看到敌人的两个团分散行动，就将红军主力隐蔽地集中到五斗江附近。当敌第八十一团从遂川向五斗江前进时，红军指战员在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党代表的指挥下，突然向敌人发动袭击，将大部分敌人歼灭，当敌人有意调动兵力准备在五斗江地区围歼红军时，红军又神秘地转移到了永新城附近，击溃了敌第七十九团的一个营，永新城内的守敌慌慌张张地逃回吉安，红军乘胜攻占了永新县城，成功地击破了敌人的“进剿”。

五斗江战斗，是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二、草市坳巧胜。

国民党军队在五斗江遭到红军的歼灭性打击后，又于5月中旬调集驻守江西的第二十六师和第七、第九师各一个团，用5个

团的兵力再一次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剿”。

当时，朱德军长率领第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在永新城西35公里处的小西江区集结。敌第二十七师师部率第七十九团和第二十六团一个营进占永新城以后，企图进攻宁冈，主力约4个团已经南渡千水河，永新城内兵力空虚。朱德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红军主力由小西江区向东前进，沿禾水河北岸奔袭永新城。

途经草市坳时，红军将从永新城西进澧田的敌第七十九团拦住。朱德命令第二十八团从正面发起攻击，第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向敌侧后迂回。在朱德指挥下，这两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密切配合，奋勇杀敌。仅仅两个小时，就将敌人全部歼灭了，敌军官当了俘虏也不知道红军是从哪里打出来的。

草市坳巧胜敌军后，朱德又挥师东进，乘敌不备，突然攻进永新城，将敌第七十二师师部和第二十七团1个营歼灭。敌师长杨如轩也被击伤。

在朱德的巧妙指挥下，红军以4个营的兵力歼敌1个师部、1个团零一个营，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枪300多支（挺），银元20余担以及许多弹药和被服、药品，又一次击破了敌人的“进剿”。

三、龙源口大捷。

6月中旬，驻守江西的国民党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奉命调集5个团的部队，又一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进剿”军总指挥，当地人民群众称敌师长杨池生和杨如轩是“两只羊”。与此同时，国民党驻守湖南的第八军第二师也从平江调到攸县，企图威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西侧。

朱德和毛泽东看到敌人来势汹汹，决定避开敌人的锋芒，指挥部队主动撤出永新城，向西南方向撤退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域宁冈，张网以待；同时组织永新附近的农民赤卫队、暴动队日夜袭扰敌人。

国民党军队进占永新以后，果然中了朱德和毛泽东的诱敌之计，将3个团的兵力分成两路，向宁冈进犯，22日，这两路敌人分别前进到龙源口和白口，当天夜里，朱德和毛泽东命令红军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二十八团分别占领新七溪岭和老七溪岭的制高点。

23日上午，两路敌人果然钻进红军设下的伏击圈。在红军指战员的猛烈打击下，敌军狼狈逃窜。午后，红军第二十八团开始追击敌人，在白口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以后，直插龙源口，顺顺利利地切断了左路敌军的退路；接着，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互相配合，将左路敌人歼灭在龙源口地区，红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城，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进剿”。

龙源口大捷，红军在朱德和毛泽东的指挥下，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缴获步枪400多枝，重机枪1挺，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也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根据地的全盛时期，一批批革命的农民、学生和安源煤矿的工人克服重重困难，长途跋涉，奔上井冈山。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龙源口大捷后，当地人民赞扬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在朱德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多年以后，朱德颇有感慨他说：“在井冈山时，战斗很多，都打得很漂亮，敌人有十几万，打了一年多，还不能打败我们。周围群

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

从湘南起义到井冈山，这是朱德为了发展红军、发展革命力量所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朱德认为，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湖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十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朱德率领这支部队退出湘南，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合，开展有组织的游击战争。

关于游击战争，朱德颇为自豪他说，“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雄图壮志依然在，

《朱德选集》第127、128页。

《朱德选集》第126页。

任重致远永不歇。
学诗学书学理论，
忧国忧民忧建设。
海量宽宏唯忘我，
平易近人众心悦。
奋斗一生服从党，
高龄犹勉共产业。

这是康克清在朱德元帅寿诞时写的一首诗，诗中反映出了康克清对朱德元帅的深刻认识和颂扬。

朱德和康克清，47年的夫妻之情，47年的同志之情，在井冈山上建立起来的战斗情谊，伴随着朱德和康克清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直至走完人生的路途。

康克清回忆说：我和朱德组成家庭，也就是志同道合吧，当然，在许多方面，应该说我是他的学生。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结婚那年，朱德已经43岁，是红四军军长，康克清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

康克清出生那一年，正值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康克清的家乡在离井冈山很近的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罗塘湾离万安县10公里，是一座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穷苦渔村，幼年的康克清历尽坎坷，由于度日维艰，出生仅仅40天的康克清就被送给别人做童养媳，1925年，他的养父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康克清在其养父的熏陶和影响下，很早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13岁就成为妇女协会的宣传委员，14岁就加入了共青团。50年代初期，康克清专程来到她深切怀念的故乡，察看了那一幢四扇六间砖木结构的瓦屋。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故乡的老屋已经墙壁脱落，破旧不堪了，但她对故乡的感情依然是那么深厚。

旧社会江西一带，许多人都是早婚。1928年春夏，养父已经开始为康克清筹办婚礼了。康克清不愿意，用种种理由拒绝这场婚姻。但是，她没办法说服养父，养父还在按照他的计划筹办婚礼。

康克清想逃走，逃出这个家。养父知道后，把康克清锁进一间小房子里。

那些天，康克清苦闷极了。她想哭，她想喊，她多么希望有人来帮帮她呀！

一天夜里，康克清正昏昏欲睡，忽然听到窗口传来一个女娃子的声音：桂秀、桂秀（康克清小时的名字），红军要开到我们村里来了，有人已经看见红军了。

康克清一听，顿时兴奋起来，连声说：快帮我把门打开。

我们都报名参加万安游击队呢，你去吗？

哪能不去呢？你一定要替我报个名。

康克清从那间小屋里逃出来以后，就同罗塘湾的37名女伴一起，跟随红军上了井冈山，康克清回忆第一次见到红军时说，“红军来到罗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进老百姓的家，宿营在外面。陈毅就召集我们开会，讲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为红军筹粮菜，我们就组织起男男女女几千人，把丢到塘里的枪支、梭标都捞起来了。后来，国民党81团来了，陈毅见敌人比我们强大，就立即撤回井冈山。我就是那次跟陈毅上井冈山

的……”

山路弯弯曲曲，蜿蜒数百里，群山在行军队伍周围发出蓝色。红军战士们兴致勃勃地向井冈山上前进。康克清正走得满头大汗。忽然听到队伍里有人喊了一声：朱军长来了！

康克清的心“突”地一跳，暗暗问自己，朱军长？那不就是传说中“朱毛红军”里边的朱德吗？人们说得可神哩，今天有机会，一定要亲眼看看朱军长。

康克清往前走了几步，顺着别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体格魁梧、满脸胡子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他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军衣领子敞开，一身风尘，可见走了很长的路。忽然，他在路边坐下了，笑嘻嘻地同大家打招呼。

他就是朱德军长吗？康克清心里顿时升起一个疑团。她见过反动派的军队，别说是一个军长，就是挨户团的杂牌团长，也是一走地皮颤，前前后后不知有多少护兵保镖呢！红军的军长怎么就像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样，一点儿官架子都没有？

来人正是朱德。每当行军休息的时候，朱德总是和指战员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康克清见这情形，刚才那种紧张感也没有了，她小声对同村来的一位女同志说：真没见过，朱军长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那位女同志“哧”一笑，说，你没听见，有人竟敢叫他“伙夫头”。他还像士兵一样挑粮食呢！

康克清刚从乡下出来，见到红军队伍里的生人还不大好意思，今天亲眼看见朱德军长这么平易近人，也就不感到怎么拘束了，她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听朱德同大家一起聊天。

这是康克清第一次见到朱德。当地和朱德组成家庭以后，她还忘不了这次见面。她说：当我初次碰到他，并没有立刻浪漫地对他钟情，不过因为他生活跟小兵一样又做着小兵的工作，所以非常喜欢他。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敬爱这位革命的领袖。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由于生活窘迫和繁重的劳动，她从来没有上过学。上井冈山时，康克清还不识字。参加红军以后，康克清也担任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来德那里登门求教，朱德总是热情地鼓励和辅导康克清。

康克清很倔强，她把学习看作同打仗一样重要，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她都不放弃一切识字的机会。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萌发了爱慕之情。

有一天，康克清坦率地公开了自己的婚恋观。她对自己的战友们说：我可以奉告大家，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朱德听到康克清的这番话以后，心中增添了几分敬意。他紧紧握住康克清的手说：克清，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纯洁、真诚、坚强的姑娘真心地爱我，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好吗？

康克清甜甜地一笑，低下了头。

忽然，她想到朱德马上就要率领部队出发了，猛地抬起头，说：打了胜仗来结婚。

1929年3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红军在长汀一战中，歼敌2000多人，胜利攻克了长汀县。不久，朱德和康克清结婚了。

婚礼十分简朴，新房里几乎没有什么布置，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四个方凳。毛泽东、陈毅和战友们纷纷来到新房，向朱德和康克清道贺。朱德虽说是新郎，也钢枪不离身，草鞋不离脚，笑盈盈地拿着花生和汀州特产招待大家。

一对红军恋人终于结成终身伴侣。

婚后，朱德和康克清长期过着简朴的生活。那时候，朱德常常率领部队作战，有时候许多天都不在一起生活，朱德心里却时时想着让康克清尽快地成长起来，为革命工作多作贡献。朱德很少让康克清去料理他的生活，以便使康克清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承担的工作。一旦能挤出空余时间，朱德就和康克清并肩而坐，一只手拿着识字课本，一只手指点着生字，帮助康克清学习。康克清一字一句地学，一字一句地记，进步很快。短短一年里，康克清就认识上千个字了。

朱德喜欢康克清，也尊敬康克清。在朱德眼里，康克清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在朱德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康克清又开始学军事、学政治。白天，她模范地执行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夜晚，她在油灯下认认真真地学文化。当朱德看到康克清伏在桌子上写笔记、写心得，看到她写出了一段文理通顺、言简意赅的短文时，总是一边夸奖她，鼓励她，一边又耐心地为她改正错别字。

康克清对朱德同样十分尊敬，她非常希望能给朱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康克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我在福建省长汀县结婚”。“自从结婚以后，我差不多始终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〇年占领了吉安以后，两人曾分别了一年。”但是，艰苦的斗争岁月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把时间用于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在瑞金时，康克清多次变换工作，从警卫团到交通队，从军委机要局到妇女义勇团，她总是愉快地接受新的任务，像男同志一样去爬山过河，去冲锋陷阵。但她心里时时忘不了朱德。

紧张、艰苦的斗争生活，更加深了康克清对朱德的理解。在康克清心目中，朱德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于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这个品质使得朱德自觉地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朱德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也同样爱戴他。

对于家庭生活，康克清曾经说：我从未跟朱德吵过嘴，有时我给他一点小小的批评，但他平常的行为总是对的，我们两人亦从未命令过谁。他生病的时候，我把他当同志一样地服侍他，至于他的衣食，我可从未关心过，这些是由他的勤务兵料理的。

《续西行漫记》的作者威尔斯曾经用称颂和羡慕的笔调写道：我曾和康克清，还有朱德、周恩来一道在总司令部里吃饭。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亦微笑地看着他这个年轻的爱妻，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提起他时从不曾称呼他为自己的丈夫，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叫他“同志”。我笑望着他们两个，心想他们是多么罕有的一对，而且各自又有着多么惹人敬爱的个性呵！他们是这么诚实坦率，又是这么天真无邪！

他们两个，就像百炼之钢。

9 朱德说：毛泽东是老师，是领袖。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毛过不了冬。毛泽东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井冈山会师以后，“朱毛红军”的威名响彻湘江赣水，华夏大地。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的岁月里，朱德和毛泽东密切配合，逐渐总结出了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得赢就打，打下赢就走”等一系列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里有先德长期戎马经验的总结，是革命根据地军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红军将士们深深感到，在革命斗争中既离不开朱德，更离不开毛泽东。朱德把同毛泽东的合作看作是红军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红四军的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当罗荣桓等人提出希望在闽西上杭养病的毛泽东回部队工作时，朱德立刻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毛过不了冬。

朱德和毛泽东合作整整 48 年。“朱毛”的旗帜已成为革命者的共识和团结的象征。这里，我们描述几段红军初创时期朱德和毛泽东生死与共的精彩情节。

自从踏上井冈山以后，朱德对山上的青山翠谷。竹丛树林，都有深厚的感情。短短两个月，朱德走遍了山区的许多地方。有时候，他甚至攀登悬崖峭壁去勘察地形，组织战士们修筑防御工事。朱德还经常同当地的农民交谈，向他们了解井冈山的风俗人情和地形情况。在朱德看来，要建设好根据地，要把敌人放在自己的“手心里玩”，就要摸熟数百里井冈山的每一寸土地。有一天，朱德偶然碰到王佐、袁文才两人，就问到了他们在井冈山地区打游击的情况。王佐、袁文才两人异口同声他说，井冈山地区过去有一个叫朱老聋子的人带了一支队伍，很活跃。他的办法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钻圈，井冈山这么大，国民党军队进山来，八成是要吃亏的。

当朱德问到武器弹药时，王佐、袁文才毫不掩饰他说，山上的武器很简单，甚至还有弓箭呢！那时候，井冈山上还有用树干做的“大炮”，他们把一种坚硬的树干锯成五六尺长，把一头挖空，再在另一头挖开一个发人的小孔，把黑色火药、铁片、铅块和三棱石子装在树干里后，就把这种炮暗藏在通往井冈山的五六条小道的工事里，一旦敌人走近，就点燃引信。随着一声爆炸声，大炮炸得七零八落，敌人也受阻了，他们用的弓弩也很大，箭头上有毒，弓的一端摆在地上，用脚一踏机关，就可以发箭。朱德很注意听王佐、袁文才讲这些故事，他觉得朱老聋子的有些战术是可以借鉴的。三个人正说得有趣，忽然听见有人喊：军人，湖南省委派人来了，党代表正找你呢！

原来，中共湖南省委在盲动主义的影响下，认为湖南的反动势力已经削弱了，就制定在湖南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计划。为此，湖南省委连续写信和派人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主力立即向以郴县为中心的湘南发展，支援湘南的武装起义。

对此，朱德有不同看法。朱德注意到，当时敌人在湖南的兵力大约有 10 个军，其中有 4 个多军驻守在湘南和湘东的茶陵、酃县地区；在江西还有 3 个军的部队，其中在赣西就有约 1 个军。湘赣两省的敌人正在酝酿对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来进行新的“会剿”。这个时候，反动势力并没有削弱，1928年6月30日，当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举行联席会议时，朱德认为，湖南敌人的力量目前还过于强大，其它条件也对红军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主力不宜到湘南去，而应坚持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参加会议的多数人同意这一意见。会后，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把会议的意见和决定向湖南省委作了报告，并建议湖南省委重新讨论和决定红四军的行动方针。

但是，由于湖南省委的一部分同志没有认清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敌情的变化，致使湘南和湘赣边界遭到“八月失败”。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7月初，湘赣两省的反动军队联合行动，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7月4日，敌第八军第一、第二两师提前出动，由茶陵、酃县前进，相继侵占了宁冈的耒市和新城。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朱德和毛泽东决定，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由新城北进永新之敌，红四军军部率领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进攻酃县、茶陵，威胁敌人的后方，调动进入永新之敌回援；然后集中力量，打击即将从江西来犯的敌人。如果朱德和毛泽东的这一决心能实现，就不会遭到“八月失败”。谁知战斗中出现了意外的干扰。

7月13日，红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按照朱德和毛泽东的意图，顺利攻克了酃县。红军的这一行动果然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第二天，进占永新的敌人即经莲花撤回茶陵。朱德和毛泽东认为红军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决定率领部队返回永新。

行军途中，朱德突然接到报告：第二十九团被杜代表和龚代表截住，已经开往湘南了。原来，第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战士都是湘南人，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第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认为敌人已经到了“惊恐万状，不堪一击”的地步，极力鼓动该团战士打回湘南去。第二十九团的一些官兵有思乡情绪，很想去打湘南的敌人。在杜修经、龚楚的鼓动下，第二十九团官兵离开了红军主力，向湘南进发。

朱德知道，第二十九团开往湘南，就可能陷入敌人的重围，有全团覆灭的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朱德气愤他说：不听毛泽东的，就是鸡蛋碰石头。为了减少革命力量的损失，朱德被迫率领红四军军部和第二十八团前去追赶第二十九团。

当时，毛泽东跟随第三十一团在永新附近。永新城周围驻扎赣敌第三军5个团和第六军6个团的兵力。当毛泽东得知红军的两个团开往湘南时，为了不使永新附近的敌人去湘南围攻红军，立即指挥第三十一团和永新赤卫队、暴动队，用四面游击的方式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把敌人的11个团困在永新城周围15公里内达25天之久。后来由于敌人得知红军主力已经到湘南，就大胆地向永新城周围的红军发起进攻，毛泽东才不得不指挥第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从永新县城周围地区撤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坚持在井冈山打击敌人，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迎接红军主力。

红四军军部和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进入湘南以后，于7月24日进攻郴县，击溃了敌第十六军的两个团。但是，红军已经陷入优势敌人的围攻之下。当天黄昏，敌人向红军反扑，朱德果断指挥部队撤出郴县。在严重的形势面前，第二十九团的许多人由于受杜修经、龚楚的鼓动，开始向南自由行动，

纷纷跑回直章家乡。这个由宜章农军编成的团只剩下约百人留在朱德身边。

面对优势敌人的围攻，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余部，果断东进，向井冈山转移。

8月23日，红军主力在湘南桂东同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会台，朱德、毛泽东和陈毅的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光中充满着难言的激动之情。

两路部队会合后，朱德、毛泽东和陈毅就率领部队返回井冈山。

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时，江西的敌人乘机向根据地进犯，留守井冈山根据地的部队被迫撤向山区坚持斗争，根据地内各具城和平原地区大部分被敌人占领，这么一来，保安队、挨户团为虎作伥，横行无忌，地主豪绅乘机进行阶级报复。那一段时间，白色恐怖布满城乡，井冈山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毛泽东总结他同朱德在井冈山的斗争历程时，深刻指出：4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是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个团。然而，红军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和军委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才有4月至7月4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下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前夕，湘敌第八军第一师在赣敌的策应下，向驻守井冈山黄洋界阵地的红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黄洋界是井冈山上著名的五大哨口之一。雄伟险峻的井冈山上，共有双马石、八面山、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五大哨口。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距茨坪17公里，海拔1343米，是江西省宁冈和湖南省酃县通向井冈山的要隘。站在这个哨口举目了望，只见数百里群山起伏，山下白云翻滚，有如一片汪洋大海，故称黄洋界。黄洋界上，第一道哨口设在小伙店左侧下坡处，主要用于扼守大陇、酃县进入井冈山的道路，阻止湖南方向的敌人向井冈山进犯。第二道哨口设在小伙店右侧前方，主要用于扼守由宁冈、茅坪、白露等地上山的道路，阻止江西方向的敌人进犯。这道哨口的西侧有一棵枝繁叶茂、高十余丈的木荷树，树身大得要三个人合抱，朱德和毛泽东、陈毅一起挑粮上山时，经常在这里休息。当时，守卫在黄洋界上的红军不足一个营。

1928年8月30日上午，敌军凭借人多势众，已经冲过两道哨口，逼近黄洋界海拔1558米的望哨。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指战员退守到黄洋界的最高点以后，凭借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顽强作战，打败了敌人一次接一次的进攻。下午，当敌人再次向红军发起进攻时，红军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向集结在源头的敌人射击。敌人听到炮声，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山，不敢再向山上进攻。当天夜里，敌人撤退到酃县。

这一仗，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依靠黄洋界大险打垮了4个团的敌人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事后，毛泽东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诗句。

197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50周年，毛泽东的词《西江月·井

冈山》镌刻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上。

1928年9月8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返抵井冈山南麓的黄坳。

由于“八月失败”，红军面临的敌情依然十分严重。赣敌第十四旅仍然占领着宁冈新城和永新，自上犹开始一直尾追红军主力的赣敌独立第七师5个营已经占领遂川，赣敌第二十一旅和第三十五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等地域，湘敌第八军的3个师都部署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朱德和毛泽东、陈毅等人商量后，决定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进占遂川的赣敌独立第七师。

9月13日，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4个营，对遂川之敌发起进攻。守卫遂川的赣敌独立第七师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师长刘士毅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第三期、日本陆军炮工学校和日本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归国后曾经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兼督战官，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刘士毅自认为精通战术，当他得知朱德率领红军来攻遂川时，别有用心地把部队撤出遂川，埋伏在县城两侧，妄图把红军装进他预设的口袋里。

朱德身经百战，一眼就看穿了刘士毅的鬼把戏，他胸有成竹地对前来报告敌情的侦察员说：刘士毅想牵着我们的鼻子来，那么好吧，我们就让他们“牵”一次吧！

朱德说完，命令一部分战士装扮成老百姓，和部分部队一起大摇大摆地进了城，主力则留在敌人的外圈。

刘士毅以为自己的意图得逞，正想动手，突然听到前后左右爆发出一阵阵激烈的枪声，红军里外夹击，打得独立第七师喊爹哭娘，东逃西窜。刘士毅摸不清红军有多少部队，急忙命令余敌退守赣州。

十多天后，当刘士毅摸清情况，联合驻守泰和的敌军第二十一旅1个团向遂川进行反攻时，朱德和毛泽东已经主动撤出遂川，挥兵北上，于10月1日出其不意地对驻守宁冈新城的赣敌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发起攻击，“吃”掉敌人一个营。

刚进至遂川的敌第二十一旅1个团绕道泰和，增援遭到“朱毛红军”打击而逃退到永新之敌时，朱德和毛泽东又挥师南下，于10月13日再攻遂川，吓得刘士毅连忙指挥部队弃城逃跑。

11月2日，当敌人调动部队又一次向遂川进犯时，朱德和毛泽东再次主动撤出遂川，抓住战机，对占驻新城的敌第二十七团发起猛攻，使这股敌人受到重大损失。在朱德和毛泽东的连续打击下，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敌军联合进行的第二次“会剿”即被打破了。

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朱德和毛泽东利用根据地内作战的有利条件，指挥红军避强击弱，忽南忽北，连战皆捷，一共俘虏敌人约500人，缴获枪支400余枝，基本上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原有地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湘赣边界于10月4日至6日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不久，朱德和毛泽东又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应采取的路线的指示。这份指示在关于军事的组织与指挥问题中指出：“自湘南发展，首先须注意军事的组织与指挥的统一部队的分布区域与部队之间的联络与指挥必须有相呼应相联络的行动。因此，红军须有一健全的军事委员会，担任这种任务。军委的主席中央指定润之（即毛泽东，作者注）同志担任，

玉阶文才诸同志均须参加。”根据中央指示，11月6日中共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统一领导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11月14日，红四军召开第6次代表大会，选举出了由23人组成的军委委员，朱德担任军委书记。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

1928年11月，湘赣两省的敌人又开始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及时打破敌人的“会剿”，朱德和毛泽东一面组织部队开展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能，一面广泛动员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想方设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山区的隆冬，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整天呈现着一种混沌沌的现象。空气凉透了，使人难于熬受。偶尔飞扬起一片片清雪，严寒似乎要把大地冻裂。只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才让人们感受到那种水晶似的、温柔的光线，朱德在宁冈已经住了好几天了，每天都有战士们送来关于敌人“会剿”的新消息。朱德总是细心地进行分析研究，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对策。12月10日这一天，朱德刚写完一份报告，忽然看见一个人兴冲冲地跑进来，大声说：军长，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部队上山来了。

朱德一听，喜上眉梢，连忙迎了出去。

彭德怀原名彭德华，号石守，是湖南省湘潭县彭家围子人，18岁时入湘军当兵，1922年又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担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彭德怀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1月任团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彭德怀同滕代远一起带着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平江起义是由彭德怀、滕代远在湖南平江地区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进驻平江，彭德怀是该师第一团团团长。7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到湘鄂赣边界地区，同独立第五师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这个师发展了一批党员，准备在必要时组织起义。谁知数天后南（县）华（容）安（乡）特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敌人发现，敌师长立刻命令逮捕并处决黄公略。在紧要关头，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一团于7月22日在平江城举行起义。黄公略领导的部队也先后起义。起义军共2000多人，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

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给敌人以一定的打击，但在平江长寿街、黄金洞和万载大桥等地的作战中失利，部队减员较大，缩编为5个大队。10月份，这支部队又与湘鄂赣边一些县的游击队合编为3个纵队。当国民党军队在湘鄂赣三省举行“会剿”时，黄公略率领部队在湘鄂赣边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700多人踏上了井冈山。

彭德怀早就知道井冈山上有一支“朱毛红军”，今天同朱德见面，猛地一把拉起朱德的手，兴奋他说：朱军长，红四军在井冈山干得很漂亮嘛！

朱德乐了，说：你们来了，好呀，井冈山根据地的力量就更强大了，敌人再进行“会剿”，也是枉费心机。

一讲到反“会剿”，彭德怀显得很激动。他把一路上掌握的敌情和红五军的基本情况详细地向朱德说了一遍。朱德一边听一边记，心里想：老

彭这个人，真是胆大心细，湘鄂赣三省的敌情都装在他脑子里了。他对彭德怀说：老彭，这一路你们很辛苦，先让指战员们休息休息。

彭德怀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朱军长，反动军队的“会剿”我们要高度重视嘛！

朱德点了点头，说：过了元旦，我们要同毛泽东、陈毅一起好好研究一次。

彭德怀走了。朱德耳边还在回响着彭德怀那豪放的声音。

1929年1月初，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又开始了。敌人调动了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从永新、莲花、茶（陵）、（县）、桂东、遂川等地出发，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为了削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敌人还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朱毛红军”面临的形势日益严重。

1月上旬，朱德、毛泽东、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同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红五军军委的委员们一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除传达、讨论了在苏联莫斯科郊区的兹维尼罗德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外，主要讨论了反“会剿”的方针和部署。这次会议决定红军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朱德、毛泽东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的实际困难，在敌人“会剿”全面开始后，再在外线作战。配合内线红军打破敌人的“会剿”；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彭德怀开始对井冈山一带的地形不太熟悉，他上山还不到一个月，朱德告诉他，第三十二团团团长是王佐、党代表是何长工，他们对井冈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彭德怀对王佐不够了解，会后听了朱德的一番介绍，心里有数了。

1月14日，朱德、毛泽东和陈毅率领红四军军直、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离开了井冈山，经大汾、营前、崇义向赣南出击。第二十八团团团长是林彪，林彪当时只有20岁，就开始指挥这个以南昌起义军为骨干的主力团了。朱德曾经说：“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八团战斗力强，但群众观点差些”。第三十一团团团长是朱云卿。

敌第三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总指挥是鲁涤平，代总指挥何键，副总指挥金汉鼎。当鲁涤平和何键得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行动时，也采取了兵分两路的战术。何键命令已经前进到遂川和资兴的第七师第二十一旅、第十九师的一个旅和驻守赣州的第十五旅一起，追击“朱毛红军”；命令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第十八师第五十三旅和独立第一旅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形势十分严重。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前进到大厦时，遭到敌第二十一、第十五旅的袭击。为了摆脱优势敌人的追袭，朱德和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北出赣州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沿赣粤、赣闽边界挺进。朱德心里想，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灵活机动，歼敌的机会总是有的。

2月8日，“朱毛红军”到达瑞金以北的大柏地、隘前地区时，机会终于来了。朱德和毛泽东看到尾追红军到瑞金的敌第十五旅的两个团态势孤立，大胆冒进，急于追上红军，就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必经之大柏地附近的谷地两侧隐蔽占领有利阵地，用少数兵力在隘前警戒。

第二天，敌人果然大摇大摆地紧追红军。朱德要求警戒分队边打边退。当敌人被诱到大柏地附近时，朱德命令红军发起猛烈攻击。敌人万万想不到“逃跑”的红军会杀回马枪，毫无防备，慌乱中勉强抵抗了数小时，就纷纷缴枪投降了。

大柏地战斗是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胜仗。短短两小时，将敌第十五旅大部分官兵歼灭，俘虏团长以下官兵 800 多人，缴枪 800 多支。红四军的这一胜利，不仅改变了红军北出赣州之初的被动局面，也使赣南的群众受到巨大鼓舞。战斗结束后，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吉安的东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会合。

但是，井冈山的主要阵地却被敌人占领了，使红军原定的内外线配合、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计划难以实现。

169

朱德和毛泽东离开以后，井冈山上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1929 年 1 月 26 日，湘赣两省敌 3 个旅相继对红军坚守的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八面山位于茨坪西北、湖南和江西的交界处，海拔 1800 多米，气势雄伟，是井冈山上最高的哨口。八面山南通大井，东通上井，哨口设在两路交叉之地，十分险要。桐木岭位于茨坪东北，是通往永新县的要道，共有三个总哨口和风雨亭、石姬、小黎坪 3 个分哨口。总哨口设在马坳，在两山之间的咽喉要地。风雨亭距离总哨口不到三百步，平时，红军白天在此守哨，晚上回总哨口。石姬哨口设在龙姬仙坛内，是通往宁冈县的一条捷径。小黎坪哨口设在黎坪山顶上，距总哨口约 3 公里，是通往拿山的要道。总哨口和各分哨口之间，都构筑了工事，工事外围还有竹钉障碍物。红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凭借各大哨口的险要地形，顽强抗击敌人。

战斗进行到第 4 天，著名的黄洋界哨口被敌人突破了，八面山哨口的阵地也丢失了。敌人集中兵力对桐木岭进行猛烈的炮击。炮击后，敌人还组织小分队偷袭桐木岭，都没有得逞，红军战士守得非常顽强。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撤出桐木岭，率领红五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到赣南去寻找“朱毛红军”；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和红五军的一部分由团长王佐指挥，转入井冈山的深山密林开展游击战争，继续反对敌人的“清剿”。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不久，敌“会剿”总指挥鲁涤平为了争夺控制湖南的权力，和代总指挥何键之间发生了公开争斗。这场争斗的幕后策划者是桂系军阀和蒋介石。1929 年初，桂系军阀势力不断膨胀，为了控制湖南，桂系军阀有意制造“湘案”，赶走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扶植何键上台，并乘机派军队进驻长沙。蒋介石早把桂系军阀看作他建立独裁统治的一种重大威胁，立即调动军队，发动了持续数月、殃及半个中国的蒋桂战争，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军也大部分撤走了。在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乘机进行反攻，基本上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敌军的第三次“会剿”破产了。

由于红五军团主力已经撤离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就率领红四军转战赣闽边界，在福建省西部的长汀县又打了一个胜仗。

驻守长汀之敌是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3 月 11 日，当郭凤鸣得知“朱毛红军”到达长汀西南的四都时，急忙命令一个团在长汀城南的长岭寨上设防，命令另一个团赶往四都，进攻红军。

朱德早就注意到了郭凤鸣这两个团的动向，他同毛泽东研究以后，一面

在四都大张声势，一面调动主力部队在四都以北的渔溪附近设伏。13日，当敌人耀武扬威地向四都前进时，在渔溪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打击，损失惨重，残敌被迫退守长岭寨。第二天，红军又挥师前进，主动进攻长岭寨。

在长岭寨前，朱德察看了敌人的部署以后，先指挥一部分兵力从左翼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主力再从正面发起攻击。在红军的前后夹击下，敌人毫无斗志，勉强抵抗了数小时，长岭寨2000多守敌全部被歼灭，敌旅长郭凤鸣命归黄泉。红军乘胜占领了长汀城。

长汀战斗，“朱毛红军”歼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缴获步枪500支，迫击炮3门以及大批物资，使“朱毛红军”扬威闽西，极大地鼓舞了闽西人民的斗争热情。后来，朱德对这一时期红军的发展作了初步总结。朱德说：“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定向赣南发展，到东固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下山时，红四军有四千八百人，到了东固，还有四千人。这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部队稍事休整，即向福建行动。三月中旬，长岭寨一战取胜，占领汀州，打死敌旅长郭凤鸣。这就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红四军又有了新发展，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各项政策与制度，也初具规模。”

长汀战斗结束后，朱德和毛泽东组织红四军进行整编，以原第二十八团、特务营、第三十一团为基础，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林彪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还是率领南昌起义的老部队。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时，朱德和毛泽东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会合。

就在朱德感到红军“有了新的发展，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各项政策与制度，也初具规模”时，毛泽东拿着党中央的一封指示信来找朱德。毛泽东说：玉阶，这封信中央是2月7日发出的，我们刚刚收到。中央当时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

朱德一愣，展开信一看，两道眉毛渐渐锁紧了。原来，党中央要朱德和毛泽东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朱德认为，如果采用这种办法来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那就太不切合实际了。

这一天，朱德和毛泽东彻夜长谈。

4月5日，朱德和毛泽东同前委的同志商量后，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当时赣闽浙三省敌军最弱，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尤以江西西部、南部、东北及西北部发展革命的条件为最好，建立了或正在建立红军游击队和小块根据地，这就造成了对南昌包围的形势。报告叙述了红四军几年的战略战术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朱德和毛泽东等人还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

这份报告，提出了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战略计划。这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的重大发展。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于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尤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红四军以前6次党代会都在井冈山

《朱德选集》第128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上召开，这次决定在尤岩召开，本来是准备总结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会议期间发生了争论。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地位，朱德继续留在红四军，“朱、毛”两人开始短暂的分别。

出现这种情况，使朱德感到很意外。朱德回忆说：“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这套“新办法”是什么？一直到古田会议时才解决。红四军为找到这套建军的新办法，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说起来真是惊心动魄。

4月初，“朱毛红军”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在瑞金会合以后，于4月11日在零都举行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以井冈山根据地为基础的湘赣边苏区；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三、第四团，在瑞金、零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等地消灭地主武装，发动和组织群众。

这一时期，红四军在朱德和毛泽东的指挥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是转战赣南，攻占兴国、宁都两城。这一战，朱德和毛泽东分头行动，毛泽东率领一千多红军进兵兴国县，朱德指挥红军向兴国县东面的宁都县进攻。

朱德曾经到过宁都。那一次，红军一枪下发就占领了宁都全城。现在，宁都由国民党的一个团驻守。团长雷世宁出身于地主军阀家庭，一贯横行霸道，民愤很大。宁都的老百姓说，雷世宁一人霸占了30个妇女，他还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要把“朱毛”的头悬挂在宁都城墙上。

听到这句话，朱德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宁都的城墙比较坚厚，红军虽然缺乏爆破器材，但是在城内外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红军很快攻破了宁都城。敌团长雷世宁为了逃命，连忙换了一身便服想躲藏起来，刚一出门，就被红军抓住了。

红军战士原以为这个雷世宁一定身高体壮，谁知却是一个又瘦又矮、在俘虏中显得最为怯懦的家伙。朱德脸一沉，厉声责问：要把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头挂在宁都城墙上的就是你？

雷世宁一看眼前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德军长，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你听着！朱德说。红军本来应该枪毙你，因为你罪大恶极。今天先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们已经了解到你在石城的家里存放着许多步枪、机关枪以及其它军火和银元，还存积了许多从农民那里抢去的大米。现在，你必须告诉你家里的人，把那些枪支、军火、银元和粮食运到我们这里来。另外，我这里还开了一张药品单子，这些药要到上海或者其它大城市才能买到，我们认为，你的家庭能想办法买到这些药。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你如果把这些事尽快办好了，我们可以放你。

雷世宁为了活命，立即按照朱德的要求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一名部属送到石城老家。数天后，雷世宁的大老婆雇了人把家里的枪支、军火、银元和大米都送到宁都。那些药品却是3个月以后才送到的，那时候红军早已离开宁都，雷世宁也随红军行动，行军途中，有的红军战士再次提出要枪毙雷世宁，朱德一直把他当作俘虏看待。

红军收到那些迫切需要的药品以后，朱德决定释放雷世宁。朱德警告雷世宁说：如果你再作恶，红军绝不会再像这样处理你。

朱德和毛泽东密切配合，又指挥红军于5月中旬攻占了龙岩，歼敌两个营，俘敌200多人。当敌人回援时，红四军于6月3日和17日连续两次打下龙岩。17日一战，除敌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只身逃脱外，其余2000多人全部被歼。

在连续胜利的鼓舞下，闽西地区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和赤卫队，一部分地方武装也转入正规军，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军在发展壮大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红军成员主要是农民和大批俘虏兵，加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作战频繁，中下级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新上任的干部缺乏实际经验；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缺少马列主义书籍，影响了干部思想觉悟的提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发生了争论。

这次代表大会由陈毅主持。会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有四个。第一是关于红军的任务问题。有人提出红军应建立根据地；有人认为红军只管打仗，根据地由地方党组织建设；有人干脆提出要“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第二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有人喜欢个人说了算，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制度觉得很受约束；有的人则主张事无大小都要交给大家讨论。第三是关于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有人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好”；有人175提出“司令部对外”，认为政治工作“是吃闲饭的”。第四是关于民主制度与管理部队问题。有的军官认为，士兵不打不骂不好带，主张体罚；有的还主张枪毙逃兵。

所有这些问题的争论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而且半年以后作为“党内的错误思想”而加以纠正，但当时对这些分歧未能取得统一认识。

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这场争论中起了挑拨的作用。林彪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写信给毛泽东。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林彪不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平时也常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例如，朱德军长同士兵的关系从来都是很融洽的，但林彪却恶意指责朱德是“拉拢下层”。

肖克将军认为，林彪在前委会议前“给毛泽东写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辞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

林彪的挑拨性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5月间，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慕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以后，在这场争论中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在红四军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一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被多数人接受，党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

《朱德传》第178页。

《朱毛红军侧记》第9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

没有再次当选。会后，毛泽东经前委同意，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上杭县蛟洋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

朱、毛分离，“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以后就不存在了。

党中央对红四军的发展一直非常关心，只是由于通信极端困难，远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中央机关难以及时而具体地了解红四军的情况。6月份，兼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看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对发展红军有很大便利，提出中央常委召开军事会议时，“很需要朱、毛处来一个得力的人”。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

根据周恩来的这一要求，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第七次党代会后离开福建，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并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问题，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对红四军的贡献。陈毅离开以后，红四军前委的工作由朱德主持。

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以后，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分歧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明确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应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走后，带回红四军。临别前，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10月下旬，陈毅从上海回到红四军，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和周恩来的一番话。

朱德兴奋他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毛过不了冬。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朱德和毛泽东又战斗在一起了。两天后，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朱德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流寇思想、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也深恶痛绝。为了摸索出一套建军的新办法，朱德同毛泽东、陈毅一起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参与制订了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2月28、29日两天，红四军120多名代表聚集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溪背村曙光小学，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向全体代表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反对枪毙逃兵。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经验，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

《周恩来传》第194页。

《周恩来传》第196页。

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详细列举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如何建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各地红军也先后贯彻执行了。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从整体上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朱德深有体会他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朱德还特别讲到毛泽东对发展红军的贡献，朱德说：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登出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军事通讯》是由周恩来主持的，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朱德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战斗生涯，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30年后，朱德元帅重返井冈山，看到井冈山上的一草一木，回忆起“朱毛红军”的发展历程，不禁触景生情，欣然挥笔赋诗：

革命雄师会井冈，
集中力量更坚强。
红军领导提高后，
五破围攻固战场。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朱德和毛泽东的合作更加密切。1935年6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逼迫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所谓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朱德大义凛然，明确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深受感动，称赞朱德：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看到中南海里贴出污蔑朱德的大字报时，当场提出批评。毛泽东说：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1973年12月，身穿深色中山装，手拄拐杖的朱德元帅从北京郊外的住所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军委会时，毛泽东亲切地请朱德坐在自己身旁，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一句风趣的话，说出了“朱毛红军”的历史影响，也说出了朱德和毛泽东之间多少深情厚谊！

10 中国红军之谜：是伙夫头、勤务兵， 还是军长？是医官，还是指挥官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叱咤风云，同毛泽东、陈毅等人一起指挥红军接连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爱民爱兵、忘我奋斗的动人事迹。这些事迹尽管只是朱德元帅戎马生涯中的几颗闪光的明珠，但它却反映出了朱德元帅崇高的道德品质，无私无畏的革命情操，使千百万人民群众看到了红军总司令的光辉形象。

故事之一：排队理发。

1928年1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新城以后，部队在新城附近进行短暂休整。数十日行军作战，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脏了，袜子破了，头发长了。休整时，朱德除了布置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之外，还留出时间让指战员们处理个人事务。

一天，数名战士来到新城南门的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店的黄师傅很热情，他一边给红军战士理发，一边问：听说朱德军长也在城里？

红军战士睁开眼看了看，没有回答。黄师傅自言自语：朱军长真了不起，那么多敌人，都被朱军长打败了。红军没有来以前，城里的敌人可威风啦，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百姓们可苦了。自从红军来了，穷人的日子就过得好了。这全靠毛委员和朱军长的好领导呀！朱军长是个啥样子哟？你们见过来军长吗？

说话间，朱德也到这家理发店来理发了。他见理发的人多，就悄悄地排在几名战士后面等候。

好一会儿，那战士理完发，翻过衣服领子走出来，忽然看见朱德排在后面，吃惊地叫起来：牛军长，你也来理发？战士们一听，立刻站起来，争先恐后他说：军长，你先理。黄师傅回头一看，才知道此人就是朱德军长，连忙拿着白围布走过来，说：朱军长，我先给你理。

朱德笑着摇了摇头，说：不不，你先给他们理，干什么事都有先来后到嘛，我还是排在后面吧！

朱德还常常利用理发的时间宣传革命道理。在永新县城时，朱德曾经独自到曾三和理发店理发。

那天，理发店的一名学徒刚挑完水，坐在门坎上休息，猛然看见面前站着一名红军。这个红军拍了拍学徒的肩问：你会剃头吗？

学徒看了看这个四十左右的人，满脸胡子，身上穿一身旧灰布军装，军装的后面还补了一大块蓝布，前面也补了一小块浅灰布，看样子是个炊事员，就大胆地说：我会剃头的。

那好，快带一套家伙，跟着我来。

学徒提着理发工具跟着这个炊事员来到南门商会里，进屋一看，只见屋里到处都是枪，正忐忑，只见那人把外衣一脱，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条凳子上准备理发，学徒心里没有底，就去问旁边一名擦枪的红军战士：同志，他是谁呀？

那战士笑嘻嘻他说，他？他是朱军长？我们的军长！

学徒一听，不由得“啊”了一声，他是军长，那我这个手艺恐怕……

怕什么？不要怕！你大胆理好了。朱德说。

学徒手里拿着理发推子，就是不敢下手。原来，刚才有个红军战士上来到

曾三和理发店，一脚跨在门外，一脚跨在门里说：老板，我们军长要理发，请你们去一个人，要手艺好一点的，弄得干净一点！一听这话，店里五六个理发师傅都停住了手，他们都愿意为朱军长理发，不等他们开口，店老板曾三和抢着说：好的，好的，我去，我去！

曾老板连忙换了一身白纺绸衣裤，提起理发箱子就跟红军战士走。谁知这位学徒刚挑了一担水，曾老板就提着箱子回来了。学徒好奇怪，怯生生地问：师傅，怎么这么快？

朱军长他不理发了。曾老板一边说一边脱下白纺绸衣服。刚才，他跟着红军战士来到朱德住处时，朱德正好往外走。朱德上下打量着曾三和，问：你是老板？曾三和连忙笑脸相迎。是，是，多吃了两年手艺饭，小号叫曾三和。

朱德沉吟了一下，摇了摇手说：我现在有事，不理发了，你回去吧！朱德已经了解到这个曾三和平时贪吃好穿，只管收帐，很少动手理发，对店里的学徒克扣得很紧，别人挣的钱都进了他的腰包。看到他身上那套被风吹得飘飘动的白纺绸衣裤，心里很反感。

学徒不知道这般缘由，得知面前坐着的就是朱军长，心里很紧张。朱德见状，干脆拉这名学徒坐下，亲切他说：不要怕，我们是红军嘛，红军就是为穷人打仗，为穷人解除压迫的。

理发时，朱德问：你学艺几年了？

已经五年了。学徒回答。

曾老板给多少工钱？

哪里有工钱？学徒的紧张感全消失了，滔滔不绝他说：当学徒真是苦呀，入徒还要自带3个月口粮，学3年帮3年，不但没有工钱，还要给师傅挑水做饭，洗碗打杂，下知道哪一天才是头呢？

做了工夫，应该向老板分钱，你应该有钱得。朱德又向他讲了许多打土豪分田地、反对老板剥削的道理。

理完发，朱德又招呼这名学徒一起吃饭。朱德说：你以后过十来天就来一次，你只要把箱子放在这桌上，我就知道你来了。

临走时，朱德把他送到门口，给学徒一个银角子。当时，一个银角子能换三四十个铜板，理一次发，十六七个铜板就很体面了。学徒正发愁无法找钱，朱德笑盈盈他说：不用找，你拿去，揣在你袋里自己用，不要交给老板。

在朱德的启发教育下，这名理发店的学徒毅然扛起枪杆，加入了红军的队伍，成为长征路上的一名英勇战士。

朱军长从来不欠理发钱，这也是井冈山根据地人民传诵的一段佳话。

有一年春节前夕，朱德的头发很长了，胡子也没有时间刮，大家都劝朱军长去理个发。朱德只得抽空来到镇南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主非常热情，很耐心地力朱德理了发，刮了胡子。

理完发，朱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毫给店主，说：这是理发刮胡子的钱，谢谢你。说完就转身往外走，店主人一把拉住朱德，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他激动他说：红军来了，我们的日子好过了。过去国民党兵来理发不但不给钱，不高兴还打人、砸店。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是你和红军给的，我怎么能收你的钱？

朱德听了，连忙把红军遵守纪律、爱护百姓的道理讲了一遍，再三表示理发一定要给钱。店主人听了，淌着激动的泪水对朱德说：那好，这个银毫

我收下，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银毫。

这位店主一直珍藏着这枚银毫。解放以后，他把这枚银毫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故事之二：军长挑粮。

自从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以来，国民党反动军队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调集部队“会剿”、“进剿”红军的同时，还耍出了经济封锁的种种花招，到处设关置卡，千方百计要使井冈山断粮断盐，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井冈山上。因此，红军要粉碎敌人的围攻，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除了修筑工事和练兵之外，还必须在井冈山上储备一定的粮食。

当时，井冈山上生产的粮食校少，当地群众留足口粮以后，能供给部队的粮食不多。红军要吃粮、存粮，除了井冈山周围地区的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送粮上山以外，还得自己下山去挑粮。战斗间隙，朱德总是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八百里井冈，到处都留下了朱德、毛泽东、陈毅和井冈山军民一起挑粮上山的足迹。

红军从山下挑粮上井冈山，主要有三条路。一条是从永新经过桐木岭上山，一条是从遂川经过朱砂冲上山，一条是从宁冈经过黄洋界上山。每一条路都要爬山过岭，挑一次粮至少得奔波一天，一位老红军曾经回忆说：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又高，路又陡，着实难走。每到运粮的那天，我们天一亮就出发，赶到装粮地点，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用具不够，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一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地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山。

1928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朱德又像往常一样，背着斗笠，蹬着草鞋，亨着自己亲手做的刻有“朱德记”三十字的扁担，精神抖擞地带领一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古城去挑粮。

说起朱德肩上的这条扁担，还有一番动人的故事。朱德当时已经42岁了，平时整日整夜地计划作战和部队训练，还常常和战士们一道挑着满满的一担米爬山过岭的，大家生怕他累坏了，都劝他不要去挑，但又讲不过朱德，有几名红军战士就想了个办法：偷偷把朱德的扁担藏起来，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谁知朱德又另外找来一根扁担，亲手在扁担上写了“朱德记”三个字。从此以后，“朱德记”的扁担就没有人“偷”了，朱德就能同战士们一起去挑米了。在朱德的带领下，战士们挑米的劲头更大了。有人还编出一首歌子，每当挑米爬山感到累的时候，战士们就唱起歌子互相鼓励，这首歌于是：

朱德挑谷上坳，
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合力，
粉碎敌人“围剿”。

以往每次挑粮，朱德总是要挑满满的两筐。今天，几个战士悄悄议论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让朱军长挑那么多了。谁知刚到古城，朱德就先动手装粮了。他把两个箩筐装满以后，又拿出随身带来的两个口袋，装上大半口袋粮食，加在箩筐上。战士们见了，连忙跑过去抢下口袋，争先恐后他说：军长，这一次你一定得少挑一点。我们那么多人，每人多挑一把，就把你那份补上

了。

朱德脸一沉，又亲切又严肃他说：我为什么要少挑呢？我挑得动嘛！挑粮也应该有我的一份嘛！说完，他就挑起担子去过秤。大家低头一看，朱德这一挑可重呢！

在朱德的带动下，战士们都自觉地把箩筐装得满满的。

战士们刚要走，忽然听到山岗下传来一阵充满喜悦的歌声。留神一听，这歌声是在颂扬朱德和红军。歌词是：

一根扁担四尺长喽，
年年用它来送粮。
往年送粮泪涟涟呵，
家中没有隔夜粮，
今年不同往常年喽，
人人喜送翻身粮，
朱军长带来好光景，
支援红军打胜仗。

领头唱歌的是麻上村的邱祖德。今年，朱德领导他们村打土豪分田地，老乡们精耕细作，获得了好收成。为了支援红军打敌人，报答朱德的恩情，邱祖德把最好的稻谷用来送军粮，他挑着沉甸甸的担子，翻过山岗，越过小溪，不知不觉走到朱德面前。

老 ，去送粮吧！快放下，休息一会。邱祖德回头一看，见是朱德，就顺从地歇下了，他和朱德已经是老相识了。

今年打多少粮食，交了军粮还够吃吗？朱德问。

够了，够了！老邱显得很激动。红军来了，地也变了。今年我们收了3000多斤稻谷，交上1500斤，我还剩2000斤呢，够吃了。

朱德仔细一算，觉得邱祖德一家孩子多，只要交1000斤军粮就够了。于是又和蔼地问：真个够吃了？

不够吃我们还有南瓜和红薯呢！邱祖德笑了。

朱德显得激动起来。他说：红军是为穷苦百姓的，你们把粮食给了红军，自己吃南瓜红薯，这怎么行呢？当朱德了解到根据地许多老乡都超额交了军粮时，他特地对地方干部说：一定要劝说老乡，不要超额交军粮，要留够自己的口粮！

办完这件事，朱德才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山。

从古城到茨坪，往返约200里，挑粮的红军指战员路上还得歇一宿。夜深了，月儿挂在中天，很圆，很亮。战士们望着夜空中亮晶晶的星星，围在一起议论着怎样才能减轻朱军长的谷担。

第二天一早，几名战士不约而同地来到朱德面前，准备集体向军长提“抗议”。朱德似乎看出了大家的来意，先开口了：小伙子，怎么样，今天我们来比赛？

班长谢长生听说军长主动提出比赛，劲头就上来了，连忙壮着胆子说：好呀，赛就赛吧，谁先到山顶谁就是英雄。旁边一名战士听了，连忙拉了拉班长的衣角，谢长生立刻醒悟过来了，又说：军长，咱们比赛也得讲个条件？

什么条件？朱德笑眯着眼。

谷担得按年龄分轻重，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给我们每人分一把。

朱德一听，哈哈笑了：那可不行，那可不行。说着，挑起谷担就走。

几名战士连忙赶上去，把朱德拦住，争执了好一会儿，朱德的谷担也没有减下来。

太阳冒出个圆顶子，嫣红嫣红的，把萦绕在村舍顶上、小山脚下的轻烟薄雾染成淡淡的玫瑰色，衬着远处如烟如云的青山翠田，融作一片朦胧浮漾的紫霞绿烟，在大地上缓缓游荡着。在挑粮队伍中，朱德挑着沉重的谷担，大步大步地朝前迈。不认识朱德的人万万想不到，红军的军长和战士们一起挑一百多斤重的谷担。

挑粮队伍到斜源村休息时，两名战士来到朱德面前，不由分说地把箩筐上的两大半口袋粮食提起来就跑。朱德想追，已经追不上了。他笑着说了一声：这小家伙……

一名战士回头说：军长，你“逼”得我们不能不采取“武力”行动了。一语刚落，战士们都发出了一阵快乐的欢笑。

距离茨坪 17 公里，就是黄洋界了。黄洋界这个峭口地势雄伟险要，一面是高山，一面是万丈深渊，路窄，坡陡，空着手往山上爬，也会累得喘不过气来。红军战士们每人挑着一百多斤重的谷担，一步登一个石阶，走几十米就得歇一会。走了一阵子，一名战士用一种关切的口气说：今天准把朱军长甩到后面了。

黄洋界上有一棵十余丈高的木荷树，这棵树枝繁叶茂，像一把大伞。红军挑粮上山时，常常在木荷树下休息，今天，那几名先到木荷树下的红军战士放下箩筐，准备下山去接朱军长，回头一看，朱德迈着坚定的步伐已经走到木荷树下了，大家高兴极了，齐声说：我们军长真是革命的英雄。

围坐在木荷树下，战士们看着朱德汗涔涔的脸，湿透了的军装，感动得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忽然间，红军战士们放声齐唱起来：

同志哥，
扁担闪闪亮，
挑起粮食上山岗，
毛委员带兵在井冈绘蓝图，
朱军长带（我）下山去挑粮，

……………

这雄壮的歌声，在井冈山谷回响，在红军战士心中激荡。

故事之三：帮人治伤。

1928 年 6 月中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联合“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6 月 22 日，朱德和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在七溪岭歼灭敌人三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粉碎了反动军队的“进剿”。在这次战斗中，红二十九团有个战士负伤撤离战场时，朱德发现这名战士一拐一拐的，立刻走到他跟前，亲切地问：你负伤了吧？伤着哪里啦？伤势重不重？

战士抬头一看，是军长，一股激动之情腾地涌上心头，马上说：腿上擦破了一点皮，没有关系，军长。

我看看，我看看。说着，朱德扶着这个战士坐在一块石板上，自己蹲下身子仔细查看战士的伤口。这个战士的伤口没有包扎，鲜红的血还在往下流。朱德凝视着战士的伤口，心中隐隐作痛，他比伤在自己腿上还难过。

战士有些难为情了，连声说：军长，这点伤不要紧，真的不要紧。我们走吧！

走？那怎么行！朱德站起来，又认真又和蔼他说，虽然没有伤着骨头，

但你这伤势也不算轻。现在天气热，不及时包扎治疗就可能引起伤口发炎，马虎不得呀！朱德前后看了看，见没有医护人员，就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会，我去找草药来。红军医疗条件差，用草药治伤是常有的事，朱德也学会了用草药治伤。

朱德弯下腰，在山坡上边走边找，为了指挥部队在七溪岭设伏，朱德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这一会儿，他下顾饥饿和劳累，在山坡上寻找着……

朱德拿着草药来到战士跟前，耐心地给战士敷上。这名战士热泪盈眶，紧紧拉住朱德的手说：军长，你又当军长又当“医官”，整日整夜为我们操心，你真是我们的亲人啊！

哪里话，我们革命队伍里都是阶级兄弟嘛，都应该互相关心嘛！朱德用爱抚的口气解释。

包扎了伤口，朱德又让警卫员和通信员找来一副担架，抬着这个受伤的战士走。望着军长的身影，躺在担架上的战士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朱德不仅热心为自己的战士治伤，还热心为井冈山上的老乡治伤。

在井冈山的佯桥湖村头，有一块500平方米的小高地，当地人叫步云山。暴动队员谢槐福就住在步云山附近。这年秋天，朱德军长亲自带领100多名刚参军的赤卫队员，从茅坪来到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那些天，朱德同红军战士一起住在谢槐福家里。

房东谢槐福很勤劳，天不亮就扛起锄头到茅山林里去锄草培土。一天早晨，他一不小心锄头尖就落到右脚背上，砍了一道半指宽的血口子，鲜血霎时就淌了出来。谢槐福“啊哟”喊了一声，忍着痛，跛着脚，在路旁扯了几棵治伤的白艾根，一脏一拐地走回家，蹲在门前的石阶上，轻轻敲打着艾根准备敷伤口止血止疼。

朱德正准备带领战士们到步云山上小高地去练刺杀，看见谢槐福，连忙走过去问：老谢，你的脚怎么流血啦？谢槐福抬头看见朱军长，苦笑着说：没有啥，刚才上山铲茶山，不小心碰着脚背了。朱德一听，立刻弯下腰，查看谢槐福脚背上的伤口。

谢槐福要把撕碎的艾根往伤口上敷，朱德连忙制止他，说：等一等，老谢，这样敷上去容易化脓。说着，朱德接过艾根，扶着谢槐福一步一步地走进屋，让他坐在竹椅上，顺手提起锅台上的一个瓦罐，倒了一杯茶水，又撕下随身带的一块药棉，用药棉蘸着茶水小心翼翼地替谢槐福把伤口上的一大块血饼洗擦干净，再把研碎的艾根做成一个银元般大小的饼团，轻轻地敷在伤口上，包上一块白纱布。

朱德左看右看，直起腰说：老谢，敷这草药伤口好得慢，明天我再到茅坪的红军医院给你取些药粉来，这几天你就在家息着，山上的活我们去干。

第二天，敌情发生了变化。天蒙蒙亮，朱德就带着部队出发了。谢槐福坐在家，不时地听到远方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他的心几乎悬了起来，他为红军担忧，也为上战场的朱德担忧。夕阳已经靠山了。天上迤邐着几块白丝等般的云彩，一层晚霞宛如鲜艳夺目的彩缎，装饰着碧蓝的天空，似乎在和青山绿水媲美。谢槐福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一盆鸭食，正想去喂鸭，忽然看见朱德的警卫员满头大汗地跑到跟前，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笑着说：谢大伯，这是朱军长要我给你送来的药粉，快敷上吧。为送这包药粉，警卫员跑了两里多路。

谢槐福连忙摇摇手，说：了不，我这伤不算啥，红军的药也很紧张，你

们留着给伤员用吧！

大伯，朱军长指挥红军又打胜仗了，警卫员把药粉塞到谢槐福手里，转身就走。

目送着红军战士的背影，谢槐福十分激动，他在心里说：毛委员、朱军长对我们穷苦百姓多么关心、多么体贴呀！

故事之四：教兵识字。

革命战争年代，许多红军战士参军前都是穷孩子，没有机会读书，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朱德十分关心战士们学文化，千方百计抽出时间教红军战士识字，帮助他们提高读书、看报的能力。在朱德身边工作的许多“红小鬼”的文化知识都是朱德一字一句地教出来的。

理发员陈友生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因为生活贫困，他父母很早就把他送到理发店当学徒了。参军后，陈友生依旧担任理发员。一天，陈友生给朱德理发，朱德了解到陈友生的身世后，微笑着问：小陈，你识字吗？

陈友生脸红了，羞怯他说：家里穷，我只读过三十月书，识了几个字也都忘了。

理完发，朱德蹲下身子，叫住小陈说：来，我来考考你。说完，就在地面上写了“打倒帝国主义”六个字，问：小陈，你认识这几个字吗？

陈友生往地上一看，心里像着了火似地慌了，一会儿摸弄理发衣，一会儿仰着脸瞅着房顶发愁。

朱德笑了，小陈，房顶上有这几个字吗？

陈友生急得直冒汗，又往地上看了一眼，吞吞吐吐他说：军长，我只认识头两个字：打倒，其余的我不认识了。说到“打倒”时，陈友生心里像揣着小兔子似地乱跳，生怕说错了。

别急，你再想想，朱德安慰他。

陈友生琢磨了好一会，还是摇了摇头。

朱德耐心他说：后面四个字是“帝国主义”，这六个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我们革命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嘛！小陈呀，你就从认标语开始，每天识六个字，我教你。怎么样？

陈友生难以启口，担心认不下来，朱德摸到小陈的脉搏，幽默他说：小陈，认字就像抓俘虏，你每天抓六个俘虏，然后用绳子把他们拴住，让它们听你指挥。

哪有那么多绳子啊？陈友生天真他说。

朱德笑了，拍着陈友生的肩膀说：绳子就是你的脑子，用脑把“字”记住，字不就成了你的俘虏了？识字多了，再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一篇文章了。

陈友生一下子明白了，兴奋得双脚跟一靠，向朱德敬一个礼：请军长放心，我一定多抓俘虏。

从此以后，陈友生学习文化的劲头很大，三天两头跑到朱德那里去问字，朱德总是一字一句地把着手教他，耐心地帮他纠正错别字。在短短一年里，陈友生就念完了工农识字课本第一册和第二册。他写的一篇墙报稿还被评为“甲”级。朱德知道后，专门去看了那篇稿子。朱德鼓励陈友生说：小陈，继续努力吧，革命事业需要我们学好文化啊！

红军在江西省会昌县整训时，军部传令部的徐松林被提升为班长。命令宣布以后，徐松林担心自己当不好这个班长，硬着头皮去找朱德，说：军长，

我参加红军才3个月，又没有文化，当班长不称职。传令班长，得找个识文断字的，不然，传错了命令就会误大事呀！

朱德一听，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双眼审视着徐松林，说：这倒是个问题。不过，没有文化可以学嘛！许多红军战士都受地主老财的剥削，有文化的不多。松林呀，我们既然可以队敌人那里把机枪、大炮夺过来，也一定能掌握文化知识。这样吧，我帮助你学文化，每天学会10个字，天长日久，熟能中巧，你就能识文断字了。

徐松林一听要学文化，高兴得跳起来，连忙说：那太好了，有军长教我，我一定用消灭敌人的劲头来学文化，把目前的工作搞好。

朱德笑着摇了摇头，说：小徐，你这话说得不完全，学文化不仅是为了搞好目前的工作，还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总有一天要被我们打倒的。革命胜利了，我们还要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那时候，你就可能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没有文化怎么行呀？你刚才说从明天开始学，为什么下从现在开始呢？朱德在纸上写下10个大字，又说：来，咱们就开始学吧，这是我要教你的第一课，10个字。

徐松林听了，禁不住热泪盈眶。朱军长不但要指挥红军作战，还常常帮助炊事员烧水、煮饭，真够劳累的了，现在又要教我学文化，我可不能辜负了军长的一片心意呀！

那天，朱德教了好一阵子，徐松林才学会10个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此以后，每当行军休息，徐松林都要拿出本子来识字。有时候没有笔，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在朱德的帮助下，徐松林进步很快，几年以后，他能够看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的文章了。每当他翻开扉页，看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个鲜红的字时，立刻就会想到朱德军长第一次教他识字时的情景。

魏国录从小给别人放牛，参加红军后在军部当传令兵。朱德看到这个结实实的红军战士，心里很高兴，他问：小鬼，你识字吗？

认不了几个。

朱德笑了，说：你是传令兵，你的任务是送信，不识字怎么行呢？信封上的字下认识，怎么能准确地把信送到呢？参加革命队伍，就要学习革命理论。毛委员常说，红军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这就要学好党的政策和文件，就离不开文化。小鬼，你得学文化啊！沉思片刻，朱德又说：我看你学文化就从认信封上的地址和人名开始，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不会写的就拿树枝在地上练，千万不要怕羞。每识一个字，都要会念、会写、会讲、会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红军战士能打倒土豪劣绅，也能掌握文化。

一席话，像涓涓暖流，汇入魏国录的心田。魏国录按照朱德教的办法，每天都要识几个字。不久，他就能自己写信了。

不光是对红军战士，对农村的孩子朱德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他们学文化。工农革命军在韦阳县敖五庙前练兵时，朱德看到这个村子里虽然打倒了土豪，分了田地，但农民的生活依旧很贫困，小孩子乱跑乱闹。朱德关切地问村干部：这么多孩子，怎么不上学？

没有学校。一名干部为难他说。

朱德拉住村干部的手，边走边说：你看，这些孩子多聪明，多可爱，他

们都是革命事业的主贵财富呀！我们要多为孩子们想一想。你们这里有祠堂，有条件，应该给孩子们办所学校，让他们读点书，将来于革命也多一份力量呀！

在朱德的关怀下，敖五庙村很快在祠堂里办起了学校。开学那天，村民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犹如过节一般，朱德特意给每个学生免费发了一支毛笔和一叠纸。从此，这个山村里的孩子安安心心地在祠堂里学习，不再乱闹乱跑了。

故事之五：深夜探伤员。

1928年，秋末的一天。朱德率领部分红军战士在永新关山缴了一个地主民团的武器，返回茅坪宿营时，夜已经深了。刚洗了一把脸，朱德忽然想起在红军医院住院的几名伤病员，连忙走出八角楼，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山道，快步向红军医院走去。

走近病房时，一阵朗朗的读书声传进朱德的耳朵。白狗子，坏心肠，吃我饭，杀我娘，老子长大当红军，杀尽白狗报答娘……进病房一看，原来是伤员李辉梅在学文化。茅坪的红军医院依山傍水，空气新鲜，是养伤的好地方，但许多伤员不等养好伤就再三申请，要求提前归队。李辉梅是因左胳膊负了伤才被送到医院来的，伤口还化着脓，他就要求出院随部队打仗，医生不同意，他就夜以继日地学文化，忽然看见军长进来，连忙住了口。

朱德轻步走到李辉梅床边，把他手上那本《红军识字经》合上，和气他说：同志，你负伤了，要好好休息呀！正说着，忽然听到旁边的病号喊了一声：茶——。朱德一看，是刘排长。刘排长似睡非睡，双手搔着干得发痒的喉咙。朱德连忙转过身，弯下腰，轻声问：渴了吧？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刘排长睁眼一看，见是军长，就摇了摇头，不一会儿，刘排长伸出那条受伤的腿，说：军长，我的伤已经好了，让我出院吧！朱德连忙帮他腿放进被窝里，略带几分责备他说：你想早出院？那好，你安心养伤，伤就好得快呀！朱德摸了摸他床头的瓦壶，瓦壶里的水已经凉了，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山梨送到刘排长嘴边。渴了，吃个山梨润润嗓子吧！这个山梨是红军路过关山时，一位老婆婆送给朱德的。

我不渴，军长。刘排长怎么也不肯接这个山梨。

朱德故意把脸一沉，说：快吃吧！你如果不吃，就不许你出院啦！刘排长这才接过梨，却迟迟不肯放到嘴边。

伤员小王参军不久就负伤了，注进医院后，左臂骨头里还夹着一块两指宽的弹片，伤痛折磨得他整日整夜地睡不着觉。他想出院，医生不同意，他就和医生。护士闹别扭。朱德走到他身边，轻轻地给他盖上了被子。小王以为是护士来查房，又把被子掀开小同志，山沟里夜晚冷，不盖好被子，会冻坏身子的。朱德劝他。

小王睁开眼；看到一位陌生人，以为是新调来的医生，又恳求说：大夫，你让我回连队吧，我要去杀敌人。

小同志，你伤势很重，先要安心养伤，养好伤才能多杀敌人呀！正说着，刘排长走过来，把刚才那个山梨往床头一放，轻声说：小王伤势最重，这个梨给他吃。

朱德一摸小王的额头，烧得直烫手，就掏出一把小刀，削了两片山梨送进小王嘴里。小王吃了梨，心情舒服些，慢慢地睡着朱德站起来，对身旁一名年轻护士说：小王的伤很重，你们要耐心照顾，让他们好好养伤，才能重

返前线，多杀敌人呀！

朱德离开红军医院时，东方已经发白了。吃早饭时，朱德告诉炊事员，用他的伙食费去买一只肥一些的母鸡。炊事员感到纳闷。心想，军长从来不吃特殊伙食，今天怎么啦？

鸡买来后，炊事员故意问：军长，这只鸡怎么做？

鸡汤很有营养吗？朱德问。

炊事员点点头。

那就请你把它熬成鸡汤吧，做好了告诉我。

当朱德看到一盆热气腾腾的鸡汤时，兴冲冲他说：好！好！喝了这鸡汤，小王的伤就能好得快了。说完，再三吩咐炊事员，一定要把鸡汤送给小王喝下去。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医院的药品非常紧张，许多伤病员只能用草药来治疗。自从那 197 天探望伤病员以后，朱德一直在思考，怎样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使伤员尽快痊愈。有一天，朱德对医务人员说：伤病员住院以后，一要治伤，二要治心，治伤和治心结合起来，才恢复得快。你们能不能抽时间排些文艺节目慰问伤员，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也能使伤病员振作精神、配合治疗嘛！

在朱德的指点下，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很快就编排出了《赞英雄》、《慰问红军伤员》、《舞狮子》、《耍青龙》等节目。演出那天，朱德高兴地走上台，同大家一起台唱：

五月里，是端阳，

七溪岭上摆战场。

白狗子来了两个师哟，

红军只有四个团。

“快举手，快缴枪，

留你一命见爹娘。”

白匪听了全跪下哟，

乖乖交了手中枪。

几首歌，唱得大家群情激昂，医务人员纷纷说：朱军长的“治疗”方法真好。

1929 年夏天，朱德的警卫员小魏患痢疾，住进了瑞金医院。朱德知道后，同几个战士一起顶着似火的骄阳，踏着烫脚的石板路，去看望病号。

盛夏季节，许多红军战士都拉痢疾，发疟疾，有的还得了疥疮，住在瑞金医院。朱德在傅连璋院长和贺诚卫生部长的陪同下，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看望，伤病员们看到朱军长来了，都坐了起来。朱德看到满脸通红的伤病员，连连做手势让伤病员躺下休息。

了解了病员的情况以后，朱德对傅连璋和贺诚说：战士们得了痢疾，要积极治疗，多吃些大蒜，多喝些浓茶，不可吃辣椒嘴！

沉思片刻，朱德又说，你们也可以访问访问老中医，多搞点偏方验方。有时候偏方可治大病呢！治疗疟疾、疥疮，也可用土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预防，要抽时间给部队讲些预防知识。

朱德还同傅连璋和贺诚研究了连队防潮湿和灭蚊子的措施，才返回军部。

故事之六：耕者有其田。

1928年11月，红军为了发展革命力量，采用毛泽东提出的“母鸡下蛋”的办法，逐步扩大根据地。新区的老百姓由于深受地主和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对打土豪分田地还有些恐惧心理。朱德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总要抽出时间同老乡一起边干活边谈心。

朱德来到新城时，听说贫农苟大叔的老伴病了，地里的活又很紧，就带着几个战士来到苟大叔的田头，二话不说，卷起裤脚就到田里拔杂草。苟大叔看见来了几位红军帮他拔草，连忙说，要不得，要不得！

朱德一边拔草一边问：大叔，你种了多少稻谷？

一问到稻田，苟大叔叹了口气，说：我是种人家的客田呢！

朱德微微一笑，和蔼他说：大叔，这不是客田，是你自己的田喽！

苟大叔一听，惊得好半天不说一个字。在他看来，自古以来都是地主有田，农民哪有自己的田呀？

朱德走近苟大叔说：大叔，你放心，这田今后就是你的了。你们一年到头在地里劳动，还吃不饱，穿不暖；地主豪绅们从来不劳动，却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你们养活的，他们剥夺了你们的田地，你们才吃不饱，穿不暖。红军来了，就要同你们一起把田地收回来。

听了这番话，苟大叔眼里射出了激动的光，他真想大喊一声：我有田了，我有自己的田了！

故事之七：官兵同乐。

有一年春节前夕，朱德和红军战士来到江西瑞金附近的壬田寨。一天午后，朱德来到禾场上时，一百多名红军战士已经坐成了一个圆圈圈。看见朱德，大家都嚷嚷起来，军长，快来呀，给你留着位子呢！

朱德一看要丢手中，连忙走过去，找个空位盘腿坐下了。今天，毛泽东也来了，禾场上的气氛十分活跃。

一个红军战士拿着白手巾，围着圆圈跑开了。毛泽东坐得很端正，可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却时时注意着圈外跑动的战士，每当战士跑过去，他总要悄悄地伸手到背后摸一下，朱德呢，起初他还头戴八角帽，打着绑腿，正正规规地盘坐在地上，但很快他的两只手开始不定地在背后摸，甚至还回过头去看看，生怕那块白手巾会丢在他背后。

忽然，朱德看到那战士把白手中丢到毛泽东背后了，毛泽东似乎没有发觉，笑得那么开心。朱德想，这下好啦，先把毛委员抓住。就在那战士快要跑到毛泽东跟前时，毛泽东似乎从大家的眼神中发现了“秘密”，伸手拣起手巾就跑。那战士后悔跑慢了几步，只得坐到毛泽东的位置上。

毛泽东跑着跑着，把手中悄悄地扔到朱德背后。毛泽东又跑出去半圈了，朱德丝毫也没发觉。战士们想，这一次非抓住军长不可，谁知朱德身旁的战士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朱德立刻明白了，转身拿起手巾一骨碌就跑，战士们见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朱德跑着跑着，把手巾放在一个20多岁的红军战士的背后，但很快被这个战士发现了。这战士步子大，跑得快，眼看就要追上朱德了，大家齐声喊了起来：“军长，快跑！快跑呀！”在加油声中，朱德拉大了步子，可这战士跑得更快。眼看就要跑到位子了，这战士猛一伸手，把朱德抓住了。

这一下，战士们乐得纷纷叫喊起来。有的说：罚，罚军长学鸟叫！有的说：不，要罚军长做怪样子。

让军长唱一首歌吧！

听到这个建议，许多人都随声附和，对，唱歌，要军长唱歌！
朱德无可奈何，笑咪咪地走到圆圈中央，高声唱道：
当兵就要当红军，
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
做游戏我们在一起。

.....

故事之八：端午聚餐。

端午节前的一天，红军总部直属工兵连的战士们正坐在宿营地前的草坪上编织草鞋。编着编着，一个战士拿着一双编好的草鞋，半真半假地说，这是谁编的草鞋？还不如朱军长编得好呢！

另一名战士说：你敢同朱军长比？朱军长的手艺不亚于徐婆婆。

徐婆婆是井冈山地区下游村里编草鞋的能手。红军住在下游村里，每天晚饭后，大家就坐在徐婆婆的院子里，就着月光编草鞋。朱德处理完公务，也和大家坐在一起编草鞋。朱德双手灵巧，动作熟练，编出来的草鞋又细致又结实，徐婆婆看了连声称赞。战士们说，我们军长不仅打仗行，编鞋补衣样样都行。他军装上的那几个补丁还是他自己补的呢！徐婆婆心想，一个带兵的，怎么会做针线活？走到朱德跟前一看，果然补得好，高兴得大声说，朱军长真了不起，编鞋补衣比我这个老婆婆还强呢！红军战士听了，更加钦佩朱军长的手巧。

正说着，朱德来了。朱德拿起大家编好的草鞋看了看，忽然问：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

明天是端午节。一名战士说。

朱德点点头，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大家想想办法，开开荤，改善改善伙食吧。草鞋已经个少了，过几天再编吧！

战士们一时不明白军长的意图，心里想，敌人封锁这么严，附近村子里的鸡鸭牛羊几乎都被敌人抢净杀光了，这几个月连豆腐都吃不上，哪里有什么荤腥？朱德见大家沉默下语，笑吟吟地说：

没有鸡鸭鱼肉，我们还可以就地取材，搞些现成的荤腥来改善伙食嘛。

一听这话，战士们立刻活跃起来，有的要去捉野鸡，有的想去猎山猪，通信员徐达桂说：我们还可以去捡田螺呢！朱德听了微微点头。在朱德看来，捉野鸡和猎山猪都不行，红军本来弹药就少，枪一响，还可能惊动敌人。

端午节这一天，朱德头戴一顶淡黄色的破草帽，手里提着小竹篓，同战士们一起下田里捡田螺。这一带水稻田里的田螺很多，通信员徐达桂生怕朱德捡少了，不时地喊道：首长，到我这边来，这丘田里田螺多。其它战士也喊起来，军长、你看这里的田螺多大呀！朱德答应着，并不过去。通信员徐达桂感到诧异，走近朱德跟前一看，朱德不仅把篓子捡满了，连军装的口袋里也装得鼓鼓的。

炊事员老胡看到朱德同战士们一起捡来许多田螺，乐哈哈地说：田螺是样好菜，油烙、辣炒、醋焖，还可以氽汤，味道鲜得很！

开午饭时，每个班都分到了三十菜：韭菜辣椒炒螺蛳肉，醋焖螺蛳，一盆情炖田螺汤。

朱德也同战士们一起聚餐。他把自己的一份放在战士们中间，左右看了看，说：同志们，我们聚餐还少些什么？徐达桂连忙说：酒！

朱德笑了，说：是呀，没有酒怎么行呀！小徐，你把伙房里的酒拿来。战士们一听，感到非常吃惊，军长什么时候叫大家喝过酒呀？

不一会儿，徐达桂和炊事员老胡给每人倒了一碗酒，大家低头一看，原来是茶，都大笑起来。朱德也笑了，说：中国有一句古诗，叫做，寒夜客来茶当酒。我们今天就把茶当酒吧！

一名战士一口喝下去半碗茶，擦了擦嘴边的茶水，说，这酒好，比山西杏花村的酒还好喝。

故事之九：劝说号兵。

新战士小谢只有 15 岁，个子也不高，由于长年过着穷苦生活，脸色又黄又瘦，性格却十分倔强。他参加红军以后被分在总部司号班当一名号兵。每天凌晨，小谢提着一把号对着山沟吹，嘴唇吹肿了，腮帮子吹疼了，还没有把调子吹好。

朱德每天早晨也起得很早，他在操场上检查大家出操以后，总要到司号兵练吹号的地方去看一看。这天清晨，他看见小谢坐在茅坪河旁望着河水直发呆，忽然想起有几天没有听到小谢的笑声和歌声了，就挨着小谢坐下，亲切地问：小谢，吹号吹累了？

小谢的心“突”地一跳，见是军长，忍不住大声说：我吹不好，我要去打仗。

哟，好大的决心呀！其实，朱德已经知道小谢认为当号兵不光彩，想到战斗连队去，就劝告他说：吹不好，就多练习，功夫不负苦心人啊！我看你呀，恐怕是不愿当号兵吧？

是又怎么样？我爹是吹吹呐的，一辈子被人家看不起。

朱德一听，乐呵呵地说：唢呐和军号不同呀！唢呐是一种民间乐器，可以演奏出老百姓的疾苦。军号却是指挥员的助手，是协助指挥员调动兵马、指挥战斗的。军号吹好了，可以提高红军的士气，灭敌人的威风，这同打仗有什么两样呢？小谢那双淘气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朱德，信佛一下子长大了几岁。从此以后，不管刮风下土雨，小谢都是认认真真地练习吹号，从不间断。

11 南昌城头，响起了纪念起义三周年的枪声，却不打南昌；长沙城外，汇集了两路红军英豪，又撤围长沙；总司令为何如此决策

南昌市翠花街西面，有一处著名胜地——万寿宫。万寿宫始建于晋朝，宫的左侧有一口井，井水与江水相消长，井中还有一根东晋蜀郡许逊所铸的铁柱，相传是为了镇蚊螭之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宁宗御书“铁柱延真之宫”。明世宗又赐名“妙济万寿宫”。万寿宫经过多次重修，现在已经成为南昌一处富有吸引力的名胜。1930年7月30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来到南昌的万寿宫、生米街地区。

朱德对南昌这个城市太熟悉了。3年前，他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同周恩来、贺龙等人一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自从那年8月3日率领起义军撤离南昌以来，整整3年过去了。今天，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更有组织、更加强大了。一想到南昌起义，朱德心中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激动……

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是要夺取南昌和九江等城市的。但是，朱德经过慎重考虑，只在8月1日那天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着赣江向南昌市内的敌军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随后，朱德就和毛泽东一起率领红军转移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开始筹款和发动群众。

朱德为什么不攻打南昌？

战争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国之大事”。国民党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连年混战不断。1930年初，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早年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加入在军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9年回国后担任新军的标统。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太原新军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两年后他又投靠袁世凯，袁世凯给了他一顶“山西督军兼省长”的乌纱帽，但他不久就在赴湘和护法战争中遭到惨败，不得不再度归附国民政府，于1927年5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在同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中，首先攻占北平和天津，就是这个亦胜亦败的阎锡山在30年代初期厉兵秣马，准备在军事舞台上同蒋介石一决雌雄。

蒋介石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其独裁行为非常不得人心。阎锡山借机多方串联，把国民党内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桂系、冯系、阎系以及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方军阀组成了一个反蒋联盟。1930年3月，国民党第二、三、四集团军的50多名将领联名通电反蒋，阎锡山被拥戴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当时，占据东北、对蒋、阎双方都是举足轻重的张学良虽然未表态，但当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军队于5月份在津浦、京汉、陇海线进入阵地时，蒋介石急忙把大批军队调到河南、山东一线，并于5月11日下达总攻令。一场反蒋派同蒋介石之间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爆发了。在广表的中原战场上，战争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100多万人，战线绵延数千里，双方死伤约30万人。战祸所及，人民群众离乡背井，颠沛流离，艰难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对于同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军事冲突，蒋介石是估计到的。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把湘、鄂、赣诸省的主力军都调到津浦、陇海、平汉线上，但蒋介石始终把工农红军看作心头之患，把反动军队调到中原大战的第一线前，还对红军发起了进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正在永新县发动群众的朱德指挥红军果断撤出永新城，上了七溪岭。

七溪岭位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要道上，海拔约八九百米，是井冈山西北的门户。老七溪岭和新七溪岭两座大山紧密相连，当地人称“上七里下八里”。山岭四周是无数的小山岭，形成一个山连山、岭接岭的壮丽景色。七溪岭山高路窄，层峦迭嶂，坡陡崖险，地势异常险峻，是一个理想的反击战场。国民党军队见朱德率领红军撤退上山，竟然疯狂地向七溪岭发动猛攻。

朱德站在七溪岭的指挥所上，判明了敌人的进攻意图后，心里想：今天决不能便宜了敌人。

七溪岭山顶上有一座亭，称望月亭，平时是行人上山的休息之处，现在成了朱德的指挥所。当敌人步步紧逼，围到望月亭附近时，朱德大声命令说：同志们，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用梭镖杀敌人，一定要把敌人打下去。说完，朱德提着机关枪一跃而起，冒着雨点般的子弹冲向敌阵。一时间，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扑向敌人，“缴枪不杀”的喊声响彻阵地，敌人被打得四处逃窜，狼狈不堪。

战斗结束后，有个红军战士忽然发现朱德的军帽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大声惊叫起来，军长，你伤着了没有？

朱德摘下帽子一看，自己也笑了，他轻轻拍了拍帽子上的尘土，乐呵呵地说：有窟窿怕什么，有窟窿的帽子戴起来可以透点热气呢！很长一段时间，朱德都带着这顶帽子。

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中争取主动，不得不暂时把主要力量用来进行中原大战，在江西战场上，用来对付红军的正规部队只有张辉瓒指挥的第十八师、邓英指挥的新编第十三师和独立第十四旅的一部分；在湘鄂西战场上，只有新编第三师和独立第十四旅一部分；在鄂豫皖边战场上，只有川军第二十军和新编第五旅等部队。此外，革命根据地附近就只有一些地方武装和民团。中原大战的隆隆炮声，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也力发展革命力量造成极力有利的条件，各地红军乘敌人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采取攻势作战，扩大革命队伍和根据地。到1930年夏天，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7万多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近3万人。

5月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作出了猛烈扩大红军的决议，颁布了中国红军的编制草案及组织系统，决定成立军团以上的指挥机关，当时，赣西南、赣东北及其邻近的湘鄂赣、闽西等地的红军已发展到11个军，4万多人。根据红军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召开联席会议，朱德和毛泽东、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活动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六军和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红一军团共2万多人。

红一军团组建以后，朱德担任多年的红四军军长的职务由林彪担任。当时，林彪只有23岁，朱德是44岁。

不久，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二军也划归红一军团的建制。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的红一军团已编有5个军。即：林彪为军长、

彭清泉、罗荣桓（后）为政委的第四军，黄公略为军长、陈毅、蔡会文（后）为政委的第三军（即原第六军），伍中豪为军长、谭震林为政委的第十二军，曾炳春为军长的第二十军，陈毅为军长、邱达三为政委的第二十二军。

与此同时，在湘鄂赣地区活动的红军第五军和第八军等部队组成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在湘鄂西地区活动的红军第二军和第六军等部队合编为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

当时，革命力量虽然有了比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从全局看，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远远没有改变，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并没有改变他们镇压革命力量的本质，当革命力量发展到涉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这些国民党反动势力又联合起来对付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中央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提出了一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口号和政策。

1930年2月，党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提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任务和总路线；提出了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武装，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的中心策略，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提出要“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随后，李立三等人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朱德和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领红一军团到达南昌的。朱德曾经说，当时“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但红一军团离开长汀以后，没有直接去攻打南昌，朱德和毛泽东都不赞成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他们率领红一军团经广昌、绕兴国，于7月24日攻占了樟树镇（今清江县城），歼灭了张辉瓒第十八师的一部分，然后再向南昌前进。

通过樟树镇这一战，朱德摸清了敌人的底细，当时，张辉瓒第十八师的3个旅中，1个旅守卫南昌，1个旅位于临川地区，还有1个旅在吉安以北的阜田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和毛泽东都认为红军不宜进攻南昌，因而对6月份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作了灵活处理，率领红军西渡赣江，在万寿宫向南昌鸣枪示威。

数年以后，朱德在回顾没有完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的战略意图时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的起义前夕，我们只要接受。

但是，朱德是有保留地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分析”的，朱德坦率地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

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

朱德还看到了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但蒋介石同时也在计划对红军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

历史证实了朱德对中国形势的正确判断。

在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向南昌前进的同时，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切断武长路”的指示，率领红三军团趁湖南敌人的主力南下衡阳、宝庆之际，于7月27日攻占了长沙市，俘虏了4000多名敌人，缴获各种枪约300枝（挺），火炮20余门，电台9部。但是，当敌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率领主力部队向长沙反扑时，红军受到不少损失，彭德怀不得不率领红三军团撤出长沙，退到平江以东长寿街地区转入防御。

当朱德得知何键集中力量分三路追击红三军团时，马上率领红一军团从江西的安义、奉新地区西进，援助红三军团。

何键被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主席以后，进一步追随蒋介石，疯狂屠杀革命人民。8月4日，何键率领反动军队占领长沙以后，竟然在一周之内屠杀了数千名平民百姓，一些正义人士为此发表宣言，称这个3年前授意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湖南军阀是“只会杀害无辜的屠夫”。不久，何键又派出4个团追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8月18日，这路敌人追到浏阳东南文家市和孙家等地。当时，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已经到达万载县的黄茅，敌人对于从东面来的红军竟然毫无觉察。朱德觉得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机会，同毛泽东等人商量以后，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先歼灭这路敌人，再同红三军团一起相机攻取长沙。

一场奇袭敌人的战斗开始了。8月20日，红一军团主力在朱德和毛泽东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文家市内。占驻文家市的敌军正在搜捕百姓，四处打听彭德怀的去向，一听说“朱毛红军”已经打进文家市，惊得四处逃窜。战斗只进行了短短几个小时，朱德就得到报告，敌第三纵队3个团又1个营被红军歼灭了，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被击毙，1000多名敌人当了俘虏，红军还缴获了1500多支（挺）枪。朱德很高兴，他对兴高采烈地围过来的战士们说：何键很疯狂，“吃掉”他3个团，他的部队就要缩回去了。

战斗结束后，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北上永和市。

8月23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也到达了永和市。朱德、毛泽东、陈毅和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兴奋下已，那几双紧握着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永和市胜利会师后，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为副司令员，滕代远为副政治委员，整个方面军共3万多人。

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组建，揭开了红军建设史上崭新的一页，也使朱德在革命斗争生涯中迈出了新的步伐。从此以后，朱总司令、“红司令”的威名传遍华夏大地，它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在人们心中久久地飘扬。

成立红一方面军的同时，也组成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为前委委员。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还兼任第一军团的主要领导，林彪仍担任第四军军长。

红一方面军组成后，部队根据“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的目的，

于8月29日前进至长沙近郊。李立三总是念念不忘进攻大城市。朱德回忆说，三军团退出长沙不久，“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但朱德看到，长沙守敌较多，工

事坚固，不是那么容易打下来的。

红军第二次打长沙，采用了“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但是，何键似乎也从失败中接受了一点教训，他在长沙周围设置了三道防御工事，工事前沿的铁丝网上还通了电，部队坚守工事，不轻易出击。从8月底开始，红军围攻长沙十多天，除了9月3日敌第三十一师在猴子石出击时被歼灭两个多团外，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

一些红军战士着急了。为了突破长沙周围的防御工事，他们从附近农民那里买了五十多头水牛，在水牛的尾巴上系上鞭炮，企图用水牛去冲开敌人设置的电网。谁知牛尾巴上的鞭炮一响，水牛并不是一个劲儿往前冲，去挑开电网，有的竟是毫无目标地四散奔跑。冷兵器时期颇显威风的“火牛阵”并不能挑开用现代技术设置的电网。

朱德很恼火，他看到红军当时的装备和训练水平都不宜再打阵地战。当红军两度攻击长沙没有奏效时，总司令果断命令：全军撤离长沙。

有人还希望再打一次，因为“进占长沙”是中央的意图。

朱德不同意再打。毛泽东也不同意再打。红一方面军随即转战到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第二次避免了红军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朱德总司令很感激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

红军撤围长沙以后，朱德和毛泽东看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湖南的反动势力过于强大，提出红军应折回江西，再上井冈山。但是中央不同意，红一方面军内有的干部也主张红军应该立即去攻南昌，攻九江。他们说：夺取南昌、南浔路，截断长江，争取武汉，这是中央在8月初下达的指令，红一方面军应该执行这个指令。

红三军团的大部分同志也不同意折回江西。

是打武汉、打九江？还是折回江西？问题越来越尖锐了。

在株洲，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没有结果。部队继续向东前进。

总司令在思考。总政委在思考，红军的指战员都在思考……

东进的道路是艰难的，红一方面军“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

萍乡再往东是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在袁州，总前委成员又坐下来进行讨论。朱德分析了江西的敌情后说：红军应该先打吉安，得到补充后再打九江。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总司令胸有成竹他说：打吉安，我们包打下。

会议最后决定，先由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取吉安，歼灭敌新编第十三师

《朱德选集》第129、130页。

《朱德选集》第130页。

等部队；由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占领清江（今临江镇）等地，截断赣江，阻击援敌，保障红一军团进攻吉安时的侧翼安全；上述任务完成后，两个军团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再打南昌、九江。

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朱德、毛泽东率领一军团南下，由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东进，两个军团分兵行动的方案。定下这个决心不久，中共长江局的代表周以粟到了。周以粟对大家说：中共长江局指示红一方面军反攻长沙。

一支从长沙撤围的部队要再回头去打长沙？朱德不同意，毛泽东也不同意。

总前委再次举行会议，经过毛泽东的多方说服，周以粟终于接受了总前委的上述决策。

9月底，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第一、第三军团分别向吉安和清江开进。

10月4日拂晓，红一军团对吉安之敌发起了进攻。敌人的防御很快被突破了，红军突入吉安城内。但是由于兵力不集中，敌人组织反击时，红军主动撤出了吉安。

正当朱德调整力量，准备再次进攻吉安时，吉安城内的守敌却在当天夜晚乘船沿赣江北上，逃往南昌。红军占领了吉安。

第二天，红军在整理缴获的敌伪档案和武器弹药时，意外地发现了两份重要文件。

有一份文件中提到，反动军队正在计划第一次“剿共”。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对于这个信息极为重视。当时，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已经取得了主动。8月上旬；阎锡山的军队失利，被迫迟往河南，蒋介石就集中力量同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冯玉祥也连连失利。在关键时刻，东北的张学良突然发出拥蒋通电，东北军迅速入关，10天内占领了平津和华北的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已经开始考虑，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结束后，就把主力军调到江西来围攻红军。

朱德和毛泽东都认为，蒋介石调反动军队“围剿”红军的可能性极大，红军不应该再去攻打南昌和九江了，红军占领吉安以后，朱德要求各级指战员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吉安、峡江、安福等地的群众踊跃参军，红军很快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红一军团退出吉安过赣江时，已经发展到3万人。

10月14日，朱德总司令指挥红一军团移师北进，在新余地区同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靠拢。在总前委会议上，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陈毅等人又进一步决定红军停止执行进攻南昌、九江的原定计划，把红一方面军部署在清江至分宜之间地区，用战备的姿态开展群众工作，筹措给养。这是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一起第三次决定红军不攻打南昌、长沙等中心城市。这个决定至关重要，它不仅使红一军团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对红军顺利转入反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份文件中，讲到了AB团的有关情况。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塞维克）的缩写。AB团团员在革命根据地内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他们还组织了宗教式的秘密会道门，预言什么红军有毁灭的预兆。为了拉拢根据地的群众，孤立红军，他们甚至暗中组织起“爱情自由”团体，用女色来引诱红军战士。AB团是蒋介石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而放出的

一支“毒箭”，它曾经给红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为了打击 AB 团，肃清打入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红军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由于在苏区的 AB 团团员的姓名都用密码，红军难以及时破译这种密码，曾经出现肃反扩大化的现象。朱德仔细查看了缴获的有关 AB 团的文件，认为它为查清 AB 团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重要线索，就让有关人员把这些文件都送到保卫局。对于打击 AB 团，朱德和聂荣臻等人都主张澄清事实，实事求是。聂荣臻回忆说：我到长汀时，还看到了对“破获”的“社会民主党”正法的布告。那时在江西叫肃 AB 团，在福建是肃“社会民主党”。其实，AB 团是有的，但只是敌人打进我们内部的个别人，哪里会有那么多？很多是冤案，是自己在哪里吓唬自己，自己在哪里疑神疑鬼，自己把自己搞垮，冤枉了很多干部。我看到有的战士也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我很奇怪，一个农民才当几天红军，他知道什么叫社会民主党呀？！

朱德和毛泽东审时度势，三次抵制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之际。那几个月，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罢工都失败了，红军也遭到了重大伤亡，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洪湖根据地几乎丧失。红七军也由原来的 6000 多人缩减到 2000 人，右江根据地也丧失了。在这个重要时期，毛泽东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既维护了党的组织纪律，又在行动上避免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攻中心城市可能遭致的损失，使朱德和他领导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不但避免了损失，而且在严重困难时期得到了发展。

1930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会议进行中，周恩来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瞿秋白主持会议，发表结论性意见，周恩来严肃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他明确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

李立三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第二天，会议作出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主力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这是朱德第一次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毛泽东被重新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朱德和毛泽东虽然远在江西苏区，他们被选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虽然不能立刻在中央起明显作用，但对以后的事态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2 红军的战斗力靠什么？不仅靠军事技术，最主要的是靠阶级觉悟、政治影响。国民党军队“围剿”的炮声隆隆，总司令要创造铁的红军

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大震惊。蒋介石当时正受到上海和其它城市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赞扬，因为他在中原大战中打垮了北方的主要对手，被一些人捧为“英雄”，但蒋介石始终把红军看作主要对手、主要隐患，尤其是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他做梦都想把南方的红军消灭。在蒋介石看来，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的对手是不难战胜的，活跃在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才是他的真正对手。蒋介石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部属，如果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

怎样对付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呢？蒋介石的拿手好戏是围起来打。

蒋介石凭借由他控制的优势反动军队和广大地区，对苏区和红军由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逐渐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也一次比一次激烈，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大规模“围剿”一共进行了5次，这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的前3次反“围剿”，红军面对数十万敌人的进攻，打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不仅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还基本形成了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这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朱德和毛泽东是如何指挥红军创造这个奇迹的呢？

1944年，朱德颇感自豪地说：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

蒋介石对这次“围剿”的失败极不甘心，因为他谋划已久，自以为能成功，他万万想不到，“围剿”中会损失一万多人，还赔上一个张辉瓒。

1930年7月下旬，当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时，蒋介石就告诉“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要他迅速召集湘、鄂、赣三个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何应钦虽然是江西籍人，却是蒋介石的一名心腹。1908年，何应钦留学日本，先后在振武学校、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曾经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朱德对其有所了解。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时，何应钦被校长蒋介石选中，担任黄埔军校战术少将总教官，不久，蒋介石又把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和他自己曾经兼任的第一军军长的要职交给何应钦。由于何应钦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到1929年，他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任命为陆海空军司令部参谋总长、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等要职。对“围剿”红军这样的大事，何应钦从来不敢马虎。接受蒋介石的旨意以后，何应钦很快明确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红军的总方针。

不知何故，蒋介石又忽然冷落了何应钦，把第一次“围剿”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蒋介石交给鲁涤平指挥的部队有：原来在江西的张辉瓒的第十八师，邓英的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从湖南调来的罗森指挥的第七十六师，公秉藩指挥的新编第五师；从陇海路方向调来的谭道源指挥的第五十师，许克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毛炳文指挥的第八师。此外，蒋介石还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把在武汉休

整的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两个师也调到江西参战，空军航空第一，第三、第五队在南昌和樟树镇机场上随时准备支援作战。

鲁涤平受宠若惊，他力自己能指挥空军而感到自豪。空军在中国战场上还是一个新奇的军种，湖南将弁学堂出身的鲁涤平对空军的情况并不了解，但他从中看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11月2日，鲁涤平急急忙忙把已到达江西的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限定在3日之内到达指定地域集中。鲁涤平的部署是这样的：

第一纵队共3个师。张辉瓒的第十八师位于樟树镇，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位于丰城西北的赣江北岸，邓英的新编第十三师位于临川。张辉瓒为纵队司令。

第二纵队共1个师又1个旅。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位于万寿宫，独立第十四旅位于靖安。谭道源为纵队司令。

第三纵队共2个师。罗森的第七十六师位于上高，公秉藩的新编第五师位于高安。

毛炳文的第八师为总预备队，部署在南昌。

蒋介石对鲁涤平的这个部署表示满意，他希望鲁涤平能把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消灭在清江（今临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蒋介石还特别对湖南军阀何键说，湖南的第十九师要进驻袁州，配合鲁涤平行动。

朱德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准备和部署时，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正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筹款。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陈毅等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委员同江西省行委的委员们一起，对如何粉碎敌人“围剿”问题在罗坊等地进行了多次讨论。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

有些人主张，红军主力应该按照中央和军委8月初下达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这样一来，蒋介石不得不指挥其参加“围剿”的军队转入防御，敌人的“围剿”计划就落空了。这种意见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认为，当时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局上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红军要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就应该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创造有利战机，再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这实际上是一种诱敌深入的巧妙战法。

经过多次讨论，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全部东渡赣江，在地形对红军有利、群众条件又比较好的赣江以东地区待机歼敌。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也领导苏区人民紧张地进行了反“围剿”准备。

鲁涤平信心十足地在11月5日向各路敌军下达了进攻红军的命令。两天以后，敌人的6个师已分别前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鲁涤平万万没有想到，朱德已经指挥红军转移了，三路纵队都扑了空。这时候，鲁涤平反倒担心红军会乘机夺取赣江以东的樟树镇、临川等地，连忙调整部署，命令第三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红军，把张辉瓒和谭道源的两个纵队4个师集中到赣江以东，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朱德和毛泽东的办法是，用少数红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迷惑敌人，主力红军分别从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丰、吉水等地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保存力量，待机破敌。

于是，各路敌军分别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清剿”，一次又一次地扑空，一步接一步地向苏区中心逼近。

正当大战一触即发之际，红一军团由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率领的第二十军由于肃反扩大化而引起内部矛盾激化的严重事件，使反“围剿”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2月初，第二十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他们一面在东固附近的各个山头上构筑假工事，迷惑敌人，一面又把主力秘密转移到苏区中部的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这期间，由于第二十军内部矛盾激化，该军少数领导人将部队拉到赣江以西，以致使尤冈以西和西北地区仅有少数群众武装活动。《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作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记述朱德谈起红军内部的这一事件时说。

“在战斗方酣的时候，一个地主的儿子刘迪藻（应为刘铁超。作者注）率领由东固农民组成的红军第二十军哗变。当时，红军尽管在吉安缴获了AB团的文件，证明东固至少有一户地主家庭与国民党特务机构有关系，还是派刘迪藻（应为刘铁超。作者注）在吉安附近抵御福建敌军。”

“刘迪藻（应为刘铁超。作者注）和李文林乃是李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而朱德和毛泽东正与这条路线进行斗争。李文林是东固——兴国地区的政委，曾有资料证明他家与AB团有关系……刘迪藻（应为刘铁超。作者注）和李文林当然不敢向农民组成的部队暴露自己的真正动机。他们因此硬说朱德是‘第二个蒋介石’，说毛泽东是出卖共产党的‘党皇帝’。他们的煽动造成了预期的哗变，并且杀害了许多在东固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投奔到吉安以西的国民党区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小共产党，发出一些前后矛盾的宣言。在这些宣言里，忽然把朱德誉为品质高贵，把毛泽东贬为叛逆；在另一个宣言里，却又大捧毛泽东，而大骂朱德。”

“朱将军说，不论他怎样伪装，红军是用事实来判断一切的。事实很清楚；国民党军队对这批叛徒丝毫不采取行动。最后，东固农民也觉悟到这一点，逐渐逃亡，归附红军。”

红一方面军及时处理了这一事件。12月15日，这个部队移至平田、砍柴、安福圩地区，进行休整和训练，并将第二十二军缩编为一个师，序号为第六十四师。

由于发生这一事件，张辉瓒的第二十八师占领了东固，不少无辜百姓惨遭杀害。

蒋介石似乎要利用红军内部发生的这一事件。他于12月上旬急匆匆赶到南昌，召集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会议，亲自组织对红一方面军的进攻。他还催促在武汉的第十九路军迅速进入江西，又调动福建刘和鼎指挥的第五十六师、张贞指挥的第四十九师和暂编第二旅向闽赣边界地区推进，从南面堵截红军。这么一来，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总兵力达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多人。

12月16日，各路敌人在蒋介石和鲁涤平的催促下，耀武扬威地向苏区的中心地区进攻。

朱德和毛泽东对于反“围剿”胸有成竹。战前，红军在小布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会场上贴着的一幅大字对联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副对联，充分反映了红一方面军反“围剿”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誓师大会上的动员讲话，进一步增强了苏区军民的胜利信心，会后，朱德要求方面军总部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以及当时在战术、技术和战斗动作上存在的问题，颁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各个师根据《三十条作战注意》对各类人员进行了专门训练。在朱德和毛泽东的组织下，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准备搞得扎扎实实。

鲁涤平指挥的几个师一路上不断遭到红军小分队的阻击和袭扰，进展到苏区腹地时，多数部队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官兵疲劳不堪，行动缓慢下来，只有鲁涤平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突出冒进。朱德和毛泽东等人看到，“围剿”红军的反动军队虽然有十万之众，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这些敌人又分成多路多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的间隔很大。张辉瓒、谭道源的两个师各只有一万多人，而红军主力有4万人，如果红军集中兵力打敌一个师，就有绝对优势。

一个逐次歼灭敌人的作战计划形成了。

第一个打击对象是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当时，敌第五十师已经前进到主力红军的集结地域附近。12月25日，朱德和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埋伏在小布附近，如果谭道源率领部队离开源头阵地向苏区前进，红军就出其不意地将其歼灭。

谭道源是湖南湘乡人，早年进入湖南兵目学堂学习，1912年转入湘军，先后担任驻粤湘军第三师师长。南（雄）始（兴）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师长、第十四军副军长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宁汉战争。近20年的风风雨雨使他不敢在苏区腹地孤军冒进。他看到附近没有部队接应，就命令部队驻守源头阵地。这样，红军指战员在冷冰冰的草地上埋伏了一夜，太阳升起的时候不得不撤回原驻地。

鲁涤平不允许谭道源按兵不动，不然他无法向蒋介石交帐。当红军侦察到第五十师即将出动时，于27日夜又进入了伏击阵地，谁知谭道源的这个师离开源头阵地不久又缩了回去，红军伏击未果，只得撤回原集结地域。

第二十打击对象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张辉瓒被鲁涤平指定为前线总指挥后，行动较为积极。12月28日，已经率部占领东固的张辉瓒接到了鲁涤平下达的向红军实施总攻的命令，即以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自己率领师部和第五十二、第五十三旅向龙冈前进。

朱德看到张辉瓒这个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当即决心：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政卫团占领黄陂附近地区的阵地，在当地赤卫军的配合下，牵制位于源头的谭道源第五十师，主力部队分两路秘密西进，在龙冈附近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

29日，敌人占领了龙冈。

龙冈圩后面是一座大山，前面有一条河，河的对岸是一座小山，东面不远处的黄竹岭是张辉瓒这个师东进的必经之地，地形十分险要。朱德命令黄公略的第三军为左路，林彪、罗荣恒的第四军和第三军团为右路，分头向龙冈方向攻击前进。第三军和第四军都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和训练素质都不错。朱德和毛泽东把这两个军一左一右摆开，决心要歼灭这股敌人。朱德后来说：那山地的确险要，有些怪地方，山顶上的小路，一般军队都不

能走，没有人领路，那就会迷失在树木草丛石壁中间了。

果然，12月30日上午，当张辉瓒率领部队从龙冈向五门岭前进时，突然遭到黄公略指挥的第三军先头第七师的迎头痛击。下午3时许，林彪任军长的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起，又把这股敌人的后路切断。在两路红军的夹击下，敌人随即溃败，到处窜逃。夕阳西下时，龙冈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一仗打得十分利索，红军共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当时，对于后勤保障主要来自前线的红军，大需要这些武器了。更令广大红军指战员振奋的是，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活捉。

张辉瓒的惨败使鲁涤平大吃一惊。他伤心地给蒋介石打电报说，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

战斗结束后，红军把俘虏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简短的教育后，许多俘虏纷纷要求加入红军。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士兵都是穷苦百姓，是被迫当兵的，他们受教育后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的一种补充力量。对于张辉瓒，朱德决定当面同他谈一谈。

张辉瓒很不服气，第一次同红军交手就当成了俘虏。他穿一身笔挺的卡叽军装，脚上登一双黑得发亮的长筒皮靴，还带着全副军章，被两名红军战士押着来到朱德的司令部时，十分傲慢地问：出多少钱能放我？

朱德扫了他一眼，严肃地说：红军不是做生意的。红军要在你自己的部队面前，在遭到你们“清剿”过的人民群众面前公审你。

一听朱德说出“公审”两字，张辉瓒几乎瘫倒在地。

不一会儿，朱德又故意问张辉瓒：你知道，你们的“围剿”还没有结束，红军下一仗应该打哪一个部队？其实，这时候红军主力已经去追击敌第五十师了，并于1月3日在东韶歼灭敌第五十师的一个旅，缴获各种武器2000多件。可是张辉瓒还真的建议朱德去打第五十师。张辉瓒说的其它情况也同红军掌握的基本相符，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拖延时间，等待第五十师来救他。

朱德想到张辉瓒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又问：我们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你愿意去讲课吗？

张辉瓒微微点头。东固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组织的第一次“围剿”就被打破了。张辉瓒被公审时，一些遭受迫害的群众和战士群情激昂，将张辉瓒就地正法。

数周之后，党中央从上海派入送来一封信，要求朱德和毛泽东释放张辉瓒。蒋介石提出的交换条件是：释放一批政治犯，付二十万现款。

蒋介石得知张辉瓒被杀后，就故意杀害了在狱中的许多革命同志，发泄他对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的痛苦和愤怒。朱德回顾第一次反“围剿”时，深刻指出：“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红军歼灭张辉瓒这个师时，缴获了该军的一部电台。这以前，红军没有电台，红军战士不知道这件战利品有什么用途，不小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朱德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要红军总部通报全军，要求各部队今后把缴

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缴，不得损坏。

朱德得知原敌军电台台长王诤和工作人员刘寅参加了红军时，连忙让人把王诤和刘寅找来。在司令部，朱德和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接待了王诤和刘寅，欢迎他们参加红军。

毛泽东乐呵呵地向他们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王诤和刘寅把自己掌握的无线电技术贡献出来，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

朱德很高兴，他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暂时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朱德还送给他们“麻雀牌”香烟，以示鼓励。

朱德的预见很快成了现实。第二天，红军在东韶打击谭道源这个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这一次，红军战士们把这件战利品完完整整地送到了方面军总部。

朱德很高兴，马上决定成立无线电队，开办无线电技术训练班。派冯文彬到无线电台当政委。各个军选调了十多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参加训练班，培养报务员，从此以后，红军有了自己的电台和无线电通信分队。

训练班开学那天，朱德作了动员讲话。朱德说：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就要战胜种种困难。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

红军的一部半电台没有条件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朱德对王诤等人说：你们要尽快把电台架起来，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特别要注意收听敌军的无线电台信号。

一大早晨，朱德刚起床，王诤就跑来报告：总司令，这几天敌军电台频繁呼叫，还出现了好几个新的呼号。

朱德点了点头，心里说：看来，蒋介石又在组织第二次“围剿”了。

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以后，蒋介石贼心不死，他又调王金钰的第五路军5个师、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3个师（其中有关树人的骑兵第一师）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等部队，到江西参加“围剿”，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仍留在中央苏区的残余部队，总兵力达20万人。

蒋介石看到鲁涤平打了败仗，就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要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蒋介石对何应钦说：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行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以期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

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何应钦于1931年3月下旬把部队调到预定集结地域，航空第一、第三、第五队在南昌、樟树镇、吉安机场做好准备，随时支援“围剿”军作战。福建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也做好了防堵红军向东南方向转移的准备。何应钦雄心勃勃，企图为蒋介石立大功。

红一方面军在准备第二次反“围剿”时，组织指挥机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月上旬，项英受中央委派来到中央苏区，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决定。项英原名项德隆，是湖北省武昌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

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当时项英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根据项英传达的中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于1931年1月15日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由项英代理。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项英，朱德担任副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1931年3月20日前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的通令，朱德和毛泽东联名发出了关于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训令。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二三月份，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对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陆续发出了一些指示和训令，尽管表示诱敌深入“也是可采用的战略”，但其中心思想是要红军先发制人去进攻敌人的主力部队，甚至提出了在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抛弃；日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4月初，党中央还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非议。

王明等人的这些行动，对朱德和毛泽东组织指挥第二次反“围剿”增加了新的困难，但是，由于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经为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所接受。红一方面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士气高昂，斗志旺盛；在苏区人民的支援下，红一方面军做好了反“围剿”的充分准备。

4月初，何应钦指挥四路军队向苏区大举进攻。何应钦这一次耍了些新花招，采用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特务手段相结合的办法进攻红军。

在军事上，何应钦要求各级将领严格遵循“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规定各部队一天只能前进5里、10里或20里。每走一步，都要派小分队进行游击侦察后，大部队才推进。部队占领了一个地方，马上要构筑工事和进行“驻剿”。

在政治上，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以后，要尽快把地主豪绅召回来，让他们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对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和恐怖统治。

在经济上，何应钦在更加严密地对苏区实行封锁外，还怂恿反动军队在新侵占的地方大肆抢劫、烧杀，肆意毁坏千苗，屠杀耕牛，企图造成人心恐慌，增加中央苏区的经济困难。

朱德和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派出了一部分主力红军同地方武装配合，不时地阻击和袭扰敌人。但是，对于反“围剿”的方针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出现了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面对20万敌军的严密包围，红军应采取“分兵退敌”的方针，把各个军分散到苏区外面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这样做，既能保存红军，又能保全苏区。

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到云南、贵州、四川去建立新的苏区。

毛泽东、朱德等人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中央苏区内，抓注战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毛泽东特别指出，参加“围剿”敌人的数量虽然多，但弱点也多，许多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指挥不统一，

地形不熟，给养运输困难，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帮助。红军数量虽然少，技术装备也比较薄弱，但上下团结，求战热情高；有苏区人民的广泛支援；红军还可以去占领优越而熟悉的地形。这就是：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形好。有了这些条件，红军一定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经过反复讨论，苏区中央局终于再次肯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艰苦奋斗，持久作战”。

这一次反“围剿”，朱德十分重视发挥无线电台的作用。敌人开始向苏区进攻后，朱德要求电台工作人员高度集中精力，随时侦听敌人的行踪。晚上，朱德迁常常到无线电训练班，同学员们谈心。那时候，训练班的学习条件极其简陋，树荫下摆几块石板，就算是课堂和练习桌了。练习发报的电键少，学员就用左手的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头也舍不得丢，要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在这般艰苦的条件下，大家都学得非常认真。方面军总部转移到东固坳上以后，新任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王诤同值班的同志一起，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信号。

5月13日，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占到富田、沙溪等地，离苏区中心区越来越远，无线电台上，敌军的联络信号也多起来。当时，国民党军队不知道红军已经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他们在联络中竟然若无其事地用明码交谈。

黄昏，星星从苍白的天空深处出现了。山坡上的树木像狰狞的巨人似的站着，枝叶的罅隙中似乎有千百双小眼睛，在窥视这神秘的大地；房屋成了一团黑影了，躁动了一天的大地显得平静多了，无线电台上的信号比白天更清楚了。忽然，王诤耳朵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信号：

我们现在驻富田，明晨出发。

王诤立刻判断出，这是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师部的电台，在同另一个师联络。王诤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

你们到哪里去？

东固。

王诤等人立刻把这份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指挥所。朱德和毛泽东看到红军的电台及时收听到了敌人的动向，非常高兴，他们详细分析敌情以后，于5月14日和15日相继下达了歼击由富田出犯之敌的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5月15日晚，毛泽东特地赶到红三军，同军长黄公略一起到附近村子里去找向导，在向导的帮助下，他们选择了从东固到中洞大道南侧的一条小路作为红三军主力的前进通路。

为了一举歼灭敌第二十八师，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部署。以彭德怀为总指挥的第三军团为左路军；朱德和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军团兵分两路，黄公略的第三军为中路军，林彪、罗荣桓的第四军为右路军。同第一次反“围剿”一样，朱德把彭德怀、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等人率领的部队部署在主要方向上。

朱德要到前沿阵地去指挥作战。15日夜晚，朱德同方面军总部和警卫连的同志们一起，从敖上沿通向中洞的大道西进时，突然同敌第二十八师的前卫部队遭遇了。朱德立刻命令大家往山坡上散开、边打边退。天大黑了，敌第二十八师的前卫部队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红军，还以为进了红军的伏击地带，行动极为谨慎。山谷里、枪声时而激烈，时而消失。朱德和警卫连的同

志们一起同敌人战斗了近3小时，阻止了敌人。

近午时分，黄公略指挥第三军突然向敌第二十八师侧后发起猛烈攻击，林彪、罗荣桓指挥的第四军也抢占了有利地形，敌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夜幕四垂时，敌第二十八师大部分被红军歼灭了，敌师长公秉藩也同张辉瓒一样，被红军俘虏。

公秉藩似乎已经想到了当俘虏的结局，在战斗接近尾声、惨败已成定局时，他狡猾地穿上了一套普通士兵的军装，混杂在成群结队的俘虏中间。红军对这些俘虏进行简短的教育以后，像往常一样，对不自愿参加红军的俘虏每人发给三块现洋，作为回家的路费。公秉藩也伸手接过这三块现洋，从红军的眼皮底下逃跑了。不知是谁开了这个先例，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在被俘前夕，总想穿上一套士兵服，利用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来逃脱自己的罪责。

敌师长公秉藩虽然侥幸逃脱了，但红军却歼灭了敌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第四十六师一部，缴获各种枪支5000余枝（挺），火炮30余门，特别是俘获了包括100瓦特电台在内的第二十八师无线电队的全部人员和器材，这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同党中央建立电讯联系打下了基础。

富田战斗以后，朱德和毛泽东又指挥红一方面军相继进行了白沙战斗、中村战斗、广昌战斗、建宁战斗。在短短的半个月里，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横扫敌军700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三万多人，缴获2万多枪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随后，红军乘胜进攻，扩大了赣东、闽西根据地。

战斗结束后，朱德来到无线电总队时，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总司令，争先恐后地说：首长，我们在电台里还听到敌人拍发“SOS”的紧急求救信号呢！

朱德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身上。

在朱德的关怀下，红军利用缴获敌人的电台，于1931年秋天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通信，使中央的精神能迅速传送到江西前线。

朱德回忆第二次反“围剿”时说：“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

战争有自己的规律。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刚刚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富田、白沙战场余烟统绕，广昌、建宁地区满目疮痍，红军战士还没有来得及撤去胳膊上的绷带，擦拭炙热的枪管，一场更为险恶的战斗又降临了。

6月，赣江两岸酷阳如火。蒋介石又纠集其嫡系第十四、第十一、第六、第九，第十师共10万人到江西战场。连续两次惨败，使蒋介石大为恼怒，他把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罗卓英、赵观涛等一些心腹将领指挥的几个师调到“围剿”第一线，连同原来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共23个师约30万人，组织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军政部航空署所辖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七航空队分别驻防南昌、吉安、

樟树、武汉等地，还特地派了两架运输机运送伤兵。

这一次，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让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以便一旦失败时有一只“替罪羊”。蒋介石还野心勃勃地聘请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集中兵力从红军两翼分进合击，左翼自南丰指向黄陂，右翼由兴国及永丰指向黄陂，在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后，再深入“清剿”。

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朱德和毛泽东虽然预见到了蒋介石会纠集更多的力量再次“围剿”红军，但未曾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当时，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处于分散状态，部队连续苦战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的进攻，形势十分紧急。朱德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直趋苏区的兴国、霄都，形势是极为紧张的。

正是在这种“极力紧张”的形势下，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上，发表了著名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的论著。它是“红军之父”朱德的一部杰作。

朱德认为，创造铁的红军是当时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铁的红军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

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朱德总司令认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朱德还提出，中国红军是在土地革命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它的主要的组织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农、贫农及中农。它的军事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应该把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出身的放在第一列。乡村中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尤其是城市总工会，应该按期调动自己政治上坚定的分子来充实和扩大红军的队伍。把游击队，赤卫队中有斗争历史的积极分子抽调来当红军，更有必要。

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朱德提出，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实行土地革命、逐渐把游击队转成为红军、逐渐扩大和加强红军的力量、消灭军阀混战、扩大苏维埃运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政府等“伟大的繁难的任务”。朱德认为，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已经认识清楚红军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形成的伟大的革命武装，我们自己更应该从阶级立场上明确这一点。红军中的军事指挥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训练的实施，必须完全由共产党领导执行。各级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充当，要尽量提拔和培养最好的工人干部做政治委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成为铁的红军。

三、政治训练的重要。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朱德特别强调，要造成铁的红军，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共产党有指导工农联合的责任；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了解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是为全中国的工农及劳苦群众谋解放；了解自己在战争中积极完成其一部分任务就是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

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必须有红军的发展、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暴动四种革命斗争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朱德认为，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朱德深刻指出，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红军队长时间的游击战争中得到不少新的经验，养成了红军旺盛的攻击精神。但现在革命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单凭红军的英勇冲锋固然不够，单凭红军已有的战争的经验也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必须特别加速战术方面的进步，预备在全国的范围内作战，并且要预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

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朱德说：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朱德提出，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特殊组织，它不仅要完成中国工农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要成为创造并保卫社会主义的柱石。红军不仅要与国内军阀的军队作战，它还要与武器最进步、组织更完备的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因此红军本身的编制，必须力求进步，以适应于新的作战环境。要有统一的训练，集中的指挥。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

朱德还特别强调，要在斗争过程中创造铁的红军。

历史是公正的，“红军之父”朱德在这篇论著中的许多预见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都成为现实。朱德提出的这些建军理论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事人物分册指出。《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这一论著对进一步提高红军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

在总司令“创造铁的红军”的号召下，红军将士斗志昂扬。7月，当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大举合围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相继从各自的工作区域出发，绕道瑞金，紧急行军十多天，在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第3军主力、第35军。第7军会合。稍经整顿后，又跋山涉水千余里，转移到高兴圩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将红军主力形成了一个打击拳头。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30万军队逼进中央苏区后，狼奔豕突二十多天，竟然找不到朱德指挥的红军的去向，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更使蒋介石惶惶不安的是，苏区人民实行坚壁清野，红军小分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员互相配合，不断阻击与袭扰国民党军队，使其官兵饥疲交困，锐气大减。

7月底，蒋介石忽然得到了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在兴国集中的情报，认为红军要西渡赣江，立刻命令“围剿”部队兵分两路，连夜向西和南急进，企图把红军压迫到赣江边消灭之。当时，朱德正在兴国的高兴圩地区组织红军进行休整，进行战前动员。当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得悉各路敌军正在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新安一带只有3个团防守，后方联络线上的

防守兵力也比较薄弱时，当即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到敌人后方去打一个胜仗。

8月5日，夜色昏沉黑暗，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中，沿着崇山峻岭悄悄地前进。山谷里寂静无声，只有那黑暗把他们团团围着，红军神秘的行动竟然使熟睡于两侧的数万敌军毫无察觉。黎明时分，红军主力到达莲塘、官田地区。

8月7日拂晓，跳出了敌人合围圈的红军抓住其部署在外围的战斗力较弱的第47师第2旅发起猛攻。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上午9时，敌第二旅及由良材西出侦察的一个多营全部被歼灭，敌旅长谭子钧被击毙，红军初战告捷。

朱德心里很明白，莲塘一战得胜后，红军还未完全摆脱困境，一旦几十万敌军“醒悟”过来，红军仍然有被围歼的危险，经过仔细研究，朱德和毛泽东命令红军主力不顾疲劳，继续向良村急进。

谁知冤家路窄，前进中的红军突然与支援莲塘的郝梦龄师长指挥的第五十四师第一六旅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趁围歼莲塘之敌的余威，乘势发起猛攻，把敌第一六旅旅长张奎诏击毙。顿时，敌人乱作一团，不知道是哪路“天兵神将”下凡，一个个吓得抱头鼠窜。第一六旅的一个先头团很快被红军歼灭，其余部队见大势已去，仓皇向良村溃逃，红军将士衔尾猛追，很快包围了从城冈撤回良村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师师部及两个旅。红军趁敌喘息未定，发起猛攻。激战之中，敌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丧命，部队被击溃。

这时候，蒋介石和何应钦才知道，朱德已经率领红军主力从兴国西北地区东进，判断红军要北出临川。于是，急忙命令赵观涛指挥的第六师、陈诚指挥的第十四师、第十一师掉头向东，企图在宁都以北地区寻歼红军主力。至8月15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了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大有一口把红军主力“吞掉”之势。

在这个严重时刻，朱德得到情报，正在东进的两路敌军之间，有一条10公里宽的间隙，但都是崇山峻岭。朱德心里想，这是一个好机会，是红军摆脱敌人的良机。经过研究，朱德和毛泽东决定让红军第十二军大张声势地向乐安方向佯动，把国民党军队吸引到东北方向；红军主力二万多人利用夜暗从两路敌人的间隙中偷越过去，秘密西返兴国境内。

蒋介石果然把红军第十二军当作红军主力，命令陈诚和赵观涛的部队追击红军第十二军。这时候，第十二军利用自己装备轻便的长处，翻山越岭，专门走崎岖的山路。陈诚的数万部队拖着笨重的装备，在崎岖的山路上亦步亦趋，疲于奔命，还见不到红军的影子。

到8月底，国民党30万军队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快两个月了，除了第四十七师等4个师遭到歼灭性打击外，其余部队饱尝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的困苦，“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再也无力进攻。为了保住参加“围剿”的军队，蒋介石不得不下达总退却的命令。

9月6日晚，当兴国地区的敌人狼狈地沿着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时，朱德和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7日晚，蒋鼎文指挥第四军团沿着黄土坳、老营盘一线北撤，黄公略军长率领红三军和独立第五师果断出击，一举攻占黄土坳，又从北、南、西三面向敌独立旅发起攻击。激烈的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午后，敌独立旅全部被歼灭，2000多敌人被俘，缴获各种枪支2000多枝（挺），迫击炮10门。

9月13日，惶惶不安的残余敌人改变了退却路线，蒋鼎文残部和陈诚的部队经崇贤、东固等地向吉安撤退。朱德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立即集中红军主力对该敌进行猛烈追击。15日拂晓，红军抢占了方石岭，截住了敌第五十二师和第四军团的一个多团，顺利地将其围歼在方石岭以南地区。这一仗，红军又俘虏了5000多人，缴获各种枪4500余枝（挺），马200多匹。

战斗结束了，红军战士背着战利品喜洋洋地向总司令报喜。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又失败了。朱德正高兴，忽然接到红三军的报告，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到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什么？朱德忍不住又问了一声，沉痛的感情就像闸门挡不住的洪水那样，直往心口上涌。

朱德曾痛惜地说：“我们有一个有名军长黄公略，被飞机击死。黄同志是智勇双全的人材，是我们顶大的损失。”

朱德在极度悲痛之中，同毛泽东联名给红军名将黄公略送了一副挽联。内容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称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被迫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处于守势。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军乘势攻占了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消灭了当地的一些反动武装，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两部分完成连一片，根据地扩展到了近30个县境。在建设苏区过程中，有12000多名群众参加红军。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

50多年以后，国民党在台湾检讨这几次战斗失利时，痛心地说：当匪军主力进出泰和县境内回师东窜时，经老营盘、高兴墟进出莲塘，是时国军第一军团主力在兴国，一部在崇贤圩，两地相距约15公里，匪军从两部之间通过而无阻，完全为搜索疏忽所致……左右两集团军……相距仅约3公里，匪主力竟能乘国军尚未发现之际，潜由第一军团南翼侧逸出而窜往南龙、莲塘附近，虽说山地地形复杂、视界不良，观测困难，但国军之搜索欠周，致情报不灵，为其主因。

回忆起中央红军的前3次反“围剿”，朱德颇为自豪地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13 总司令预言：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
到来。中央局回电：这完全是离开
了原则。地球仅仅转动了100圈，
第四次“围剿”开始了

中央红军夺取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后，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形成了经过毛泽东、朱德等人在战斗中不断总结提高的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原则。根据地内建立了党、政、军、群各级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问题报告》，朱德总司令作了《红军问题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决议。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以便与中共“中央军委”相区别）在瑞金组成。朱德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其余成员是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统一领导苏区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总参谋部部长由叶剑英担任。

周恩来是12月上旬离开上海，途经长汀等地，在月底到达瑞金的。在瑞金，周恩来见到了朱德、毛泽东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是由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朱德和周恩来又开始新的合作。

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人率领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军在朱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进一步发展和扩大。

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基本国策指导下，不断挑起事端，寻找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一段路轨炸毁，反而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关东军当即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并于19日拂晓攻占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深重，抗日的怒潮席卷神州大地，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下野。这是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32年初，当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党政府西迁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朱德的副手彭德怀想到，中国共产党“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

但是，远在上海的由博古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认为中国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要求

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并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1931年12月4日，临时中央给红军发出训令，认为争取上省数省首先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两天后，朱德、毛泽东等人又收到临时中央的指令，要求中央红军“首取赣州，迫吉安”，向北发展。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错误地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在1932年进行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等6次进攻战役。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参与指挥了这些战役。

打赣州是这六次进攻战役的第一仗。

赣州位于瑞金西部，是江西省南部的一个中心城市，也是连接赣粤两省的军事要地。赣州处于章、赣两水的汇合处，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赣州城城墙坚固，高达二丈，素有“铁赣州”之称。朱德和毛泽东等人注意到，驻守赣州的敌军尽管只有马 指挥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3000多人及一些地主武装，但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一带驻扎着第十八军军长陈诚指挥的罗卓英、周至柔、刘绍先、李明的4个师和公秉藩指挥的第二十八师，这些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战斗力相对较强，陈诚又是蒋介石的心腹，下管蒋介石下野还是上台，陈诚都听命于蒋介石。朱德和毛泽东还注意到，赣州以南的大庾、南雄、韶关一带，驻扎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的两个师、两个独立旅和两个教导团。广东军阀虽然同蒋介石有矛盾，但是，赣州如果遭到红军攻击，他们随时可能增援。

打下打赣州？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不同意进攻赣州。

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赣州。

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瑞金以前曾经主张进攻赣州。到苏区以后，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又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上海的临时中央复电：红军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个城市攻打。

毛泽东仍不同意。他想：这三个城市一个也不能打。

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在抚州、吉安，赣州三个城市中，赣州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赣州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继续着一九三一年的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的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有首先胜利的前进（途）。”根据这个训令，由彭德怀任总指挥的第三军团和林彪任军长的第四军为主作战军，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陈毅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配合主作战军打赣州。

2月4日，彭德怀指挥主作战军占领了赣州城近郊的白云山、天竺山等地。赣州的守敌立即拆毁城外工事，依城固守。这以后，红军连续两次攻城。

第一次是2月23日。攻城的红军炸开了赣州东门附近的一段城墙，一度占领城楼。但敌人不顾一切地反扑，我军攻城受挫。蒋介石得知红军进攻赣州，立刻命令陈诚把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迅速调往赣州。几天后，这些部队开始进入赣州城内。

第二次是3月4日。红军又一次用坑道爆破的方法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宽约20丈的缺口，谁知敌人事先赶筑了一道拱墙，凭着拱墙顽抗，红军又没有攻入赣州城内。

7日凌晨，红军在暗夜中正准备第三次攻城时，赣州城内5个团的敌人突然出击，使攻城的红军一时陷于被动地位，被迫撤出战斗。

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不仅城未攻克，红军却遭到很大伤亡。

朱德总司令回忆红军攻打赣州前后的情况时说，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总司令特别提到：“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

30年后的一天，朱德元帅经江西铅山县到闽西视察。汽车经武夷山盘旋而上，当元帅看到那一带层峦叠嶂，高耸入云的山势时，不禁感慨万分。朱德元帅说：一九三二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力推行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分去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

赣州撤围不久，中革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到赣江西岸活动，称为西路军；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同林彪、聂荣臻、董振堂、赵博生等人一起率领红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称为东路军。

1932年4月下旬，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一起指挥东路军，漂漂亮亮地打下了漳州，缴获了大量物资，筹措了100万元以上的经费。这一行动，对红军以后的作战很有利。

5月，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原驻江西的“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在“围剿”中被红军打败的何应钦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担任副总司令。陈济棠得到副总司令的头衔以后，立即指挥广东的两个师北上，侵占了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

6月7日，朱德总司令收到周恩来打来的电报：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毛泽东、王稼祥也看到了这份电报。周恩来是根据中共临时中央6月5日发布的军事训令给朱德发电报的。临时中央的军事训令提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即要林彪、聂荣臻的部队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

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冒着炎夏的酷暑，赶到广东的乌迳地区，于7月上旬同粤军在水口地区遭遇。这是一场著名的恶仗。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说，水口战役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但是，“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

水口战役后，周恩来赶到前线。红军恢复了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朱德总结前几次进攻战役的经验教训，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于7月25日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8月8日，中央局接受了朱德等人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任主席。中央局同时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

8月15日，朱德和毛泽东下达了进攻乐安的作战命令。这个战役由第一、三、五军团为主作战军，江西军区、闽西军区为支作战军，由朱德、毛泽东全面指挥。这一次，林彪以红一军团总指挥的身份参战，聂荣臻为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为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第四军军长已由周昆担任，政治委员是罗瑞卿。

8月16日，红军出敌不意地对乐安发起攻击，并于17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1个多旅，俘敌3000多人。3天后，红军攻克宜黄。23日，红军又乘胜占领南丰。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的这一战役打得异常迅猛，一周内连克三城，歼敌约3个旅，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俘敌5000多人。红军战士无不拍手称快。

按照预定计划，乐安、宜黄战役结束后，红军还要攻打南城，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已到达南城近郊。当他们在现地详细观察敌情时，发现南城守敌3个师已有了作战准备，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工事，南城近郊的地形也不利于红军进攻。朱德还了解到，蒋介石已经调动武汉、南昌、吉安等地的部队向南城增援，以解除对南昌的威胁。根据这些新情况，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机立断，改变原定计划，指挥红军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进行休整，寻找战机。

一天傍晚，朱德检查了几个团的宿首部署，刚回到总司令部，机要参谋就递过来一份电报。电报是临时中央拍来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又一次提出，红一方面军应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以便减轻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电报的口气十分严厉，甚至指责朱德和毛泽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就会“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

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四人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是斗争，还是妥协？红军是出击南昌，还是……

9月23日，朱德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致电中央局，详细陈述了他们对红军行动方针的看法。这份电报提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于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电报还指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对于受到敌情威胁严重的湘鄂西和鄂豫皖，朱德也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分别去电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在强敌围攻面前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而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以及分进台击的最好机会。

然而，临时中央没有像朱德期望的那样调整行动计划，反而加深了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两天以后，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收到中央局的复电。该电称：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中央局还严厉指责朱德等人不同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相呼应。

看了这份电报，总司令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勉强去进攻中心城市，已经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为什么？驰骋战场几十年的红军总司令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研究后，当天就给中央局回电，坚持自己的看法。

朱德等人在复电中痛切地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电报还富有远见地指出，“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总司令的预言很快成为现实，三个多月以后，蒋介石指挥几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然而，矛盾还在继续激化。9月29日，中央局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蛮横地断言：“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朱德、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出席了会议，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会议开始时未到会。矛盾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朱德也只好同大家一起坐到会议桌上来。

宁都会议上，双方争论得十分激烈。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将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提出要毛泽东回后方去负责中央政府工作。

在双方激烈争论的重要时刻，周恩来从前线赶回宁都。周恩来不同意让毛泽东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¹因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建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可是，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最后还是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战役计划，该计划最后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隆冬季节，山峦，田野和村庄都沉浸在一片恬静的严寒之中，沉浸在耀眼的光亮和淡蓝的阴影里。大地像冻死了一样，连空气都冰透了。就在1932年的隆冬季节，蒋介石下令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组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和未德、周恩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参谋长贺国光根据蒋介石的授意，把“围剿”部队编成左、中、右三路，另设总预备队。

中路军又称为“进剿”军，由蒋介石的心腹陈诚任总指挥，担任这次“围剿”的主攻任务，所属是清一色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共有3个纵队12个师。第一纵队由罗卓英任纵队长，指挥萧乾的第十一师、李明的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第二纵队由吴奇伟任纵队长，指挥李默庵的第十师，霍揆彰的第十四师，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和吴奇伟自己兼任师长的第九十师。第三纵队由赵观涛任纵队长，指挥周浑元的第五师，周的第六师，李延年的第九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中路军预备队为刘绍先指挥的第四十三师。

左、右两路军也称为“清剿”军，主要任务是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行动，但兵力也不弱。左路军由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队共6个师和新编第四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部队是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沈光汉的第六十师，戴戟的第六十二师，区寿年的第七十八师，卢兴邦的新编第二师。

右路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6个师和独立第二旅组成，总指挥是广东军阀余汉谋，所属6个师是李振球的第一师，叶肇的第二师，张瑞贵的第三师，张枚新的第四师，王赞斌的第四十四师，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

总预备队名义上只有李云杰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但第八、二十四、二十八、五十二师和两个独立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何应钦随时可以把这些部队调来参加“围剿”。

在红军没有组建空军的情况下，蒋介石总是把航空队作为“杀手锏”调到“围剿”前线，这一次蒋介石又把第三、第四航空队调到南昌，归何应钦指挥。

前三次“围剿”都失败了，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蒋介石几乎调动了闽、

¹《周恩来传》第256页。

²《周恩来传》第256页。

赣、粤三省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做梦都想把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军剿灭。1933年1月底，蒋介石冒着严寒，野心勃勃地亲自到南昌组织“围剿”。

蒋介石把何应钦叫到跟前，神秘地说：剿灭红军的作战方针是“分进合击。”

何应钦心领神会。第三次“围剿”的“长驱直入”战略失败得太惨了。

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围剿”梦能成功吗？

宁都会议以后，朱德和周恩来决定乘国民党军队新的围攻部署没有完成时，出敌不意地打一个胜仗。10月16日，朱德和周恩来随军从广昌地区出发东进，在一周之内连续攻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歼敌一个团。11月间，朱德和周恩来又指挥红军攻克了黎川、光泽、资溪和金溪，使苏区地域扩大了数百里，把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但是，这年发动的6次进攻战役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无论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还是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的“围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紧张、频繁的战斗中，朱德总司令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敏锐地看到，敌人“正将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朱德等人还尖锐地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时机已经到了”，全体红军指战员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消灭敌人，来争取比（第）三次战争还伟大的胜利”。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12月下旬进行战前的整顿改编和军事训练。

大战的序幕就要揭开了。总司令在思考，能参加反“围剿”的红军总兵力不到7万人，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周围聚集了近50万军队，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怎么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呢？是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时候，主动地打到外线去，打乱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计划？还是就地组织防御？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坐下来，一谈，就是整整一夜。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在闽赣边界的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准备主动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第二天，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总政委随军出发，踏上了反“围剿”的征途。

1月5、6日，红军在黄狮渡与敌遭遇，首战告捷。

1月8、9日，红军又在浒湾同孙连仲、吴奇伟的一支部队打了一仗。两次战斗，红军俘敌4000人，缴枪4000支，令人振奋。

然而，月底的战斗却打得不顺心。

在金溪以南地区，朱德和周恩来两次调动部队，准备在运动中寻歼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所属霍揆彰的第十四师和吴奇伟的第九十师，但这两路敌人的行动都很谨慎，红军没有达到预定目的。

1月24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负责人收到中央局的电报，要求红军以所有主力“先取得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并取得南丰”。中央局的电报还以警告的口吻说：“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

总司令思考良久，认为南丰不能打。

周恩来仔细阅读了中央局的电报，认为强攻南丰是不利的。

敌情越来越严重了。1月29日，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

蒋介石抵达南昌，并于第二天发表演说，声称“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31日，蒋介石还急匆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红军的“围剿”。2月初，蒋介石又决定自己兼任“剿匪”总司令，把行营设在南昌。他对何应钦不放心，决定亲自指挥这次大规模的“围剿”。

那几天，朱德脑海里总是在回想中央局的电报，他似乎觉得宁都会议上的那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他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局打电报，认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要求中央局对前方只给“原则上和方针上的指示”。

但是，中央局听不进朱德等人的意见，在回电中明确指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中央局唯恐朱德等人不迅速执行这一指示，又斩钉截铁地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看到这份电报，朱德意识到强攻南丰已经是一项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朱德和周恩来只好率领红一方面军于2月9日离开黎川附近的集结地域，向南丰开进。

南丰位于广昌北面南北狭长的平原中。南丰城东临抚河，是抚河战线的敌人向苏区进攻的一个重要据点。部署在南丰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是敌总预备队陶峙岳指挥的第八师主力约5个团。

2月12日晚，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的部队向南丰城西北之敌的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夜，红军也没有突破敌人的土阵地。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得知红军主力向南丰进攻时，心中暗自高兴。他一面命令部署在南城的第二十四师立即增援南丰，千方百计把红军抑留在南丰城下；一面命令中路军各部队迅速向南挺进，同红军主力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已难以打下南丰。朱德和周恩来毅然决定主动退却，撤围南丰，避开敌人兵力密集地区。这次撤退不是盲目的，而是从反“围剿”全局考虑的，朱德要周建屏军长指挥的第十一军伪装成红军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前进，迷惑敌人。红军则分批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

这以前的几次战斗，朱德都不满意。朱德认为，红军“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是“很多都是空打的”。南丰撤围时，朱德和周恩来“隐真示假”的战略考虑，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反“围剿”这盘棋也一下子活起来了。红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的指挥下，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

第一仗是黄陂战斗。这是一次闻名中外的大兵团伏击战。

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南丰以后，陈诚情况不明，果然把向黎川方向前进的第十一军当作红军主力，急忙命令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在宜黄以南地区集中，向广昌、宁都方向前进，堵截红军的归路。命令吴奇伟的第二纵队从南城、南丰出发，侧击建宁、黎川。命令赵观涛的第三纵队从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根据这个部署，李明指挥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指挥的第五十九师要从乐安出发，向黄陂前进，同从宜黄南下的第十一师会台。

朱德注意到，敌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同第二、第三纵队相距甚远，态势孤立。这两个师要经过登仙桥以东山高林密的摩罗嶂大山，这一地区有

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33年2月4日。

利于红军隐蔽集结，是集中兵力歼敌的极好机会。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仔细研究以后，决心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有利地形，在敌前进道路上设伏，首先歼灭敌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

2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给进攻苏区之敌迎头痛击，用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号召各部队在战前做好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提高士气。朱德还特别强调，要严密封锁消息，详细侦察敌情。

26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在师长李明和陈时骥的率领下，从乐安出发，到黎川去寻歼“主力红军”。这几天天不作美，雨缓慢而顽固地下着，一刻也不定。李明和陈时骥都认为红军主力在黎川，放心大胆地缓缓东进。也是在这一天，朱德和周恩来同红军主力一起，冒着绵绵阴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域连夜秘密北上，隐蔽在宜黄南郊的黄陂一线山区。由于高山雨雾掩护和群众封锁消息，李明和陈时骥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行动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

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分头行进，两个师之间被摩罗嶂大山所隔，联络和协同都有困难。摩罗嶂大山内整日细雨浓雾，10米之外的人就难以看清。27日下午一时，当李明师长率领第五十二师前进到桥头附近时，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第七师立即将敌人的行军纵队拦腰切断，第九、第十、第十一师等部队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激战3小时，将敌第五十二师师部和第三九团等部队全部歼灭，敌师长李明被俘。敌第五十二师的其余部队在28日上午被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也在摩罗嶂大山的另一面突然向敌第五十九师发起攻击。敌师长陈时骥一看进了红军的伏击圈，起初还命令两个团就地转入防御，期望得到陈诚的支援，可是陈诚根本不知道摩罗嶂大山两侧有红军主力设伏。在红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陈时骥见败局已定，不得不率领残部利用夜幕的掩护向蛟湖方向逃窜，企图同李明指挥的第五十二师会合。逃到蛟湖附近时，才知道第五十二师已经被红军歼灭，又仓皇向乐安方向逃窜。3月1日上午，该敌逃到登仙桥东北地区时，被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部队歼灭。师长陈时骥的命运同李明一样，也当了红军的俘虏。

仅仅打了一仗，敌人的两个师都被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长都被俘虏了。黄陂伏击战，打得多么漂亮。

第二仗是草台岗战斗。

黄陂战斗结束后，朱德和周恩来迅速率领红军主力撤到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陈诚仍然摸不清红军主力的去向。朱德和周恩来将计就计，调动一部分红军向广昌方向前进。

陈诚在黄陂吃亏后并不甘心，急于向红军反扑。当他得知红军向广昌前进时，迫切的求战心理又使他误以为红军主力开始向广昌转移，就于3月中旬改变部署，把原定左中右三路“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把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从宜黄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在广昌地区寻歼红军主力。

朱德总司令判明敌人的企图以后，一面命令周建屏指挥的第十一军在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吸引敌人加速南进，以便拉大259敌人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一面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从侧后“吃”掉一股敌人。

陈诚果然上当，坚信不疑地把第十一军当成红军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陈诚还特意把后纵队的第五师配属给前纵队指挥，因为该师离前纵队较近。3月20日，敌前后两个纵队之间已经相距百余里。后纵队又在山路上拉得很长，前面萧乾师长指挥的第十一师到达草台岗、徐庄时，后面李延年的第九师还在东陂。

朱德看到这是打敌第十一师的极好机会。以萧乾任师长的第十一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虽强，但这时正好孤单单地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兵器难以展开，前后之敌无法呼应。为此，总司令果断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第一军团为左翼队，彭德怀、董振堂指挥的第三、五军团为右翼队，“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21日拂晓，红军从左右两翼向草台岗、黄柏山、徐庄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战至午后，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草台岗这次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靠它起家、素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该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还有三十二旅旅长均被我击伤。击毙了三个团长。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我们缴获很多。”

陈诚指挥部队向中央苏区“进剿”时，蒋介石多次要求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和右路军余汉谋积极策应陈诚作战，但是，蔡廷锴、余汉谋同陈诚之间矛盾很深，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一直不肯积极支援。

黄陂、草台岗两仗，一共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多人。陈诚无可奈何，只能改取守势，指挥“进剿”军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又被打破了。

这次反“围剿”，朱德和周恩来一直在前线指挥，他们以高度的智慧，全局运筹，指挥若定，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战例。在严重的敌情威胁下，朱德用佯动和巧妙的伪装来迷惑和调动敌人，灵活运用兵力，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之一部，表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这种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是第一次。

朱德总司令称这两次战役是“伟大胜利”。

战后，朱德专门撰写文章总结这两次战役。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他还特别提到，南丰撤围以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的目的按期达到。红军主力先南进后来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朱德还看到，在这两次战役中，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独五师、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备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

《聂荣臻回忆录》第176页。

《朱德选集》第9页。

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朱德明确指出：“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¹这种作战形式为我军以后进行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奠定了基础。

朱德也明确指出了这两次战役中存在的某些教训。他认为，“通信联络不确实”，“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另一个问题是“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²

朱德严肃指出：“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他还举例说，东陂战役的第二天，各部队已报告打扫战场完毕，但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机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当时对俘虏的处置也有“游击习气。捉到一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朱德颇为沉重地说：“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支，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在以后的战斗中，红军及时纠正了朱德提到的“教训”。草台冈战斗结束后，红军没有放出一个俘虏官兵。这样，敌人就不能很快地恢复原建制了。

¹《朱德选集》第10、12、12—13页。

²《朱德选集》第13页。

³《朱德选集》第13页。

14 红军总司令朱德给南路“围剿”军总司令陈济棠写信：事不容缓，迟则莫及。陈济棠默默无语，在封锁线上冷眼相看。35年后，邓小平评述陈济棠

秋深了。

天气是晴朗的，太阳却显得黯淡了。鸭子一半浮在水田里，一半栖在田埂上，已显得那样清冷。没有干透的谷草个子零落地堆在场院里，也显得寂寥。自然界似乎萎谢了，在10月的云雾下，山岭和田野的颜色慢慢地褪了，只有那群白鹭倏地飞起来时，才叫人想起刚刚过去不久的夏天，想起火辣辣的太阳和汗水浸湿的衣裳……行军队伍已经走出去数里了，朱德总司令才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马缰绳，一跃而上，随着行军纵队缓缓走过了于都河。

这是一次大转移，中央红军离开了战斗多年闽赣边革命根据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红鬃马嗒嗒地走着，朱德已经是第二次回首眺望瑞金那座海拔不到100米的云石山了。云石山是石灰岩山，经过大自然长年雕刻，山峰像一朵朵云。总司令清楚地记得，云石山的山顶上有一座石砌的古庙，庙里还有一尊如来佛塑像。古庙四周，竹树茂盛，高劲挺拔，好一番多姿迷人的景色。两个多月前，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沙洲坝，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就从沙洲坝、下霄、乌石垅迁移到了云石山，云石山一度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

先遣队的敌情通报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朱德总司令手里。敌情越来越严重了，蒋介石调集重兵，在红军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了四道严密的封锁线，一心想把红军截住。然而总司令的脑海里还不时地闪现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情景。那是一次令人心痛的反“围剿”，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了一年之久，苏区人民也竭尽全力支援了战争，但这次反“围剿”遭到了严重失败。

朱德总司令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时，非常愤慨地说，第五次反“围剿”“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它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

朱德所说的“洋教条”主要是指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第五次反“围剿”中推行“左”的政策。

1933年初，当朱德、周恩来等人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反“围剿”前线沉重打击蒋军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处境日益恶劣，不得不迁到中央苏区来。博古到达瑞金以后，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博古还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

5月8日，根据博古等人提议，把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朱德和周恩来的职务也相应变化，朱德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革军委设在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

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临时中央还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这个职务由项英代理。朱德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时时都随红军主力在前线指挥，上述规定，实际上是由临时中央在瑞金决定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了，朱德总司令的实际指挥权受到了限制。

不久，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

6月上旬，朱德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那时候，博古等人正在错误地批判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犯了“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周恩来在会上作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时，强调红军中没有“罗明路线”。

会后，朱德和周恩来一起返回前线。

6月13日，朱德和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很长，主要表达了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的意见。电报中批评了朱德和周恩来等人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的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个方面配合作战”。电报还提出，要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

朱德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份长长的电报，一面把电报批转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滕代远、董振堂、朱瑞等3个军团的领导同志看，一面于18日同周恩来一起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对方面军作战计划的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不应分开”。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见到这份作战计划时说：“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备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其实，朱德总司令总结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对红军的战术发表了详细意见，提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基本战术原则。总司令认为。

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要懂得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以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红军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下。任务、敌情、地形时常变换，红军的决心就不同，运用战术的原则就更不同了。

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它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钳制敌人的兵力，但要主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保障主要突击方向的进攻。

朱德还提出，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不能争取战术的胜利，战略的目的就不容易达到。战斗的完全胜利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不去争取小的胜利，就难以有大的胜利，要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

朱德总司令还对红军的通信和侦察工作明确了具体原则，要求兵团和部队在遂行任务时要保持通信联络，以便共同实现决心。当情况变迁而通信联络中断时，则应根据首长决心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各级指挥员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

但是，博古等人没有接受朱德总司令提出的“集中其最大兵力”在一个方向作战的建议，而是企图通过分离红军主力，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

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中革军委却在7月1日下达了分兵两路的命令。

根据这个命令，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等部队组成东方军，由军团长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从广昌出发到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展开进攻。入闽以后，彭德怀指挥的东方军编制不断扩大，作战近3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本身也受到了削弱。

红一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委。中央军主要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战任务。

红军分兵作战，使蒋介石获得喘息的时间。为了更大规模地“围剿”红军，蒋介石撤销了赣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另外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的一种重要权术就是变换总司令部的名称，调换指挥官的职位，以期达到预定目的。

蒋介石自己坐镇南昌，就要千方百计把“围剿”红军的架势拉得大一些。这一次，这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除了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实行更加严密的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外，还向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大量借款，购买国外先进的飞机和火炮，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企图借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来“围剿”红军。

当蒋介石得知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入闽作战时，就从容地在江西庐山这座风景如画、凉爽宜人的避暑胜地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围剿”的方针和计划。这一次，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蒋介石最初的部署是组成北、南两路军。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三路军18个师又1个旅为这次“围剿”的主力军。顾祝同是江苏省涟水县人，他跟蒋介石不同，不是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六期毕业生，他在黄埔军校任步兵战术教官时，追随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北伐战争中，他率军攻克福州后，担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1927年8月，蒋介石在下野以前把他调到嫡系部队的第九军任军长，后来又担任第一军军长。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又被蒋介石选调为南京国府警卫军军长。蒋介石在“围剿”红军连遭挫折的时候，把顾祝同这样一名亲信第一次调到江西前线，委任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北路军总司令，地位在陈诚、汤恩伯等亲信之上，而把何应钦冷落在一边，可见其用心良苦。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第一、二、三军共11个师又1个旅，主要任务是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我军向南发展。陈济棠跟顾祝同不同，他本人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以往统率的军队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7岁时入广东陆军小学学习，1915年参加了讨袁（世凯）倒龙（济光）活动，后来到粤军任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31年，陈济棠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担任总司令，并接管了驻广东的海、空军，他手下的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

蒋介石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也是无可奈何。蒋介石主要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

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也没有对陈济棠抱多大的希望。朱德却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这个南路军总司令 269 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亲自给陈济棠写信，同周恩来一起主持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朱德总司令给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写信，是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在这封信中，朱德深刻分析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表明了红军抗日反蒋的态度。朱德在信中说：

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蒋光、蔡廷锴等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在爱国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抗日情绪的推动下，于 1933 年 10 月 26 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朱德以此为例，敦促陈济棠抗日反蒋。作者注），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中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元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亡，则非

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待。

朱德总司令还根据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屡战失利，日趋严重的形势，坦率地在信中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的提议。朱德说：

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责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

朱德在信中还希望双方顺畅通信联络，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

这封信是 1934 年 9 月发出的，当时红军准备长征了，总司令的脑海里还在思考反“围剿”的隆隆炮声和熊熊烈火，在思考信中所提到的“福建事变”。

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尽管在中央苏区周围集中了 50 万反动军队，但打破敌人“围剿”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其中一次是“福建事变”，另一次

是 1934 年夏天。

“福建事变”是以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与国民党南京政权决裂的一次重大事变。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生的。

1933 年 9 月 25 日，国民党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师从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序幕。战前，朱德和周恩来曾经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破坏敌人五次‘围剿’的一切准备与企图”。但中共临时中央却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正当中央苏区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时刻，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1928 年在德国越狱后逃往苏联，后来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但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用一知半解的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拿到中央苏区来当“尚方宝剑”。由于李德的特殊身份，开始时大家对他相当尊重，但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由于博古等人的支持，完全排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正确主张，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有时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伍修权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李德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以后，面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先是盲目蛮干，驱使红军同强大的敌人硬拼，要红军打所谓“正规战”、“阵地战”，继而又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使红军在反“围剿”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自 9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以朱德为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但不能御敌，自己却遭受重大损失，朱德很痛心。

正当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时，“福建事变”发生了。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福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蒋光鼐早在 9 月底就与苏区红军有联络。10 月 26 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是极其秘密的，蒋介石等人都不知道。

11 月 18 日，蒋光鼐、陈铭枢、蔡廷锴等人相继踏上了福建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的鼓山。鼓山延袤数十里，有 鼓山、白云、鼓子诸峰。山巅的巨石如鼓，所以称为鼓山。山中有福建著名的寺院涌泉寺。涌泉寺东侧有灵源洞、听水斋、白猿峡，岩石嵯峨，摩崖密集，被古人誉称为“石鼓都会”。涌泉寺西侧苍松翠柏，曲径通幽，有鼓山十八景、白云洞等名胜。山上另 鼓山峰俗称“绝顶峰”，可看到日出时的壮丽情景。蒋光鼐一行这一次上鼓山，并不是游览名胜古迹，而是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发动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11 月 20 日，在福建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案》、《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等 12 项决议，并

于当天晚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徐谦等 11 人为 273 委员，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关税自主”，“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在军事上，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下辖五个军。福建人民政府还决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大为惊恐，慌忙从“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 9 个师，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己担任“讨逆军”总司令。

这时候，红军如果能抓住机会，采取积极行动配合第十九路军，蒋介石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但是党的临时中央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是把中央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堡垒阵地。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被迫单独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当由蒋鼎文率领的国民党第三、第九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时，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刚刚打完大雄关战斗，正在国民党军队开进的侧面休整，敌人的行军纵队红军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人提出，这是打敌人的很好机会，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可是有关方面就是不让打，说什么打了这些敌人“等于帮助了小军阀”。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

正当福建人民政府处于十分危急时，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从前方回到瑞金，俩人商量后，周恩来通知红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大胆截击蒋军。为了执行好这项任务，方面军还特地给第三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但为时已晚，当第三军团到达延平附近时，蒋军主力已经通过延平，红军的行动已无法扭转整个福建局势。福建人民政府仅仅存在 53 天，遂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逃往香港，厦门、福州、泉州、漳州等城市都被蒋军占领。

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以后，立刻集中兵力再次向中央苏区进犯。中央红军就这样失去了一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机会。

朱德清楚地记得，红军能够打破敌人“围剿”的另一次机会出现在 1934 年夏天。

当国民党军队重新对中央苏区发起进攻时，由博古和李德掌握实际指挥权的中革军委不仅要求红军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道、大居民地和隘口等地构筑碉堡，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方针。这种做法的后果十分严重，红军连续作战 3 个月，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

4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 11 个师分两路向广昌进攻时，为了保卫广昌，博古和李德直接到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野战司令部的司令员，实际上是由李德指挥。在历时 18 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虽然杀伤了许多敌人，但自己也伤亡了 5500 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是多么沉痛的代价呀！

这以后，红军又相继进行了建宁保卫战、古龙冈以北地区反击作战，都没有阻止住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尤下等地以后，由顾祝同总司令直接指挥的 6 个师开始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指挥的 4 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的 4 个师进占头陂以后，又增调 5 个师向宁都和驿前、石城推进。

朱德看到，在各路敌人的全面进攻之下，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屡战屡败以后形势日趋严重，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极小。红军如果能毫不迟疑地改变战略方针，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打破敌人“围剿”也是有可能的。

党中央曾在小范围内讨论红军实施战略转移问题，但是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7月15日，朱德总司令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革军委派出以寻淮州为军团长的第七军团3个师6000多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离开瑞金，往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中革军委的企图是用这支部队调动“围剿”军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但是，由于这支部队兵力小，没有引起蒋介石和反动军队的严重关注。

在更加严重的形势下，中革军委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且要求红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在阵地上拼消耗。

中央红军又一次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机会。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严重失败。1934年10月10日晚，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率领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多人离开瑞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留下了约两万名伤病员和一些军事、政治方面的领导人。伤病员大多数分散在山区的医院里，医院转移时，伤病员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隐蔽起来，康复后又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当时身患肺病，健康极差，他同司法委员何叔衡等人原来是准备转移到上海去的，后来不幸被捕，被反动派杀害。陈毅当时的坐骨断了，体内还有许多碎骨，伤势很重，痛得整天躺在床上，红军医院又没有条件开刀，难以随军长征。周恩来知道后，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经装箱的医疗器材给陈毅做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去看望陈毅时，依依不舍他说：陈毅同志，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你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陈毅留下来后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红军开始长征以盾，国民党用20个师的兵力占领了苏区的重要城镇，反动军队无法剿灭红军这支革命武装，却杀害了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穷苦百姓。

朱德总司令行进在漫漫长征路上，时时回想起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陈毅等亲密无间的战友，想念无私地参加和支援他们进行反“围剿”斗争的苏区人民……

“南天王”陈济棠虽然独揽广东军政大权，却时时有被蒋介石吞并的危险，他被蒋介石任命力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和南路军总司令时，犹豫重重，迟疑不决。他既怕派兵到江西以后必然被红军纠缠，

难于摆脱；又怕蒋介石乘粤军到江西与红军作战之际，突然从湖南派部队袭取广东。因此，他对南路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一直显得不冷不热。“福建事变”发生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去电报请他在广东一致行动时，他也是担心失掉广东的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但是，当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派出代表同粤军进行秘密谈判时，他指派两名曾经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师长作为谈判代表。他头脑里时时在想：假如蒋介石收拾了红军，就要回头收拾他这个“南天王”了。

朱德和周恩来派遣潘汉年和何长工作为红军代表，到寻乌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密谈。何长工当年曾经上井冈山同王佐、袁文才进行谈判。朱德总司令给南路“围剿”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信也是在谈判中发出的。

陈济棠顾虑重重，对于朱德这封信，他下敢表示什么，但他对朱德信中所写“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等话，印象很深刻。经过谈判，红军和陈济棠的部队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双方还商定，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的部队就后撤 20 公里。

陈济棠答应朱德和周恩来上述条件时，大概没有想到红军要进行长征，蒋介石会把部署第二道封锁线的任务交给他。

蒋介石部署的第二道“钢铁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蒋介石的意图是要求陈济棠把粤军的精锐部队放在第一线，但由于朱德和周恩来事先同陈济棠达成协议，陈济棠又担心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就命令在江西的粤军立即撤回广东境内，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赶筑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和野战工事，名义上是准备抗日，实际上是积极防备蒋介石进攻。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突破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以后，8 万多红军携带大量笨重物资器材，沿着山路缓慢前进。道路上拥挤不堪，直到 11 月 8 日才到达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附近。

在这道封锁线上，朱德看到国民党军队修筑了许多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又挖了许多交通壕，组成了一条绵密的火网地带，但这道封锁线的前沿主要由地方保安队防守，正规部队配置在内线。“陈济棠执行同红军原定的秘密协议，没有堵截，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1980 年 9 月，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博士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陈树柏博士当时是美籍华人、电子学家。

朱德知道，红军最大的困难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钢铁封锁线”设在湘江，湘江这条全长 800 多公里的河流，是湖南省境内最大的河流。因为有条湘江，这个位于洞庭湖以南的省简称湘。

朱德和周恩来等人指挥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11 月 12 日，蒋介石重新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薛岳、周浑无两路部队共 16 个师 77 个团，“追剿”红军；命令陈济棠重新组织精锐

部队到粤、湘、桂边境截击，命令广西的白崇禧调遣 5 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带，堵截红军。蒋介石做梦也在想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早年曾归唐生智麾下。北伐战争结束后，他曾授意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以后又明靠佳系，暗通蒋介石。1930 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键更力紧密地追随蒋介石。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境内后，何键深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积极追剿红军，何键把“追剿”军分为五路。

第一路由刘建绪任司令员，率领第十六、六十二、六十三、十九师共 4 个师 27 个团，由湘赣边向全州以北的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红军；

第二路由薛岳任司令员，指挥第五十九、九十、九十二、九十三师共 4 个师和一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区集结待命；

第三路由周浑元任司令员，指挥第五、十二、九十六、九十九师共 4 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具方向追击红军；

第四路由李云杰任司令员，指挥第二十三、十五师共两个师，配合周浑元的部队，由桂阳向宁远方向追击红军；

第五路仅力李韞珩的第五十二师一个师，主要任务是协同粤军和桂军向江华方向追击红军。

除了何键指挥的 16 个师以外，红军的前进道路上还有两个天然障碍——两条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

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后，部队开始走山区小道，由于道路非常拥挤，行进速度明显减慢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越追越近，湘军和粤军也乘机从两侧夹击过来，情况十分危急。

11 月 18 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前进。当红军攻占临武，继续向江华方向前进时，朱德总司令看到了对红军突破封锁线十分有利的时机。这个难得的机会是由国民党军阀内部勾心斗角而造成的。广西军阀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进入广西境内，在 21 日突然命令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离原防线，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湖南军阀何键也担心主力红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马上调湘军主力去接防。这样一来，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钢铁封锁线就出现了一个缺口。

白崇禧的这一行动，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蒋介石得知白崇禧自己在“钢铁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时，大骂“小诸葛”“娘希匹”，又急忙命令刘建绪调兵去堵口子。

刘建绪的部队没有赶到预定地域前，从宜章到湘江的广大地区敌人防备薄弱，又没有多少堡垒，红军如果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就能抢先渡过湘江。但是，由于博古等人一味退却逃跑，行军纵队被诸多坛坛罐罐拖累，消极避战，丧失了有利战机，不得不在湘江岸边进行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红军分 4 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的命令。

11 月 27 日，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军团的部队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顺利渡过湘江。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第四师也渡过湘江。红四团完成了抢占界首的任务，以保障中央纵队从界首和凤凰嘴之间渡湘江。但是，当红五团渡过湘江后赶往另一个渡江保障要点全州时，刘建绪的部队已经从湖南压过来，先于红军两小时占领了全州。为了保障中央纵队渡江时的右翼安全，

林彪和聂荣臻指挥一军团的部队在距全州 16 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抢构工事，同优势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就向红二师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批敌人在红军指战员猛烈扫射的枪弹面前倒下去了，另一批敌人又踏着他们的尸体冲过来……

敌人的地面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受挫后，天空中出现了十多架飞机，一枚枚航空炸弹在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为了围歼红军，蒋介石又使出了空袭这种“杀手锏”。

阵地上，硝烟弥漫。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但敌人又接二连三地发起了冲锋，红一军团的几个前沿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朱德总司令最关心的是一军团和三军团坚守在渡河地段两翼要点上的阻击情况。他已经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发出了几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们坚决守住要点，保障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总司令心里着急呀，27 日，红军已经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 60 里的湘江两岸，在这个地段内有四处浅滩甚至可以涉渡。当时中央纵队离湘江最近点只有 160 多里路，如果全军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但是，行军纵队中带着许多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每天行军只能前进四五十里，按照这个速度，足足要 4 天才能到达湘江边上。总司令知道，这个时候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阻击阵地上的红军战士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呀！

30 日晚上，朱德坐在油灯下，刚刚摊开那张已经破了两道口子的作战地图，作战参谋就递过来一份电报。电报是湘江前线阻击阵地上的林彪军团长和聂荣臻政委打来的。电文中说：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成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总司令的目光在“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这一行字上来回扫了几遍，心情十分沉重。

总司令走出指挥所，似乎想看看红军行军的情况。夜色昏沉黑暗，月亮和星星都叫乌云遮得一点儿也不漏，一阵冷风吹来，朱德顿时感到脑门上凉凉的。朱德立刻回转身，给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朱德除了要求中央纵队加快行军速度以外，还命令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这时已经是 12 月 1 日 1 时多了。

紧急作战命令下达以后，朱德又坐在小油灯下，一边看电报一边迅速地处理电报。48 岁的朱德总司令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此刻也看不到他有丝毫倦意。小油灯下，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闪耀着灼热的光。

周恩来穿着一身灰色军装，披着一件旧黄布雨衣，走进指挥所。周恩来看了几份电报，同朱德等人研究以后，又于 3 时半用中央局、军委、总政的名义给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下达了一份指令。这份指令的口气颇为严厉，其

中说：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上，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

12月1日是阻击战最激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就开始向红军的阻击阵地狂轰滥炸。为了保证中央纵队能够顺利地渡过湘江封锁线，阻击阵地上的红军战士高呼“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中午时分，主力红军除了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其余部队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过了湘江以后，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000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是多么沉重的代价呀！

聂荣臻在撤离战场后又临时派部队再渡回湘江东岸，接应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第三十四师和第十八团，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很快控制了湘江渡口，被阻于湘江东岸的红军几经英勇战斗，杀伤了大量敌人，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小部分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多么惨重的损失。

红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朱德的心情还是那么沉重。他在深思这一阶段的教训。

朱德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部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

15 国民党第十次传出红军总司令的死讯： 朱德在猪头山被击毙。朱德看到那张 报纸，想起了长征途中的历历风险

红军渡过赤水河以后，朱德总司令的心情特别好。为了扩大红军的影响，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朱德曾经要求当地群众开祝捷大会，多张贴红军胜利的捷报。这会儿，他正乐滋滋地回忆着祝捷大会的动人场面……忽然，通信员拿着一份报纸走过来，笑盈盈地说：首长，这是老乡送来的报纸，你看看，多么可笑呀！

朱德接过报纸，见报上发了一条路透社关于红军的报道。其中说：据悉，朱德在遵义地区猪头山一役中已被击毙。朱德当时率领部队企图攻占贵阳……尸体尚未入棺……现用红绸裹由其亲信抬运……朱德由于重伤，不治而死……其红军亲信在逃命之暇，不断在红绸裹缠的尸体前用三牲祭祀……现经证实红军残余已不足一万人。

朱德看了，轻蔑地一笑，说：我一生之中很少生病，可是国民党经常传说我死了，这已经是第十次了。

朱德又想起了什么，慈祥地看了看通信员和周围几个人，说：蒋介石就好搞这种权术，他还悬赏 25 万元，要我的头，要毛泽东的头和其他人的头。蒋介石甚至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订价，还派飞机散发到我们阵地上。这倒好，阵地上的人要是看到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或者开列的赏额太少，还对蒋介石不满意呢！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条消息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朱德总司令和红军当时所处的险恶环境。

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的行动意图，并且在红军的前进道路上重新部署了重兵，准备在湘鄂四地区围歼红军主力。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无异于钻进敌人预先张开的口袋，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曾经提出，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朱德等人仍然坚持红军向湘鄂西前进。

1934 年 12 月 5 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西进。道路很窄，路两旁或是巨石嶙峋，或是深不见底的山涧。每当遇到一个狭隘的关口，这支队伍就要经受一次最艰辛的考验。遇到暴风雨，路面又滑又险，一夜只能走几里路，有时候红军战士浑身湿透了，还不得不在野外露营。

一天夜晚，部队都宿营了。朱德处理完几份电报，也打开军毯，准备在山径上蜷卧一阵。他太累了，身子刚刚躺到毯子上就睡着了，不知睡到什么时候，他又被冻醒了，他把毯子裹得严严实实，使劲蜷成一个小圆球。可他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睁开眼，望着天上的星星，星星好像缀在黑幕上的宝石。他侧过身，望着黑沉沉的山峰，山峰像一个个虎视眈眈的巨人。他仿佛看见了何键把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一层接一层地部署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他想起了贵州军阀王家烈把部队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要阻止红军西进贵州……想到这里，他忽地坐了起来，把军毯一卷，向宿营地走去。

山谷里，数名被冻醒了的战士围坐在一起，低声谈话，他们身后躺着不少跌断了腿的马匹。医疗队的女同志还在星夜里护理和安慰伤病员，一点也没有厌烦和疲倦的样子……朱德转了两处营地，心里在想：红军连续行军作战两个月，极度疲劳，战斗力大力削弱。如果仍北出湘西，就必然要同五六

倍于己的敌人作战，那可是太危险了！

在这种万分危急的形势下，党中央在 33 天里连续召开 4 次重要会议，朱德总司令为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是 12 月 12 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再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前进了。博古虽然对红军的损失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甚至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头上瞎比划，但又一筹莫展，仍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于第二天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次日，博古等人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主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第二次是 12 月 18 日，党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议争论得很激烈。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鉴于目前的情况，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不可能实现。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第二天，朱德同周恩来一起为执行这个决议作出了红军行动的具体部署，从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第三次是 1935 年 1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猴场会议同通道、黎平会议一起，为召开遵义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第四次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的川黔铁路线上，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遵义的东面，有一条长江在贵州省内的最大支流——乌江。乌江中游穿行在大娄山、武陵山之间，深切石灰岩层 100—200 米，谷深水急，险滩相连。1 月 2 日至 6 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等地段顺利渡过乌江。7 日凌晨，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红二师智取遵义。两天后，朱德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遵义市老城子尹路。这里原来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官邸，这座砖木结构的曲尺形洋房，一楼一底，面向街道，楼上四周有走廊相通，楼下正门矗立着一个高大的牌坊，楼房占地总面积约 520 平方米。遵义会议就是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这座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召开的。

召开遵义会议是由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提出来的，朱德总司令很支持党中央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洛甫、周恩来也支持召开这次会议。

1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和红军总部、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等人，相继来到红军总司令部，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为“左”倾错误进行辩护。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

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方向。

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发言，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王稼祥、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主张。

会议经过3天激烈讨论，主要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长征开始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上述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以后，朱德总司令开始考虑指挥中央红军渡赤水河，过金沙江。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记述朱德的这一伟大功绩时说：“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迫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红军占领遵义不久，蒋介石又挖空心思地调集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的国民党军队，一步一步地向遵义地区进逼。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8个师已经进入贵州，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要地；黔军的3个师也先后向刀靶水、滥板凳和湄潭进攻；川军的40多个团已分路向川南集中。面对敌情的迅速变化，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到四川西北部同红四方面军一起进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当时选定了重庆上游宜宾至泸州一线北渡长江。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4日占领土城。这以后的两个多月里，朱德和毛泽东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不时地调动和迷惑敌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导演出了四渡赤水这一战争艺术的杰作。

赤水河是长江支流，流经川黔两省边界西段，亦多险滩。1月29日3时，朱德总司令向全军下达命令：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朱德还明确规定：一军团，九军团，军委二、三梯队等部队统归林彪指挥，为右纵队，由猿猴渡河，向古蔺以南前进；五军团、三军团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向太平渡前进。

红军一渡赤水以后，川、黔、滇的军阀急忙调集重兵进行追击和堵截，同时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布防。根据敌情变化，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研究后，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并于2月6日1时向林彪、彭德怀指挥的一、三军团下达命令，命令他们前进地点应向扎西（今威信）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上及扎西西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

2月15日20时，朱德总司令为二渡赤水河下达命令：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上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王家烈是贵州桐梓人，1914年到贵州省防军当兵以后，经过十多年奋斗，两年前升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掌握了贵州的党政军大权。但是，他手下的兵战斗力不强，当地人称他们是“双枪兵”，士兵都有步枪和鸦片烟枪。2月18日至21日，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把迫近扎西的各路敌军甩开，重占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了王家烈部的8个团，随后又在遵义以南的老鸦山歼灭了赶来增援的国民党重庆行营参谋团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部两个师，俘虏敌人3000多人，缴获枪支2000多枝，“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出了朱德和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

3月4日，中央军委在鸭溪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3月16日18时，朱德总司令再次下达命令：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红军遵照这个命令，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以后，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顺利攻占镇龙山，击溃了拦阻红军的川敌1个团，再次进入川南地区。

这时候，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命令其所有部队再次向川南进击，企图把红军围歼于古蔺地区。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判明蒋介石的企图后，朱德于3月20日17时为红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下达命令，指出：“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又以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西面，主力则由镇龙山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在敌人重兵集团的右翼分路向南急进。3月28日，朱德总司令又作出了南渡乌江的部署。3天后，红军主力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地段南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甩在乌江以北。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以便调滇军出滇来援。

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敌九十九师的4个团。蒋介石万万想不到朱德和毛泽东等人指挥的红军能在国民党军队的千军万马之间长驱直入，威逼贵阳。那几天，蒋介石坐立不安，诚惶诚恐，生怕当了毛泽东的俘虏。在焦虑之中，蒋介石一面命令守城部队无论如何要死守飞机场，以便从空中逃命；一面急令国民党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暗中还让亲信准备好了轿子、马匹，找好了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4月8日，朱德和毛泽东又指挥红军主力突然急转向南，再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一下子跳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圈。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进入云南以后，引起了蒋介石和重庆行营参谋团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的极度恐慌。蒋介石虽然为红军没有攻打贵阳而大难不死，却为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而伤心。战场上的蒋介石有个特点，屡败屡战。当他得知朱德指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气急败坏地命令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五十三师向西，在红军的右侧沿黔滇公路向云南追击；命令第三纵队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紧迫不放。蒋介石哪里知道，这些部队在红军四渡赤水时往返奔波，已经疲惫不堪，减员很多，战斗力大大削弱。

龙云是云南昭通人，彝族，比朱德晚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2年，龙云任滇军第五军军长，4年后又相继担任昆明镇守使、云南讲武学堂堂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并于1929年统一云南。龙云虽然同蒋介石的矛盾很深，但他得知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前锋直逼云南省会昆明时，这个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急忙调集在滇北等地的部队回援昆明，一再催促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和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迅速行动。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又决定让罗炳辉、蔡树藩指挥的红九军团从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要求他们声势大、行动快；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挺进，迅速攻占了马龙、寻甸、嵩明等地方，眼看就要进入昆明城了。

朱德的声东击西战术使龙云大为震惊，慌乱之中，他一面调集各县的民团来防守昆明，一面又再三催促在曲靖的第三纵队孙渡的4个旅取捷径直接开往昆明。这么一来，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力量明显削弱了，这正是朱德和毛泽东所企望的。朱德看到，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云南省六大水系之一，其中石鼓以下的虎跳峡江面最狭处只有30米宽，峡区长16公里，落差约200米，与两岸相对高差达3000多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4月29日，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给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指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红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同时号召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斗志坚决完成这一任务。

5月2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巧渡金沙江的命令，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军团为左纵队，从龙街方向渡江；命令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的三军团为右纵队，从洪问渡方向渡江；命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往司令员的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朱德还特别命令刘伯承率领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

命令下达后，中央红军像离弦之箭，向金沙江边急进。然而这三路纵队却在金沙江边遇到了三种不同情况，使朱德总司令不得不改变原定决心。

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中央纵队最顺利。

林彪、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不顺利。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三军团也不顺利。

刘伯承接受朱德下达的命令以后，立即来到干部团，同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后，决定挑选第三营去抢占皎平渡。

因为团长陈赓有伤，刘伯承还要求宋任穷随第三营行动。宋任穷在对先遣营进行动员时，响亮地提出：渡过金沙江，抢占渡口；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

皎平渡是金沙江在云南禄劝县与四川会理县交界处的一处渡口。这个渡口江水滔滔，惊涛拍岸，两岸山峰挺拔，景色虽然壮观，渡河却不容易。5月3日晚，朱德总司令收到刘伯承从皎平渡拍来的电报，电文是：“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

刘伯承提前抢占渡口，朱德总司令喜出望外，但他还在等待林彪和彭德怀的消息。

皎平渡的6条船来之不易，那是刘伯承智斗伪职，先机制敌的一个硕果。原来，刘伯承为了完成抢占皎平渡这项艰巨而紧急的任务，就让先遣营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这样一路上可以走得快一些。

先遣营经过小仓、龙海塘、石板河、脚纳等地，来到离金沙江30多里的杉落树时，国民党区政府的一个胖区长带着几个乡丁满脸笑容地迎了出来。刘伯承和宋任穷带着警卫员，大步走进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我们烧船封江。不知长官到此有何公干？

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让我看看。

胖区长急忙站起来，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给刘伯承。刘伯承把那东西往桌上一放，神情严肃地问：那么你们这里的船烧了没有？

一问到船，胖区长的脸色煞地白了。他慌慌张张地解释说：长官，千万别见怪，我们也是刚刚接到公文，船还没有来得及烧。

刘伯承听了，心中一乐，不容置疑地说：那好吧，这件事就由我们来办。刘伯承故意看了看那份公文，又问：皎平渡水浑吗？

当问到渡口时，胖区长如释重负，把皎平渡的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国军部队等情况，说得详详细细，滴水不漏。这时候，刘伯承把脸一沉，说：老实告诉你，我们都是红军。现在你立刻带我们去找船。如果找不到船，唯你是问。胖区长一听面前坐着的正是要过江的红军，豆大的汗珠立刻从额头上滚了下来。

宋任穷叫来一个侦察组，让胖区长带路找船。来到金沙江边，船夫看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走过来，以为区长有要事过江，打招呼说：回来啦？一个侦察员机智地回答：回来啦！

控制了两条船以后，前卫连连长迅速率领部队过江。接着，刘伯承和宋任穷也随部队过了江，控制了皎平渡。在船民张朝寿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条船。有了6条船，刘伯承才给朱德总司令发报。

在另一方面，林彪和聂荣臻率领部队占领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及时赶到了尤街渡口。谁知在龙街渡口找不到一条渡船。林彪站在水急流深的滔滔金沙江边，想不出安全渡江的办法。他曾经命令前卫团在尤街渡口架一座桥，但是由于江面大宽，水流大急，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桥架了一半就被河水冲垮了。

彭德怀率领的第三军团到达洪门渡以后，先头第十三团渡过了江，但浮桥很快被激流冲垮了，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

朱德了解到上述情况以后，决定改变原定计划，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全部改由皎平渡渡江。

朱德总司令给彭德怀军团长打电报。电报要求第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7、8两日为第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朱德总司令又给林彪下达命令：军委纵队在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七

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担任掩护，定于八号下午渡江，敌人八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这份电报，林彪几乎是译电员译一行他看一行，越看越感到军情紧急。电报还没有译完，林彪就命令说：部队赶紧向皎平渡前进。

聂荣臻政委看了看地图，说：穿过白马口的山谷，要近得多。

白马口的山谷里有一等溪流，溪流上到处都是圆乎乎、滑溜溜的大石头。林彪和聂荣臻同战士们一起踩着这些石头往皎平渡赶。天大黑了，战士们不小心踩到结满青苔的石头上，跌倒在溪流里，引出一阵阵笑声。这一夜，一军团的指战员们穿过了48道急流，赶了120多里路，终于按时赶到了皎平渡。

在渡口岸边的一个崖洞里，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经等候多时了，部队渡江时，朱德和毛泽东等人一直在这个崖洞里了望渡江部队，看见聂荣臻和林彪，连忙迎过来。毛泽东说：你们过江了，我就放心了。

5月9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这时候，尾追红军的敌人全部被甩到金沙江以南，会理地区只有川康边防军一个旅。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研究后决定，由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其余部队在会理进行短期休整。

中央红军力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5月15日放弃了对会理之敌的围攻，沿会理至西昌的大道继续北上。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商量以后，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一方面进行战略侦察，一方面为红军北上开路。先遣队司令员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政委是聂荣臻。

5月20日上午，朱德总司令收到刘伯承和聂荣臻到达泸沽的电报。泸沽是西昌北面的一个城镇。当时，红军的前进道路上又出现了一条天险——大渡河。从泸沽到大渡河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登相营、越西到大材堡，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条道路不仅崎岖难行，还要通过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军阀的欺压，对汉人的成见很深。

朱德总司令经过反复考虑，当天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是给全军下达的训令，训令强调，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西岸的情况下，红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另一份电报是发给刘伯承和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总司令的这份电报，为红军先遣队的刘伯承和聂荣臻选择正确的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下达的任务，各军团以迅速、勇猛、果断的行动继续北进，相继攻占了泸沽、越（今越西）、冕宁等地，进入了彝民聚居区。

这个地方的彝族当时还处于奴隶制社会。彝族分为“黑骨头”，“白骨头”。“黑骨头”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骨头”是彝汉混血儿。彝族内部有矛盾，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采用民族压迫的政策，彝民对汉族人的疑忌很深。国民党军队常常采用关押和杀害彝族首领的办法来统治彝民，使彝民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他们对红军的性

质，红军执行的政策全不了解。为了团结和解放彝族人民，宣传红军的政策，提高红军的威望，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持，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朱德经过反复考虑，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说：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支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

这份布告发出后，受到当地群众特别是彝族兄弟的拥护，他们逐渐消除了对红军的疑忌。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刘伯承还同聂荣臻一起帮助沽鸡家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耐心说服由于受敌人利用而同红军对立的罗洪家族。这些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红军不仅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还动员了一些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红军通过彝族区以后，迅速向大渡河急进。

大渡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是岷江的支流，在乐山汇入岷江时，已在雪山峡谷之中奔流了 1070 公里。这是红军前进道路上必须跨越的一道天险。5 月 24 日夜晩，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的先遣队前进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激战半小时，歼灭了守卫安顺场的两个连敌人，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

朱德得知先遣队到达安顺场右岸时，心里并不轻松。他太了解大渡河了。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都是崇山峻岭。安顺场这个渡口，河宽 300 多米，水深 30 米，流速达每秒钟 4 米。河底的嵯峨乱石使河面出现无数旋涡，这种旋涡非常厉害，能把鹅毛沉到底，泅渡就更不可能了。由于水深流急，难以架桥。渡船过河时，也要先拉到上游 2 里的地方去放船，由老艄公掌舵，十多名船工篙橹齐用，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斜斜地冲到对岸的石级上，如果下小心碰到两侧石壁，就会船毁人亡。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起义军来到大渡河边，因北渡不成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命令薛岳的部队北渡金沙江，尾追红军，命令第二十四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地段沿大渡河筑堡，堵截红军。

朱德同毛泽东等人一起，是 25 日到达安顺场的。当时，红军第一团第二连的 17 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用从敌人那里夺过来的一条小船强渡

《朱德选集》第 29 页。

《朱德传》第 344 页有“彝族沽基部落”。《刘伯承传》第 121 页有“沽基家”、“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第 264 页有“彝族沽鸡家族”、“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

成功，击溃了防守北岸的川敌第五旅第七团的1个营，巩固了渡河地点，在大渡河这条天险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红军在渡河两岸只控制了4只小船，仅凭这4只船是难以把红军送到大渡河对岸的。朱德得到情报，薛岳的部队已经追过德昌，情况十分危急。

站在安顺场渡口，总司令望着大渡河的激流骇浪，思绪万少年时期，朱德就知道四川有一条大渡河、石达开要过大渡河的故事了，那是双手深褐、满面皱纹的老织匠讲给他听的。每年冬天，当老织匠来到朱德家里织布时，朱德总是默默地站在织布机旁，一次又一次地听老织匠讲故事。

老织匠称自己也是太平军，当年曾经跟随石达开到大渡河边。朱德相信了，因为他讲的故事太动人了。

老织匠说：石达开带着他们到贵州桐梓，当地老百姓都出来欢迎，尊称石达开为翼王。石王爷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谁耕哪块地就分哪地，那些地不再是老虎地主的了。他们的队伍要离开时，老百姓不让走，揪住石达开的马鞍哭起来。石达开留下一百名兄弟，训练村里的小伙子打仗。他们离开桐梓时，老百姓哭着送了很远很远的路。

老织匠还说：他们跟随石达开来到大渡河边时，敌人已经在大渡河边布防了，敌人有洋鬼子给的步枪和大炮，太平军无法过河，因为太平军只有弓箭。敌人在大渡河的北岸竖起了一面写着“投降保命”的招降旗。

石达开看了看那几个字，对大家说：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我们打！数千人上了筏子，前面装好皮盾牌，手里拿着长矛，一个个高声呼喊，直冲对岸。突然，对岸的大炮响了，筏子被打烂了，大渡河上漂满了尸体。石王爷心里难过极了，他独自走到一个山坡上，看见一个穷苦的农民正在锄地，就走过去说：老乡，我是石达开，鞑子悬赏一大笔钱，要我的头。你拿我的主剑把我的头砍下来，你就不会再穷了。

老织匠又说，石达开曾经收养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子，叫四姑娘。四姑娘一家人都被鞑子杀了，她一向当作男孩子养大，满腹经纶，她在军营中替石达开抄发公文信件。后来她嫁给了太平军中一个酷似石达开的官长。太平军渡河失败后，四姑娘要求石达开逃命，让她的丈夫——那个很像石达开的人去投降。石王爷落发烧戒，穿上黄色僧袍，装做和尚走了。

后来还有许多人见过石达开。但老织匠没有找到石达开，只好重新干起织布的行当。

当年，朱德还颤声地问：织布爷爷，那真是石达开，还是石达开的魂呢？后来，朱德专门研究了太平天国史，弄清了石达开被害的真实情况。但是，老织匠讲的故事还久久在他心中回荡。这些故事使他想到：农民不愿意承认石达开被杀害，承认了就等于放弃了希望。

整整72年后，朱德率领红军来到石达开渡河不成导致失败的大渡河边，难道仅靠4只小船来渡过大渡河吗？

朱德和周恩来彻夜不眠，在一起研究渡河方案。最后决定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的左岸北上；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前进，迅速抢占距离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

泸定桥就是我国著名的大渡河铁索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城西的群山环抱之中，横跨大渡河天险之上，桥东同泸定城相连，是川康要道上的一个“咽喉”。泸定桥是铁索悬桥，桥净跨长100米，净宽2.8米，由13根铁链组成。桥身9根铁链平行系于两岸，上面铺着木板，就是桥面；桥栏左右有两根铁

链作为扶手，每根铁链重约 2.5 吨。史载泸定桥是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 1705 年）开始，前后用 5 年时间建成的，桥头挂着康熙御书“泸定桥”三字的匾额，立有康熙《御制泸定桥碑》。270 多年来，泸定桥成为四川内地通往康藏高原的一个重要关口。当时东桥头的守敌是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的两个营，为了阻止红军过大渡河，他们已把铁索上的木板拆除，只剩 13 根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

部署好安顺场的渡河工作以后，朱德和周恩来率领军委纵队连夜向泸定桥前进。

这一夜，下起了瓢泼大雨。因为薛岳的部队追得很紧，红军不得不冒雨急行军。这雨是无情的，简直让人害怕，雨不是在倾注，而是在汹涌奔流，它好像天上的洪水，以疯狂、持久不竭的固执哗哗地冲刷下来；它好象自己有什么不平和愤慨，让人觉得它要再不停止，就要失声尖叫起来。朱德总司令脚下只是一条小路，许多地方还是凿在峭壁上的，弯弯曲曲，非常难走，连日长途跋涉，朱德的眼窝已经深深地陷下去了，雨点打在脸上，雨水顺着瘦削的脸面往下流，但从他那两只神采奕奕的眼睛中，看不出日夜行军的疲劳。

一路上，朱德很少骑马，路面稍宽的地方，他就和周恩来、彭雪枫等人一边走一边谈天，显得很有信心。

接近泸定桥时，乌云消散了，天晴了。山坡上的松柏经过一夜雨水的冲洗，显得一片葱绿，空气异常清新，太阳火辣辣的，似乎要把红军战士身上的水气烤出来。翻过一座大山，忽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前面厮杀。朱德定了定神，心里说：这就是泸定桥了。

5 月 29 日下午，红军第四团第二连的 22 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冒着对岸敌人射出的密集的枪弹，冲到对岸，胜利占领了东桥头，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朱德总司令赶到泸定桥头时，先头部队已经在铁索上铺上了门板和桥板，三军团的战士们已经开始过桥。

河太宽了，尽管铺上了木板，人一上桥，碗口一般粗的铁索依旧摇摇晃晃的。刚下过雨，战士们的脚上带了不少泥巴，部队往桥上走过，板与板之间就滑出一条缝，一不小心走失了脚，就会落进奔腾咆哮的大渡河里。过铁索桥时，战士们提心吊胆的，谁也不敢往桥下看。

朱德总司令来到桥头，一边观察一边问在桥头负责指挥的一位参谋：有什么困难？

这位参谋皱起眉头，望着滔滔大渡河水说：有些马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太慢。有一匹马在铁索桥上掉下去了。

朱德马上追问：怎么掉下去的？人伤了没有？

开始只掉下一只腿，它急得乱蹬，蹬翻了别的木板，就落到河里了。没有伤着人。

朱德思考了片刻，说：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好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人员过桥。每隔 10 分钟要派人检查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前面的人走后，后面的人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那个部队过桥后，要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不一会儿，朱德也往桥上走去。走着走着，总司令忽然看到有两块桥板已经脱开，中间露出一条大缝。他马上弯下腰，把两块板合并起来，警卫员

一见，连忙抢先去挪板子。朱德一边移板子一边说：在这桥上工作，更要沉着，不要看河水，要多注意桥板。

数分钟以后，朱德到达泸定桥东岸。东岸原来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镇，镇上的房子已经被敌人烧毁，残留着一堆堆黑灰和烧焦的木头。朱德站在桥头，默默地观察部队过河。警卫员为他找了一间休息的房子，他进去只坐了一小会儿，就回到桥头来了。

不一会儿，毛泽东、博古、邓发、王稼祥等人从铁索桥上走过来，刚下桥，朱德就迎了上去，微笑着同他们握手。毛泽东对泸定桥印象极深，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著名诗句。

16 张国焘公开迫害朱德，朱德大义凛然。
毛泽东动了感情，称赞总司令“临大节
而不辱”

朱德在回忆长征时说：

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那么慌张了。当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斗平常就过去。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理得很恰当。

这是朱德元帅高贵品德的写照。其实，漫漫长征路上朱德几度险遭莫测，只是由于他的大智大勇，才“履险如夷”。

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就是其中一例。

中央红军离开瑞金以来，朱德总是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紧密合作，领导红军战胜了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1935年8月初，当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时，朱德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开了，开始同张国焘共事。

张国焘耍阴谋，公开迫害朱德。

一间正方形的房子里，总司令受到围攻，被变相撤职；

马棚里有十多匹马，唯独朱总司令的马被偷走了……

毛泽东深受感动，他对陈毅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

这是发生在过雪山以后的事情。

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千年大雪山，就是四川中部那座晶莹耀眼的夹金山。夹金山山势巍峨，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山举步艰难，一旦在山上坐下休息，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朱德和毛泽东等人率领红军突破泸定桥以后，很快占领了天全。这时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由程世才和李先念指挥的第三十军等部队正向懋功急进，接应中央红军。中革军委为了迅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指挥红军于6月上旬突破了敌人的芦山、宝兴防线，歼灭了一部分敌人，来到夹金山下，开始征服这座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大雪山。

朱德总司令了解了夹金山的情况以后，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尽量穿暖，连队要携带10天的粮食和柴禾。朱德还特别强调，大雪山“路窄而且险峻，部队部署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几乎不能进行战斗”；部队行军每天不得超过六七小时，要准备制作担架，在某些地区还要进行白色伪装。

过雪山之前，朱德总司令还到各个部队进行检查，查看战士们的装备，掂掂他们的背包，询问战士们的健康情况。他鼓励红军战士作出最大努力征服雪山，要求医疗队和收容队要照顾好翻越雪山时身体不支的人。

一切部署完毕，朱德总司令和大家一起踏上了千年雪山。

那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一名老红军回忆说：夹金山终年积雪。山谷间悬有巨大冰柱，到处白雪皑皑，一片寂静。我们身上的东西实在太多，每个人都带10天的粮食和柴禾。我们把粮食装在干粮袋里，斜背在肩头。朱德总司令跟大家一样，也背着一份。他有一匹马，可他给伤病员骑了。

另一名老红军更形象更生动地回忆起来朱德总司令过雪山时的情景。他说：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雪山上简直没有路，可是附近的农民说，经常有人从山丛中下来抢劫。他们既然能翻山，我们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了。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惊害怕的冰雹。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冷得人连呼气都冻了，手和嘴唇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人，就在原地冻僵。筋疲力尽的政治工作人员用手势和拍打鼓动大家继续前进。到了暮色苍茫时，我们翻过了第一个山头，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时，大家都筋疲力竭地躺下来休息了，朱德总司令像往常一样四处巡查。朱德一路上同部队一起跋涉，疲劳不堪，但是他的例行巡查却是无论如何也中断不了的。他来到我们面前时，还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牛肉干给我。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已经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还有几大就可以到懋功了。天还没有亮，朱德总司令就和我们一起爬第二个山头。到半山腰，突然下起了雨，雨又变成大雪，冷风像刀子一样吹打着我们的身体，有些人想坐下歇歇腿、喘喘气，就从此站不起来了。沿路我们不停地弯下腰去，想拉他们站起来，可他们已经咽了气。过这座山头，有很多人在严寒和力竭中死去。

年近 50 的朱德总司令同红军指战员一起，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战胜了冰雪严寒的恶劣环境，翻越了海拔 4000 多米的大雪山。

如今，巍巍雪山上竖立起了一座金色的纪念碑，以纪念红军当年翻越雪山的壮举。这座纪念碑高耸入云，在阳光的照耀下，金色的光芒可以照射到几十里之外，成为雪山上的一大奇观。

中央红军翻过雪山时，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已经攻占夹金山西北面的懋功，并且前出到懋功东南的达维。为了及时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稍经休整后，朱德总司令又发布了继续北上的命令。出发前，朱德还特别强调，红军面临的环境虽然很艰难，我们的军政教育工作仍然必须坚持，不能间断。行进中要遵守以下六项纪律：（一）服从命令；（二）动作敏捷；（三）严守时间；（四）爱护武器；（五）注意卫生；（六）对兄弟部队和部落人民要和气、尊重。在这份命令中，朱德鲜明地提出了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红军同少数民族之间加强团结的要求。

6月16日，朱德总司令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一起打电报给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提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电报中说，“为着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电报还明确提出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张国焘看了这份电报后不以为然。第二天，他同陈昌浩一起给朱德等人复电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张国焘主张红军应北攻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看到这份电报，朱德已经觉察到张国焘同党中央的矛盾，但不知道张国焘会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企图危害党中央。他自己也受

到张国焘的公开迫害。

6月18日，朱德、周恩来等人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来到川西的一个山区小镇懋功，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会师。那一天，红军战士们高兴极了。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企图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为发展革命战争开创了新的局面。朱德和周恩来一起亲切地接见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负责同志时，高兴地对一名参谋说：告诉管理排长，会个餐吧！

当天晚，朱德和大家一起在离懋功不远的一间小瓦房里会餐，欢庆两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

不久，中央红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加强中央红军。两大红军主力互相参观慰问，表现出了人民军队之间兄弟般的团结和友谊。

朱德和张国焘之间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时，红军虽然处在地域辽阔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围的川西北地区，这一地区山高谷穷，人口稀少，还有复杂的民族问题，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和建立根据地。为了统一红军发展的战略思想，党中央决定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

6月25日，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刘伯承等人从驻地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也从茂县赶到两河口，路上保护他的有一个警卫排。那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天空中金蛇流走，四周雾气腾腾。在大雨中红军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会。朱德先讲话，他代表红一方面军，张国焘也讲了话，他代表红四方面军。

欢迎会后，张国焘询问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

周恩来坦率地说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

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红四方面军当时有八万多人，兵力比朱德、周恩来等人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多得多。

6月26日上午9时，朱德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一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一共进行了3天，张国焘也表示同意党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因此政治局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增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还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消灭松潘地区的敌人，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

张国焘并不满足，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不放在眼里。为了把红军的指挥权抓到手，张国焘首先瞄准了朱德的职位。7月6日，当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时，张国焘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要求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

然就“无法顺利灭敌”。

7月16日和18日，陈昌浩连续两次给中革军委打电报，“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煮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当时，红一军团及红三十军一部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已经向毛儿盖地区前进，张国焘却迟迟不下达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命令。可见，张国焘的上述行动带有要挟性质。

朱德回忆说：“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也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

党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等人的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在同毛泽东商议后，把他担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7月18日，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朱德仍然为红军总司令。3天后，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候，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但是，敌情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四方面军推迟行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从从容容地在松潘地区集结，薛岳的部队也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与胡宗南相呼应，四川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蒋介石又企图把红军围歼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红军腹背受敌，已经失去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在这种危险的形势下，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把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经阿坝北进，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右两路军进军甘肃南部后，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江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时候，一方面军司令员与政委由周恩来兼任。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纵队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朱德总司令同张国焘的斗争也日益激烈。

斗争之一：左路军北上还是南下？

从卓克基到阿坝，要经过茫茫草原。朱德总司令对川西北的大草地有所了解。这些草地表面看起来都是无边无际的野草，野草下却是黑水弥漫；茫无边际的草地上没有村落，没有人烟，很难找到可供人吃的东西；气候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69页。

《朱德传》第352、353页。

无常，晴空万里的天气瞬息之间就会变得细雨霏霏，忽而浓雾弥漫，忽而风雨冰雹。朱德和左路军的将士们踏上草地以后，总是鼓励大家要藐视困难，征服草地。

遇到难行地段时，朱德就要饲养员把自己的马停在路边，让部队先过。他站在一边叮咛战士们：当心一点，这里的地表面是由腐草结成的，人和骡马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

到了宿营地，总司令不顾奔走一天的疲劳，总是仔仔细细地检查部队的帐篷搭得牢不牢，警戒放得合适不合适，战士们有没有水洗脚。在草地上找不到吃的东西，就吃死马肉，有时候后续部队只得啃马骨头，连骨头也找不到时，不得不吃草根、吃树皮，甚至吃皮带，一些红军战士在草地上饿死了，病死了，错食毒草毒死了，有的陷入沼泽以后再也没有站起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朱德一次又一次地对大家说：红军部队是革命的大家庭，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同志都是将来的干部，大家要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多走出一个人，就为革命多增添一分力量。

8月20日，朱德总司令同左路军将士一起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通过了茫茫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几天后，左路军来到黄河上游的噶曲河。噶曲河到班佑只有三、五天的路程，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左路军已经到达班佑、巴西地区，正在等候左路军。

这时候，张国焘却借口噶曲河涨水难以通过，命令已经到噶曲河边的部队返回阿坝，并于9月3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同红军北上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公开要“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张国焘还命令已经到达墨洼附近的第五军返回阿坝。

朱德总司令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他注意到，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右路军前进到班佑、巴西地区以后，蒋介石急忙命令胡宗南的部队绕道文县，到西固去堵截红军；东北军主力正在“围剿”陕甘红军，国民党军队在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县地区兵力不多，碉堡封锁线还没有筑成，这是红军北上陕甘的有利时机，左路军应该毫不犹豫地按照原定计划北上。他去找张国焘，张国焘说：河水上涨，部队过不去呀！

朱德总司令要警卫班的人骑上马，来到噶曲河边。前天下了一阵小雨，噶曲河水稍有上涨。为了了解河水的深浅，朱德对警卫员说：你骑上马，下河走走看。

警卫员骑马过了河，又折返回来，河水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

朱德又去找张国焘，说：噶曲河的水并不深，部队完全能过河。

张国焘“嗯”了一声，还是按兵不动。

朱德一再提出左路军要按计划北上，谁知张国焘却于9月8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联名打电报给张国焘，严肃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

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

朱德和刘伯承看了这些电报后，再次催促张国焘北上，张国焘不但置之

不理，反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和分割中央。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看完叶剑英送来的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电报，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这个紧急情况。11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这时候，张国焘仍然置若罔闻，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甘南是“逃跑”，红四方面军中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在严重时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贯彻北上方针，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高吉村）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会议还决定把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和林彪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行动。

斗争之二：总政委围攻总司令。

右路军北上后，张国焘就让左路军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由于朱德总司令反对左路军南下，张国焘对朱德恨之入骨，张国焘公开叛党时，对朱德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和迫害。部队驻在阿坝约半个月，在张国焘的策划下，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看不到党中央拍来的电报，不让参加有关会议，甚至公开围攻朱德。

9月中旬，张国焘经过秘密策划，在阿坝一个喇嘛庙里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为了壮声势，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会了。这一次会议，张国焘让人通知朱德和刘伯承参加。

朱德走进会场时，一眼看见会场上挂着一条“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横幅，一下子警觉起来了。

会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朱德和刘伯承紧挨着坐下后，主持人就宣布开会了。朱德随身带了一本书，必要时他就以看书抗议。

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人大喊大叫起来，中央丢了根据地，损失了红军，执行的是退却逃跑路线。朱德总司令见此情形，就拿出书来，低头看书。

在张国焘的蛊惑下，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硬要朱德总司令表态，逼朱德承认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庄重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是举了手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里吵得更凶了，有人还逼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党中央北上。刘伯承总参谋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说：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好！你把我们党的会议说成审案子！几个人把斗争矛头转向刘伯承。

有人冲着朱德高声嚷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一听这话，朱德意识到张国焘是想把他逼走，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那一套错误路线。为了耐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争取和教育更多的人，朱德决定留在左路军同他们斗争。朱德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这一句话戳到了张国焘等人的痛处。有人暴跳如雷：你既然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

有人明目张胆地威胁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红军北上“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认为南下才是“进攻路线”。

走出会场时，朱德很气愤，他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泽东干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会后，张国焘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

毛泽东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后，被朱德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对陈毅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下辱”，“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毛泽东的话，是对朱德思想品格所作的最好概括。

斗争之三：强迫验伤。

一天，左路军原一方面军五军团的一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突然与一股敌人遭遇，红军指战员毫不犹豫地消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一批梭标和枪支。

返回阿坝时，这个排遇到了张国焘手下的一名连长。当这名连长得知他们是五军团的人时，脸一沉，厉声说：把缴获的战利品都留下。

为什么？那几天，大家对张国焘围攻朱德的行为极为不满，心里憋了一肚子气，见这个连长蛮不讲理，当然不答应。一名战士说：战利品是要交公的，为什么要给你？

一句话把那名连长问哑了，他自恃身后人多，一声命令，把这个排缴获的战利品全都抢了过去。

五军团的战士们非常生气，回到阿坝，立刻详细地向朱德总司令报告了这件事。朱德听后想了想，说：尽管张国焘搞分裂，而且又斗争了我，毛泽东、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要顾大局，不然就容易上张国焘的当。

朱德的判断很有道理，张国焘果然利用这件小事耍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张国焘让人把抢战利品的那个连长用担架抬到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的两间房子中间，唆使一些人在外面大声吵闹：五军团的人打了我们的干部，请朱总司令出来验伤！

这时候，张国焘从屋里走出来，脸色阴沉，背着手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一声不吭，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分明是在给朱德出难题。

朱德拉开门，微笑着走出来。看见朱德，刚才吵吵闹闹的那些人立刻静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了。朱德走到担架旁边，和蔼地对那位连长说：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都是党的干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说打了，没有打，你就说没打，你自己讲一讲嘛。

躺在担架上的连长看了朱德一眼，拉起被子蒙上头，一句话也不说。

见这情形，张国焘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头一低，尴尬地走进屋去了。

斗争之四：谁要叛变？

张国焘不听党中央和朱德等人的劝告，政治野心恶性膨胀，竟于10月5日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宣布另立“中央”，私自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朱德同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这种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起初，张国焘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强加给朱德和刘伯承许多头衔，朱德和刘伯承坚决不接受，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张国焘对朱德和刘伯承怀恨在心，他先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刘伯承到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校长，又想方设法刁难朱德。

一天，五军团的一个营奉命到阿坝西北约20多里的地方去执行警戒任务，张国焘知道后，以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红军为理由，要缴他们的械。为了把叛变红军的罪名嫁祸于朱德，张国焘逼着朱德总司令表态。

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朱德异常严肃地说：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有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

张国焘心里发虚，对总司令的问话无言以答。

朱德接着说：没有事实，没有根据，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做，不是有意制造分裂，破坏红军的团结吗？谁要叛变红军，广大指战员心里很清楚。

朱德总司令以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又一次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斗争之五：抢马和让马。

为了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张国焘于10月7日发出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把左路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向南进攻。

出发前，几名伤员突然来到总司令的住处，叽叽咕咕地唠叨起来：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他们的用意很明显，硬要把朱德总司令的牲口拉走。

总司令的饲养员见有人动手牵马，立刻拉住缰绳，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

一名伤员说：管它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我就要骑。双方拉着缰绳，你来我去，谁也不肯松手。有的伤员见争执不下，突然倒在地上，大喊大叫起来：打人啦，总司令部的马夫打伤兵啊！其他几名伤员也边喊边往医院跑。

不一会儿，又来了十几名伤员，硬要从马栏里把朱德骑的那匹马牵走。朱德的警卫员也来了，警卫员坚决不让他们把马牵走。于是那些伤员就围坐在马栏门口不走。

警卫员无奈，跑去向朱德报告。

在长征路上，朱德经常把马让给走不动的伤病员骑，有一次，骑兵警卫班的班长在战斗中负了伤，马也被打死了，行军时一瘸一拐的，眼看就要掉

队了。朱德知道后，耐心地看了看班长的脚伤，说：骑上我的马吧！班长不肯上马，总司令近50岁了，怎么能骑他的马呢！正犹豫不决，朱德把马缰绳一丢，赶队伍去了，警卫班的战士们深受感动。现在，朱德听了警卫员的陈述后，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

警卫员急了，抢着说：首长，他们是有意的，他们有马。看到总司令无所谓的样子，警卫员又跑去找张国焘。他对张国焘说：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员硬要把总司令的牲口牵走，劝了很久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

张国焘一听，装出很惊奇的样子，说：啊，有这种事？过了一会儿，张国焘又说：你去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要胡闹，让他们回去！就说是我说的。

警卫员回到马栏，转告了张国焘的话，十几名伤员才一声不吭地走了。

绥崇丹懋战役，左路军虽然击溃了川敌第二十军、第二十四军共6个旅，毙俘3000多敌人，但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四川的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红军的攻势，先后从第二十四军、第二十军、第四十五军等部队急调59个团，分别在金汤、雅安、芦山、宝兴，大邑、大川场，新津、绵竹等地组织防线。张国焘不顾敌情变化，于10月20日发布“天芦名雅邓大战役计划”，把左路军分成3个纵队，全力南进。24日，左路军再次越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张国焘还扬言要占领成都，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左路军的行动危及到四川军阀刘湘的统治，刘湘一面向蒋介石求援，一面调集王瓚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队，倾全力抵抗。至11月12日，红军先后攻占主兴、天全、芦山等地后，国民党军队先后集中了80个团的兵力，企图同左路军决战，阻上左路军东进成都平原，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听朱德等人的劝告，仍然命令红军全力进攻名山、邛崃。16日，红军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以后，接连打败国民党军队十多个旅的反扑，苦战7天，虽然毙伤了15000多敌军，自己也伤亡上万人，不得不把部队撤退到名山西北地区转入防御。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右路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今吴旗）镇，经过短暂休整，于11月初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人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在直罗镇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多人。朱德总司令看完中央发来的电报后，非常高兴，朱德对张国焘说：这真是个好消息，应该迅速向全体指战员传达。

张国焘听了，闷闷不乐，陕北的好消息对他简直是一个打击。当时左路军的处境极为被动，在四川军阀的层层堵截下，东进和南下都不可能，红军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地多为藏族聚居区，藏族上层的反动分子竭力煽动和胁迫群众反对红军，这一地区人口少，粮食缺，红军始终未能建立起根据地，部队的供应越来越困难。张国焘担心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胜利消息会影响他的威信。

朱德总司令没有理睬张国焘，亲自向指战员传达了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喜讯。红军战士们听了朱总司令的传达后，欢欣鼓舞，许多人高兴地在草地上跳起舞来。有人问朱德：总司令，我们什么时候到陕北去呀？有人窃窃私语：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见此情形，张国焘越发惊慌失措了。

斗争之六：曹里怀该不该杀？

一天夜里，朱德总司令正在灯下看书，忽然有人来报告，张总政委要召

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曹里怀。朱德听了很吃惊，站起来就走。

张国焘见了朱德，怒气冲冲地说：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曹里怀已经被张国焘关押起来。

曹里怀那时候只有25岁，朱德对他很了解，井冈山时期，曹里怀就跟朱德在一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会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曹里怀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同朱德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当时，曹里怀和军团长董振堂都主张北上，张国焘对他们很不放心，先是派第三十一军跟随红五军团行动，后来又把第三十三军和五军团合并，从一方面军来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调出了五军团，曹里怀到四方面军总部作战局任局长，张国焘小看了作战局长这个职务，当时，红军总部、党中央和各军团的电报往来都要通过作战局下属的机要科，曹里怀看到这些来来往往的电报后，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比较了解，为此，张国焘总想找机会整曹里怀。

有一天，曹里怀遇到一方面军几个人，他们心里很着急，很想北上。曹里怀说：你们不用急，那边不断有电报来，他们已经过了六盘山，到陕北吴起镇了。我们也是要北上的，准知这几句话传到张国焘的耳朵里，张国焘要杀曹里怀。曹里怀回忆说：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就是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主张北上，被张秘密杀害的。张国焘杀起人来可是不眨眼的，四方面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死在他的手里。

紧急会议的气氛很紧张。朱德总司令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对张国焘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的反革命够下上，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由于朱德总司令的坚持，张国焘不敢再迫害曹里怀，会上决定撤销曹里怀作战局局长的职务，开除党籍。

会后，曹里怀被派到总部军事学校当教员，部队北上时，曹里怀恢复了党籍，担任干部科科长。

一天，朱德总司令见到曹里怀，关切地说：里怀同志，以后不要乱讲了，这里情况复杂，弄不好会有危险。

斗争之七：半夜枪声。

1936年2月初，蒋介石经过周密策划，先后集中了薛岳等部队的6个多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

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1月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表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红军难以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决定左路军主力向西康境内转进，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彻底失败了。

再次北上那天，部队宿营时，朱德总司令的马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十多匹马一起，都拴在马棚里。第二天一早，饲养员去牵马时，突然发现马棚的墙上打了一个洞，朱德总司令的那匹马不见了，其它马却一匹不少。那匹红鬃马跟随朱德总司令南征北战多年，部队又要过草地了，马是多么主贵呀！饲养员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在附近找了一遍又一遍，依然没有找到那匹红鬃马，只好报告朱德。

朱德微微一笑，安慰饲养员，军部的领导同志知道这件事以后，给总司令送来了一匹马。

数天后，朱德随着前卫部队又来到噶曲河。总司令看了看河水，司令部

队马上过河，到河北岸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又同前卫部队出发，谁知张国焘率领的主力却莫名其妙地没有跟上来。这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前卫部队的指战员们已经进入了茫茫草原，受到严重的敌情威胁。

夜幕悄悄地垂下来了，天空一片漆黑，连一颗星星也没有，似乎和草地连成一片。朱德总司令和一个骑兵班围坐在一起，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

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像个唠叨的老人，没完没了。朱德和大家一起挤在一个帐篷里，十多匹马都拴在拉帐篷绳子的钉子上。后半夜，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持枪准备战斗。

有人在黑夜中偷偷接近帐篷，割断了马缰绳，放跑了四、五匹马。

战士们把朱德团团围住，深怕总司令发生意外。

雨住了，东边的天空微微泛白。一名战士看见远处有几匹马在游动，几名骑兵立刻追了过去，才把马找回来。

再次过草地，粮食依然是一个难题。张国焘率领的主力部队还没有赶上来，前卫团想了许多办法，才弄到一些野牛羊。管理员很高兴，想杀几头牛羊为大家补充一点营养，刚拿起刀子，忽然看见朱德总司令走过来了。朱德乐呵呵他说：你要手下留情嘛，后面的部队比我们更困难，还是把这些野味留下来给后面的同志吃吧！

过了几天，两只野羊死了。管理员想把死羊肉煮一煮给大家吃，朱德还是不同意，他动员大家把死羊肉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挂在小柳树枝上，留给后面的部队吃，前卫部队只喝羊骨头汤。管理员很不高兴，心里想：张总政委三番五次地迫害总司令，这一路上发生的几桩怪事都同张总政委的阴谋有关，为什么总司令还要处处想着他们呢？

三天以后，张国焘才率领部队来到噶曲河南岸。黑夜中，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隔河相望，但张国焘没有过河，命令部队在河的南面宿营。

在左路军北上的同时，红二、六军团也前进在长征路上。红六军团是1934年8月12日在桂东县寨前圩正式成立的，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同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跳出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击退了滇军的阻击，前进至盘县、亦资孔地区。

3月30日，朱德和张国焘联名发出命令，要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台。红四方面军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作战，减员很大，当时已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减至4万多人。

贺龙。肖克等人接到命令后，遂于31日率领部队向甘孜前进。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渡过金沙江，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阻击和敌机的骚扰、轰炸，于7月2日齐集甘孜，同朱德、张国焘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那天，朱德总司令骑着马，到60里路外去迎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7月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由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命令，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那几天，朱德总司令同贺龙、任弼时。肖克等人彻夜长谈，互相慰问，十分愉快。张国焘以为有机可乘，又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中央，遭到朱德、贺龙等人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斗争之八：张国焘“辞职”风波。

朱德、张国焘。贺龙等人率领红二，红四方面军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已经结束西征，将主力部队集中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红军三大主力逐渐靠拢，出现了胜利会师的有利态势。

朱德总司令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同张国焘一起研究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和北上会师问题。当张国焘得知蒋介石调胡宗南的第一军从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静宁、会宁，以遮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通路时，张国焘又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估计过高。他说：现在敌情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带领部队进入宁夏，青海。

朱德见张国焘仍然不愿北上，非常严肃地说：目前，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前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红军的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如果我们放弃北上，就会使前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面临严重的敌情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张国焘听不进朱德总司令的话，怒气冲冲地走了。

第二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和骑兵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暗地里又督令红四方面军主力抓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

9月15日，朱德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是给他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其中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朱德看完电报后，说：张国焘说他辞职了，他不干，我干！

朱德向部队发出了继续北上的命令。

就在这天黄昏，张国焘又从岷江对岸赶回来了，提出要立即召开西北局会议。

16日和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会上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争论很激烈，朱德、陈昌浩等多数同志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反对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张国焘见红军北上已成定局，不得不耍手腕说：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嘛！会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联名致电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电报发出后，张国焘又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和骑兵，直奔前敌指挥部漳县，欺骗前方部队的干部，公然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岷县会议的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停止北上，转头西进，迅速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

当时，朱德总司令已经率领司令部北上，宿营时，司令部收到张国焘要他们停止北上而南下西进的电报。看完电报，朱德立刻决定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党中央和军委报告，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时停止一切行动，通知西北局成员迅速赶到漳县，再次讨论红军行动问题；朱德还打电报给张国焘，反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重申中央军委9月19日来电中指出的“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的行动方针。

当机要员拿着电报稿到电台发报时，电台竟然拒绝拍发，说是张总政委有命令，没有他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经过反复做工作，才把上述电报发出去。

党中央和军委接到朱德的电报以后,于9月24日和27日连续发出复电,明确指出:“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台,尔后向宁夏、甘西。”

由于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对张国焘西进方针的抵制和斗争,经过党中央和军委的耐心说服,张国焘也看到了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10月9日,朱德同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会师。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师会师。

由于张国焘的迫害,朱德在长征中备尝艰辛,但他依旧轻松、乐观地说:“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了,多半是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夫,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

“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又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

17 红军战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帮助藏胞 搞春耕。藏族同胞翘起拇指：红军，耶 莫！红军，耶莫！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

红军长征，不仅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还在沿途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军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时，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佳话，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长征途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深受各族人民爱戴。藏族同胞曾经牵着奶羊，提着茶壶，赞不绝口地说：红军，耶莫！红军，耶莫！

那是 1936 年。

3 月，朱德率领红军来到四川省西部的炉霍。

炉霍坐落在大雪山麓的河谷之中，四川西北部的达曲河、尼柯河两支激流在这里汇合。大雪山冰融雪化，奔腾的河水猛烈冲击河谷，把这个高原山镇雕琢得格外显眼。炉霍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镇子不大，藏胞们居住的石头房子，像一朵朵蘑菇，稀稀落落地分布在那座喇嘛寺的周围。朱德总司令考虑到部队即将进入草地，决定先在炉霍休整一个时期。

太阳已经西斜了。天上迤邐着几块自丝条般的云彩，涂上了一层晚霞，宛如鲜艳夺目的彩缎，装饰着碧蓝的天空，似乎要和青山绿水媲美。映衬着春大的美丽风光，朱德总司令同红军队伍一起浩浩荡荡地走进了炉霍。

奇怪，镇子里冷冷清清的，一个藏族老乡也没有见到。巴山蜀水，面积 56 万多平方公里，汉、彝、藏、苗、回、羌多民族聚居。朱德对藏民的习惯还是有所了解的。进炉霍以后，朱德下了马，在镇子里仔细巡视。来到镇口，朱德站住了，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望远镜，向远方观察了一会儿，看着看着，总司令的两道浓眉不由得紧锁起来。

炉霍，冷落荒凉，藏族同胞不了解红军，由于反动土司、喇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煽动，纷纷逃到深山藏起来了，镇子里只有几头来不及带走的牛和羊，根据这一情况，朱德总司令立即向红军明确了四项规定：

- 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 二、爱护藏胞的一草一木；
- 三、在藏胞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子；
- 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们留在家中的牛和羊。

这四项规定传达下去以后，朱德又专门向政工干部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要他们教育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揭穿反动分子散布的谣言，消除藏族同胞对红军的误解。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藏族同胞依然没有回到炉霍。

朱德站在镇口，不时地张望西边那座喇嘛寺和远处的群山，心里想：炉霍春寒袭人，躲到深山里的藏族同胞住宿和吃饭一定很困难，尽管他们对红军有误解，红军决不能让他们在深山受苦。我们应该主动做工作，使他们尽快回到炉霍，回到自己家里。这么一想，他决定立刻派人去找“通司”（即翻译），让部分红军跟着“通司”到山上去寻找藏族同胞，朱德还亲自向“通司”交待，请他们协助红军把藏族同胞请回来。

傍晚，“通司”和上山的红军回来了。他们进山后，虽然也看到了一些

藏民，可是不等他们接近，藏民们又跑远了，像跟红军“捉迷藏”似的。有几个地方，藏民还放冷枪吓唬红军。

朱德心里很不安。他漫步走出镇口，不知不觉来到田野上。忽然，一股浓郁清新的气息迎面扑来，朱德站住了。田野上，土地变得松软了，树杈已经冒出小芽；远处山上，冰雪渐渐融化，岩缝中的一股股细流发出动听的淙淙声。总司令眉梢一动，心想：春天已经悄悄来到西北高原，春播时节，该是下种的时候了。可是，眼前这一片片土地还荒着，去年没有收拾干净的青稞麦茬子散落在地上，在微风中摇摇晃晃的，像是在呼唤。朱德心里忽然燃起一团火，他快步回到红军总部，对大家说：按照西北高原的气候，该是青稞麦。豌豆等春播作物下种的时候了。可是，藏族同胞们还没有回来。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季节不等人哪，这是关系到藏族同胞生活的大问题。从今天开始，我们一面继续组织人员上山喊话，宣传民族政策，劝说藏族同胞早日回镇，一面要组织力量把地种上。

总司令一席话，说得大家情绪激昂，西北高原上的那一片片荒地，牵动着总司令的心哪！

为了帮助藏族同胞搞好春播，红军总部专门召开了动员大会。朱德总司令用高亢的声调说：由于藏族同胞对红军辽不了解，不能回来种地，红军就不能等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一天天地过去。红军和藏族同胞是亲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帮助藏族同胞把地种好，这也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总司令的话深深地激励着每一个红军战士。动员大会结束后，大家摩拳擦掌，有人把缴获的粮食背出来，用作种子，有人找不到锄头，就用身旁挖工事用的小铁铲去翻地，有人连小铁铲也没有，就把树棍子削了削，凑合着翻地，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炉霍镇周围，到处都是紧张劳动的红军战士，时时飘起一阵阵愉快的欢歌笑语。西北高原上，编织出了一幅极为壮观的春耕图。

朱德总司令也来到田间了。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军装外面套了一件羊皮短袄，裤腿上虽然打了绑带，依旧可以看出裤子上的补丁。朱德看见大家正在满头大汗地平整土地，乐呵呵他说：同志们，辛苦啦！朱德前后看了看大家平整的地，满意地说：干得不错嘛！见战士们都向他打招呼，他就拿起锹，边干边说：干活就要像干的样子，活干好了，庄稼长得好，藏族同胞才能多打粮食呀！

一个战士去夺朱德的锹，说：总司令，你年龄大了，这活该我们干。

朱德牢牢地握住铁锹，故意收起笑容，怎么，你不让我活动活动筋骨？一句话说得周围人都笑了。

那几天，朱德总司令常常是夜晚办公，白天在田间地头劳动。炉霍周围的土地，到处都留下了朱德的脚印。

白天劳动，夜晚值勤，红军战士十分辛苦。朱德总司令看到战士们日夜奔波，身上缺少御寒的棉衣，一日三餐只用野菜充饥，许多战士面黄肌瘦，体质减弱，心中暗想，战士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何不利用在这里休整的机会开个运动会，鼓励大家锻炼身体、提高士气呢？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以后，立刻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拥护。

为了迎接运动会，有的战士挖了一个沙坑，练习跳高跳远，有的战士在草皮堆上跨越障碍，班与班之间还用装满羊毛的“篮球”进行对抗赛。朱德专门向有关领导交待，发动大家想方设法

解决运动器材不足的难题。那些天，红军战士一个个生龙活虎，斗志昂扬，连日劳动的疲劳一扫而光。

藏族同胞的青稞和豌豆全部播种完毕以后，红军总部正式作出了在炉霍召开运动会的决定，运动会的评判委员之一就是朱德总司令。这个决定传达以后，战士们兴高采烈，早早晚晚，都三五成群地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炉霍镇上生龙活虎的情景很快被山上的藏族同胞知道了，听了“通司”的宣传以后，胆子大的藏民半信半疑地下了山，忐忑不安地走进了镇子，当他们看到地里种上了青稞，留在家里的牛羊自由自在地吃草，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屋里的东西却丝毫未动时，看到红军战士在室外露宿时，心中的疑云顿时消散了。

朱德听说有的藏族同胞回来了，非常高兴，再三嘱咐要热情接待他们。当朱德走出办公室，想见见那几个藏民时，藏民忽然转过身子，飞也似地向山上跑去。

藏民的身影渐渐消失了，朱德总司令还久久地站在镇口。

突然，山谷里传出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呼唤声，不一会儿，山坡上出现了一个个黑点，那黑点渐渐变大……

总司令看清楚了，那是藏民，藏民们欢呼着，向炉霍奔跑。

炉霍沸腾起来了。当红军战士们迎向藏族同胞时，藏族同胞们顾不得进自己的家门，就牵着奶羊，提着茶壶，来到红军面前。纷纷翘起拇指：红军，耶莫！红军，耶莫！那意思是：红军真好！红军真好！

望着一碗碗端到面前的香喷喷的酥油茶，红军战士心中乐开了花。

5月1日，运动会开幕了。

运动场选在炉霍镇西南的一大块平地上，地上长满了密密的青草，是理想的运动场地。场地一端，用树木和石头搭起了一个临时主席台，藏族同胞们早早地赶来了，这更增加了运动会的气氛。

金色的太阳洒满了运动场。朱德总司令穿一身整齐的旧军装，腰间束一条失去光泽的皮带，气宇轩昂地走上了主席台。远处是一片湛蓝的天空，眼前是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红军战士。朱德扫一眼会场，兴奋他说：同志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纪念日，我们在长征路上举行运动会，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工农红军永远是充满生气的，是任何困难也压不垮的。

运动会整整开了3天，这是一次内容丰富的运动会，既有球赛、径赛、田赛等传统的运动项目，还有跨越障碍、刺杀、投弹、骑兵表演等军体项目，还有识图、侧距、识别和利用地形地物等别开生面的特设项目，运动场上，红军战士时而像轻燕腾空，时而像雄狮扑食，时而像飞龙出水，那一个个精彩的动作与藏族同胞们的掌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了一幅幅十分壮观的场面。

最激动人心的项目，是5月3日下午的烧牛粪比赛。这是朱德总司令提出要增设的一个比赛项目。朱德考虑到，在茫茫草地上不但粮食困难，连柴禾也很难找到。部队很快要进入草地了，牛马粪就是常用的燃料了。用牛马粪烧水做饭，不懂门道的还真为难，烧牛粪比赛，实际上是一种训练。

为了在烧牛粪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红军战士想了许多办法。有的人把鲜牛粪做成一个个大饼子，贴在墙上晒干；有的人还特地做了能够“推闭拉张”的风匣子，使牛粪燃得更快。

这是一项广泛的群众性比赛，信号枪一响，数千名红军战士几乎同时划着了火柴。一时间，田野上冒起了一缕缕青烟，烟龙在微风中翻腾，缓缓游向蓝天。站在一旁观看的朱德总司令看到如此壮观的比赛场面，带头鼓起掌来，那一阵阵掌声震撼山谷。晚霞倾泻在西北高原上。炉霍上空响起了运动会闭幕的歌声。闭幕式上，朱德总司令望一眼会场四周的藏族同胞，兴高采烈地说：这次特殊条件下的运动会，是对红军战士的又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演习。同志们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一语刚落，藏族同胞们带头鼓起掌来，那掌声经久不息。

青稞麦上黄的时候，红军结束休整，离开炉霍向甘孜进发。藏族同胞们看到红军要走，男女老少都涌到路旁，为红军举行了当地最隆重的欢送仪式。

红军的队伍渐渐远去了，藏族同胞们还聚集在镇口，向朱德总司令告别，向红军队伍挥手……

在炉霍休整期间，红军千方百计准备过草地的粮食。刚进草地时，每个红军战士身上都带了三四十斤粮食，可是，筹措粮食极端困难，不久，红军携带的粮食吃完了，如何填饱肚子成为红军走出草地的一大难题。由于营养不良，红军战士一个个面黄饥瘦，有的病倒以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一天，朱德总司令脚穿一双草鞋，肩上背一个斗笠和公文皮包，手中握着一根棍子，几步走到一个草坡上，望一眼长龙似的队伍，向大家挥挥手，喊道：同志们，快走呀，我们就要走出最艰难的水草地了，而且有了一条牦牛。

什么？牦牛？行军队伍一下子兴奋起来。有的战士又惊又喜，问：这茫茫草地连飞鸟都见不到，哪来的牦牛？

朱德微微一笑，说，这是先头部队留给我们的礼物。

战士们乐了，纷纷围上来，争先恐后他说，总司令，把牦牛杀了，我们大家好好吃一顿。红军战士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尝到油腥味了，一听说杀牛，情绪可高了。

朱德问：想吃牛肉？一条牛够吗？一句话把大家问住了，朱德扫了大家一眼，又说：四川有句俗话：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米桶。我们要走出草地，可不能眼光看到鼻尖上，得有个长远打算。宁愿顿顿缺，不愿一顿无嘛！

一听这话，几个战士伸了伸舌头，后悔刚才太冒失，总司令一定要把牦牛留下来，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忽然又听到总司令说。当然，牦牛我们还是要杀掉，把牛皮和牛肉留起来当干粮，用牛骨头炖野菜，这不是很好的晚餐嘛！这时候，朱德又用询问的口气说：我们一起去挖些野菜？

说到找野菜，这有藏族同胞的一份功劳。红军住在炉霍的时候，朱德曾经询问藏族同胞，这片草地上什么野菜能吃？藏族同胞开始不理解总司令的用意，经过反复解释，他们向红军详细介绍了无毒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听了，马上拿起铲刀和提篮，同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一起，到草地上去挖野菜。那天，风和日丽，朱德弯下腰，一边挖野菜，一边询问藏族同胞，把草地上能食用的十几种野菜都挖到了。

回到营区，朱德让炊事员把野菜洗刷干净，一棵棵分类用水滋养，再让红军战士一类一类地去辨认。那场面，真象一个展览会，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十几种奇形怪状的野菜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操场上，战士们排着长队，一边看一边议论，热闹极了。

一名战士指着一种野菜说：那是中药材，我认识。

另一名战士说，什么中药材？都叫“革命菜”！

朱德一听，笑眯眯地说，野菜也是宝，草地上有了它，就饿不死人呀！

自从那次展览以后，每个红军战士都能辨认出十多种野菜。今天，一听说要找野菜炖牛骨头，战士们纷纷散开，不到一个小时，就挖回来几筐牛耳大黄、灰灰菜、车前草之类的野菜。牦牛已经杀了。草地上架起了几口行军锅，火苗舔着锅底，每口锅里都有几块牛骨头，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了，渐渐地，卷出一阵阵香喷喷的牛肉味。

开饭的哨音响了，战士们端着碗向炊事班走去。因为是牛骨头煮野菜，晚餐的气氛非常活跃，朱德端起一碗野菜，正吃得津津有味，警卫员忽然端过来一碗大米粥，说：首长，你吃粥吧，野菜留给大家吃，其实，这碗粥很稀，连人影子都照得出来。朱德一见，皱起眉头问：哟，哪来的大米呀？

先头部队送牦牛时，顺便捎来一点大米，说是给总司令熬粥喝。警卫员解释说。

朱德沉思片刻，说：你把粥送给病号喝吧，这牛骨头煮野菜，味道好着呢！说着，把一筷子野菜送进了嘴里。这野菜尽管和牛骨头一起煮了好久，还是苦涩得难以忍受。警卫员望着朱德勉强装出来的笑容，无可奈何地把稀粥端走了。

吃野菜，吃枪皮带，吃皮草鞋……草地上的困难真多呀。朱德总司令总是蔑视困难，用豪迈、乐观的气魄去感染战士们。跟随总司令长征，战士们总是那么有信心。

数年后，朱德写下了过草地的生动回忆。

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 —

18 官女子记不住朱德的名字，朱德说：你看到猪，就会想起我的姓——朱；你手里得到东西，就会想起我的名——德

草地的傍晚是美丽的。夕阳似乎在金红色的彩霞中滚动，通红的火球金边闪闪，进出几点炽热的火星，夕阳的余辉使松潘草地呈现出一片金黄。

朱德走出帐篷，伸了伸腰，忽然看见十多名战士正在前方搭帐篷，想到总保卫局开办的机要学员训练班又开学了，就缓缓走过去。朱德正要伸手去拉帐篷杆子，忽然听到一声亲昵的叫喊：朱叔叔！

朱德转头一看，面前沿着一个英俊小伙子，觉得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叫什么名字。

朱叔叔！这个年轻人显得有些激动，他是准备喊“总司令”的。谁知连喊两声“朱叔叔”，他直埋怨自己。

朱德忽然看到了小伙子右脸颊上的一块疤，喜上眉梢，问：哟，你是官女子？

是我呀，朱叔叔！你还记得我吗？

朱德双手一伸，按注年轻人的肩膀，亲切地摇了摇，说，怎么不记得，你是带路的小英雄呀！

年轻人笑了，说：总司令，我是来参加机要学员学习班的。他终于把“朱叔叔”改成“总司令”了。

朱德拉住年轻人的手，脑海里浮现出第一次见到官女子时的情形。

那是 1926 年秋天。

朱德率领的军队来到四川通江县洪山塘镇，准备讨伐军阀刘南亭。一天，朱德到镇子东北口视察时，一名副官忽然向他报告：长官，一个名叫官女子的孩子主动要为我们带路。

朱德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行军打仗，女孩子受不了。

副官低头一笑，指着那孩子说：你看，就是他，他是个男孩。

那孩子一听，连忙走上前，向朱德鞠了一躬。

朱德连忙阻止，说：哎哟哟，革命军不讲这一套。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孩子，问，你是个男孩，怎么叫官女子？

那孩子动了动嘴，没有说出口。原来，他刚满周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天下省人事。病好后，他的父母听信阴阳先生的话，取名“官女子”，让观音菩萨夹保佑他。

官女子看了朱德一眼，壮着胆说，我知道刘南亭住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吧？

朱德微微一笑，问：你今年多大？

16。

你比民国还大 1 岁。

官女子听了很高兴，说：父亲也跟我说，民国多少年再加一，就是我的年龄。今年是民国 15 年，我 16 岁。

朱德连声称赞，好记性，好记性。官女子已经没有陌生感了，他和朱德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朱德了解到官女子是个放牛娃，从 7 岁起就到老秀才罗德良家里去放牛。罗德良的表妹是军阀刘南亭的小老婆，刘、罗两家来往密切，官女子经常受罗德良的派遣给刘南亭送东西，对刘南亭的情况很熟悉。

官女子身上，还有多处被人打伤的疤痕呢！

朱德看着眼前这个瘦棱棱的放牛娃，微笑着说：好吧！就请你带路。

革命军来到洪口附近，朱德部署好正面进攻以后，就让官女子带一组便衣队去活捉刘南亭。

便衣队在刘南亭的住处附近埋伏以后，官女子背着一篓鸭子，领着朱德和那名副官来到刘家大院，哨兵查问时，官女子摇动着篓里的鸭子，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给太太送鸭子来的。哨兵听到“嘎嘎嘎”的鸭子叫声，信以为真，就让他们进屋了。军阀刘南亭酣睡未醒，就被活捉了，刘南亭的武装也被缴了械。

革命军把刘南亭的浮财分给当地群众，官女子也分到了衣服、夹被和 60 块银元。谁知官女子怎么也不肯要。朱德说：你是带路的小英雄，这些东西你就带回家用吧！

官女子还是不肯要，说：我是个穷孩子，哪来这么多钱，别人还以为我是偷来的。

朱德一听哈哈大笑，连忙写了一张“赠给官女子母子衣服 9 套、夹被两条；奖赏带路英雄官女子银元 60 元”的条子，还签上自己的名，交给官女子。官女子这才接过衣服、银元和条子，又说：叔叔，我没有文化，记不住你的名字。

朱德笑了，风趣地说：官女子，你放过牛。对牲口一定很熟悉吧？我姓朱，你看到猪，就会想起我的姓——朱；你想一想手里得到的东西，就会想起我的名——德。

朱德！朱德！官女子高兴得跳起来。朱德叔叔，我也要参加革命？

朱德拍拍官女子的肩膀，说：你呀，快回家照顾母亲和姐姐吧，过几年再说。

自从那天分别以后，整整 10 年过去了。官女子已经改名为殷长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今天在草地上相遇，朱德总司令很高兴，他把殷长科领进自己的帐篷，亲昵地攀谈起来。殷长科的父亲曾经同朱德一起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来在战斗中负伤牺牲了。朱德总司令勉励殷长科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在机要训练班好好学习，准备接受更重要的任务。

夕阳已经完全沉落下去了，朱德站起来，划了根火柴，去点油灯，殷长科这才感到时间不早，急忙起身告辞。

殷长科刚走两步，忽然被朱德一把拉住。朱德总司令低头看着他的绑带，和蔼地说，你看，你的绑带没有打好，这是要影响行军打仗的呀！总司令把自己打的绑带伸到殷长科面前，说：这种宽面绑带打成人字形，既舒适又好看。你会吗？

殷长科摇了摇头。

来，我教你。朱德弯下腰，同殷长科脚靠脚地打绑带。

殷长科集训结束回部队后，参加了西路军的战斗，1940 年春，殷长科作为西路军的幸存者，再次去找朱德总司令。

那一天，朱德看见殷长科，脑海里又闪现出了西路军将士艰苦转战的情景。

西路军，总司令的记忆中总是那么清晰。

1936 年 10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很快粉碎了国民党骑兵第五师两个旅的阻击，占领了大部村寨、五佛寺、打拉牌一线地域。

10月30日，朱德，张国焘收到毛泽东、周恩来拍来的电报，提出，“九军、三十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

11月1日和2日，朱德收到了徐向前，陈昌洁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的电报，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4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又向朱德和张国焘拍电报，提出：“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当时，西渡黄河的只有第五、第九、第三十军、总司令部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共约两万多人，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总司令部部分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分学生以及第四、第三十一军仍在会宁通往靖远的大道上抵抗国民党军队。11月7日，当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党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第2天就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政治委员是陈昌浩。

11月9日，西路军所属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2.1万多人，分两路向西出动。这时，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仍在会宁通往靖远大道的东北面。

西路军的主要敌人是马家军阀部队，共有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两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从青海调来的马步芳新编第二军所属第一师之3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和两个警备旅，共3万人，另外还有青海、甘肃的保安民团约9万人。“马家军阀代表着回族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巩固统治地位。马步芳号称‘野马’，性情残暴，反共坚决，有当‘西北王’的野心”，加之青海、甘肃、宁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西路军面临的战斗是极其残酷的。

11月19日，朱德总司令曾同林育英，张国焘、周恩来一起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西路军按照上述指示，曾停止西进，几经战斗后，又西进临泽、高台地区。

西路军在甘肃西部的4个多月中，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徐向前总指挥在向党中央发出的电报中说：“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予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

朱德总司令对西路军的处境十分忧虑，张国焘回忆说：“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中央军委为了支援西路军，曾经由周恩来等通过政治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28、529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18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牺牲。殷长科克服千难万险，从新疆辗转到延安，当时，在西路军中熟悉他的人几乎都牺牲了，他原来保留的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名单通知书也在一次战斗中被销毁了，组织上不了解他的履历，把他作为战士留在延安招待所。殷长科心里像火烧一样，他要上前线去。

殷长科在招待所门口踱来踱去，忽然看到了中央首长住的窑洞，思考良久，他决定去找朱德总司令。朱德看见殷长科，连忙迎出来：官女子，你好呀！他们又像当年在草地上见面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朱德听了殷长科谈到西路军的损夫时，十分痛心，但他还是安慰殷长科：官女子，你是幸存者，人生在世，难免有三灾六难，这次你又过了一难。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官女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呀！

殷长科紧锁着眉头，说：现在组织上不承认我是干部，让我留在招待所，现在这个时候我上不了前线，真难受啊！

听了这话，朱德沉思良久，说：官女子，你是带路的小英雄，是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当过保卫干事，这些情况，我来作证。实事求是嘛！至于工作分配，就让组织上安排吧！

不久，殷长科恢复了干部职务，被党组织派往胶东抗日前线。

19 石头城秘密邀请中共要人赴会。叶剑英 说：毛不必去，未必须去

初秋，天是高高的，云是淡淡的，霞是红红的，辽阔的田野显得寂静无声。炎夏已经悄悄地溜走了，田野上留下一片凄凉景象。

离开延安以后，朱德的汽车开得飞快。从车窗向外望去，朱德看见了道路两旁光秃秃的麦茬地，牲口在收割过的地里来回走动，成熟的玉米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麻雀不时地像一片乌云似地从玉米地里腾空而起，又像下雹子似的纷纷散落到满是尘土的道路上。

朱德现在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央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书记。短短几个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军”，“红五星”要换成“青天白日”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这两个整整打了10年仗的冤家对头，已经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了。

八路军总司令部设在陕西省泾阳县的云阳镇。朱德总司令是从延安赶往八路军总司令部、赶往抗日前线的。战争发展很快，朱德总司令坐在车上，汽车在平原上奔驰，总司令思绪万千……

他想起了发生在古都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逼蒋抗日事件。这是一起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强烈反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对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朱德的记忆中，蒋介石及其一行是于1936年12月4日到西安召开“剿共”会议的。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野蛮地践踏中国的领土，蒋介石还念念不忘“剿共”。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红军剿灭，193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向蒋介石传递信息，希望团结抗日，先是由覃振转达，再分别由胡宗南和邵力子转达，蒋介石都不答应，表示一定要消灭红军。当时，东北军的许多将上积极要求抗日，蒋介石为了控制东北军，亲自前往西安。蒋介石到西安后，先游华山，两天后才宣布“剿共”计划。蒋介石的行径遭到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反对，张、杨两人对蒋介石多次谏诤无效后，命令孙铭九率领特务团到临潼华清池抓蒋介石。12日凌晨2时，蒋介石从睡梦中听到枪声，慌忙翻墙逃走，谁知坠入墙外深坑中，腰椎也摔坏了，疼痛难熬，只得由蒋孝镇背着，躲藏到后山上的一个洞穴中，被东北军活捉。蒋介石的随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维承、万耀煌也被扣留，宪兵三团团长江孝先被处决，邵元冲跳墙逃跑时被打死。

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全国各地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深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听说蒋介石被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提出要杀蒋介石。有人说，蒋介石的罪恶，杀他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解恨。

12月25日，朱德到陕北保安县看望红军大学的学员时，有的人出于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也提出要杀蒋介石。朱德对大家说：西安发生的这件大事，这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必然结果，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下场，我们党早就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不干，现在我们要继续向蒋介石提出这个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主席说得好，蒋介石这个人像陕北的毛驴，你牵着它上山他是不走的，你在它屁股上推它

也不走；你用鞭子抽它几下，它就会走的。

总司令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红军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前承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容纳抗日”等诺言。尽管蒋介石回南京后出尔反尔，但这一事件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力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夜幕骤然降临，满天星斗在深蓝色洁净的夜空闪耀。汽车迎着夜风，还在原野上奔驰。朱德总司令没有一丝儿睡意。这一个时期，形势变化很快，他仿佛听到了日本军队在宛平县卢沟桥地区挑起事端的枪声，想起了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八·一三”事变和淞沪会战，想起了临行前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想起了南京之行……

南京，这座有六朝古墓、石头城遗址、栖霞山石刻，明孝陵、太平天国天王府等著名古迹的历史名城，是国民党政府的首府，蒋介石的总统府就设在南京。朱德总司令是受到国民党人的邀请，受党中央委派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

那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了“红军联络处”。这是十年来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周恩来、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与各方人士洽谈。

一天，朱德收到了叶剑英发来的一份重要报告。7月12日，叶

剑英代表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时，侯成如用试探的口气说：据南京方面的绝密消息，南京拟将红军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使用于平绥方面，与傅作义共同作战，但不知红军能否听从调动？显然，侯成如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叶剑英听后郑重声明：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国人皆知。华北事件发生，共产党和红军即通电表示抗日救国。事关重大，会谈结束后，叶剑英立即向党中央报告。

朱德和毛泽东看了这份电报后，明确表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决心抗日，红军主力准备随时服从调动，同意参加平绥线作战，并决定以一部深入敌后。

但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一字未提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红军的改编问题。

蒋介石在耍手腕，他想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消灭红军。

“七·七”事变十天后，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江西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人进行会谈。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

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是浙江乐清人，蒋介石的同乡。1931年，张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底，张冲又到陕北瓦窑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会谈，后来又陪同中共代表潘汉年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因此，张冲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8月初，张冲给周恩来打电话，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

张冲还多次给西安的叶剑英打电话，询问朱德等人的行止。

叶剑英想起了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下飞机，张学良即被扣押，并遭到终身监禁，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叶剑英向党中央建议，关于南京这个会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

8月5日，朱德和周恩来到达西安，同叶剑英交换情况。

8月9日，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南8月11日，朱德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

这是红军总司令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正式重大会议。

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首府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上，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们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主要是华北方向，但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抗日战争中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会下，朱德频繁地同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会晤，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

国共双方的斗争很激烈。

8月12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其中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力“民用”；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要求提共赴国难。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第二天，日本军队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侵略者的炮火打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朱德两天前的预言成为现实。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但是，由于双方对部队改编、员额等问题上仍有斗争，上述协议到22日才正式发表。

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朱德先离开南京了。

周恩来也于8月21日离开了南京。叶剑英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进行交涉。

经过艰难曲折的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开始了。

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名义，下达了红军改编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七十四师，编为第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红二方面军及陕北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个营，骑兵团，编为第一二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队编成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

不久，朱德同彭德怀、任弼时一起向中共中央提议，恢复了政治委员制

度，加强了八路军中的政治工作。

红军改编后，国民党下发了三师人的军饷、弹药和碘片、阿斯匹林片之类的药品，枪支却没有下发，蒋介石心有余悸，他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掌握良好的武器装备。

对此，蒋介石的一名尉官曾经说，共党一向夸口说，他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让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去夺取吧！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于8月下旬陆续开往山西抗日前线。朱德总司令也奔赴了抗日前线。

为了实现全面侵华的野心，“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不断向中国派兵。7月下旬，陆续增派到中国的日本侵略军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地区的进攻部署，极其野蛮、残酷地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妄想3个月内灭亡中国。

7月26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廊坊。

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驻本上的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开赴华北，命令中国驻屯军指挥所属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驻屯步兵旅团等部队消灭或驱逐北平、天津地区的中国军队。

7月29日，北平失陷。

7月30日，天津陷落。

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名水兵驾车强行冲入虹桥中国机场，不听警告，枪击中国哨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哨兵将其击毙，日军立即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备战，派遣海军第三舰队主力进入上海附近海域。

8月11日，日本侵略军所属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由北平沿平绥路向防守南口。居庸关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军正面发起攻击。第十二军由蒋介石的心腹汤恩伯指挥。

8月19日，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从张北南下，进攻张家口，这使平绥路东段的国民党军队腹背受敌。蒋介石急忙命令卫立煌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从石家庄驰援南口、居庸关，支持汤恩伯。谁知卫立煌的军队未到，汤恩伯的军队已经向山西东北撤退。

8月31日，日本天皇下达敕令：“以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机会的目的，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

9月4日，日本政府召开第72届临时会议，会议确定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对华不宣而战，以诏书代替宣战书。

上述情况，暴露出了日军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10月间占领华北”的野心。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在津浦、平汉、平绥、同蒲4条铁路300公里正面上同时进兵。在日军的进攻部署中，位于中央战线的山西具有特殊地位。

山西省位于华北西部，从地质构造上看，它是我国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山西境内，山地、高原、丘陵的面积很大，东部有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中条山等，以太行山脉为主；西部以吕梁山为主，因此，山西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从军事上看，谁控制了山西，谁就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攻则可依地势而进，出紫荆关而入平津外围，出娘子关而入冀中，沿太行山南麓而入冀、鲁、豫边；守则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作依托。有的军事家断言，保住山西就能保全华北；山西失守，整个华北战线也

随之解体。可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近40天里，国民党军队尚没有形成固定的战线。南口战役失败后，汤恩伯、刘汝明的部队被蒋介石调往平汉路，国民党的其它部队也从绥东、察南败退，山西北部完全暴露。曾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仓皇之中设计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一方面频繁调动部队，一方面多次与朱德联系，希望八路军尽快开往前线。

正是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第一一五师即于8月22日在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贺龙、肖克指挥的第一二师于9月

3日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征，刘伯承、徐向前指挥的第一二九师于30日从庄里镇出发东进。朱德也日夜兼程，赶往抗日前线。

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指战员们得知朱德总司令从延安赶来，非常高兴，一大早就起来打扫院子，整理朱德的办公室和宿舍，几名警卫人员和通信员还赶到30里外一条河的桥旁等候，他们被告知，朱德总司令一定要从这里经过。

中午时分，数名八路军干部向桥上走来，他们每人都穿着一身灰夹衣，衣领上缀着红领章，腰间扎一条皮带，打着裹腿，头上戴着一顶红五星的八角帽，每人还挎着一支驳壳枪，在桥旁等候的警卫人员和通信员一见，悄悄议论：怎么不见总司令呀？他们可能是总司令的先遣队吧！

那个眉毛浓黑、眼睛有神的首长，是不是总司令？

怎么可能呢？总司令还走路？

他们左等右等，等不到朱德司令，心里不踏实，越想越觉得刚才那个首长是总司令。当他们赶回八路军总指挥部时，才知道朱德总司令在两个小时以前就到了。

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八路军总指挥部于9月6日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朱德总司令也东渡黄河，前往山西。

渡黄河那天晚上，夜空是湛蓝的，北斗星在天空中格外明亮。朱德总司令站在奔腾咆哮的黄河边上，思绪万千，战士们也恨不得一下子飞过黄河，飞到抗日前线去。

过黄河不久，朱德一行在山西的侯马镇（今侯马市）上了火车。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经常沿铁路轰炸、扫射，白天火车也得钻山洞防空，夜间才能开。遇到铁路被炸毁时，还不得不下车步行。

在洪洞车站，朱德受到了当地乡亲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当谈到抗日的前景时，朱德坚定他说：日本侵略者妄想把我们的祖国一口吞下去，这是白日做梦，中国人决不当亡国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一定能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由于接到了阎锡山的命令，途中的一些国民党部队还列队迎接朱德。阎锡山还专门派出了一名联络官，早早地来迎接朱德。途中翻一座山时，朱德和八路军战士一起步行前进，那名又矮又胖的联络官却高高地骑在马上，前后还有护兵保护。山路崎岖，那匹马偶有闪失，把联络官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联络官见自己在朱德面前丢丑，恼羞成怒，竟然甩开皮鞭，抽打护兵，打得护兵满地翻滚。

不准打人！朱德一声吆喝，那联络官大吃一惊，连忙收起皮鞭，皮笑肉不笑他说：是！是！不准打人。

9月21日清晨，朱德到达太原。第二天，朱德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抵达代县太和岭口，会见了阎锡山。这次会谈比较顺利，阎锡山也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

23日，朱德回到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这次会谈结果。

在山西，朱德总司令还同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接触多次。与阎锡山不同，朱德每次见到卫立煌时，两人都在一起诚恳地长谈。

一次是在临汾。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八路军方面，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参加会议。朱德一行先到临汾。在临汾，朱德同卫立煌第一次见面，卫立煌热情接待了朱德。卫立煌亲身军旅多年，当他看到朱德穿着一身灰军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了一根士兵用的皮带，绑腿打得整整齐齐，脚上穿一双旧布鞋时，哪里敢相信这个田舍翁一般和蔼可亲的人就是博古通今的红军总司令，在交谈中，当卫立煌得知朱德家境贫寒，幼年趴在母亲的纺车旁边借着桐油灯光读书，后来为追求救中国的真理去找孙中山时，感到朱德的经历与自己的青年时期颇有相似，不禁发生了共鸣，卫立煌幼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母亲为生活哭瞎了眼。他自己从孙中山的一名卫兵发迹为国民党的一员“五虎将”。今天，他深深感到朱德胸怀远大，思想境界高尚。事后，有人问卫立煌对朱德的印象时，卫立煌说：朱德是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

六中全会前，朱德路过卫立煌处，送给卫立煌几项礼物，其中有两匹俘获日本军官骑的枣红色大洋马。这两匹马很高大，身上的毛油光闪亮，卫立煌很喜欢。

卫立煌赠送朱德两样礼品：一批新式大号可以当盒子枪用的威力很强的手枪；一支刻有“立煌敬赠”字样的美国犀佛利牌钢笔和一块手表。朱德对钢笔和手表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使用了还专门文待要留下保存好。

另一次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朱德和卫立煌又相见了。

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在洪洞县马牧村与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相距不远。1938年1月31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带着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第九军军长郭寄娇，给朱德总司令拜年，这一年，朱德已经52岁了，他比卫立煌大11岁。朱德很高兴。卫立煌的部队在忻口战役中英勇奋战，虽然遭到重大伤亡也不动摇。八路军举行了俭朴的欢迎会。村子里的土墙上还贴满了“欢迎劳苦功高的卫总司令”等标语，村口还挂上了横幅。朱德总司令在欢迎会上致词说：今天，我们热烈欢迎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卫立煌司令、李默庵军长和郭寄娇军长，你们指挥抗日的“中央军”、晋绥军，在忻口歼灭了三四万敌人，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希望“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今后合作得更好。

卫立煌致答词说：八路军是真诚抗日的，是复兴民族最精锐的部队。通过同朱德的多次接触，他对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接着说：抗日战争，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我们为保卫我们的民族，流血牺牲才是有价值的，在抗战中可以把旧的、坏的东西消耗掉，创造出新的、好的东西，把旧中国建设成新中国。卫立煌还要求朱德给他介绍一些人才。朱德欣然同意。

返回路上，卫立煌耳边一次又一次地响起了朱德总司令的那句后：

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

20 看到日军尸体上的反战传单，朱德感
叹：我们应该多学几句日语，好对日本
兵喊：不杀俘虏

山西省五台县东北隅，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名山——五台山。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峰顶平坦宽阔，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其中北台海拔 3058 米，素称“华北屋脊”。五台山寺庙林立，清流潺潺，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相传东汉水平年间（公元 58—75 年）五台山上已有寺庙建筑，魏，齐，隋。唐至清末，屡经修建，台内现有寺庙 39 座，台外寺庙 8 座。许多寺庙建筑壮丽，雕刻精美。“五台山图”曾绘入敦煌壁画，唐宋以来，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国僧侣都与五台山有往来。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在这里，日本侵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法施展，中国军队却可以来去自由。朱德设想，五台山区可以建立一片抗日根据地。在这片根据地里，正规军可以得到休息、补充和整训，游击部队和人民群众也可以在根据地受训。可以在根据地内修建碉堡、战略据点、军火库、交通线和铁路，还可以建造小型兵工厂，办学校。医院。

五台山，与抗日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五台山上，青庙和黄庙里的数千名和尚，喇嘛，几度列队欢迎抗日的子弟兵。有的和尚、喇嘛还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捍卫民族利益，出家人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转回到五台。师部设在五台城东的一个小村子里。

八路军总部也来到五台，总司令部设在一所白色的地主宅院里。

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分两路向山西太原进击，朱德率领抗日武装到晋北的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当朱德等人行进到盂县与五台之间的路上时，忽然遇到一支部队，警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平型关战斗以后，华北各地出现了许多“九路军”、“十路军”之类的地方武装，有的是真抗日，有的是以抗日为名骗取钱财。朱德仔细一看，这支队伍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政治委员薄一波。

在薄一波心目中，朱德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是一位令国人敬畏的英雄。途中突然相遇，当他看到面前这位老农式的人物竟是朱德总司令时，深有一种“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之感，连忙迎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叫薄一波，是共产党朱德打断了薄一波的话，和蔼他说：薄一波，我知道，知道。

薄一波喜出望外，滔滔不绝地说：总司令，我虽然带了一支部队，却不会打仗。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准备在晋东北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

朱德沉思片刻，明确他说：薄一波同志，你不要在这里，马上离开五台地区。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形势很好，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

朱德何以这样说？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以军官教导团一部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七·七”

事变前夕，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争取和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决定以薄一波等人组成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对阎锡山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阎锡山商定以后，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负责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并组建10个国民兵军官（军士）教导团。“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助其建立新军的协议。8月1日，以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在太原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各级军事干部大部分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八路军总部也派了一部分干部到决死队中工作。当第一总队扩大为第一纵队时，薄一波任纵队政治委员，朱德对这支武装的组建过程很清楚。

薄一波正听得入神，朱德又继续说：你在山西，不坏啊！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同我谈论过，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说到这里，朱德举目眺望远方，显得很有信心。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

正当薄一波脑海里闪现出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人民奋勇抗敌的情景时，朱德瞄了他一眼，果断地说：薄一波同志，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你们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我们已经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薄一波同志，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撵走！

托派、汉奸张慕陶？薄一波脑海中升起一个问号，忽然听到

总司令问：薄一波同志，你能不能办到呀？

能办到！薄一波毫不犹豫地回答。

朱德微微点头，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薄一波说：总司令，我们这支部队政治质量较高，其中不少人是从白区来的共产党员，但他们打仗不一定行。部队里还有不少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总司令能不能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

行！你要多少，我们给你多少。朱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后来陆续给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派去了不少军事干部。

接受了朱德总司令布置的任务以后，薄一波就去找阎锡山，明确提出要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带到晋东南去。阎锡山一听，立刻问：到晋东南去干什么？

那里地理形势好。薄一彼说。

一听到山西的地理形势，阎锡山眉开眼笑，喋喋不休地说：对！对！自古兵家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今长治一带）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占据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说到这里，做梦都想成为山西的“土皇帝”的阎锡山显得很得意。

阎锡山同意了薄一波提出的要求。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转至晋东南沁县、沁源一带后，按照朱德总司令的要求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协同八路军开创太岳根据地，并发展成为3个纵队，统称山西新军。这支部队由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设政治委员，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受八

路军总部指导的抗日武装。

太原失陷以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弃地溃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开始和华北地区进入主要地位。有一天，朱德总司令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军事力量，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都到会了，薄一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薄一波考虑到决死队第一总队来到太行山区以后，已由原来的一个团扩充成三个团，如果加上两个游击团，就有五个团了，就说：大家都把我们这支部队称为“山西新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团了，能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

不行！朱德一听，很明确他说：我们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讲得很清楚，要帮助阎锡山抗日。现在统一战线建立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把他一脚踢开。共产党是讲道义的，对于阎锡山，弃之则不义。

彭德怀看了薄一波一眼，说：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战，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

朱德为了解开薄一波的疙瘩，又说：薄一波同志，你们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嘛！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样做，我们有许多便利之处咧！薄一波同志，你们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薄一波略一思考，说：我没有打过仗。

朱德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不久，八路军派毕占云同志到山西新军去当参谋长。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战斗极为频繁，八路军总部也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经常转移。平型关大战前夕，朱德总司令就来到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部，和彭德怀一起下令：“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朱德总司令已经50多岁了，还是和战士们一样，日夜奔忙。

一天，彭德怀副总司令来找朱德总司令。特务团长想起昨天的事，心里还打鼓。

361

原来，特务团长已经为找总司令出了一身汗。昨天傍晚，他刚端起碗，总司令的警卫员急得满头大汗地跑来说：团长，你快想个办法吧，朱总司令找不到了。

朱总司令失踪了？特务团长一听，两个眼珠顿时鼓了出来。现在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五台山地区情况也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武装都有，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特务团长放下碗，立即组织机关人员分头到村里去找。

太阳慢慢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天空中只剩下一片紫红的晚霞。特务团长赶到村边时，看见朱德总司令手拿锄头，肩并肩地同一位老大爷在地里除草，心中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朱德看见战士们纷纷跑过来，忙招呼大家下地干活。

特务团长走到朱德面前说：总司令，天快黑了，你先回去，明天我们多派几个人来。

谁？总司令？老大爷得知眼前这人就是朱德总司令时，连忙去夺下朱德的锄头，含着泪说：总司令，你是天下最好的司令，八路军是天下最好的队伍！

朱德笑了，说：老大爷，老百姓养活了我们，我们不为老百姓办事，那还算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彭德怀走进朱德的办公室，滔滔不绝他讲起了各地传来的抗日捷报，讲到了敌情的变化。当两人谈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举行的平型关战役时，彭德怀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军很顽强，除非受了伤，否则是绝不投降的。

朱德“嗯”了一声，好久没有开口。

平型关，那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在现地指挥这场战斗的聂荣臻元帅曾经回忆说：“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面有些名气”。“我同林彪研究了一下……随即下达了命令……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与后期的不同，他们经过严格的军国主义训练，抵抗得十分顽强，虽然失去了指挥，仍分散着跟我们厮拼。有的爬在车轮下和沟坎上射击，有的向坡上爬，妄图夺取阵地。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甚至出现了敌军的伤兵与我们的伤员打成一团的情况，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

“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那时，我们的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但是，随着八路军政治部对日军开展大量的宣传工作，日军绝不投降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日军官兵中也出现了厌战、反战情绪，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反法西斯联盟在日军官兵中还散发了一些反战传单。一名日军尸体上的传单有这样一段话：可怜那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死亡的二十万名弟兄！力谁而死？为何而死？为了军国主义者——为了自己国内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军国主义者！难道我们再去上当吗？……亲爱的阵中同志们！……要求军国主义者偿还我们弟兄的生命。我们应该站起来，把枪口对向真正的敌人——军国主义者和财阀。只有打倒他们，我们才能在远东获得真正的和平。

想到平型关和其它一些战斗中日军不肯投降的情况，朱德心中卷起一股恼怒的激情，他几乎是用痛恨的口气说：日本人情愿被打死而不愿被俘，他们那种拼死作战的精神不应该单纯地说成勇敢，里面还蕴藉着犯罪的意识和胆怯。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强奸了那么多妇女，他们深怕给我们逮住。他们公然吹嘘自己的“杀光战”。他们以为，只要落在我们手中，我们会用他们折磨和杀害落在他们手中的中国士兵的办法来折磨和杀害他们。

彭德怀看了朱德一眼，心中也有一股怒火。

朱德沉思良久，又说：也许我们杀了自己的同志们了！我们的部队应该多学几句日文，好对日本兵喊：不杀俘虏。日本军官总是对他们的士兵说，共产党折磨、杀害俘虏。

是呀，这要引起我们重视。彭德怀说。

不久，八路军总部下达通知，广大指战员要学会战场用日语，“对敌工作部”也千方百计对日军开展宣传工作。

1938年，朱德总司令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把瓦解敌军作为政治战争的一个要点提出来。朱德说：“对于与我作战的日军及伪蒙伪满军队、保安队等等，估计到它们的士兵和一部分长官是不愿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牺牲品的，他们或则思念家乡，或则不忘祖国。抗日游击队应当用种种方法，如散发传单到敌军之中，喊话（用他们所懂得的言语），连络伪军里亲戚朋友等等，揭破敌人欺骗的政治宣传，指明侵略中国是于他们无益而有害，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帮助敌人——日本军阀来打自己的朋友，使他们明了我们抗日自卫战争的政治意义，说明我们与他们之间并无仇恨，说明即使他们战胜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受苦，说明他们只有用革命的败北主义——掉过枪口来杀日本军阀和汉奸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用这种种方法，使他们不反对以至同情我们的抗日自卫战争，使他们厌恶以至反对丑恶残暴的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和汉奸”。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军之间的生死大搏杀。在朱德总司令的指导下，广大抗日军民加强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在11月初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一名日本步兵军官和一名日军无线电报务员。

战斗结束了，当八路军战士把两名日本俘虏押进村庄时，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村民们把自己的深仇大恨都集中到这两名日本俘虏身上，有的人伸手要打日本俘虏，有的人怒不可遏，大声高喊，“杀死鬼子！杀死日本鬼子！”押送俘虏的八路军战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大家拦阻住。

见此情形，朱德总司令猛地登上一个高坎，大声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侵华罪行，讲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然后又详细讲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朱德说：乡亲们，我们了解到许多日本兵也是来自工人和农民，他们是被日本军阀和财阀强征入伍后派到中国来的，发动侵略战争的并不是日本人民。我们还了解到，日本国内有大批反法西斯人士因为反对战争而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军国主义者杀害了。我军历来宽待俘虏，在抗日战场上，我们也要俘虏、教育和训练日本兵，让他们帮助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谁知那个被俘的日本无线电报务员懂汉语，听了朱德总司令这番话，脸上的恐惧感消失了，他往前走了两步，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朱德说：我是一个日本兵，但我也是一名工人。我是被强行征调入伍后派到贵国来的，一直到被俘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国人民有这么和善。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打的，日本人民并不愿打。今后我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人群静静的，空气似乎凝固了。

乡亲们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还要宽待日本俘虏，第一次听到日本兵也反对打这场战争。

一连数天，这两名俘虏的日军都跟随朱德总司令一起行军。有一次，朱德给俘虏的日本兵一包香烟，这是一包日本产的烟，是几天前从战场上缴获的。那名日本兵犹豫了一会儿，接过烟抽了起来。

又有一次，朱德总司令把自己的马给俘虏的日本兵骑，那日本兵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了。

来到一个村子时，朱德让人买了一些饼干给那名日本军官吃。日本军官鞠躬致谢，一边吃饼干，一边喃喃自语：应该有个国际运动来改变目前解决

纷争的办法，我们这儿不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一个美国人，相处得都很好。

朱德听了译员翻译的这段话以后，说：你现在正跟着这种运动前进，所以你才能活着。在你们军队里，也有一些人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人。你是军官，日本兵帮助我们打败日本军队那一天总会到来的。

想打败日本军队？没有那么简单。日本军官的脸色刷地变白朱德微微一笑，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军队。

一名八路军战士看到总司令如此宽待俘虏，忐忑不安地问朱德：总司令，如果日本俘虏要回部队怎么办？

任何日本俘虏凡是愿回自己原来部队的，照样让他回去。朱德总司令显得很自信。我们准许日本俘虏回他们的部队，我们就会粉碎他们长官所说的我们折磨和杀害俘虏的谎话。

不久，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合发布了一项命令。该命令说：日本士兵乃是日本劳苦大众的子弟。在日本军阀和财阀的欺骗和强制之下，才被迫跟我们作战。因此：

（一）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件。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到惩处。

（二）对伤病日俘应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

（三）日俘凡欲回归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四）日俘如有愿留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意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

（五）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

（六）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

几名日军俘虏得知这项命令的内容后说：日本军队有一条军规，凡是在战场中被俘虏的日本人永远不能回归本国，被俘虏后再回到自己的部队的，一定枪毙。

朱德听后说：如果他们的长官枪毙他，更会在日军中惹起不安。将来一定有日本兵不经战斗就投降我们，或是开小差投奔我们。

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和上海以后，更加疯狂地发动进攻。在华北地区，沿平汉路南犯的日本侵略军于11月上旬突破了第一战区的漳河防线，进占大名和安阳；沿津浦路南犯的日军也于11月中旬前进到黄河北岸，准备渡黄河攻占济南；沿同蒲路南下的日军于11月中旬进占太谷、平遥。在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攻势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经退出冀、察全境和晋、绥大部以及山东北部地区。

11月17日，日本侵略军成立了侵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络会议。大本营很快确定，在华北首先对残存于占领地区的中国军队实行“扫荡”，对活动于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和晋东南严重威胁其后方和交通线安全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围攻，野心勃勃地要消灭或驱逐八路军，以便确保平汉、同蒲、平绥、正大等主要铁路交通线的安全。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以后，迅速展开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早在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

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9月20日，八路军总部收到毛泽东发出的电报，毛泽东提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发出电报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朱德和彭德怀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电报指示精神，于9月21日和25日对八路军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八路军所到之处应“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开创持久的胜利发展的局面”。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指示，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这以后，朱德总司令为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日夜奔忙。

晋冀豫边区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侵华日军的主要交通线，它既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11月11日，朱德总司令同彭德怀副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一起，在和顺以西的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朱德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各师把大部分兵力分散到各地，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扩大部队，打击汉奸，粉碎日军对内线的进攻。

根据朱德总司令提出的部署和要求，刘伯承师长召集全师党员、干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会议，决定把全师化整为零，每个营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团或游击支队，分散到各地活动。“石拐会议”成为开辟晋冀豫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分散到各地的八路军指战员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建立各种抗日组织、抗日自卫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并于12月底粉碎了敌人从太原、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出动的六路围攻，在西寨、沾尚等地毙伤700多名敌人。

在朱德的号召下，太行山区的工农子弟纷纷参加八路军，呈现出了一片“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景象，抗日烽火在晋冀豫熊熊燃烧。

晋冀豫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1938年1月13日，朱德应蒋介石的召集，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一起乘火车赶赴河南洛阳，参加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八路军出师抗日以来，蒋介石很注意朱德等人指挥八路军积极支援正面战场、屡创日军的行动。

1月17日，蒋介石专门面见参加会议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林彪、贺龙、刘伯承三位师长，一一称赞朱德等五名八路军高级将领。蒋介石还说，林彪在平型关打得好，刘伯承智计过人。

为了做好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的统战工作，朱德送给白崇禧一把日本指挥刀，送给何应钦一头军犬。

洛阳会议结束后，国民党第二战区把山西的军队分成东、南、北三路军，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日本侵略军在遭到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后，决定于4月初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八路军在获悉这一企图后，朱德总司令同彭德怀一起，从3月24日至28日连续召开4天东路军将领会议，决定八路军以一部分主力在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钳制进犯的各路敌军，再集中主力歼敌的一路，粉碎敌人的围攻。

4月4日，当日本侵略军从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等部队进行攻击，企图摧毁晋冀豫根据地时，根据地居民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人的指挥下，抓住战机，先急袭长乐村，毙伤日军2200多人，缴获步、马枪1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再战张店，歼敌近1000人。经过23天的艰苦战斗，八路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先后歼敌4000多人，恢复18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转战敌后根据地的数百个日日夜夜，朱德总司令深深感到，游击战争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已经传遍全国，在抗日战争中是没有力量把它取消的。朱德认为，抗日游击战争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产生出来的。日本侵略者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就不管有武器和没有武器，不管有军事人才还是没有军事人才，就在敌人远近后方或者敌人将到的作战区内自己动手干起来，或者经过抗日政府与抗日军队有计划地分派出正规部队担任游击任务，组织民众进行游击战争。抗日游击队就是在这中间形成的。

朱德深刻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敌人”。抗日游击队“包含着各种抗日的社会成分，得到全体同胞的拥护。每个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1938年，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这一著名论著。在这部著作中，朱德深刻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朱德认为，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因此，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极其紧要的事业”。

朱德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争，抗日游击队应当在艰难困苦、弹尽援绝的情形下坚持奋斗。在经济上，要取之于敌，没收日本在游击区域的财产及夺取日军辎重、粮秣及其它资材；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要取得当地民众经济上的援助；要节省，过刻苦的生活。

朱德还深刻论述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这五个要素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作用，游击队要根据这五个要素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关于武器装备，朱德深刻指出：“游击队武器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质量虽然差，却因为可以应用各种武器的缘故，数量上是可以多的。因为武器不好，所以作战时第一须利用地形，利用夜间或特殊天候来补武器之短，选择有利

于自己的武器的地形来发挥自己武器的效力。”朱德还提出了抗日游击队的七条活动方针，即：

- 一、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破坏仓库，袭击飞机场；
- 二、暴露敌人的企图；
- 三、震恐敌人的军心；
- 四、破坏敌人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
- 五、分散敌人兵力；
- 六、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
- 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最能发挥广大群众抗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适合于采取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的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逐步转变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军创造条件。在中国人民反抗日军侵略的重要时期，朱德总司令“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朱德的这部著作同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全国抗日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思想武器。

《朱德选集》第 54、55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第 5 页。

21 我这个人哪，就是小里小气的。一支枪
我不嫌少，一匹马我也不放过。日本皇
家空军一次次轰炸八路军总部，总司令
如是说

轿车，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常见的交通工具。在都市和城镇的街道上，到处可以见到长龙似的轿车队，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轿车在奔驰。

但朱德总司令到延安时，延安见不到轿车。

总司令到部队视察，或则步行，或则骑马。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外出，也是骑马。

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英勇业绩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也在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爱国侨胞克服种种困难，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慰问抗日英豪。一位华侨得知延安没有小轿车时，出于对中央领导和八路军将领的尊敬，特地把两辆小轿车送到延安。

1938年秋，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达王家坪那天，秘书兴冲冲地告诉朱德：首长，我们有一辆小轿车了。

轿车？哪来的轿车？朱德很惊奇。当秘书说明原委以后，朱德说：这辆车给毛主席。

373

毛泽东坚持不要。毛泽东说：两辆小轿车，一辆给朱德使用，一辆给“五老”使用。

“五老”，是指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毛泽东外出，像往常一样骑马。

一次，毛泽东骑马到枣园去开会，马在途中受惊，毛泽东从马背上摔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得像馒头似的。朱德去看毛泽东，让司机把小轿车开到毛泽东跟前。“五老”也来了，大家一定要把轿车给毛泽东。毛泽东摇摇头，硬是把司机“撵”出去了。

毛泽东要去大砭沟口中央礼堂作报告，一出门，看见门口停了一辆车。警卫员微笑着说：主席，你的胳膊摔伤了，走路不方便。顺手打开车门，请毛泽东上车。

毛泽东故意板起脸，风趣地说：小鬼，胳膊有伤，不影响两条腿嘛，走！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陈绍禹、张闻天、项英、彭德怀、贺龙、邓小平、罗荣桓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中央各部门与各地区的负责人53人参加了会议。朱德同其他八路军高级将领一起，是从敌后战场赶回延安的。大会开幕以后，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王稼祥，张闻天、项英等人分别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等报告，朱德总司令作了关于华北战场八路军工作的报告。

一年来，抗日战场的敌我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6月15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研究了攻占武汉、广州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兵力侵占武汉、广州，切断国际上援华的补给线。7月23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作出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明确提出要摧毁中国军队统一的指挥中枢，控制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夺取武汉以东长江沿岸各要点。

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20余万日军在海军和航空兵的协同下，向武汉发起进攻。武汉是中原的水、陆交通中心，素以“道通九省，冠盖辐辏之地”而著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为中心的湖北盆地，群山环抱，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城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分析了日军的进攻企图和兵力部署以后，决心以第五、第九战区及第三战区和鄂豫边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共50个军70余万兵力保卫武汉地区。8月下旬，日军展开大规模进攻以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抗击。

朱德总司令是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枪声炮声中作报告的。

朱德在报告中说，一年来，八路军将士活跃在西自山西、东至黄海，南起黄河，北到内蒙、热河等地，抗日的烽火燃遍整个华北，在国民党军迅速撤退，大片国土沦陷的情况下，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和吕梁山，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北大抗日武装，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二万多人的代价。

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也负伤了。

平型关战役打胜后不久，林彪师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官的大衣，同几名随员一起经过阎锡山部队的防区。阎锡山的军队以为他们是日本军人，远远地开枪射击。随着“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入林彪的胸膛，打穿了林彪的肺叶。这位八路军师长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到苏联治疗养伤了。

朱德还指出，由于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日本侵略军不得不分散兵力，保护后方交通线和运输队。八路军采用伏击、袭击和反围攻等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不仅迟滞、疲惫、消耗和歼灭了敌人，也在战役和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

六届六中全会要开40多天，朱德也要在延安住一个时期。

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朱德总司令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武汉会战，国民党军虽然杀伤了大量日军，却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朱德注意到，各路日军渐渐逼近武汉，武汉已经难以久守了。

10月26日，朱德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于昨天决定放弃武汉。失守，这两个字又一次跳了出来，像一柄铁锤，重重地敲击在他的中枢神经上……

几十小时以前，朱德还在汉口。

朱德原计划10月21日乘飞机到武汉，面见蒋介石，由于天气不好，飞机被迫改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许多朋友抱着遗憾离开了机场。

10月22日，朱德才飞抵汉口。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机场等候。

周恩来也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他在大会上发言后就离开了延安，10月1日就到武汉了。三天后，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张，当面转交了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14日，周恩来再次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说，他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但蒋介石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明确表态。

朱德见到郭沫若，非常高兴。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三河坝分兵以后，朱德同郭沫若阔别已经11年了。郭沫若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当时，日本军队正在向汉口进迫。朱德到达汉口不久，就由周恩来陪同

去见蒋介石。朱德详细介绍了八路军抗战一年来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朱德还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朱德还提出了把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增发经费和弹药的要求。

蒋介石听得很仔细，对八路军扩大编制的要求，他没有答应。

这次到汉口，朱德只在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家里住了一夜，23号就乘飞机回延安了。郭沫若与朱德故友重逢，格外欣喜。

朱德说，沫若同志，写首诗吧，留作纪念。

郭沫若是著名诗人，他深情地望了朱德一眼，随手拿起笔，写了一首白话诗。当郭沫若把诗递给朱德时，朱德也写好了一首白话诗。

郭沫若接过朱德写的诗，兴致勃勃地朗诵起来。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需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
相见必期在鸭绿江边。

回到延安以后，朱德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武汉会战的情形，浮现出他同蒋介石那次短暂的会见。

其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那天，其党、政、军机关已经从武汉撤退完毕。10月2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国民党军武汉保卫战以丧失武汉三镇而告终。

在华中日军进攻武汉的同时，华南的日军也分两路向广州进犯，并于10月21日占领广州，国民党第四战区的主力被迫退向粤北地区。

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把华北地区作为打击的重点。

那些天，朱德总司令白天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晚上又忙于处理八路军在前线的作战事宜。

总司令难以忘怀敌后战场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

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第二战区的部队对日军进行反攻，以策应即将进行的徐州会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东路军，进入晋东南的大行山区打击日寇。

一天，当朱德率领两个警卫连前进到长治附近的古县镇时，突然得到日军已经占领长治的消息。

朱德问：长治有多少日军？

一个旅团。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一名排长跑到朱德面前，

说：总司令，这路敌人太多，武器又好，我们设法避开他们？

朱德沉思片刻，摇了摇头，说：不，我们要迎上去。拖住这路日军，我们背后的友军就能安全退却，临汾的军需物资也能从容撤出。

战斗异常激烈。警卫连的大部分指战员都到第一线去阻击敌人了，朱德身边只有几名警卫员和通信员。当日军摸清只有少数八路军部队阻击他们前进时，指挥官恼羞成怒，组织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猛攻。

第二天，日军又调了十多架轰炸机，企图彻底摧毁古县镇的八路军总部。谁知日本空军错把沁县以南一个叫“故县”的村子当作朱德所在的古县镇，上百枚重磅炸弹倾泻到故县，刹那间，故县变成了烟雾火海。

当日军得知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时，就大肆吹嘘八路军总部被皇家空军炸为一片焦土。

这条消息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

朱德将军是否安在？

朱德将军有无下落？

国内外记者纷纷打电报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电话整日不断。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日军飞机轰炸故县时，朱德总司令正镇定自若地在安泽附近的古县镇指挥战斗呢！

然而，整日在敌后战场奔波的朱德总司令曾多次遭到敌机轰炸，朱德总是临危不惧，泰然处之。

一天，朱德同参谋们一起聚精会神地在八路军总部研究作战计划，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一阵沉重的轰鸣声，抬头一看，十几架日军飞机黑压压地飞过来。刹那间，一枚枚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警卫员急促地跑过来，劝总司令到山上的防空洞里去躲一躲。朱德抬头看了看敌机，说：我不要紧，快去通知部队，注意隐蔽，不要暴露目标。说完，朱德又伏下身，继续研究作战计划。

八年抗战，朱德总司令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险情。古县镇和故县的阴差阳错，使日本侵略军的阴谋又一次落空。

朱德率领两个警卫连同日军周旋3天以后，支援部队终于赶到了，援军是两个新兵连。

警卫连长又发愁了。这些新兵不仅缺乏战斗经验，携带的武器装备也很差，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连步枪都没有。日寇的围攻越来越紧了，八路军总部多么需要一支战斗力强的援兵呀！

朱德来到新兵连，同新兵一一握手，镇定自若地向大家介绍了敌情，亲自为他们布置了战斗任务。

第二天，当日本侵略军的几十辆卡车沿着一条山路前进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紧接着，数百枚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在敌人的车队中，随着接连不断的一阵阵爆炸声，山路上浓烟翻滚，火光冲天，许多日本兵被炸死炸伤。当新战士们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自己的“土铁蛋”竟然换来许多洋武器时，纷纷奔走相告：跟着总司令，仗仗都必胜！

强将手下无弱兵呀。

一阵秋风，从朱德面前拂过，它吹落了路旁树梢上的枯叶，把窑洞的门窗叩打得嗖嗖响。朱德看见树上轻轻晃动的叶子，想起了初秋的那一场战斗……

那天，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来到屯留县。八路军总部是不久前转移到屯

留县的。深夜，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日本鬼子向八路军总部发起了突然袭击。

朱德总司令分析了敌情以后，当机立断，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率领两个半团，带上一批重武器，分别从东、西两侧突围；他自己带一个警卫营留在八路军总部，拖住日本鬼子，保障左权率领的部队顺利突围。

在密集的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日本鬼子不断向八路军总部逼近。战斗异常激烈，警卫营只有一挺重机枪，其余都是步枪，朱德巧妙地组织了几个火力点，有力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拂晓，朱德又抓住战机，亲自率领警卫营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迅速向北转移。

日本鬼子进入屯留县时，八路军指战员早已无影无踪。

山西省沁水县丁店一战，徐海东、黄克诚那个旅同日本鬼子拼得很凶，虽然打死打伤了不少日本鬼子，但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朱德知道后，于7月12日专程赶到沁水县端氏镇，批评了正在端氏镇休整的这支部队。

总司令的批评让指战员们心服口服。

朱德来到端氏镇时，排以上干部已经在旅部集合好了。朱德同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和政委黄克诚交谈了一会儿，就由涂海东、黄克诚陪同走进会议室。

徐海东先讲话。他说：今天把大家集合起来，不是下达战斗任务，而是和大家谈谈心。丁店一仗，我们虽然打胜了，但是部队伤亡太大。为了及时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朱德总司令特地赶到我们旅来了。

指战员一听旅长身后那位身材健壮、满脸微笑、眉毛又浓又黑的首长是朱德总司令时，院子里立刻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同志们，你们辛苦！朱德挥动手臂，掌声停止了。朱德说：丁店一仗，是硬仗、恶仗，你们打得很苦哇！虽然你们打胜了，可我还要批评你们呢！总司令的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语气里慈爱多于责备。

我们八路军要打日本鬼子，是打大仗好还是打小仗好？或者是大仗小仗一起打？朱德微笑着问。

打大仗，大仗可以多消灭鬼子。一名干部说。

大仗要打，小仗也要打。我们要大仗小仗一起打。另一名干部说。

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大家为打大仗和打小仗争论不休。

朱德示意大家静下来，风趣地说：我看哪，你们这些人眼大，看不起小仗，这很危险哟！

381

会场里鸦雀无声，指战员的目光都集中到总司令身上。

你们这支部队很勇敢，有一股拼劲，这很好嘛，这是要发扬的，但是，你们还缺少智谋呀！中国古代有个大军事家，叫孙武，他认为打仗要“知己知彼”，要搞好调查研究，对敌人的情况要了如指掌，才能“百战不殆”。同日本鬼子打仗，更要讲智谋、讲战术。如果单凭现有的力量去同鬼子硬拼，那怎么行呢？！大家知道，鬼子现在兵力多，武器好，巴不得同我们打大仗呢！

朱德看到有几名干部低下了头，稍稍停了停，又说：我这个人哪，就是小里小气的，我就不愿意打大仗，因为打大仗要吃亏嘛！就说进攻平阳府那一仗吧，当时，我们就放过了鬼子的大部队不打，只带了总部的警卫连去伏击他的后勤部队。那次战斗，一支枪我不嫌少，一匹马我也不放过。当鬼子

的大部队调过屁股时，他的后勤部队都被我们“吃”掉了。那一仗，我们自己没有伤亡，还消灭了不少敌人。这么便宜的仗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朱德见大家的注意力很集中，又提高语气说：同志们，只想打大仗，不想打小仗，看不起一支枪、一匹马、一辆车，这样打下去，不但不能打败鬼子，连我们现有的部队都要赔进去喽。八路军整编以后只有3万多人，日本鬼子却有100万精锐部队，如果我们同他们硬拼硬打，日本鬼子就是抽出十分之一的部队，八路军一个拼他两个，胜利也许还是日本人的。

朱德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语气也变了。我们这支抗日的部队，来得不容易呀！今天的战士就是将来的干部。我们不光要消灭敌人，更要发展、壮大自己。一个独立营，一支游击队，即使每天消灭一个敌人，看起来数量虽然少，积少胜为大胜，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这里就有辩证法，就要用智谋呀！

听了这番话，大家心里豁然亮堂了。

丁店一战，朱德印象极深。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总司令在关于华北战场八路军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应该利用有利的地点和时间巧妙地同日军作战，绝不应该同兵力相同，并且拥有优良装备的敌军硬拼。

六届六中全会一直开到11月6日才闭幕。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下讲斗争的迁就主义，重申了全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全会还确定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

八路军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的方针，决定以3个师的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使八路军、新四军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不得不进行另一场艰巨的斗争——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朱德心里明白，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限制异党”的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共产党，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38年夏天，国民党顽固派就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就地开白条子吃粮食。朱德没有理睬。

一天，八路军总部得到消息，重庆国民党政府准备派一个“战地军风纪视察团”到解放区，来视察八路军的军风纪。这个团的权力很大，如果他们发现八路军有什么“不轨行动”，可以“就地处理”，可以立即停发八路军的军饷。显然，这是别有用心的。

朱德总司令知道这件事以后，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要来，那就来好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战，打日本侵略者，人人有责。既然要打仗，就要吃饭，不能空着肚子打。八路军打日本，吃粮食，是合情合理的，这犯什么法？

“战地军风纪视察团”并没有到解放区来，但国民党政府不仅制造借口，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一次次地掀起反共高潮。

武汉失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以“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借口，把陕甘宁边区政府称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令其存在”。为此，国民党先后调集了胡宗南等部及反动地方武装共30多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对

陕甘宁边区实施包围。1938年12月，国民党第一六五师奉胡宗南的命令，侵占了陇东分区的赤城、白马铺等地。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和演讲中公开说，抗战到底的“底”即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我们下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回复了就是胜利”。这就道破了蒋介石的抗战天机，暴露了国民党在抗战中消极、妥协的本质，企图默认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和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还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专门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远方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等许多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条例和办法。

朱德注意到，国民党在军事方面规定：“第十八集团军既经改编为国军，其军令、政令，应统一于中央。所有该军编制、补给等，均应遵照中央法令办理，不得有‘特殊表现’及私行征募等情事”。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有改变。在短短10个月里，国民党军队与当地反共势力制造的反共磨擦与军事挑衅事件达150多起。朱德总司令在领导根据地军民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坚持自卫原则，坚决制止和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939年4月，第十七集团军军长胡宗南与当地反共势力勾结，派部队进攻镇原，宁县的八路军，制造了第一次“陇东事件”。5月，国民党得知八路军残废军人医院驻在 邑县（今旬邑）土桥镇时，集中了关中地区8个县的保安队，袭击八路军残废军人医院，惨无人道地杀害抗战有功的伤残人员10多人，制造了“ 邑事件”。

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兵突然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信处，枪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众，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被活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平江惨案”。

朱德得知这些情况以后，非常愤慨，这以前，对于国民党的军事挑衅，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总是从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一再忍让。现在，朱德不能再沉默了。平江惨案发生后，朱德同毛泽东一起立刻致电重庆，揭露了国民党的暴行，要求迅速严惩有关人员，正式向八路军、新四军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蒋介石没有回复。

8月，胡宗南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指令暂编骑兵第二师由三原北犯，企图攻占 县（今富县），并以一部兵力进至延安以南三十里铺一带，直接威胁延安。国民党第六军军长石友三公开与日本鬼子勾结，攻击八路军。

对此，中央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命令第一二 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第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返回陕甘宁边区；命令留守兵团调整陕甘宁边区的防御部署；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加强反顽作战的指挥。

第二：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名致电蒋介石，揭露385国民党军队的反共罪行。

这份电报是用密码发出的，朱德和彭德怀在电报中引用了石友三给部下

的命令。其中有一段话是：

据蒋委员长令，为了国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全军必须剿灭阻碍抗战的共匪……目前阶段，应首先肃清共匪，第二阶段则为对日作战。

第六军如与日军冲突，应立即后撤，并派代表向日军解释。日机来时，在房顶摊开白布，命令所属不得射击。

第六军如遭遇共匪，除必要的警戒外，其他行动，应通知日军。必要时，应协助日军与共匪作战。朱德和彭德怀发出的这份电报，是对蒋介石的一种警告。蒋介石借口石友三的命令全属虚构，不予承认。蒋介石开始感到石友三的叛国行为过于彰明昭著，不久就把石友三诱捕枪决。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没有停止。

1939年12月初，胡宗南先后调集第九十七师的3000多人，于中旬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之第七七团，杀伤该团干部战士300多人，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盘踞于庆阳、合水等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也乘机向八路军进行骚扰袭击。“第二次陇东事件”发生不久，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谁知，国民党又制造了一次更为严重的“十二月事变”。这一事件是阎锡山在幕后策划的。

早在3月份，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新军，当遭到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的反对时，阎锡山又提出改编新军，并秘密制定了“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

朱德觉察到阎锡山有利用旧军消灭新军的图谋时，明确告诉薄一波：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确实掌握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确实掌握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朱德还让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到决死队去，研究应变之策。

但阎锡山一意孤行，11月，阎锡山密令旧军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和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各派一名代表，到临汾后村同日寇进行谈判。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以实行反共为条件，要求日本鬼子归还侵占山西工矿企业资财的49%，归还各将领的住宅。

日寇不但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还愿意接济晋绥军的军械弹药，帮助晋绥军“剿除”八路军。

一个新的阴谋出现了。

12月1日，阎锡山以第2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出所谓冬季攻势的作战命令，暗中命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

12月3日，国民党军队在永和附近袭击了决死队第二纵队的第一九六旅旅部，破坏了永和、石楼等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了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387 面对国民党蓄谋已久的反共高潮，八路军在继续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同时，要求各部队对阎锡山的军队严加戒备，掩护与支援新军实行自卫，审

慎而坚决地同阎锡山的反共行动进行斗争。朱德总司令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细致的团结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当国民党军队制造磨擦时，则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同顽固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在同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的斗争中，充分表现出了朱德总司令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

朱怀冰是湖北省黄冈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同朱德一样都是同盟会会员。1913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四期，毕业后到川军和云南讲武堂任职。1925年，朱怀冰到广州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上校科长，以后又陆续担任局长、旅长、副师长、庐山军官训练团政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1938年晋升中将、第九十七军军长、豫北自卫军总指挥等职。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朱怀冰对待八路军和抗日人民的办法是：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

1940年初，朱怀冰率部由陵川、辉县北进，包围压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争取朱怀冰共同抗日，朱德总司令同意刘伯承师长亲赴冀西，向朱怀冰表明八路军的严正立场。

刘伯承严正告诫朱怀冰：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和人民用鲜血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我们以大局为重，一让再让，已经是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了。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吧？我们一二九师一个师抵御了十万日军和十几万伪军，并不是怕你们，我们为了团结抗战，不忍同胞自相残杀，要是逼我们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

朱怀冰受蒋介石指使，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一天，朱怀冰带了十多名骑兵，气势汹汹地来到王家峪八路军总部，要八路军让出根据地。当时，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都在八路军总部，朱德听了朱怀冰的来意后，一面从大局出发，耐心劝告他：八路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日本侵略军。在大片领土丢失的民族危难之际，中国人的枪口要对准日本人。一面又严肃指出：八路军的根据地是抗日救国的必要条件。你们要占领，人民不会同意。你们想要地盘，你们就把日本鬼子占领的广大沦陷区夺回来嘛！如果你们进攻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是要自卫的。

这场自卫战斗终于爆发了。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在冀南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把八路军东进纵队2个连和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围攻东进纵队第三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队，企图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2月初，驻扎在武安、涉县、磁县的朱怀冰奉蒋介石的命令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企图夺取八路军的太（行）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总司令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进行自卫反击，连续打了两个漂亮仗。

一仗是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的卫（河）东战役，先后歼灭石友三等部6000余人，把国民党顽军赶到根据地边沿地区，巩固了冀南、冀鲁豫抗日阵地。

另一仗是在平汉铁路以西进行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这一战役打了两天，歼灭了朱怀冰第九十七军及其游杂武装1万多人，其中俘虏7000多人。当朱怀冰率领残余的3000多人逃到林县以南时，遭到

预先埋伏的别动支队的截击，又被歼 1000 多人，仅剩 2000 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

3 月 9 日，朱德忽然接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信，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的部队。

朱怀冰失败后，蒋介石多次打电话责令卫立煌出兵攻打八路军，他军队内部的一些顽固分子也有意制造摩擦，妄图挑起事端。卫立煌在抗战初期就同朱德多次接触，对八路军有所了解。在进退维谷的处境下，卫立煌一面在晋南召开军事会议，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求部队做好行动准备；一面写信给朱德和彭德怀，请八路军暂时把部队撤回去。

朱德以大局为重，在团结抗日的原则下同意了卫立煌的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划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两军边界，八路军在北面活动，国民党军在南面活动，彼此不得越界侵犯。

卫立煌见自己有了在蒋介石面前讲话的本钱，非常高兴，又特别邀请朱德到洛阳去谈判。

朱德决定赴洛阳谈判。

当时，朱怀冰正在洛阳养伤，洛阳的国民党特务也很多，大家都为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朱德却说：只要国民党不投降日本，我们就还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这次我们打了他们，还是为了团结他们共同抗日。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没有什么了不起，抗日救国是最重要的。

总司令洛阳之行，康克清也一道去了。

5 月上旬，朱德、康克清等人来到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后，受到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

卫立煌见到朱德和康克清时，送给康克清一支自来水笔，这支笔同 1938 年夏天送给朱德的一样。当卫立煌看到康克清身上背着的是十响大手枪时，微笑着说：哟，女同志带这，多不方便。说完，送给她一支精致的德国毛瑟小手枪。

朱德送给卫立煌的礼物是延安出版的各种报刊。

跟随朱德到洛阳的八路军指战员身上穿的都是晋南的土布军装，卫立煌让副官处找来裁缝师傅，为每个八路军干部缝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料的灰色军装；随总司令来的警卫连则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团的标准，每人发一套新衣新鞋。

在长官部招待所里，朱德总司令和随行人员每天三餐十分丰盛，晚上还开夜餐。朱德对招待人员说：这样招待我们受不了，还是从简一点吧。

招待人员说：这是卫长官特别吩咐的。

22 一名外国记者临终遗嘱：我特别要求将 我的遗体火化，把骨灰运交朱德将军

1993年12月10日。

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朱德传》出版发行暨纪念朱德诞辰107周年座谈会。江泽民主席在赞颂德高望重的朱德同志给我们留下光辉业绩和宝贵精神财富时说：朱德“是十大元帅的第一位。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撰写了描述朱德同志革命事迹的《伟大的道路》，她在遗嘱中指定将该书的稿费近一万马克留给朱德，朱德同志分文不取，指示用这笔钱给国家购进一大批急需的科技图书”。

史沫特莱，一位美国人，怎么知道朱德总司令的经历，执著地倾注全部精力，写出了《伟大的道路》这部著作呢？是什么力量使她在遭受“胃溃疡”、“要割去五分之一的胃”的病魔侵袭中，坚定不移地完成了《朱德的生平与时代》这部巨著的呢？

史沫特莱，1890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农的家庭里，比朱德小4岁。曾经同史沫特莱同事的日本翻译家石垣绫子说，史沫特莱是一位“含有少量印地安血统的作家，她的出生犹如在贫困与愚昧的世界中的一粒种籽从寒冷的旷野中以它可惊的生命力发芽茁壮，它排除了周围的杂草，在苦难的时代中锻炼成长”^[1]。

童年时代，史沫特莱居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矿区附近的小镇上。由于家里贫穷，史沫特莱从小就一面打工，一面上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开始在《纽约呼声报》工作，从此开始了她的文笔生涯。

史沫特莱是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的，那是1937年1月初。

在这以前，史沫特莱听到了许多关于朱德的传说。在这位美国作家的脑海里，朱德一定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因此，她到延安的第一天晚上，就大胆地踏进了红军总司令的窑洞。她心中有些疑惑。

你来延安准备做些什么事呢？朱德问她。

史沫特莱多少有些吃惊。在蜡烛光的映照下，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红军总司令“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色，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然而史沫特莱很快感到这孔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的窑洞里、在朱德的声音和动作中，充满了大丈夫气魄。

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朱德感到惊讶。

史沫特莱的回答更有意思。她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史沫特莱到中国已经不是一次了。1929年，她第一次穿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就认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知名人士。1933年，她再次来中国，把在

^[1]《解放军报》1993年12月11日。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530、2页。

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今日中国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向国外揭露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第二年，她又写了一本《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书，第一次向世界公众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作战的情况，介绍了苏维埃边区的情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红军长征胜利以后，史沫特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陕北，陕北聚集了红军的高级将领，其中有红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明白了史沫特莱的来意，微笑着说：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你到延安来了，就到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史沫特莱接受了朱德的劝告，她去采访了许多其它红军将领。她觉得红军将领都有许多传奇色彩的事迹，都是很好的文学作品的素材。后来，史沫特莱又来找朱德了，朱德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在史沫特莱的一再要求下，朱德同意谈一谈自己的经历。

从此，朱德和史沫特莱就有了“君子协定”，朱德每周抽两三个晚上的时间同史沫特莱交谈，史沫特莱一边听一边记，非常认真。朱德到延安后，日夜忙碌，能特地抽出时间同史沫特莱谈，史沫特莱很高兴。

朱德和史沫特莱的“君子协定”没有执行多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朱德奉命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因抗日战争的烽火被迫中断。

数个月的采访，使史沫特莱更加加深了对朱德的认识，这位美国女作家从红军总司令的坎坷经历中看到了中国的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求索精神，心中充满了对朱德的敬佩之情。“我要去找朱德”。史沫特莱不止一次地在心中说。

女作家毅然背起行装，辗转跋涉，克服种种困难，于1937年10月来到山西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当时，朱德正好坐在台阶上理发，看见史沫特莱，连忙站起来向她致意，急得理发员拿着推子在一旁发急，连声说：首长，请坐下，快请坐下。在随军采访中，史沫特莱亲身感受到了根据地人民欢迎八路军的热烈场面，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八路军总司令的爱戴，亲耳听到了人民群众赞扬朱德的肺腑之言。这位女作家在一篇日记中生动地写道：当我们进入当地大县中阳城的时候，街上有数千居民，手里拿着旗子欢迎我们……朱德今天的讲话，使我感到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似的。也许，是满街的旗子、欢迎的口号以及全神贯注的人们把他给感动了吧。因此，他讲话的声音、言词、举止、神情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听众歪着脖子静静地听着他讲……倾盆大雨落在一张张朝向朱德的脸庞的时刻，全场屏息静气，鸦雀无声。

随着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作战越来越频繁。朱德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劝说她离开山西。

史沫特莱不愿意，执拗地说：不管你们到哪儿，我也要到哪儿！

朱德笑了，耐心地劝导她：你可以到汉口去，在汉口能做很多事情。

那是让我在精神上死亡。我在八路军里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过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同你们这支军队在一起，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

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在一旁劝说，现在战斗很频繁，我们要不 395 停地转

移。子弹不长眼睛，说不定你还有可能被打死。朱德显得很耐心，又说：你先走吧，以后再回来嘛！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能回来的。

史沫特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既然如此这样，那我只好走了。

朱德不断地安慰这位美国作家，还表示要为她开一个欢送会。1938年1月。一天早晨，史沫特莱依依不舍地向朱德告别。

史沫特莱再也没有见到朱德。

但史沫特莱永远也忘不了朱德。

离开抗日根据地以后，史沫特莱开始整理从西安事变到1938年初的日记和信件，编辑成《中国在反击》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

1940年夏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很严重。德、日法西斯在西方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德军侵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之后，又同意大利军队一起入侵法国，法国被迫投降，英国军队退出了欧洲大陆。这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日本侵略军决心乘英、美等国无力东顾之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以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其迅速屈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对中国内地政治、经济中心的空袭，着重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对国民党继续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力战”，集中侵华兵力（不包括关东军）的75%和全部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地“抢光、杀光、烧光”，制造无人区，因而敌后抗战的形势日趋困难。当时，史沫特莱的胃病越来越重，再返回抗日根据地采访朱德就更加困难了。

1941年，史沫特莱带着采访朱德的记录稿回美国治病。

在治病期间，史沫特莱时时都关注着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关注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也没有忘记大洋彼岸这位热情的美国朋友。

1944年8月14日，朱德把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写信告诉史沫特莱。信中说：在你离华期间，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和纺织业的生产取得很大的成绩，和国民党区比较，边区的人民可以保证吃得好些，穿得也好些。我军在前方仍很艰苦，但又收复了1941年、1942年被日军占去的土地，抗日根据地比以前扩大并且更加巩固……在中国，正像在世界各地一样，潮流是朝着人民胜利的方向前进的。如有可能，我们希望你能再到中国来，同我们多住一个时期。

信收到了。史沫特莱没有成行。

女作家一往情深，对中国这片热土怀有深厚的感情，然而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病魔阻止她穿越太平洋。

美国萨腊托加——斯普临斯镇附近，有一座专供艺术家和文学家使用的耶多庄园。1945年夏天，病魔缠身的史沫特莱从纽约来到耶多庄园，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

她太想写朱德了。一拿起笔，她就觉得自己活跃在中国革命的阵地上，

仿佛又与八路军指战员在一起吃饭、一起行军、一起睡木板……为了把朱德总司令的生平写得更翔实，她写信向朱德索取资料，向朱德报告了自己的创作打算。

信寄出去了。女作家每天都在期待着……

整整 8 个月过去了，史沫特莱终于收到了朱德的信。

397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朱德在信中说：

亲爱的艾·史沫特莱女士：

首先，对你和所有的美国朋友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运动寄予的关注和所作的努力，我必须表示深切的感谢。自今年一月以来，中国在一个短时期内赢得了普遍的和平并看到了民主化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的美国朋友的努力……反动派的阴谋，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终将为中国人民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所击败。目前，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从各方面巩固力量，以便粉碎反动集团的阴谋，而反动集团的困难和危机却在日益增加。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化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无疑将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你重返中国的愿望也一定能够实现。朱德还希望史沫特莱“不要因为看到中国某些地方的暂时的黑暗而感到失望。请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这封信是朱德在 1946 年 7 月 1 日写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数百万军队已经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严重的形势下，朱德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朱德热情支持史沫特莱的工作。他在信中说：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日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它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史沫特莱打开朱德寄出的包裹时，还收到朱德赠送给她的两件小小的礼物：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一块丝织的披肩。这都是延安的工人手织的。史沫特莱细心地欣赏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又耐心地折叠起来。

史沫特莱把朱德赠送的礼物放在壁炉架上，旁边放着一个插着楠木材枝的花瓶。这些楠木材枝是她特地从美国南部的一个朋友那里要来的。她知道朱德的家乡盛产楠木，为了体验养育朱德生长的环境气氛，她特地设置了这种“小气候”。

这以后，朱德又两次收到史沫特莱寄出的信，得知史沫特莱住的那座僻静的庄园并不安宁，由于形势的变化，从 1947 年到 1949 年，史沫特莱不断受到盯梢、诬陷，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愿望，终于在 1949 年 1 月完成了传记的初稿，定名为《伟大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收到了史沫特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下的信。她在信中说：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是老样子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我希望您和毛（泽东）还是三

《朱德选集》第 187、188 页。

《朱德选集》第 188 页。

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由于史沫特莱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她不得不设法摆脱美国的反共狂潮，前往英国伦敦，修订《伟大的道路》。她曾经对一个朋友说：“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究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史沫特莱的新中国之行未能实现，由于长期贫困和精神上的抑郁，她患了胃癌，在英国牛津医院做手术无效，于1950年5月6日逝世。史沫特莱在遗嘱中写道：我特别要求将我的遗体火化，把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一切从我写作所得的款项均请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可以运用这笔款子，把它用在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上。

朱德遵从了史沫特莱的遗愿。

1951年初春，朱德将史沫特莱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公墓中矗立起一块青灰色的大理石墓碑，墓碑上镌刻着：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朱德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朱德还同另外一些外国朋友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战争的情况，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位是美军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卡尔逊早就知道朱德的许多故事，一直想见见朱德。初到山西洪洞县马牧村，他看到的朱德是一位穿着普通战士的平纹蓝布制服的结实的军人，他那古铜色的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直觉告诉他：朱德是一个热情慷慨的朋友。

朱德同卡尔逊一起走进八路军总部。这是一座四合院，房间里显得很简朴，墙上挂着那张山西、河北地区的地图格外引人注目。为卡尔逊当翻译的是26岁的年轻大学生周立波，周立波已经为卡尔逊翻译十多天了。

你是访问我军的第一个外国军官。朱德热情地为卡尔逊让座以后，问：你到这儿来究竟想看什么？

我想和你们在战区行动的部队一起生活。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你的军队有效地用于抗日的所谓游击战术的故事。作为一个军人，我很想了解构成这些战术的方法。我还想知道一些指导你们士兵行为的准则。卡尔逊用期望的目光望着朱德。

朱德略一沉思，微笑着说：好吧，明天我们要召开参谋会议，你可以提出所有你想知道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讨论你的随军旅行。现在我们吃饭去。

经过短暂的接触，卡尔逊油然而升起一种信任感。他感到，朱德“具有一种崇高的性格。他绝对地无私、善良、耐心而又判断深刻。他总是征求别人的批评，对自己的成就则轻描淡写。他对军事形势的分析是尖锐而又具有启示性的”。

陪伴卡尔逊吃饭的还有左权等人，朱德一一向卡尔逊作了介绍。卡尔逊坐在凳子上，扫了一眼桌上摆着的炒鸡蛋、白菜汤和几碗米饭，感到八路军的这些将领态度是友好的，无拘无束的，他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用起餐来。

朱德看见卡尔逊放下了碗筷，问：你想看篮球赛吗？

卡尔逊点点头。

朱德和卡尔逊来到操场上时，篮球赛正打得激烈。卡尔逊惊奇地发现，球场上有一张西方人的脸。

她是你的同胞，史沫特莱女士。朱德注意到了卡尔逊的表情变化。

卡尔逊站在球场边，全神贯注地观看球赛。天完全黑下来了，他才同朱德一起回到八路军为他准备的居室里。

朱总司令，你能告诉我有关你们组织的一些情况吗？卡尔逊坐在人炉边，喝了一口茶，大胆地问朱德。

朱德微微一笑，说：我们共产主义者绝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野蛮。过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中国农民，中国农民遭受的苦难太多了，我们希望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国民党共同参与建立真正的民主事业。目前，国家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打败日本侵略军，因为日本人要使我们沦为附属国。接着，朱德详细介绍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开辟敌后根据地、取得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战斗胜利的情况。卡尔逊听得很认真，似乎要把朱德讲的每一句话都印在脑海里。

夜更黑了。窗外乌蓝的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流星迅速掠过，用最后的光辉把四周照得透亮。朱德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又回头说：明天 11 点左右我派人来接你。

卡尔逊了解到，在八路军里，只要提到朱德总司令的名字，人们就会投来一种钦佩的目光，无论有什么艰难困苦，朱德总是和战士们在一起。

在朱德身上，卡尔逊感觉到了美国内战时的南军司令罗伯特·E·李的仁慈，阿伯拉罕·林肯的谦恭，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U·S·格兰特的坚强。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不仅采访过毛泽东，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同朱德总司令也有一段令她难忘的交往。

斯特朗看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记者的敏锐驱使她克服困难，一定要亲自踏上中国西北那片神往的土地。

1938 年 1 月上旬，斯特朗经过汉口来到山西临汾。在第二战区司令部，阎锡山以中国特有的美味佳肴招待美国记者，但斯特朗对阎锡山的盛情不感兴趣，她希望尽快见到朱德。

当斯特朗坐着一辆老式的福特卡车，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司令部时，朱德总司令已经在路口等候她朱总司令，八路军是在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作战还是作为政府的同盟军作战？这位美国记者一见到朱德，就提出了她思考已久的几个问题。她大概没有想到，朱德的回答比她的提问还要坦率。

八路军是政府的正规部队，是第二战区的一部分，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是阎锡山。我们可以打阵地战，也可以打运动战，但在目前，我们主要在敌后对日作战，所以我们采用游击战术。我们认为，拯救中国的希望主要在于华北的游击部队。

你们怎样对日军作战呢？

我们的战略前提是进行持久战。为了赢得战争，我们不仅要教育和组织部队，而且要教育和组织人民。

在八路军总部，斯特朗经常听到有关朱德的传说。

有人说：朱德神通广大，只要用扇子轻轻一拂，就能将敌人驱散。

有人说：朱德眼观六路，百里之外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

斯特朗在洪洞县马牧村只住了短短的 10 天，但她觉得八路军的粗茶淡饭比阎锡山的山珍海味还有味，她对朱德总司令产生了一股敬佩之情，在结束对中国的采访时，她在深夜 2 点还给朱德写信，向“亲爱的朱德先生”表示她对“八路军同志们为我们共同的目的而献身的事业的敬佩”。她觉得，“中国的同志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真诚，有一种对同志炽灼的热情。”

斯特朗还坦率地向朱德表示：我很幸福，因为我在一个世界上，在一个世界的运动之中，那中间，有中国的同志们，也有你……

9 年以后，当斯特朗再次来中国时，她在延安又见到了朱德。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斯特朗下决心要同人民解放军一起行动，朱德则要派人护送她回北平，朱德耐心地劝说：你年纪大了，你更重要的任务是写作，部队经常要转移，没有固定的地方，你在那样的年件下不可能从事写作，更不可能发表任何东西。

听了朱德这番话，斯特朗忍不住痛哭起来。

第二天，她带着同朱德一起的珍贵留影，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前往北平。

她接受了朱德的劝告。

柯棣华大夫是印度援华医疗队的著名医生，在华北工作达 5 年之久。1942 年 12 月 9 日，柯棣华大夫不幸逝世，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各界召开的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并宣读祭文。朱德总司令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柯棣华大夫》的文章，朱德说：柯棣华大夫不避艰险，坚持在中国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敌后，执行印度人民的委托，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伟大表现，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珍重与发扬的。

柯棣华大夫安葬在河北唐县军城南关时，朱德为柯棣华陵墓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朱德是 1939 年 12 月在八路军总部认识柯棣华的。当时，柯棣华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一起来到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著名女译员龚澎为他们之间的交谈作翻译。游击战争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很重要的。游击战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朱德一边力客人倒茶，一边说。由于印度客人的到来，王家峪比平常热闹了，屋子里的火炉呼呼地冒着火苗，使人们感到格外温暖。

柯棣华坐在炕沿上，他对八路军的人和事都感到新鲜，他听了朱德介绍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主要经验后，忽然问：为什么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命运相同的国家现在采取的斗争方式是如此不同？总不能用天赋论去解释吧？朱德笑了，他对印度客人说：我们最初也走过弯路，是敌人的屠杀和人民的流血使我们觉醒了，我们才搞起武装斗争来的。我们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明白了革命的最终目的，前途和方法，才有远大的理想和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我们的革命才得以迅速发展。说到这里，朱德的脸上泛起一种少有的喜悦。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就无法估量。

柯棣华深受感动，表示要做一个白求恩大夫那样的好医生。第二天，朱

德总司令再次接待了印度友人，朱德还特地让警卫员把当地一名叫张福星的农民请到八路军总部，为印度友人做一餐以小米饭、地瓜菜为主的“太行饭”。饭前，朱德在同柯棣华的交谈中得知，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时，柯棣华正在印度孟买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本来他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当他听到印度将派遣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日时，就放弃考试，申请来华了。他们这支医疗队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扰，才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表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热爱，还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华”字。

“太行饭”端上来了。

朱德看了看桌上的小米饭和地瓜菜，风趣地说：咱们八路军出师以来，就是靠这小米加步枪把飞机加大炮的日本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

饭后，柯棣华提出了到前线进行战地医护工作的申请。朱德答应了。

八路军进行张家店战役时，朱德总司令让柯棣华这个医疗队跟随一二九师的一个团参加战斗。

1940年4月，朱德总司令回延安前夕，派专人护送柯棣华大夫到晋察冀军区。

在晋察冀，柯棣华曾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

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是美国的三星上将，毕业于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20年代初，史迪威在驻华美军中任职，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入侵美、英、荷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美、英、法等国也对日宣战。1942年1月，史迪威将军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派遣来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1944年10月，史迪威奉命回美国。

朱德当时在延安。一天，朱德收到了史迪威寄给他的一个包裹。包裹里还有一封信，史迪威在信中说：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

这封信，说出了史迪威的心里话。他奉命到中国后，就率领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作战，由于那些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懈，致使在对日作战中连遭失败，在史迪威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是好的，连排长还可以，营长就差了，团长师长没有一个好人。”当他提出要改造中国军队时，蒋介石又不支持。相反，在敌后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人数不多，却抵御了日军的猖狂进攻，在阻止日本军队南下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7月，在史迪威的建议下，美国派出了以戴维·D·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观察和了解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情况，朱德总司令曾多次向这个观察组介绍八路军作战的情况，这在史迪威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夕给朱德写了那封信。

史迪威回美国以后，因患癌症而病逝于佛罗里达州。逝世前，他颇有感情地对他的女儿说，我真想扔掉手中的铁锹，到那边去找朱德，扛起来福枪，和他并肩作战。

朱德获悉史迪威将军逝世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史迪威夫人。电文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丧失了一个

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23 穿越重重关卡，朱德从山西返回延安。 响应大生产运动，总司令亲自种菜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离开山西，经洛阳、西安、黄陵，返回延安，写下了一首豪壮的《出太行》。

总司令此行，颇多风险。

在赴洛阳途中，朱德总司令一行要穿越日寇新修的白晋铁路。白晋铁路两侧各挖了一条一人多深的壕沟，壕沟两旁设立了一层又一层的岗楼和哨卡。这是日寇防守严密的一道封锁线，它把太行、太岳两块根据地分开，也是日本侵略军掠夺上党盆地煤炭资源的交通命脉。

朱德和几名警卫人员来到白晋铁路附近，仔细观察了护路碉堡和鬼子巡逻队的情况，心想，日本鬼子封锁再严，他们也是在异国土地上，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刀山剑林也能穿过去。

通过现地侦察，朱德和护送部队的同志很快制定了越过封锁线的方案。

朱德问康克清：总部直属队的同志都跟上来了吗？

康克清点点头。当时，康克清负责总部直属队的工作。

朱德强调说：机要人员的行装要仔细检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不要把影片装在马褡子里，要打进背包里背在身上，防止万一。这些反映华北前线军民打日本鬼子的真实镜头，非常珍贵呀！

康克清向电影口的同志传达了朱德的要求，他们立刻把几盒电影胶片打进背包里去了。

月亮被乌云遮住了，铁路上漆黑一片。护送的部队在朱德的指挥下，悄悄地埋伏在铁路两旁，战士们的枪口都对准了鬼子的护路岗楼。黑夜中，同志们手拉着手，越过了白晋铁路。

大家都过来了吗，康克清一听是朱德的声音，连忙说：你放心，我在，一个也拉不下。

抓紧时间，乘夜赶路，尽快脱离日军的警戒区。朱德命令道。

日本鬼子的岗楼和哨卡上没有丝毫动静。

一支队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来到西安，朱德发现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出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随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八路军设在国民党西北反动统治中心的这一合法机关也成了反动分子的一个眼中钉，不仅在生活中必需品供应上处处刁难，还在办事处周围设置了20多个特务据点，办事处工作人员外出，很快有特务尾随跟踪。

朱德了解到上述情况以后，一面要求大家保持警惕，任何时候都不可麻痹大意，一面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斗争艺术。为了保证文件传送中不被特务觉察，要求有关人员不走大街走小街，晴天不送雨天送，白天不送晚上送。

离开西安前夕，朱德得知办事处交通科一名姓贾的战士因公外出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反动当局又拒不承认，为了把这名战士救出虎口，朱德亲自出面同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迫使特务放人。

北上延安那天，朱德得知八路军办事处有一批通讯器材要送往延安，又担心这些器材在途中会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不知如何运送。朱德毫不犹豫地說：你们把这些器材装上车，我随大卡车一起走。

当时，著名作家茅盾夫妇和一些进步人士也要从西安去延安，为了保障他们途中安全，朱德也邀请他们同车前往。

北上途中，国民党军队的哨卡一次又一次地拦住了这辆大卡车，当他们看到车上坐着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时，只好皮笑肉不笑地让路。

返回延安以后，朱德总司令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没有再回华北前线。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国法西斯军队横扫西、北欧时取得的暂时胜利的刺激下，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为了稳定后方，日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朱德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看得很深刻。他说：“在最近新的国际环境之下，德国的闪电战术的成功以及法国帝国主义的投降，就鼓舞起敌寇的更大野心，它集中了优良的兵力，更疯狂地向我国内地进攻，并乘法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失败，企图强迫断绝我国西南中越中缅两条国际交通线，这样以它的军事压迫，配合着它的政治和经济的阴谋，来威胁和引诱中国上层地主资产阶级的投降。同时，由于中国一部分上层地主资产阶级不愿进步，抗战中的阴暗面日益暴露出来，它们的悲观失望情绪也就日益加深，对于当前的严重困难感到绝望，在这种情形下，就形成了新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威胁”。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从8月下旬开始，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参战兵力迅速增至100个团以上，史称“百团大战”。

早在7月22日，朱德总司令同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一起，发出了战役预备命令。这份命令中指出：

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割断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击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乘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线两侧工作，基本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确定这样一个战役目的，总司令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朱德在1940年7月7日《解放日报》上撰文分析敌军情况，朱德看到，敌人吃了游击战争的亏，在军事上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八路军。敌人先是依靠铁路、河流和公路，把抗日根据地隔成许多小块，为此，敌人还新建了铁路，开凿了漳河。卫河间的运河，修筑了数不清的公路。敌人还通过挖沟和筑墙的办法来割裂和限制八路军，平原地区，敌人修筑的碉堡远的二三十里一个，近的五里一个，

在铁路旁和重要城镇周围，每隔两里就有一个碉堡，步枪火力可以互相联系。因此，截断敌人的交通线，收复若干重要据点，具有重要意义。

8月8日，朱、彭、左三人又联名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该命令明确：

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平定县不含）东至石家庄段正太路，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平定段……

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是阳泉、张净镇段……

贺、关集团应破坏平遥以北之同蒲线及汾离公路……

总部特务团主力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这项命令还规定，各集团对其它有关铁路、公路线也必须以足够的兵力破击之，上列各集团和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限8月20日开始战斗”。

八路军在华北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役，打乱了敌军整个战线，日本的战争机构一时陷于瘫痪，兵力无法调动。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得悉八路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打电报给朱德，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沉重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我××部队配合贵集团军于×日开始向当地顽敌袭击，除饬加紧动作策应钳制。

但是，由于蒋介石的抑制，国民党的这支部队没有给予配合。

战役第一阶段，由于部署周密，准备充分，行动突然，八路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正大路井陘——寿阳段所有桥梁、隧道都被炸毁，拆除了路轨、枕木，破坏了通信设备。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上）一书称：“从爆炸结果看，估计事前对其干部进行过相当训练，另外敌人使用的炸药总量约有5460吨。”

在前线指挥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8月31日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报告的电报中说：“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大路和彻底毁灭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如能达到目的，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在任何方面与我有利，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

毛泽东给彭德怀回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9月16日，朱德总司令又同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联名下达了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要求各集团继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摧毁敌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

那一段时间，华北战场的战斗日夜不息，日本侵略军的经济网、封锁网和交通线受到全面打击，敌人占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许多车辆被击毁，军事设施接连发生爆炸。到1941年初，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桥梁和隧道260多处。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它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

望。由于战役的规模过大，持续的时间长，因而过多地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探索的课题。

1941年和1942年，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的人民进入了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在日本侵略军向解放区发动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和进攻战役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早在1940年10月19日，朱德和彭德怀、叶挺等人就收到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的电报，这份电报除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破坏抗战”外，还无理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面对蒋介石策划的反共阴谋，中共中央制定了“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的对策。11月9日，朱德同彭德怀、叶挺、项英等人发出电报，驳斥了何应钦、白崇禧对我党我军的攻击，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恶用心；为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向北转移，但须宽限时日。

谁知蒋介石步步进逼，秘密命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和鲁苏战区韩德勤等部共20万人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前定计划”，“立即将其解决”，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在转移途中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虽然殊死拼搏，但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周子昆遇害，袁国平牺牲，叶挺军长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

朱德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感到非常气愤，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起，揭露了蒋介石策划这一反共事件的全部真相，坚决要求重庆方面释放叶挺将军和其它新四军人员，严惩制造皖南事变的有关人员，抚恤死难者家属，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从这一事件中，朱德已经看到，国民党顽固派在和日本侵略军勾结，阴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把华北拱手让给日本。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军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蚕食”，一次又一次地发起了“治安强化运动”，解放区的财政和经济非常困难，有时候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纸用、没有被盖的地步，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也更加紧张和激烈了。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改善军民生活，中央军委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环境和条件，开展生产运动，毛泽东还发出了“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号召，要求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朱德回到延安以后，积极响应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号召，把跟随自己的工作人分成两部分，一半留在机关，一半去搞生产。朱德对他们说：军队搞生产，能减轻人民负担，加强军民团结，提高军队的素质，这是新的养兵方法，很有意义。

朱德已经54岁了，工作很忙，但他还经常抽出时间参加劳动。朱德住在武乡县王家峪老乡家里时，在房前房后栽了很多树。到延安王家坪，朱德和大家一起种了四五分地的蔬菜。早早晚晚，朱德都到地里去干活。

战士们见总司令太累，说：朱总司令，你年纪大了，别同我们一样干活呀！

朱德直起腰，微笑着说：累不着，累不着！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种些蔬菜，可以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还锻炼了身体，好处多得很。

每当前方的同志来到王家坪，朱德总要到菜地里收一些蔬菜让他们带走。星期天，有人来看望总司令，朱德一定要留他们吃一餐饭，炒几盘自己种的菜。

渐渐地，大家都知道总司令的菜种得好，常到王家坪去“改善生活”。陈赓大将很有风趣，每次到王家坪，少不了要去找朱总司令，说：我今天来打“游击”了，要游要吃，给我改善改善吧！

可是，当朱德下部队视察时，很注意节俭，从来不肯让战士们为他多花钱。

一天，朱德要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一营进行视察。这个团是井冈山时期创建的红一团，对朱德总司令的感情很深。营长和教导员听说总司令要来，就让一名战士去买回来两盒天坛牌香烟。

营长和教导员正在组织大家准备迎接朱总司令时，忽然听说门口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军人。他们满腹疑惑地上前询问：你找谁？

我到营部来。是四川口音。

你是总司令吗？

我是朱德。

教导员又惊又喜，紧紧握住朱德伸过来的那只温暖的手，连声道歉。

朱德满面笑容，说：你们辛苦了，我是来看你们的。

朱德进屋坐下以后，营长和教导员一个倒了一杯热水，一个拆开一包天坛牌香烟递过来。朱德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说：不抽烟了，不抽烟了！

营长很纳闷，说：总司令会抽烟呀！

朱德笑了，风趣地说：会，过去会抽烟，烟瘾还不小呢！现在不抽了。现在部队供应很困难，每人一个月连2两油、2两盐都供应不到，有的战士还没有鞋穿呢。现在主要是解决吃和穿的问题。

朱德看到营长难为情的脸色，就拿起那支烟，看了看，说：这烟不错，价值也一定很高吧？抽这样的烟，一盒相当于一个战士一天的伙食费。

听了总司令这番话，营长和教导员心里都很惭愧。

朱德到战斗班和炊事班——看望了大家，检查了大家保养的武器装备。来到炊事班时，朱德尝了尝战士们吃的饭菜，说：你们能吃上小米，这算是优待哩，别的部队和八路军总部都是吃黑豆。目前我们还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离开一团一营时，朱德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强不强，首先要看政治素质的好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连战争目的也不明确，对敌斗争的意志不坚强，遇到困难就会动摇，军事素质也难以提高，就不可能打胜仗。你们这个营搞得不错，在困难面前要进一步保持和发扬红一团的优良传统。

八路军搞大生产，最著名的是在南泥湾。

南泥湾离延安90来里，是一个土地富庶的地方，几十年来，战乱殃及，人烟稀少，到处是荒山和树林，到处有豹、狼等野兽。当时有人传说，南泥湾有一种怪病，一到南泥湾，脖子就会长大，腿就会长长，不治而死。八路军将士们认为，南泥湾是搞生产的好地方。康克清曾经说：南泥湾政策是朱总先提出，毛主席、党中央同意的。

为了摸清南泥湾的真实情况，朱德带着干粮，同二十多名警卫战士一起，骑马来到南泥湾勘察。南泥湾到处都是齐腰深的蒿草，朱德和警卫战士一起下了马，披荆斩棘，爬山涉水，一个山湾一个山湾地勘察，还绘制了开发南泥湾的地图。

朱德来到金盆湾时，遇到了一位老农民。这位农民姓唐，原籍在四川，是跟随他父亲逃难逃到这里来的，已经在南泥湾住了几十年了。朱德乐了，说：唐老头，咱们是同乡呀！八路军要到南泥湾来搞生产，你给我们当顾问吧！

在唐老头的带领下，朱德又仔细察看了一遍地形，他拔起一棵棵老蒿子，看看黑土有多厚，适合种什么庄稼。

天渐渐黑了。战士们点起几堆篝火，朱德和大家一起围在火堆旁，咬一口干粮喝一口水，津津有味地对大家说：这里还可以挖到野菜吃呢，比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好得多呀！

篝火熄灭了，总司令和战士们一起在野树丛中露宿。

忽然，山沟里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嚎叫，是狼？是豹？

马受惊了，又蹦又跳。

战士们紧握钢枪，守卫在总司令身旁。

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夜晚呀！

搞生产的部队进驻南泥湾时，朱德再三交待要注意野兽。1942年初，朱德得知南泥湾有只大豹子，经常咬伤老乡的牲畜，有时还伤人，胆小的老百姓吓得不敢下地生产，朱德特别指派一名管理员和两名警卫战士去打豹子。春节那天，部队还吃上了香喷喷的豹子肉。

1940年，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经过两年辛勤劳动，全旅粮食自给达80%，经费自给90%以上。南泥湾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粮食生产基地，还成了军民休养和治病的地方。

有一次，朱德来到南泥湾时，让随行的一名科学家对南泥湾的泥上和淤水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水中有毒菌。

什么原因？总司令的表情严肃起来。

这是由于林木茂密、雨水淤积、草木腐烂造成的。

总司令笑了：那好呀，我们把它开垦出来，环境也就改变了嘛！1942年7月10日，朱德总司令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位老人同游南泥湾。当他们看到南泥湾一片青绿，高粱、小米和水稻都长得十分喜人，战士们的房前房后都结满了黄澄澄的南瓜时，大家兴致很高，吴玉章老人还写下了一首《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四方众来归，
群策复群力；
工农各所得，
士兵勤学习；
空气常清新，
疗养可勿药；
人人称乐土，
家家皆足食。

看到眼前的成就，朱德也非常激动，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一首描述解放区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首诗写得很有感情，诗中写道：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慈陶宝峪，清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梢。

正当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日本侵华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了 30 万日军，向解放区发动了野蛮的进攻，他们要把解放区的人和物杀光、烧光、抢光。

1942 年 5 月底，太行抗日根据地突然传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的消息。这个消息在朱德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那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

日本鬼子为了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主力，集中了 25000 多兵力于 5 月 19 日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5 月 24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的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被日本鬼子包围。第二天，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南艾铺发起攻击。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第七六九团全力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分西，北、南 3 路突围，左权副参谋长和总部直属队的几位干部在指挥突围时，在十字岭壮烈殉国。

朱德承受着无限的悲痛。

他和左权一起工作十多年了。他了解左权，左权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不顾身，成为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现在，左权与大家永别了，总司令怎么能不悲痛。在朱德的记忆中，左权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黄埔军校和苏联军事大学学习时，他严谨刻苦，埋头实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领导岗位上，他十余年如一日，集中全部精力工作，有时候战斗昼夜不断，几天几夜不能合眼，他从来都不表现出倦怠、疏忽、放任和暴躁，有时疲乏过度，做梦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从来没有要求休息一天……总司令的眼睛湿润了，嘴角翕动着……总司令太伤心了。他在回忆左权参与我军许多重要战役和军队建设的规划与领导工作，特别是抗战以来，左权在极其残酷艰难的敌后环境下，

赤胆忠心，日夜劳瘁。在他参与策划下，八路军发展成为数十万劲旅，华北成为日寇难以摧毁的堡垒，成为大后方安全的屏障。他知道，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队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都有很丰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但这位才华横溢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年仅 36 岁就不幸殉国了。总司令以无限的哀痛悼念左权同志。他默默地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达到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目的！

朱德作诗《悼左权同志》。曰：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

24 国事、家事、天下事，无一事不拨动着 总司令的心

1944年初，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发表一篇报道称：复兴中华和保卫东亚的唯一障碍就是共匪尚未完全肃清。……我们应该在精神和实际行动上进行战斗。

那几年，日军一次又一次地对解放区进行“扫荡”、“蚕食”，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政府几乎与华北解放区断绝了联系，许多人都不清楚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

当日本报纸相继登载上述消息时，受罗斯福派遣来华的史迪威将军提出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解放区去搜集日军的情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4年，盟军正在准备对法西斯军队进行全面反攻。

蒋介石不同意这样做。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情况，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史迪威将军的建议拖了一个月，蒋介石改变主意了。迫于美国的压力，蒋介石允许一批外国记者和几名中国记者到解放区访问，但只能逗留3个月。

朱德总司令接待了美国派出的军事观察组。当双方谈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朱德有一段很精彩的讲话。朱德说：国民党的力量太弱了。海外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就是中国，因而提出了“中国是否能够抗战到底”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好，我们在华北就有三百万个臭皮匠——我们的军队和民兵。我们还在人民中选举代表，组织村、县和区政府。把他们也算在里面，看看他们抵得上多少诸葛亮……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名字同慈禧太后、袁世凯、段祺瑞和其他“人物”并列。如果蒋介石还不了解自己因为什么失败，他的名字不久倒可以接在这张名单的后面。

外国记者到解放区访问以后，纷纷写书。

哈里森·福尔曼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冈瑟·斯坦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然而，他们都没有完全解开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之谜。

朱德看到，解放区军民坚持敌后斗争的第七个年度里，胜利更加接近了，困难也在增多。这时候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难：日本侵略军由“碉堡”政策改为“囚笼”政策，这种残酷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使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更加困难。

第二难：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由围攻到“扫荡”、连续“扫荡”、反复“扫荡”，采用奔袭等手段蚕食根据地，这使抗日军民的消耗增多，缴获减少。

第三难：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残酷地摧残了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财力，抗日军民虽然进行坚壁清野，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四难：三四年来的，八路军数十万军队的弹药、被服、医药、粮饷得不

到任何方面的补充，这支无弹药、无粮饷、无医药、无被服的军队在最困难的环境中苦战数年，朱德认为这是“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怪事奇闻”。

所有这些困难，都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克服了。

朱德总司令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

朱德在总结解放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经验时，讲得既深刻又风趣。朱德说：

我们实行精简政策，实行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我们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维持”政策，以对付敌之“蚕食”政策；

我们以军民密切合作，广泛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与更彻底的坚壁情野，以对付敌之“三光”政策：

我们以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

多么英明的政策！

解放区军民的抗日奇迹正是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产生的。

朱德认为，解放区军民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主要有五种力量在起作用。

第一种力量：“我们看清国内外环境，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解放区军民下定了决心，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生存，上下一致，军民一心，咬紧牙关，坚持苦战。如果抗日军民遇到困难而屈服，那么敌后抗战早已不能继续了。

第二种力量，“我们坚持了进步”。进步是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解放区军民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团结各界各军，彻底实行“三三制”政权与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等自由，都有人权、政权、财权、地权等保障，因此，解放区军民能够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协力。

第三种力量：“我们自己动手”，八路军素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八路军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虽然得不到外界的物质援助，却依赖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第四种力量：“我们实行精简”。解放区军民看清了抗战的局面，看清了敌后的环境，在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中都实行精简，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人民负担，使自己更适合于敌后的军事行动。

第五种力量：“我们依靠群众”。朱德坦率地说，“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在敌后抗战中，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正是因为依靠群众的力量，才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

朱德总司令同解放区军民一起，正是用这种伟大的力量去克服种种困难，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前夕，我们还要记叙朱德总司令的两件事。一件是家事，一件是国事。这两件事在朱德一生中是很重要的。

先说一件家事。

朱德离开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已经 35 年了。这期间，他在四川几番征战，戎马倥偬，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但他时时惦念着家中的父母。1919 年，朱德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住，由于他父母多年劳动惯了，放下锄头就觉得不舒服，坚持要回老家。朱德没有时间送两位老人回去，在返回故乡途中，他父亲死了，家中只有一位老母亲。

朱德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的家庭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对象。

抗日战争中，中国建立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朱德才能够和家里通信。

朱德时时都念着家中的老母亲。

1943 年，朱德收到家乡寄来的两封信。

一封信是侄儿写来的。信中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

朱德看完信，心情沉重。他母亲支持他所做的事业，也知道他面临的困难，依然像以前一样在家里过着清苦的农妇生活。抗战数年，他曾经给母亲寄去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母亲年纪大了，但还一直想念着他，就像他想念母亲一样，他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没有时间回家同母亲“叙别后情景”。

另一封信是外甥写来的。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母亲的勤劳，朱德是深深钦佩的。他母亲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他曾经听人讲起，他母亲生他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现在母亲已经 85 岁了，“仍不辍劳作”，他心里怎能不记挂。

朱德太忙了。八路军总司令没有时间满足老人家“见你一面”的要求。

1944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德国法西斯军队遭到苏军的毁灭性打击，苏军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美军根据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会议宣言中提出的任务，在太平洋中部向马利亚纳群岛和菲律宾进逼，开始轰炸日本本土。英军和中国的印缅远征军正向印缅战场的日军展开大规模反攻。日本军队为了消除对其本土的威胁，扭转被动局面，大本营于 1 月 24 日发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命令，明确提出要“击溃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海的要地”。

由于日本侵略军集中大量兵力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兵力削弱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了 1944 年要继续团结国民党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乘日军兵力减少、战斗力下降之际，积极主动地向日军发起攻势作战，打击和牵制日伪军，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反攻作准备。朱德总司令日夜忙碌，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攻势作战。

正当八路军抓注战略上的有利时机，内外线结合，狠狠打击日伪军时，朱德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那一刻，他的心，他的肉，他的血，他的骨头，仿佛全碎了，全化了，他甚至感到空气都有点令人窒息……他很悲痛。

朱德爱母亲，特别是爱她勤劳的一生。

在悲痛的时刻。总司令回忆起他母亲的许多事情。

他的家境是贫穷的，他母亲先后生了 13 个儿女，由于无法全部养活，只

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来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她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常常是一边干活，一边看着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在总司令的记忆中，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把一家二十多口人的饭做好了，再去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有时候还要挑水挑粪。四五岁时，他就很想帮母亲干活，只是体力太弱了。八九岁，他就争着要帮母亲挑东西和背东西了。从私塾读书回家后，当他看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做饭时，立刻把书包一放，拿起扁担挑水去了，水挑够了，他又去放牛。农忙季节，他上午读书，下午种地，有时候一整天都跟母亲一起在地里劳动。他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许多生产知识。

在他心里，母亲是很聪明能干的，是勤俭理家的好手。那几年，生活艰苦，一家人点的是桐子油，吃的是豌豆饭、红薯饭、杂粮饭，尽管细粮少，母亲也能把一家人的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大家穿的衣服也是母亲亲手纺的线，至今还记得那种铜钱般厚的“家织布”，缝出一套衣服来很结实，常常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兄弟几个都长大了，衣服还穿不烂。

他心中至今还有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深刻印象。在家里，母亲不但任劳任怨，性格也很好，不打骂孩子，也不同任何人吵架，因此，这个二十多人的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之间都相处得很和睦。母亲自己一生贫苦，也同情贫苦人，经常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母亲意志坚强，从来也不被困难所吓倒。记得1900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许多农民衣食无着，他家里天天都吃高粱、小菜叶，一年没有吃到白米，母亲也不失望。有一年，地主逼着要退佃、搬家，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成两处住下，母亲不但不灰心，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更强烈了。在沉痛中，母亲的三言两语就诉说出他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的事实，启发他反抗压迫，追求光明，寻找新的生活。也是因为受尽了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母亲和父亲才决心节衣缩食，把他送出去读书，决心要在这个佃农家庭里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为了筹措他上学的学费，母亲常常东挪西借，有时候几年也还不清。

他深深为母亲的宽厚所感动。那一年，他抱着科学民主的思想，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母亲不但不反对，还给他许多慰勉，鼓励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他深深感到，母亲教给他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现在，母亲离他而去了，他将永不能再见到母亲了，这种哀痛是无法补救的。

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总司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944年4月，日，朱德在延安《解放军报》载文回忆母亲。朱德说：“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这，就是八路军总司令在悲痛之际的心声。

再说一件国事。

朱德参加了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大会，是沐浴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召开的大会。

朱德力参加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连接待与会代表的细节都想到了。有一天，朱德听说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要到总司令部来，马上要警卫员把保存已久的榨菜和豆瓣酱拿出来、准备请参加会议的同志吃。这点榨菜和豆瓣酱是周恩来从重庆捎来的，周恩来想到朱老总在太行山区非常艰苦，特地托人给他捎来一点四川货。朱德一直保存着，要凑机会与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分享。

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央举行了七大预备会，毛泽东提出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工作方针。

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不远了。

1945年初，日本统治集团已经被即将覆没的阴影笼罩，日本军阀都有一种被推翻的痛苦和恐惧心理。为了挽救失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失败已经无法避免，各条战线上的日军已经崩溃。

1945年1月9日，美军成功地在仁牙湾登陆，再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攻占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城。“七大”开幕前，美军在整个菲律宾群岛上的大规模战斗行动已经结束。日军在撤退马尼拉前，用机枪扫射一批批平民，用汽油焚烧一幢幢住宅，但这种发疯的兽行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

2月19日，美军向硫磺岛东部滩头发起攻击，经过二十多于激战，歼灭了日军的主力，为进攻日本本土扫清了障碍。

英国军队也从1月份开始缅甸北部发动攻势，并于5月初解放仰光，彻底瓦解了日军的“南防卫圈”。

中国战场上的敌后解放区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和整风运动、生产运动，已经拥有9000多万人口和200多万民兵，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素质也有显著提高，为开展更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下，朱德迈进了“七大”的会场，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觉得自己很荣幸，能够代表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九十余万军队和二百余万民兵，在延安向党的大会说话。

他脑海里还有大会开幕前后的两件事。

一件发生在外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他曾经与毛泽东一起致电杜鲁门总统和罗斯福的家属，表示吊唁，解放区还下了半旗。

一件即将发生在重庆，在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国民党即将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两件事会对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产生什么影响？

无论是什么影响，朱德都考虑过了。朱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区战场的抗战经验，论述了“经过无数艰难的流血的斗争”创造的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所具有的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就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随后又变成了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变成抗日的重心”。

朱德向全世界宣告：在抗日战争这样持久的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

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下完的。”在7年半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战斗达115000多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96万余名，俘虏敌伪军28万余名。缴获各种火炮1000余门，机枪7700多挺；攻克碉堡34000余座，攻克据点1100余个。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抗战一元化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朱德还论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提出了建军的原则，朱德认为，“人民的军队，因为和人民一体，对外就能有效地保卫祖国，对内就能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与人民分裂，对于保卫祖国就不能下是无能的，动摇的、失败主义的，以至变为叛逆（如当伪军），对于人民的民主自由，则是摧残的、压迫的。人民的军队，内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军民一致的，所以能够一扫军阀制度。”朱德还论述了怎样养兵、怎样带兵、怎样练兵、怎样用兵、怎样解决装备、怎样瓦解伪军等问题。

朱德明确提出，解放区的军队要站在中国大陆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解放区的军事任务主要有8条。第一：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第二：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第三：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第四：为着战略反攻，必须有新式的装备，就要注意提高军事技术。第五：要加强指挥机关，提高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水平，使之能适应现阶段作战和未来反攻的需要。第六：厉行生产节约，储蓄粮食物资，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第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第八：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内部必须有很好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去团结广大友军。朱德着重指出：“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朱德总司令的军事报告，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及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国民党于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提出会议的两项任务是：加强抗战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增进人民生活。大会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的建议，攻击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声言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无法妥协。国民党的六大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消灭共产党和

《朱德选集》第147页。

《朱德选集》第157页。

《朱德选集》第181页。

民主势力，它坚持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为抗战胜利后发动大规模内战进行了政治、思想、组织准备。正像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所说，两个大会完全有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正像朱德所预料的那样，抗日战争的胜利越来越近了。5月29日，七大还没有闭幕时，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各大战略区应对敌展开“更积极的攻势”，在主力兵团中确立正规作战观念，发扬顽强与攻坚精神，锻炼提高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

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解放区军民连续发动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作战，迅速扩大了解放区。至1945年8月，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军队93万多人，民兵220万多人。

胜利就在眼前了，斗争依然艰巨、复杂。

8月6日，人类社会的第一颗原子弹跑出魔瓶。美军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使广岛这个美丽的城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月9日，100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向中、苏、美、英四国政府表示要求投降。朱德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在两天内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日军和伪军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果遇到敌人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大反攻的号角吹响了。

谁知蒋介石也于8月10日发布三道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命令，其中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在向日伪军开展大规模反攻之际，却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这是解放区军民绝不能接受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两次致电蒋介石，据理驳斥并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声明“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我们不得不……坚决的拒绝这个命令。”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威严地命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投降。朱德在这次命令中宣布：

“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

“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

“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朱德总司令还明确告诫冈村宁次，“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朱德总司令还致电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阐明八路军、新四军有权根

《朱德选集》第185、186页。

《朱德选集》第186页。

据《波茨坦公告》及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包围的日伪军投降。

当上述命令和正义要求遭到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的无理拒绝时，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属于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坚持抗日、奋勇杀敌的将士们。

25 亲爱的总司令，你 60 年的奋斗，已使
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劳动群众的先驱。祝寿会上，周恩来如是说

春天慷慨地散布着芳香的气息，阳光从羊毛绒般的云层透出，映照着陕北起伏的山峦和辽阔的田野，带来了大自然的生气和生活的欢乐，卫生队又进行战斗动员了，战士们忙忙碌碌地准备着上战场的各种物资器材。忽然，一名战士惊奇地抬起头，指着远方的一处山梁说：哎，你们快来看哪。

看什么？

那几个人是谁？

是……

远处，几名穿着灰色军衣的人正在望什么，他们身旁还停着一辆吉普车。一名战士脑海里掠过一个念头，飞也似地跑了过去，近前一看，果然是朱德总司令，朱德身旁是两名中央医院的苏联医生和一名警卫员。

见到总司令，战士们又兴奋又吃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朱德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过去，笑盈盈地问。

我们是教一团卫生队的。战士们听说朱德总司令来了。纷纷跑了过来，很自然地把朱德围起来了。

朱德腰里束着皮带，腿上扎着结实整齐的绑腿，用爱抚的目光环视了一下，问：领导上对你们做过动员吗？

已经动员了。

都讲些什么？

一名山东籍的战士立刻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我们要做好各项准备，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机关……

对！朱德脸上透出红润的光，两眼炯炯有神，很有信心地说：你们医务人员虽然不直接参加战斗，但准备工作要做得更好。你们的工作稍有疏忽，在战时就会给负伤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痛苦。你们要知道，这一次敌人来得很多，装备也比我们的好。

朱德一席话，说出了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

从 1946 年 6 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对各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场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来势很凶，其进攻的基本部署是：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 8 个整编师又 2 个旅，约 22 万人，首先围攻鄂豫边中原解放区；

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 58 个旅，约 46 万人，进攻华东解放区；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 38 个师，约 26 万人，向晋察冀、晋绥解放区进攻；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 7 个军 16 个师，约 16 万多人，在沈阳以东和松花江沿岸对付南、北满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所属主力 19 个旅，约 15.5 万人，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延安军民进行战斗动员，就是为了粉碎胡宗南的进攻。

曾几何时，朱德同阎锡山、杜聿明、刘峙，胡宗南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为友军，共同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今天为何同室操戈、兵刃相见呢？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战争蓄谋已久。

八年抗战，亿万同胞备受战争摧残。日寇投降后，中华大地终于迎来了

和平的曙光。这时候，中国人民极其需要休养生息，迫切希望国家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谁知蒋介石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面进行内战准备，妄图迅速消灭革命力量，实行黑暗统治，蒋介石在他的高级将领面前疯狂叫嚣：“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还迅速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美国也用军舰和飞机陆续将国民党的四个军分别运到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企图分割我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反动企图，朱德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图，指挥全军分别进行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取得了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重大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迅速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企图，从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这个协议于1月10日正式公布。

在多年南征北战中，朱德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性看得很清楚。朱德知道，抗日战争的胜利决不意味着中国内战的结束。日本投降后，朱德积极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控制和发展东北。

东北工业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各根据地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只要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为此，朱德同中央其它领导同志一起，日夜操劳，抽调了2万多名干部和11万多主力部队进入东北；成立了冀热辽中央局，保卫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组织指挥撤出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含豫北）等八个省区的人民军队和党政干部，缩短了战线。这就巩固了我党我军的基本阵地，形成了应付全面内战的有利战略态势。

现在，“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虽然公布了，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从来也没有停止。朱德又积极参与了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等重大决策。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人民解放军已有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共66万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朱德，协助毛泽东指挥这支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的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决战。

国民党的几路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初，蒋介石心里是很乐观的。当时，他能指挥的总兵力达430万，国民党军队还拥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和坦克，接收了日本100万侵华军队的全部装备，掌握了一些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还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也许是蒋介石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优势装备和数量，公开叫嚣要在“三个月消灭共军”。

这场战争，彼此之间都很了解，朱德也不是第一次同蒋介石在战场上交手。以往的失败，蒋介石极不甘心，这一次，蒋介石在战争之初就摆出了一种要一口吞掉人民军队的架势。谁知事与愿违，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战争头4个月，就歼灭国民党军队29.8万多人，折合32个正规旅。

10月份，蒋介石又枉费心机地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提出“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

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面对蒋介石的狂妄叫嚣和国民党军队的咄

咄攻势，解放区军民却为身经百战、功业彪炳的朱德总司令举行庆寿会。

这一年，朱德 60 岁了。

从 11 月 29 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祝贺朱德 60 寿辰。11 月 30 日，延安城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内，正上方悬挂着一条横幅：“敬贺朱总司令 60 寿诞”，四周挂满了贺联、贺诗、贺辞。傍晚，各界代表聚集在一起，纷纷向朱德表示祝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送来了贺辞。毛泽东送来了“人民的光荣”的题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来了贺信。这封贺信回顾了朱德在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作出的贡献，赞颂了朱德同毛泽东一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领导红军长征和指挥抗日军民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伟大成就。贺信高度评价朱德：

“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是被压迫的中国农民的子弟。”“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你的六十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是全解放区和全中国人民的佳节。”

周恩来刚从南京回到延安，就参加了祝寿会。周恩来和朱德分别住在杨家岭北面山上的西、东两个院子里，相距很近。平时，周恩来经常同朱德一起交谈；今天，周恩来兴冲冲地走进了杨家岭这座砖木结构穹窿式建筑的中央大礼堂，满怀深情地在祝寿会上讲话：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

亲爱的总司令，你 60 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在外地统军搏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也纷纷以各种方式向朱德总司令表示祝贺。

当时林彪已调派到东北去了，他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从遥远的东北战场向朱德发来贺电。电文中说。

我们用新的捷报来庆贺你的六十寿诞。国民党一团人刚刚投降。

刘伯承司令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冀鲁豫和豫北战场。11 月份，他同邓小平一起采用猛虎掏心战术在滑县一举歼灭了敌 2 个旅 1 个保安纵队共 1.2 万多人。战役结束后，新华社记者采访刘伯承司令员时，刘伯承在前线祝贺朱德总司令 60 寿辰，他对记者说：朱总司令“志坚如铁，从无失败情绪。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且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国难之前。尤足使人深深感动。”

陈毅当时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在战火间隙，陈毅司令员欣然挥毫，写下了《祝朱总司令六旬大庆》一诗。诗曰。

高峰泰岱万山从。

大海盛德在能容。

服务人民三十载，
七旬会见九州同。

许多著名人士和革命团体也纷纷向朱德表示祝贺。上海“群众”杂志编辑部发出了贺信，把他们美好的祝愿带到了延安。这封来自敌占区的贺信写道：

敬爱的总司令：

您把人民从敌人的铁蹄下救了出来，您领导着人民从几千年的奴役底下翻了身，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你帮着人民保卫住自己的田园。您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您真是中国人民的再生父母，今日欣逢您六秩大庆的佳节、我们谨奉一瓣虔诚的心香。

看到热情洋溢的贺联、贺诗、贺辞，听到党和人民的肺腑之言，朱德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谦虚地说，你们不必祝贺我，我要祝贺你们，祝贺党，祝贺人民。

怀着无比激动之情，朱德在祝寿会上致答词。他说：“中国人民很早就干革命，前仆后继，但屡次遇见革命伙伴，就往往不大靠得住。那些伪装革命而以升官发财力日的人，在获得革命果实后却反转来镇压革命，致革命屡次失败，人民屡次上当……”

总司令又一次道出了自己成功的奥秘。他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摸下路。

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延安人民川流不息地涌到八路军总部，为总司令祝寿。有几个农民还从十多里路外赶来，为总司令送寿桃。寿面，指战士们纷纷把自己编织的草鞋和布鞋送给总司令。那几天，八路军总司令部周围到处是欢乐的歌声，到处是喜庆的秧歌。

为总司令祝寿，也是对蒋介石“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的绝妙讽刺。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推迟行动。

1947年3月初，蒋介石又向胡宗南发出了进攻延安的命令。

胡宗南字寿山，浙江省镇海县人，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深得蒋介石的器重。1935年，36岁的胡宗南被授予国民党军中将军衔。由于延安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蒋介石选用了自己的嫡系胡宗南进攻延安。胡宗南深知进攻延安也是他效忠蒋介石时受领的最重要的一项使命。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等共15个旅14万余人的兵力，从洛川、宜川之间分两路向陕北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还从上海、徐州调集了75架作战飞机到西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直接指挥这些飞机轰炸延安的党政机关、军事设施和有关工厂。

延安上空，不时地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第一天，就对延安的前沿阵地和纵深目标投下了59吨炸弹。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暂时撤离延安。边区部队在彭德怀和习仲勋的指挥下，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党政军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但是，党内一些同志希望坚守延安。莫斯科方面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不应该撤离延安。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508页。

《朱德传》第560页。

朱德总司令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当时，党中央作出决定，中央分成两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朱德、刘少奇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渡黄河，到晋察冀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另外，由叶剑英、杨尚昆主持后方委员会，转至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朱德要离开延安，也要同毛泽东暂时分离了。

中央分成两部分，中央警卫团也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陕北，一部分随朱德和刘少奇等人到晋察冀去。

毛泽东对中央警卫团团团长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人都随中央过黄河，保卫中央。

朱德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专门召集警卫团的连以上干部开会。朱德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强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错，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会后，朱德又详细询问了警卫部队的分配情况，指示团里把那些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挑出来，跟随他过黄河，把那些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人留在毛主席身边。

3月16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此时，以王震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已进抵陕北，人民解放军的机动兵力增至6个旅2.7万多人。

朱德对前来送行的人民群众说：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朱德看到，人群中的许多人神色忧戚。

就要和毛泽东分手了，朱德微笑着说：我已经60岁了，从此以后，每一年都是多赚的！

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当时54岁，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意即离开延安就可得延安，离胜利已经不远了。周恩来的化名是“胡必成”，意即必定成功，任弼时的化名是史林，他当时担任中央纵队司令员。陆定一的化名是郑位，他担任中央纵队政委。

这以后，朱德开始同“李得胜”联系了。

朱德心中，忘不了延安，忘不了陕北，忘不了毛泽东。

4月底，当朱德一行来到瓦窑堡以东一带时，又一次对警卫团的同志说：中央决定让我到河东去，开辟华北战场，毛主席留在陕北。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任务，不能有丝毫差错。朱德从警卫员手中拿过望远镜，轻轻地擦拭了一遍，走到骑兵连连长面前，情真语切地说：你们要进行武装侦察，是中央的耳目，拿着它去发挥作用吧！

这架望远镜，伴随朱德总司令度过了无数战争风烟。在保卫延安的重要时刻，总司令把它留给了警卫战士。

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董必武、彭真、康生任常委。离开延安以后，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经过晋绥解放区来到晋察冀，然后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设在河北省行唐县上碑镇。1946年10月，晋察冀军区机关撤离塞外山城张家口以后，一直在上碑镇一带指挥全区作战。1947年4月26日，朱德来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正在前线指挥战斗。

那是著名的正太战役。在聂荣臻指挥下，晋察冀军区部队于4月9日向

石家庄外围之敌发起进攻，3 于后攻占正定、栾城，肃清了石家庄外围的 90 多处敌人据点，破袭了正太路石家庄至获鹿段，先后歼敌 1 万多人。4 月 14 日和 5 月初，晋察冀军区部队连续攻克井陘、娘子关、狮脑山、赛鱼、测石驿等地。正太战役，不仅歼灭了 3.5 万国民党军队，还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进一步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战役一结束，聂荣臻司令员就赶回上碑镇。

朱德和聂荣臻自从延安分手后，好久不见了，现在在上碑镇相聚，俩人都很高兴。聂荣臻询问了党中央撤离延安的有关情况以后，就详细地向总司令汇报晋察冀军区军民对敌斗争的情况。

朱德在想，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发展，战争机构也需要加强。为了适应打运动战和打大歼灭战的要求，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还需要发展，需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现在晋察冀军区的指挥机构对野战军各纵队的作战指挥还不完全适应，军区的各个纵队、各个旅以至各个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伤员治疗、俘虏训练和后勤供应等问题，都要各自办理，战场上缴获的资财也要各自送往后方。因此，后方庞大，战斗人员减少，难以适应战争的发展。为了加强野战军建设，使晋察冀军区的力量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很有必要组建一支野战军，设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聂荣臻也认为，组建野战军，可以使晋察冀的主力部队摆脱繁重的负担，便于广泛地实施机动，力迎接新的胜利作了组织准备。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的方案。

那些天，朱德同中央工委的同志一起了解华北的土地问题以外，对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的工作抓得很紧、很细，朱德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同野战军领导人谈话，共同落实有关工作。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杨成武生动地回忆了朱德总司令当时找他谈话的细节。

杨成武是在阳泉前线接到电报后赶到上碑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杨成武先去看聂荣臻司令员，聂荣臻说：成武同志，你知道是谁把你请回来的吗？朱德总司令。

杨成武心头一喜，按照聂荣臻的要求，来到朱德的住处。

朱德住在上碑镇一座质朴肃静的院子里。院子里长着几棵枣树，中间还铺设了一条石子甬道，虽说是军区司令部，院子里仍然散发出浓郁的农家气息。看见杨成武走进来，朱德乐呵呵地说，成武同志，你从阳泉回来？

杨成武点点头，庄重地问候总司令。

朱德示意杨成武坐下，说：中央军委考虑到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建立晋察冀野战军，由你担任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接着，朱德介绍了全面内战爆发后各战场的基本情况和战争第二年解放军的主要任务，对晋察冀野战军提出了新的要求。

杨成武听说要成立野战军领导机构，心里很高兴，马上拿出本子，详细地记录了朱德总司令对野战军和各级干部提出的要求。

在朱德总司令的精心指导下，晋察冀于 1947 年 6 月重新建立了野战军的指挥机构，晋察冀军区与野战军分开，杨得志担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和杨成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耿飏担任参谋长，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炮兵旅，共有 12 万野战部队，这一决策，在以后打大歼灭战和运动战中带来了显著的效果。

在晋察冀，朱德总司令不仅关心军队建设，对土地问题、干部问题也进

行了实地考察，在视察冀中军区以后，朱德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干部要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朱德明确提出，要重视培养干部，要让他们准备担负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在培养干部问题上，要反对本位主义的思想，互相学习，互相批评，才能前进。

解放战争仅仅进行一年，朱德总司令就预见到了中国人民一定能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大趋势。朱德提出，“我们要大量培养干部。机关要精简，但学校要加强，要有计划地保留与训练出一批干部，准备将来打出去使用，这是很重要的任务。”

将来打出去！这意味着总司令早已全局在胸。

在晋察冀考察完毕，朱德同刘少奇等人一起，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西柏坡在太行山东麓柏坡岭下，距石家庄市 90 余公里。由于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到来，西柏坡蜿蜒曲折的小路和农家院落中，留下了朱德许许多多为解放全中国而日夜操劳的脚印。正是在这个华北的山村里，朱德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朱德到西柏坡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和参加全国土地会议。

全国土地会议是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于 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土地问题，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中国的一个中心问题。中国当时有 3 亿多农民，土地问题关系到农民的生存。毛泽东历来主张土地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创建了红军，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从小生活在四川农村的朱德对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感受颇深，到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行土地革命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党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总结和交流各地的经验，制订出更完善的政策，使土地改革彻底完成。

朱德总司令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回顾了革命武装力量成长发展的历程。他认为，红军从产生到现在，经常同几倍以至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还能够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土地革命，红军帮助农民得到土地，或者实行减租减息。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拥护和支持红军。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左”的错误，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样做就容易变成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结果就等于把地主富农赶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十几年来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

朱德认为，“中国搞土地革命，必需要有武装力量。没有武装，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到处受反动派搜捕。武装一走，土地又被地主搞走，群众又被镇压下去了。”这样，土地革命就难以成功。

在土地问题上，总司令也对军队提出了具体要求，朱德说：“军队是革命的主力，要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这点一定要使军队中的同志都知道，负责的同志更要弄明白。因为一打出去，首先和农民见面的就是军队。军队要帮助农民分得土地。军队把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学会了，土地分配就

《朱德选集》第 202 页。

《朱德选集》第 206 页。

比较迅速、容易。”朱德还结合到晋察冀考察的实际情况，提出要“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

26 解放石家庄的炮声隆隆，毛泽东
急电刘少奇：请劝朱总回工委，
不要亲临最前线

解放战争第二年，解放军指战员中广泛传诵着朱德总司令写的两首祝捷诗。一首诗曰。

南合材中晓月斜，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

另一首诗曰：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贺诗祝捷，是朱德的一种情趣。

这两首诗，写出了两场漂亮的战斗，也是朱德总司令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的生动写照。

第一首诗，是朱德《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这是指清风店战役。

清风店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西南，地处保定市和石家庄市之间。

正太战役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经过休整补充，准备在7月下旬在永定河北打一仗，然后再进行石家庄战役。朱德曾经把上述设想打电报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谁知战场上出现了新的情况。

8月下旬，以李宗仁为主任的国民党北平行辕为了确保北平。天津、保定这一三角地带的安全，派遣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等部队对大清河以北的解放区进行“清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晋察冀野战军于9月2日至12日在大清河以北进攻霸县、雄县，歼灭国民党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各一部共5000多人。这一仗，晋察冀野战军在进攻时由于口子张得过大，未能把这部分敌人全部歼灭。

战斗结束后，有的指战员因为没有打一个痛痛快快的歼灭战而有怨气。有人甚至说：肉没有吃到，倒把门牙顶掉了。

朱德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和部队的情绪以后，立刻同刘少奇一起打电报给中央军委。电文中说：大清河战役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但此次士气旺盛，干部之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

朱德具体分析了晋察冀野战军的具体情况，提出自己要亲赴野战军。电报中说，大清河战役“罗因病未去，聂初离开，杨、杨初出马（指杨得志

和杨成武，作者注），未获大胜，后方干部难免浮言。朱拟去野战军整理一时期，随同杨、杨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竖立起来。”

毛泽东接到电报，看到朱老总要亲自上前线，去把“野战军竖立起来”，心中一惊，立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朱德、刘少奇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认为大清河北战役歼敌 5000 多人就是一种胜利，“只要有胜利，不论大小，都是好的。”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朱德的安全，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提出：朱总是否亲临前线，请加慎重。

晋察冀野战军打大胜仗的机会终于来了。

9 月 14 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从晋察冀战场抽调 5 个师（旅）的部队出关增援。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野战军领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炮兵纵队和冀中军区第七旅等 11 个旅的部队在保北地区寻机作战。

10 月 11 日，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对保定以北的徐水地区之敌发起进攻，本想把国民党军队分割开来歼灭，谁知国民党军队的五个师猬集一团，敌我双方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对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飞到了北平。蒋介石仔细察看了北平行营指挥所里的作战部署图后，以为徐水一带的枪声给他带来了胜利的希望，保定北面的解放军已经被国民党军的主力所箝制，陷入了被动，于是，蒋介石命令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急调驻石家庄罗历戎的第三军北上，南北夹击解放军于徐水地区。

毛泽东有个说法，蒋介石到哪里，解放军就在那里打胜仗。蒋介石调第三军北上的这道命令，使晋察冀野战军抓住了一个极好的战机。杨得志、杨成武、耿飏等人接到聂荣臻的情况通报后，决定以野战军主力南下，拟在清风店地区歼灭罗历戎的国民党第三军。刘少奇了解了保定南北的战场情况以后，复电杨得志。杨成武：同意你们出击保北并仍以寻求打运动战为主之方针。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示，它使晋察冀野战军当机立断，迅速隐蔽南下，在运动中痛歼罗历戎，导演出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

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任蒋介石的“王牌军”第一军副军长，后来追随蒋介石参加反共内战。罗历戎接到要他率全军北上的命令后，认为从石家庄到保定的大片解放区是很危险、很难顺利通过的，他极不愿意去冒被歼灭的风险，但是由于蒋介石坐镇北平，他不得不去。19 日午后，当罗历戎率领第三军所部 1.3 万余人进至清风店地区时，被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四面包围。至 21 日晚，晋察冀野战军把敌第三军压缩于西南合村。22 日凌晨，我军向西南合村发起最后进攻，全歼敌第三军，活捉敌军长罗历戎。

这就是朱德总司令在贺诗中所写的：“南台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为援保定三军灭。”

清风店战役和保北作战，先后歼敌 1.7 万多人，创造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为我军攻取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仗，也是朱德到晋察冀解放区后的一次大歼灭战。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事人物分册记述：朱德“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

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这里用了“关键”两字。

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委罗瑞卿大将在回忆清风店大捷时说：“朱总司令对战役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为了使指挥方法适应打大歼灭战的要求，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指示我们成立了前线指挥机构。他鼓励我们一定要树立打大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并且明确指出：善于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他从战略指导原则，战役指导思想到具体指挥方法，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为我们指明了胜利的方向”。罗瑞卿认为，清风店战役是实践朱德关于学会调动敌人的指示的一个成功尝试。

第二首诗，朱德题为《喜闻收复石门》，这是指石家庄战役。

石家庄，曾叫石门，位于石德、平汉、正大三条铁路的交会处，是中国的铁路枢纽之一，战略地位重要，有人曾风趣地称之为中国最大的“庄”。驻守石家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和周围各地退缩到石家庄的地主土匪武装，兵力显得相当空虚。罗历戎被俘虏以后，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心惊胆战，一面要求把保定绥署独立团及第三军的野炮营空运石家庄，一面不断构筑工事。至11月初，没有城垣的石家庄已经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从外市沟、内市沟到市区主要建筑物，共设置了三道骨干防御工事。市郊各村庄和市内的主要交通口，大大小小构筑了6000多个碉堡。各个防御阵地之间还有交通壕和地道相联系，环石家庄市还修了20多公里的铁路，装甲列车昼夜在铁路上巡逻。

尽管蒋介石、孙连仲和刘英等人对石家庄的防御费尽心机，但在朱德看来，石家庄已经是一座兵力空虚的孤城了，我军已经有条件夺取石家庄了。

正太战役结束后，石家庄周围都成了解放区，聂荣臻等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就考虑要攻打石家庄了，但是由于罗历戎率领第三军防守石家庄，夺城的时机不成熟，第三军被歼灭，石家庄更显得势单力薄，为了攻克解放区中间的这个陆上孤岛，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在清风店大捷的当天就向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提出：“乘胜夺取石家庄”。

朱德于10月23日连续发出两份关于打石家庄的电报。一份建议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等攻打石家庄，电报中说：“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

另一份电报是以工委的名义回复聂荣臻的，朱德在电报中说：“我们同意乘胜打石门。有可能打开。即不能打开，亦可能引起李文、袁朴等南援，在石、保间可能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对我有利。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电报还告知：“朱拟即去野司。”

石家庄是解放军将要进攻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几次攻打城市，都遭到了挫折，毛泽东领导革命人民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今天，革命力量发展了，夺取大城市的条件成熟了，朱德决定亲临前线。

罗瑞卿：《我们的总司令》第2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朱德选集》第211页。

《朱德选集》第211、212页。

毛泽东也极为关注打石家庄。毛泽东看了朱德和聂荣臻等人的电报后，很快回电说，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即石家庄），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攻打第一个大城市的决策完成了。

10月25日，朱德赶到河北省安国县南关，这里是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的驻地。

朱德详细听取了侦察部队关于石家庄敌人部署的情况汇报。朱德注意到，国民党军队修整了日本侵略军占领时的旧工事，防御体系又加强了。国民党的官兵沾沾自喜地吹嘘：“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蒋介石也给刘英拍电报打气，他对刘英说：“共军若敢进攻石家庄，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

朱德在想，石家庄的防御工事要引起高度重视，决不能出现久攻不克的局面，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总司令想到了炮兵，想到了勇敢加技术……

朱德同野战军领导一起反复研究，确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以坑道作业接近碉堡，用炸药爆破，辅以炮击，各个摧毁敌人的工事；继之以步兵突击，夺取敌各道阵地。

晋察冀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作战任务时，朱德总司令专门在会上作了动员。朱德强调，攻打石家庄要作好充分准备，要高度重视攻坚的战术与技术，要学会把军事进攻同政治瓦解相结合，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朱德还要求各部队在作战中要加强党的领导，精心计划，大搞军事民主，认真钻研战术、技术，要以“勇敢加技术”去攻城。打下石家庄后要严格入城纪律。

勇敢加技术，成为发扬军事民主，调动广大指战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响亮口号。

10月27日，朱德迎着晨曦中的徐徐凉风，来到安国县西伯章村的炮兵旅驻地。在茫茫田野里，总司令检阅了炮兵部队，走进炮兵连阵地，看到停放得整整齐齐的火炮，问：打石家庄的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指战员们两腿一靠，齐声回答：准备好了。

朱德微笑着点点头，说：晋察冀有一个炮兵旅，很好。你们有前途，装备好，还要继续发展壮大，将来要准备打出去。想到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朱德收起笑容，语重心长地说：炮兵很重要呀！炮兵为步兵开辟道路，可以减少伤亡。炮不打，口不开，打开缺口可以胜利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进攻城市，打炮要猛；要突然，人力要齐整集中，集中里面还要再集中，还要注意运用不同地形实施射击，不打则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步、炮协同好，胜仗不断打。

整整一上午，朱德一会儿步行，一会儿骑马，连续到六个阵地视察炮兵部队。吃午饭时，已是下午两点了。

吃完饭，朱德又参加了炮兵旅的团以上干部会，会上，总司令向大家介绍了解放战争第二年各战场的敌我态势和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要准备打石家庄了。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打攻坚战，

学会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意义都很大。

想到石家庄的防御工事和上午视察炮兵部队的情况，朱德总司令若有所思。他说：石家庄是敌人经营多年的一个大城市，有坚固的工事，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阵地攻坚战。炮兵应该对这个课题学得更好。要研究运用炮兵为步兵打开突破口，把敌人碉堡打掉，支援步兵向纵深发展。

30日，耿飏参谋长召集野战军的炮兵和工兵干部开会，研究落实朱德总司令关于如何打好阵地攻坚战的指示。朱德知道后，又去参加这次会议，同大家一起研究怎样才能有效地打掉低堡、暗堡，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作业的方法，巷战中发挥炮兵和工兵的作用问题。遇到难题时，朱德总是启发大家要集中火力。勇敢加技术。他说：石家庄是一个很好的课堂，大家要好好学习，在作战部署上，兵力和人力要集中使用在主要进攻方向上。迫击炮要能伴随步兵一起行动，山炮、野炮、榴弹炮要组成火力队，在主要进攻方向上支援突击队。总司令的现场指导，为野战军在攻城战斗中集中用好炮兵和工兵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晋察冀野战军再次召开旅以上干部会，宣布攻打石家庄的命令和部署时，朱德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朱德认为，旅以上干部如何学会攻坚战术，对进攻石家庄将起重要作用。他还特地带去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另一本是刘伯承翻译的《诸兵种合同战术》，要求每个干部认真学好这两本书。总司令说：马上就要打石家庄了，对石家庄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不讲究战术行吗？《诸兵种合同战术》关于进攻战讲了八条，你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好好学习。石家庄战役是打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

会议结束时，夜已经深了。

朱德同杨得志、杨成武、耿飏三位野战军的领导在村子外稀疏的树林中散步。月亮从乌云背后浮出来。高高地悬挂在半空，光华四溢。月光下，巍巍的大山睡了，星星点点的村寨睡了，劳累一天的群众也睡了，连整日喋喋不休的鸟雀也睡了。朱德总司令和他的战友们谈得那么细心，那么有情趣，他们眼前已经展现出了一幅攻打石家庄的激烈场面……

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守卫石家庄这座孤城，日夜不安。刘英为了给自己壮胆，也为了打乱解放军的进攻准备，整天要空军派飞机轰炸晋察冀野战军的阵地。那几日，石家庄外围不时地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

毛泽东了解到石家庄的敌情以后，对朱德的安全很不放心。毛泽东从陕北打电报给刘少奇，要刘少奇劝朱德回工委，电报说：朱总到杨得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刘少奇收到电报后，马上告诉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要杨得志劝朱德回工委。

杨得志多次劝说朱德，朱德总是摇摇头，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敌机未必就专来找我朱德？！

杨得志知道总司令心里关心石家庄战役的发展情况，就说：朱总司令，你就到冀中军区所在地的河间县去吧！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

朱德无可奈何，笑着说：野战军司令员向总司令下了逐客令，没得办法，

我只好去找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孙胡子了。

11月1日，朱德离开野战军司令部前夕，给聂荣臻和肖克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 法”。为了取得石家庄战役的彻底胜利，总司令还要求晋察冀军区要准备充足的物资，特别是炸药和炮弹，要突击制造和补充；要指派党政人员及时率领医疗队、慰问队到各医院巡视，医好伤兵；要给不能自给的军属发给生活费。

朱德一行离开野战军司令部时，天已经黑了，大平原凉风扑面，给人一种特别清新的感觉。冀中军区机关设在河间西八里的黑马张庄。当地人传说，黑马张庄是历史上传奇式的人物窦尔墩养马的地方。朱德到达黑马张庄时，夜已经深了。

到达冀中军区以后，朱德一面关注石家庄战役的准备情况，一面按照中央工委的部署进行调查研 究。到达黑马张庄的第二天上午，朱德就听取了冀中行署的负责同志对献县天主教堂有关情况的汇报，晚上还到河间城内观看冀中旧剧实验院的演出。第二，第三天以后，朱德的工作更忙了，有时一天要跑三、四个点。

11月6日，夜空开始发白，晋察冀野战军对石家庄发起了猛烈攻击，当天就夺占了石家庄的大部分外围据点。

7日，冀晋军区主力占领了机场，蒋介石无法从空中支援刘英了。第四纵队占领了被敌人吹嘘为“铁打的”云盘山制高点。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铃声不断。杨得志司令员接过话筒一听，是朱德总司令的声音。

得志同志，仗打得怎么样？

杨得志报告说：石家庄的外市沟、内市沟都被我们突破了，云盘山已经拿下来了。

打得好呀！朱德总司令很满意。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面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

部队进入市区作战时，朱德总司令又分别给杨成武和杨得志打电话。朱信嘱咐杨成武：你们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要注意保护几个大工厂，那是民族资本家的。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你是政治委员，要抓一抓。我们在军事上要打胜仗，在政治上也要打胜仗。

朱德又给杨得志下达三项指示：部队突破内市沟后，一定要猛推、深插、狠打，不让敌人有半分钟喘息；要充分做好巷战准备；全歼一切敌人，包括还乡团在内。

总司令的正确指挥和关怀，使攻城的指战员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经过连续6昼夜的作战，全歼了石家庄守敌2.4万多人，俘虏了包括敌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在内的多名高级军官，拔除了敌人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这就是朱德在诗中所说：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11月13日，朱德总司令给晋察冀军区全体指战员发出嘉奖电。该电说：

“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举，特嘉奖全军。”

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夺占敌大、中城市的战斗越来越多。攻克石家庄，为我军继续夺占敌大、中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极为重视总结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朱德总司令来到束鹿县东小庄村，详细听取了由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座谈会上的发言。朱德在座谈会上强调说：“我们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它意味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巨的实践还在后面”。

为了详细了解石家庄攻坚战的真实情况，朱德于11月27日来到晋县的北侯城村，连续4天听取了参加石家庄战役的30多名连、排、班指战员的汇报。

座谈会后，朱德对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更清楚了。12月1日上午，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在侯城村开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朱德自豪地说：“过去人家说我们打不下大城市。你们晋察冀部队曾经打下张家口，人家不承认，说是苏联红军帮助打下的……不久我们就打下了石家庄。因此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怕得很厉害。”朱德指出，充分准备是夺取石家庄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打石家庄准备了一年，对敌情作了详细了解……我们的物质条件准备得也很充分，有充足的攻城器械，准备的炸药和炮弹都没有用完。这次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对军队、民兵、爆炸英雄、老百姓，都作了动员，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石家庄。”

朱德认为，石家庄战役中最大的收获是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这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朱德还详细总结了攻城战术。他说：“战术对你们万分需要，是你们的‘补药’。你们的作战经验很多，但就像一大篓子钱，是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都串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不要把经验老是前着装在篓子里背着，成了包袱，用不上”。总司令详细总结了石家庄战役中“勇敢加技术”的经验。战斗中，在冲击出发位置上挖了工事，缩短了冲锋距离，减少了伤亡；炸药用得好；集中几十门炮打一个突破口，效果好；运用了集中火力突破一点，随即向两边扩张的战术；步兵班战斗小组互相掩护；巷战中，使用手榴弹、炸药和挖墙前进并用；等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朱德还特别指出，石家庄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胜利后不要骄傲，要把经验好好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学习和发展。

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朱德驱车来到石家庄。

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总司令冒着大雾在石家庄市视察。在炼焦厂和大兴纱厂等一些重要工厂，朱德听取了石家庄市的负责同志对工业和经济情况的汇报，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夜幕降临城市的时候，朱德才离开石家庄回

《朱德选集》第212页。

陈靖：《往事情深》第24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朱德选集》第220、221页。

《朱德选集》第222、223页。

西柏坡。

12月10日，朱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报告了他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冀中军区和石家庄视察的有关情况。朱德在信中讲到，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在打石家庄的过程中，发扬了军事民主，发动了士兵群众，老兵带新兵，战士群策群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朱德还报告了工人的一些情况，“建议中央派得力的人做工人运动，好好地领导工人群众参加战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家务，真正实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信，很快把它转发给各中央局和野战军。

毛泽东说：朱总司令这封信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的方式发动士兵群众，研究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这种做法叫军事民主，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

1948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进行临汾战役时，朱德想到，攻打临汾可以采用攻打石家庄的经验。朱德和刘少奇一起打电报给徐向前和薄一波，建议“炮炸协同，击开突破”，集中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打一个地方，利用挖好的坑道用1000公斤到5000公斤的黄色炸药进行爆破，必能炸开突破口。

临汾是晋南的军事重镇。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二个多月的攻坚战，终于在5月17日全歼守敌，解放临汾。涂向前元帅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朱总司令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

27 天上有敌机，前后是敌人。朱德手一挥：
走！他和陈毅去“耍龙灯”、“钓大鱼”

1948年5月10日，朱德离开西柏坡，代表中共中央到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陪同朱德前往濮阳的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以及粟裕。

谁能想到，朱总司令和陈毅司令员在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身陷险境。

且看两位司令员如何脱险。

当时，华东野战军总部设在河南濮阳。朱德和陈毅坐吉普车前往濮阳。陈毅乘坐的吉普车在前面，朱德乘坐的吉普车在中间，后面还有一辆大卡车，车上坐着警卫人员。三辆车沿京汉路东侧缓缓南下。

刚下了一场雨，道路泥泞，汽车在坑坑洼洼的黄泥浆路上颠簸前进，时而遇到炸弹坑、封锁沟、界限沟之类的“拦路虎”，还得绕道前进，绕不过去了，两位司令员都跳下车，搬石头填好路后再前进。

车过邢台，陈毅看到前方道路上有一个硕大的炸弹坑，提醒司机注意。吉普车开过去以后，朱德示意停车，他担心大卡车不好过。

朱德和陈毅先后下车时，果然看见那辆大卡车陷在泥坑里了。司机轰了几下油门，没有成功。警卫人员纷纷跳下车，喊着号子推车。

朱德和陈毅挤进战士中间，用力推车。卡车刚往前移动了半个轮子，猛地又滑回来了，朱德的身上和脸上溅满了泥浆。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抬头一看，是标有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飞机。

朱总司令，陈司令员，敌机来了，你们快隐蔽。一名战士着急地喊起来。

朱德抬头看了看敌机，风趣地说：敌机在空中，我们在地上，别理它，来，大伙儿一起用力呀！

一，二——！随着这声响亮的口号，汽车推出了泥坑。

敌机在总司令的头顶上绕了两圈，飞远了。

邯郸以南，是国民党统治区。朱德和陈毅只能在夜间赶路。

月光下，吉普车没有开灯，缓缓南进。这一带驻有国民党军队，警卫参谋曾建议等敌人离开后再走，这样安全些。朱德不同意。天一黑，3辆车就出发了。

吉普车开了30多公里，陈毅突然发现了什么，急忙示意停车。他观察片刻，来到朱德跟前，说：朱总，前方有国民党军队，正沿着公路向我们走来呢。

朱德一听，急忙下车观察。

报告总司令，我们后面有敌人的汽车，正向我们开来，警卫参谋感到敌情严重，急得说话声音都变了。他去拉朱德和陈毅，急促地问：司令员，我们要不要到旁边躲一躲？

解放军两位司令员被国民党军队夹在中间了。敌人近在咫尺，人多势众。朱德和陈毅身边，只有数名警卫人员，大部队联系不上。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刚才还是风平浪静，刹那间就变得万分危急。

朱德考虑片刻，果断地说：前后的敌人都不用管它，车子继续前进！准备战斗，没有命令不许开枪！

朱德上了车，端坐车前，镇静地对司机说：把车灯打开，大胆往前开。

刹那间，吉普车启动了。车前射出两道强烈的光，把路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当吉普车驶近国民党军队时，那些官兵纷纷往路两旁闪开。他们以为车上坐着的是他们的上司，他们做梦也想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就在他们面前一闪而过。

后面国民党军队的汽车也跟上来了，一直相隔那么一段距离。

前方有一条岔路。敌情终于在过了岔路后消失了。

在国民党军队的“欢迎”和“护送”下，朱德总司令和陈毅司令员以超人的胆略和智慧，安全通过了国民党统治区。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设在离濮阳不远的孙王庄。5月13日晚，朱德和陈毅赶到孙王庄。朱德见到叶飞、王必成、陈锐霆等纵队司令，分外高兴。华东野战军是在新四军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朱德对这支部队很熟悉，一连数天，朱德总司令都和干部战士们座谈，向他们宣讲战争形势和军队建设的有关问题。

1948年夏，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总司令欣喜地告诉大家，自从1947年7月起，解放军就转入了战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到蒋管区，发展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自卫战争开始时，蒋介石有430万军队，其中200万是正规军。现在，蒋介石的军队经过多次补充，也只有360万人了，其中在第一线作战的只有163万，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几乎没有他的正规军。在以往的一年零九个月中，我们已经歼敌一百六十多个旅，计224万多人。除新疆等地的第二线部队16个旅外，国民党的军队几乎都挨过我们的打，有的部队已被歼灭二次乃至三次。敌人经过陆续补充，在数量上看起来仍然不少，但质量已大大削弱了。因为军事上的这些变化，我们要英勇地向蒋管区进军，要派好的部队打出去。出击外线的部队要能够下依靠后方独立作战，不仅要打胜仗，还要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建立新根据地。

总司令还告诉大家，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深重，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愈益加深。我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人口已达1.68亿。解放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

5月14日，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反复强调了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重要性。总司令要求部队真正做到“仁义之师，秋毫无犯”，要严格部队的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不要闹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做工作不要讲价钱，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对革命有很大的好处。”

在讲到军队建设问题时，朱德说：“我们部队能打仗，就是靠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指挥要认识，只有政治领导加强了，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能提高，才能打胜仗。要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使大家认识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劳动人民的军队，干部、战士都是为人民服

务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军政干部一定要团结，不能闹独立性。搞好团结，要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尚有正规军 86 个旅 66 万多人。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当面的主要敌人是邱清泉兵团的整编第五军和第十一师、第七师等主力部队。如何对付这股敌人？朱德生动而又形象地提出了“钓大鱼”的战法。朱德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夸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总司令还告诉大家，战术是灵活多变的，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这些都要从实际出发很好地去研究。战争形势是变化的。过去，国民党军队的条件很好，上有飞机，下有汽车、火车，水里有轮船、兵舰，它的“腿”长，走得快，所以很神气。我们就不能同他们正面相碰，就只好暂时丢掉一些地方。去年我军转入进攻以后，砍断了国民党军队的几条“腿”，它就走得慢一些了。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把它的“腿”全部砍掉，那它就只好用脚来赛跑。大家都是一双脚跑，它就跑不过我们了。将来我们的“腿”也会长起来的。朱德总司令亲临华东野战军视察和指导，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总司令在于部会上所作的“耍龙灯”、“钓大鱼”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华东野战军总部把朱德的讲话汇印成册，发给广大指战员学习。6 月中、下旬，华东野战军巧妙运用朱德提出的战术，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豫东战役，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歼敌 9.3 万多人，创造了一次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的新纪录，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态势。

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发自肺腑地号召广大指战员学习总司令的伟大人格，并赋诗四首，“呈朱总司令以志其亲临南线之快”。这里辑录其中两首：

（一）

读罢新诗兴不残。
又将远举付深谈。
总戎令下风扫雪，
立马吴山更图南。

（二）

战局儿回抵掌谈，
反复指点计艰难。
北线迎来传屡捷，
逐鹿自古在中原。

视察华东野战军前后，朱德思考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形成五个战略集团。东北

卫立煌集团 55 万人分布于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地区，华北傅作义集团 55 万人分布于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地区，华东刘峙集团 65 万人分布于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华中白崇禧集团 35 万人分布于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胡宗南集团近 30 万人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从全国态势看，中原是两军争夺的关键地区。在敌我兵力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时，如何抓住决战的关节？如何选择决战的时间、地点？这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重大问题。

朱德总司令参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

早在 1947 年冬天，蒋介石飞到北平，要求傅作义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时，朱德就要求解放军指战员学会大踏步进退、进行大的战略机动的本领。为了创造战机，要克服各种不愿长途行军，不愿急行军，不愿爬山吃苦等思想，并须改变某些不适宜于大踏步进退的组织形式和习惯，力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打基础。

视察华东野战军以后，朱德经常到总部作战局听取汇报，了解解放战争的进程，运筹战略决战问题。8 月 23 日，总司令在听取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以后，对决战的地点、时间和有关措施提出了鲜明的看法。

关于决战地点，朱德认为，中原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历史上汉楚相争，刘邦与项羽的决战就在中原。韩信将兵所以能“多多益善”，就是因为那里人口众多，地区广大。

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是分几个战场进行的。朱德发表上述观点的半个月前，国民党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作出了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决议。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不使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撤至锦州，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我军首先发起辽沈战役，歼敌 47.2 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战略决战的第二个战役于 1948 年 11 月 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在淮海地区进行。这一战，先后歼敌 55.5 万多人，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都被解放，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可见中原战场是多么重要。

关于决战时机，朱德明确提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准备物质条件，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

解放战争中，朱德协助毛泽东全面、客观地分析战争形势，在总兵力对比我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经济上日益恶化、军事上再也无法摆脱战略被动的局面，毅然决定将大歼灭战发展成为战略决战，恰到好处地把握了战略决战的时机，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兵团悉数就歼。

为了争取决战的全面胜利，朱德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总司令看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有把握了，但是如果土改政策、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许多政策有一条执行得不正确，都可能使我们失败。争取俘虏的成功，这是军事上的一个大胜利，今后要着重解决“把生产提高一寸”的问题。

朱德认为，近半年来解放军的攻城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已经能够攻

破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石家庄、洛阳、潍县、开封、兖州等城市的攻克，就是一个例证。只要努力搞好军工生产，今后就没有攻不破的城市。太原、济南这样敌人有重兵设防的城市也是可以打下来的。

对于军工生产，朱德一向十分关注。在以往的二十多年中，我军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解决军工问题，蒋介石被风趣地称为“运输大队长”。随着大规模战略决战的到来，军工生产的任务越来越繁重，1947年春，总司令曾经把晋察冀军区兵工部副部长刘鼎叫到西柏坡，朱德对他说，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了，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兵工部门要组织力量多生产一些炮弹，越多越好！

晋察冀军区兵工部研制出一种新型炮弹时，朱德还亲临靶场参观试射，勉励他们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

1948年初，中央工委专门组织了华北各解放区召开军工会议。朱德在会上明确指出，我军是用战争来结束战争，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是不得已的办法。军工生产对战争胜利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要夺占敌人的大据点，就要有大量的炮弹、炸药和手榴弹，朱德还致函晋绥军区，冀中军区领导人贺龙等人，再次强调，炸药、炮弹、手榴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必须制造大量炸药、炮弹、手榴弹，如财政不足，可省衣节食，如原料不足，可发动广大群众熬硝。

由于总司令对军工生产抓得紧，抓得具体，各解放区的军工生产迅猛发展，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保障了战略决战的需要。

朱德在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第一次讲话后下到一个月，战略决战的第一仗——济南战役就打响了。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北靠黄河，南依泰山，东有茂岭山、砚池山等高地，西面地形开阔。济南城高墙厚，工事坚固，阵地交错，防御纵深大，守敌有三个整编师 12 个旅共 10 万多人，蒋介石还调集了 162 架战斗机进行空中支援，另以 42 架重型轰炸机对攻城和打援部队进行轰炸。面对工事坚固守备兵力多的济南城，我军充足的炮弹和炸药保障起了重要作用。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采用人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术，利用强大炮火，辅以大量炸药，在高大城墙上打开缺口，经过连续八昼夜作战，夺取了济南这座敌人坚固设防和 10 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

淮海战役期间，华北和东北的军工部门送往前线的弹药达 1640 万吨，大大超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火供应。

辽沈战役结束前夕，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声明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军政人员“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郑重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施放毒气，破坏武器弹药，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毁坏文化古迹罪行者，均以战犯论罪，应依法惩处；凡采取有效办法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城市建筑及物资获得安全和免受破坏者，则应予以奖励。这个命令的发布，震慑了敌军，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即将开始时，朱德总司令在总部作战局的战况汇报会上高兴地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徐州地区的决战，“在数量上比敌

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弹药我准备了八个基数。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进行决战的物质基础。”总司令还满怀信心他说，我军以四五个纵队监视特州的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无产阶级军队才能这样。总司令还告诫大家，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不要因胜利冲昏头脑而看不到困难，要迅速把新解放区的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支援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敌人 154 万多人，连同 1948 年 7 月以来进行的济南战役和其它战役，先后歼敌 231 万多人，把战线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如此大规模的战略决战，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朱德总司令看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基本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在一次会议上，总司令兴奋地说：中国局势，在这一年内可以完全统一起来。蒋介石企图以长江为防线，但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就要过长江了。

数个月以后，总司令的预言实现了。中国人民的百万雄师飞渡长江天堑，推翻了蒋家王朝。

1949 年 3 月 23 日。

总司令忘不了这一天。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北平迁移。朱德也离开了西柏坡。

春风，暖丝丝的春风，正从车窗外涌进吉普车里。

总司令满面红光，不时地向窗外张望。河水解冻了，积雪、流水，融化在汽车的轰鸣声中。大雁归来了，带着它的家族，互相呼唤着，从车顶掠过。幼芽在柳枝上萌发，蚂蚁爬出了洞穴，享受着大地的温馨。春风，像千万股彩色的线，忙碌地为大地绣织鹅黄浅绿的春装。山绿了，田绿了，桃花在万绿丛中透出几许粉红……

首长，披上大衣吧？

朱德摇摇头，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华北平原美丽的春色。

前天，后勤处的同志给大家补发棉军鞋。北平天气还冷呀！当棉军鞋送到朱德面前时，朱德先是一惊，马上又笑着说：不不，我不要鞋，他故意把脚一伸，又说：你们看，我这双鞋虽然破了点，可补一补仍然可以穿嘛！把这双新鞋拿到前方去吧，前方的战士比我更需要呢！总司令正是穿着那双缝补过的棉鞋踏上了进京的征程。

那是康克清为朱总司令缝补的棉鞋。

前方，是总司令曾经视察过的石家庄。看到我军在解放战争中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朱德心中又增添了几分激情。七届二中全会刚结束，朱德就驱车来到石家庄面粉厂、玻璃厂、卷烟厂，总司令了解了这几家大工厂的生产情况，不辞劳累地为大家宣讲二中全会精神，要求大家贯彻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努力搞好生产。

马达轰鸣，吉普车在华北平原上急驶。这一路，朱德很熟悉。解放战争爆发后，总司令不止一次地来到这片硝烟滚滚的土地上，指挥千军万马同敌人搏杀。今天，吉普车向故都北平驶去了。车轮滚滚，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

的回忆。

在太行山麓的柏坡岭下，朱德曾经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数百万大军南征北战，有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时刻。离开西柏坡的十天前，他还同中央委员们一起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朱德眼前不时地涌现出委员热烈讨论的场面。3月5日，朱德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一起聚集在西柏坡村，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在会上作重要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地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历程，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天，朱德在大会上发言，他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认为从乡村转到城市“这是个大转变”。土地革命战争中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总司令想到，根据这个转变，军队也要由以战斗队为主向以工作队为主转变。从战争进程上看，三大战役以后，无论采取用战斗消灭敌人的“天津方式”，还是用和平方法改编敌人的“北平方式”，或有意暂时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的“绥远方式”，都不会有淮海战役那样的大规模作战，国民党军主力已经被歼灭，严重的战争时期基本上已经过去，在南方各地，我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

朱德颇有远见他讲到，我们的军队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要培养出会做事的人。今后我们进了城市，掌握了全国政权，就要搞好国防建设，要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要训练好国防部队。最后，朱德意味深长他说，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中国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凡骄傲者都是幼稚的人。

会议开得异常热烈，这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作准备呀！

七届二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朱德还在回忆西柏坡那蜿蜒曲折的小路，那令人难忘的农家院落，吉普车停了。

首长，先遣队把午饭准备好了。

朱德下了车，抬头望望空中那个嫣红嫣红的太阳。

一股春风扑在总司令的脸上，暖融融的，他一挥手，走！他仿佛感觉到了春姑娘的呼吸。

28 开国大阅兵，朱德欣喜不已：从现在起， 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

1949年10月1日下午，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时刻，一代伟人的声音在华夏大地上回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神采奕奕，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天安门前进行的开国大阅兵，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呀！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广场，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辉标志。明清时期，天安门广场是一块禁地，南面有大明（清）门，东西两面有长安门，各门之间用高大的围墙连接，人们东西来往，必须从大清门以南或地安门以北绕行，广场两侧的千步廊周围，分布着当时的中央衙门，那是封建统治阶级残暴镇压人民的场所。今天，天安门广场成了中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海洋。在二十八响礼炮声中，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那红旗是新中国的象征。北京市30万军民汇聚在广场上，欢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接受人民领袖的检阅。

下午之时55分，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们沿着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缓缓登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城楼周围的蓝天碧水、绿树丹墙，白石黄瓦、朱柱画梁，交绘出绚丽美妙的立体色彩，使这座庄严巍峨的建筑更显得气势磅礴，雄伟壮丽，以其焕然一新的面貌迎候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庄严伟大的时刻。

毛泽东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刹那间，《东方红》乐曲波澜壮阔地在广场上响起。在军乐队的鸣奏声中，广场上欢声雷动……大阅兵开始了。

朱德身穿新做的呢料军装，登上了阅兵车。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各部队。

阅兵车从天安门城楼下部那个高8.82米、宽5.25米的门洞中缓缓驶出，通过金水桥，驶向受阅方队。

“东华表下，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德总司令敬礼，并以宏亮的声音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请总司令检阅！检阅！设置在金水桥畔石狮子前的“九头鸟”扩音器把聂荣臻总指挥向朱德报告的声音扩放出去，在天安门广场上回荡。

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陪同下，向整齐肃立在东长安街、东单广场上的受阅部队驶去。由聂荣臻陪同朱德阅兵，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决断。9月初，周恩来在总部递交的阅兵方案上挥毫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检阅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周恩来曾经同朱德和聂荣臻一起阅兵。那是3月25日下午5时，刚从西柏坡抵达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来到西苑机场，在叶剑英和聂荣臻的陪同下，分乘敞篷吉普车检阅部队。入城阅兵式上，接受检阅的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一共3万多部队和1万多名北平市群众代表。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著名人士都到了西苑机场。开国大阅兵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第一次最隆重、最庄严的检阅。阅兵车由西向东缓缓驶去，展现在朱德总司令面前的是由近2万名将士组成的雄师劲旅。

同志们好！这是总司令的声音。

首长好！受阅的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和海军代表队中，不时地传出亲切的答词。

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陪同一直检阅到外国领事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才返回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回荡起朱德洪亮的声音。那是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这项命令中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它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朱德宣读命令后，激动人心的分列式开始了。

《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护旗兵掌护着一面火红的军旗，引导受阅方队从天安门前通过。

嚓！嚓！嚓！海军方队走在最前面。朱德总司令在城楼上看到，方队中的每一个士兵都戴着白色水兵帽，脑后的黑色缎带徐徐飘动，蓝白相间的海魂服在天安门前显得格格外英俊潇洒。人民军队有自己的海军队伍了！总司令激动不已，广场上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似潮水迭涌……

前进在海军方队后面的是由 8000 多名指战员组成的 12 个步兵方队。总司令注意到了，前面方队中，指战员们胸前挎着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斯登式、汤姆式冲锋枪，后面陆续出现了轻机枪、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看到这一个个气势浩荡，所向披靡的方队，总司令不时地扬起左手，向勇士们致意。

轰隆隆！轰隆隆！炮兵师、战车师相继开过来了。那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通过天安门检阅台前的所有炮车、战车都油漆上了“八一”红星和白色的轮圈、显得十分壮美。战士们挺胸站立在战车上，注目城楼，向总司令、向毛泽东等一代开国元勋们庄严敬礼。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朱德举目了望，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飞行中队正向天安门上空飞来，接受总司令的检阅。当时，北京南苑机场只有 17 架飞机，为了完成受阅任务，第一次飞过天安门的 9 架 P—51 战斗机又绕弯飞了第二圈。这是一次特殊的受阅，为了防止敌人袭扰，这些受阅飞机上还带着枪弹，其中的 P—

51 战斗机和蚊式战斗机各两架飞越复兴门后，即升到 10000 至 12000 英尺处，担负北平、通州、良乡、大兴上空的警戒任务。带弹的飞机受阅，这是史无前例的，当时的敌情还很复杂，一旦有敌机来袭，受阅飞机降落后再升空迎敌，就会失去战机。

看到空中和地面浑然一体的雄师劲旅，总司令太高兴了，他略眯双眼，那只手用力向天空中挥动……

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与飞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汇聚成了欢乐的海洋。

夜幕降临了。满天星斗在深蓝洁净的夜空中闪烁，桔黄色、淡蓝色的街灯把北京城点缀得很美很美。这天晚上，朱德总司令破例在北京饭店宴请参加阅兵的陆、海、空部队的代表。朱德端着酒杯，先到海军席上，再到空军席上，依次向大家表示祝贺。当他看到戎装未脱就赶到宴会大厅的空军代表刘善本时，兴奋地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

陆海空军总司令，这话寓意深刻。

海军、空军，都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军种。八一南昌起义以来，我军南征北战，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打败日本侵略军，基本力量是以步兵为主体的陆军，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过于悬殊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形式，不具备组建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的条件。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海军和空军，但其主要作战力量仍然是庞大的步兵部队。我军作战主要是步兵以及少量的炮兵、工兵。战争双方几十万军队的攻防作战，大、中城市的攻守，主要是以步兵为主，作战双方的战术主要是围绕步兵为核心而组织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要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要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安全，就要建设一支包括强大的空军、海军在内的现代化的国防军。朱德今年已经63岁了，他多么希望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呀！

总司令为之呕心沥血。

早在9月24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朱德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曾满怀信心他说：人民军队应当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加强，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空军和海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朱德还代表解放军代表团在大会上保证：我们一定要坚定地这样做，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充分有效地保卫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朱德的讲话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家对朱老总建设人民军队的决心和信心钦佩不已。

那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等5人任副主席。

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发言时指出：建立强大的国防军，是我们面前迫不及待的任务。在阶级消灭之前，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军队近代化的科学知识，学习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和技术。

陆海空军，始终是总司令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陆军已经发展到数百万了，海军怎么办？空军怎么办？总司令年事已高，但仍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日夜辛勤操劳。

1950年，在欢渡新年的节日气氛中，朱德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个报告。

朱德提出，大陆上的战斗除西藏以外，已于1949年12月27日结束，现在要迅速建立海军、空军、工程兵和铁道兵。朱德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后，马上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全军精简整编，组建新军种。

空军，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立的新军种。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刘亚楼原担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早在3月份，中央为了统一领导全国的航空工作，成立了军委航空局，隶属于军委作战部，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部和原军委航空局为基础，组建空军领导机关。

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第一次出现了空军司令部的正规编制。

从此以后，朱德总司令经常从百忙中挤时间，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些业务会议，参观空军的飞行表演和教学展览，勉励空军指战员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加强训练，努力掌握各种技术。朱德还同邓颖超一起，主持了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开飞典礼。

在现代战争的天平上，空军和陆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军种，如何把以陆军为主的班底建设成强大的空军呢？1950年3月10日，空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朱德总司令到会并系统阐述了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思想。

朱德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建设空军。这支空军的任务很光荣、很繁重。“首先，要配合其它军种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初步取得制空权，然后，逐渐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这支空军要在我们所有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

建设空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总司令勉励大家要克服困难，树立信心。总司令语重心长他说，八一南昌起义以后，建设陆军的环境和条件也十分恶劣，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建设成了一支有四百多万人的强大陆军。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建设空军的国内外条件都比开始建设陆军时好得多。虽然我们的飞机还不多，人员也很少，还有一些其它困难，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克服困难。

朱德认为，建设好空军的关键是掌握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与陆军不同，作战胜负有时在分秒之间就决定了。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会被敌人打败。因此，所有的人员都应当学会技术。要努力研究科学，实实在在地把飞机工业搞好，三年五年之内，我们要由外行变成内行，逐渐做到有发明和创造。要培养出大批足够用的飞行员。

朱德还特别强调，人民对空军抱着极大的希望，国家也拿出了不少钱，建设空军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现在已经成立了空军司令部，有了一定数量的飞机、机场和修理厂，仅有这些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成立航空兵师和航空兵军。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只要努力不懈，一定能建成一支新式的、强大的空军。

海军，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组建的新军种。

1950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正式成立，肖劲光任司令员，海军领导机关是以陆军第十二兵团机关和第四野战军后勤二分部各一部为基础组建的。随着海军部队的发展，我军又相继建立了北海舰队、东海

舰队和南海舰队。

海军组建不久，朱德总司令不辞辛劳地视察海军的码头、舰艇、学校。总司令对从陆军中调来的海军指战员说：你们要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建设好一支人民的海军。

1950年7月13日，朱德给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写信，强调了海军建设的有关问题。

肖劲光接到朱德的信以后，驱车前往朱德的办公室。见到总司令，肖劲光详细汇报了拟制海军三年建设计划的初步设想。朱德很高兴，听着肖劲光的汇报，不时地记下什么。肖劲光讲到海军的基本建设时，朱德说：应该利用现有的时机和兵力，首先把沿海海岸各要地及岛屿的防御工事、防御设备建立起来，把各基地组织起来。这一任务应成为当前的工作任务，且应成为首要任务之一。

肖劲光谈到海军的作战任务时说，解放台湾，是海军的一项重要任务。

朱德略一思考，说：不能单从打台湾打算，而忘记了海军的基本建设。

海军舰艇出海作战，燃料是个大问题，朱德对肖劲光说：你们给军委打个报告，要求重工业部发展燃料工业。

短暂的汇报，使肖劲光深深感到朱德总司令对海军的关心和爱护，海军司令员脑际里，不时地回忆起朱德总司令对海军建设的精辟指示：

中国地方宝贵，寸土都要保护。

海军的防卫在海上。

招兵要注意招熟悉水性的人。

在海上建立生产，建立家务。

1951年9月11日，海军在山东半岛南部胶州湾东南岸的青岛市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朱德总司令也专程来到青岛。青岛市，一面接陆，三面环海。海港阔水深，冬季不冻，是我国最优秀的海港之一。青岛这座建筑在海滨丘陵上的城市是我国著名的游览、避暑、疗养胜地。朱德总司令来到青岛后，顾不得去游览美丽的海滨，也顾不得去参观著名的海产博物馆，却一头扎进了海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会场。

听了大会的发言，朱德对大家说，中国过去不是没有海军，但却没有真正的海防。今天我们保卫国防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防守海岸线，保卫领海。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需要海军的指战员和战斗员一致努力，也需要海军同陆军、空军相互配合，共同来完成。

总司令特别强调，要根据海军的特点来加强海军建设。他说：“海军和陆军不同，在海洋上作战，炮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海战中白刃战的机会是很少的，甚至没有，但炮的用处却很广泛。有了海岸炮，有了鱼雷，有了军舰上的各种火炮，加上空军的掩护，就有可能打败敌人从海上来的进攻，因此，必须重视海军中的炮兵训练工作……过去陆军打仗，曾经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以夺取城池为主要目标，海军就不同，海军的任务是保卫国防的最前线，要把敌人消灭在海上。为此，海岸炮兵要有坚固的永久性的堡垒。炮兵除了经常操练之外，应当经常增修工事”。

朱德欣喜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年时间，我们的海军就建立起来了。目前这支海军的力量虽然还不够强大，但它是按照现代化的标准

建立的，陆军的发展经过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海军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总司令坦率地告诉大家：最近几年内，我们的海军还不可能有大的登陆艇、大的战斗舰和航空母舰。因此，我们在战略上只能采取防御的方针。但单纯的防御是不行的，要以攻为守。快艇、潜艇配合飞机、大炮，这都是攻防作战最有力的武器。海军的同志们要有信心和决心，去配合陆军和空军，依靠坚固的海防工事去歼灭来犯之敌。

朱德满怀信心地在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聪明、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来保卫伟大可爱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相信，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中国人民也必将拥有一支强大的和陆军同样英勇善战的海军部队。

一次加强海军建设的重要会议结束了。扬名世界的崂山矿泉水。青岛啤酒没有给朱德总司令留下多少印象，却描绘出了一幅海军建设的宏伟蓝图。

朱德总司令还曾经就海军建设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批准海军领导提出的以空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建立海军航空兵，以加强防卫力量。

在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关怀下，海军航空兵迅速发展。

正当先德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日夜操劳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场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在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爆发。朝鲜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这场局部战争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内战。

这场战争牵动了全世界。美国早就对号称“黄金之国”的朝鲜垂涎三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发表广播演说的当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集团的军队。

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当天，美国海军第7舰队十余艘军舰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

这是对中国领土的野蛮侵占。

不久，美国军队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安全。

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会甘心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的，并要第二、三野战军准备对付可能的美国的军事干涉。当时有人害怕我国公开揭露美军的侵略阴谋，毛泽东却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朱德心里想，中国人民有武松打虎的勇气。

7月7日，围绕朝鲜战争在太平洋两岸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

在纽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

在北京，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朱德总司令同聂荣臻、罗荣桓、林彪等人一起出席会议，研究加强东北边防问题，决定调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组成第十三兵团，作为军委的战略机动兵团，在河南集结。

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255000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当时，解放中国大陆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主要在南方。

8月23日，朱德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再次讨论东北边防军的有关工作。

8月31日，朱德总司令接到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联名呈送的报告，这份报告判断美军可能有两种企图：一是以部分兵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登陆，主力从现地北进；二是美军主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登陆，前后夹击。报告中还提出，我入朝参战的时机以敌人进到三八线以北地区为好，这样不仅政治上有利，军事上也是有利的。

朱德总司令认真审阅了有关文件，仔细分析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后，于9月5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朱德在信中提出：“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作长期打算。我们除整顿陆军外，应抓紧建设空军、海军以及装甲兵、工兵、炮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现存的陆军除整编以外，大部分可转为新式兵种，”在朝鲜战争的风烟中，总司令更加关注空军、海军和特种兵建设了。

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在朝鲜西岸的仁川登陆成功，并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随着毛泽东的一声命令，英勇的志愿军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朱德总司令对入朝参战的部队极为关心，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亲自对部队进行动员，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他曾两次离京到山东看望即将赴朝鲜参战的部队。

第一次是10月下旬。

以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力副司令员的第九兵团驻在山东曲阜，即将赴朝参战。29日，总司令来到山东曲阜九兵团驻地，亲切地看望全体指战员，总司令在干部会上说，朝鲜战场的形势发展很快，美帝国主义不顾我们再三警告，越过三八线，直趋我国边境，还有侵略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对此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保卫祖国，支援友邻，我们肩负着光荣的职责，我们一定能胜利。

朱德总司令动员后不久，第九兵团就陆续北上。11月7日、12日、19日，第九兵团三个军在宋时轮司令员的率领下先后由辑安、临江入朝，担任东线作战任务。

第二次是12月下旬，朱德专程到山东看望第十九兵团。

第十九兵团原来驻西安，为准备赴朝参战，从西安调到山东兖州。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赶到北京中南海，向朱德总司令汇报部队的准备情况。

朱德详细询问了第十九兵团在兖州的集结情况和部队的武器装备情况以后，凝视着墙上那幅朝鲜地图，说：彭老总已经率领志愿军先期入朝了，朝鲜战场上第一次战役已经结束，第二次战役正在进行，你们也即将入朝。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

杨得志和李志民相视一笑，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朱总司令到

《朱德传》第621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1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部队就要出征了，大家都希望总司令像当年打石家庄前夕那样给我们作指示。

朱德问：动员大会什么时候开？

12月下旬。

杨得志和李志民汇报完工作，返回山东兖州。

数天后，第十九兵团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将亲临兖州参加干部会议。杨得志和李志民欣喜不已。总司令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腊月天，山东兖州十分寒冷。朱德下车后就和杨得志、李志民等人交谈，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谈完了。朱德站起来，手一挥，说：走，咱们到连队看看去！

旁边那位医生一听，为难他说：总司令，外面太冷了。

杨得志和李志民也劝阻说：总司令，部队住得比较分散。我们让指战员代表到这里来，您可以分批接见他们。这屋里有木炭火，暖和些。

朱德连连摇手，乐呵呵他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来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说完，朱德顶着寒风，连续看望了几个步兵连和炮兵连的指战员们。

由于过度疲劳，朱德感冒了。第十九兵团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那天，朱德总司令不顾高烧和咳嗽的折磨，坚持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着重讲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第十九兵团的任务，分析了赴朝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鼓励大家满怀信心地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会后，朱德总司令冒着寒风与大家合影留念。

朱德总司令还给第十九兵团师以上干部每人赠送了一本刘伯承翻译的《兵团战术概述》。每一本书上，都有朱德总司令的亲笔题字。

带着朱德总司令的鼓励和期望，第十九兵团指战员于1951年3月18日在朝鲜南川、市边里、兔山地区集结，参加第四次战役。

抗美援朝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要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队进行一场现代化战争，望着鸭绿江对岸的滚滚硝烟，朱德总司令更加关注空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了。张爱萍同志回忆朱德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情景时动情他说：“为了尽快使我军编制和战斗编成达到合成化，朱德同志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从陆军中抽调大批骨干充实到这些部队，以欣喜的心情看待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的新军兵种的诞生。他在各军兵种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中，一再指出这是把我军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历史性变革，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大事”。

在本节收笔之际，我们再献上朱德总司令关心主军、海军建设的两个精彩情节。

其一：顶风冒雪阅战鹰。

1950年12月31日晚，在一片迎新辞旧的气氛中，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宴请苏联客人尤金和费德林，饭后看戏，欢度新年。毛泽东特地邀请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作陪。

演出开始了。朱德想起了新中国的战鹰即将飞赴朝鲜战场……

在举国欢庆 1951 年新春之际，朱德总司令顶风冒雪，来到前线某机场，检阅即将飞赴朝鲜战场的空军部队。朱德勉励新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要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

1 月 29 日，捷报传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新安州上空首次击落美国空军下—84 型飞机 1 架。

这是“第一次较量”中的胜利。

到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停战，志愿军空军共击落敌机 330 架，击伤敌机 95 架。

其二：企盼海军现代化。

1953 年 9 月，朱德专程来到大连海军学校视察。当朱德检阅了大连海校师生员工，听取了学校建设的汇报，参观了该校的教学设备后，即刻挥毫题词，勉励大家“努力掌握现代海军作战技术”。

1974 年 8 月 80 高龄的朱德元帅兴冲冲地登上军舰，出海检阅北海舰队，再次题词勉励海军官兵：增强革命团结，加速人民海军建设。

29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朱德发言时，毛泽东的手在鞋面上比划，说：“未抓到痒处”

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评”。

朱德总司令当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何以如此记述？委员长为什么“受到错误的批评”？

让我们翻开历史中庐山会议那一页吧！

1959年庐山会议，是指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耸立于江西九江市南面，鄱阳湖畔，长江之滨。由于江湖水气郁结浮聚，四季云雾缥缈，“不识庐山真面目”，夏季凉爽宜人，庐山闻名中外，不仅因为庐山是奇景胜地，还由于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经常在庐山进行，从而使庐山的“面目”更加神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这是一次闻名中外的庐山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朱德的发言‘未抓到痒处’。”

毛泽东为什么批评朱德？

这次庐山会议原定是要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那一个时期，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越来越明显，农业生产开始急剧下降，城乡粮食供应严重匮乏，工业内部由于比例失调，原材料供应不足，严重影响正常生产，市场上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经过调查核实，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关于落实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意见。195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陈云提出的建议，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决定7月2日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1日，毛泽东在巡视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以后，登上了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庐山，一路上，毛泽东谈兴正浓，心情轻松自如。

彭德怀于6月29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国防部长彭德怀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角之一。

朱德同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及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也陆续上了庐山。

会议开始后，大家接到了一份《毛主席的书面发言》。这份书面发言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上庐山前的几次谈话整理而成的，一共讲了19个问题。与会人员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大组，座谈讨论毛泽东的书面发言。会议开得轻松、自由、畅快，毛泽东称之为“神仙会”。

7月6日，朱德参加中南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第7页。

《朱德传》第695页。

共和国第一帅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名卓越指导者，还像一位温厚善良纯朴的老农民。他认为，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农村搞公共食堂，从生产上说可能对，但从消费上说，吃了大亏。工人还发工资嘛。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食堂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有了钱就吃。原则上都应回到家庭中过日子。

朱德提出家庭制度要巩固。“农民欲富，要使他们富起来，不会成为宫农路线的。这关系到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多年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多紧，不能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朱德的发言，也是经过调查研究的，1958年，72岁高龄的朱德曾经3次离京赴外地视察。4月份，朱德到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视察。6月份，朱德到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视察。9月份，朱德离京到新疆、甘肃、山西等省、自治区视察。参加庐山会议前一个多月，朱德委员长还与董心武、林枫等人一起，离京到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视察。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德直言：“农轻重安排好，农民立家立业很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一些，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价值规律，商品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有了粮食，可以变成鸡、鸭、肉、蛋出口，换得我们需要的东西。各个省不要都去搞啥子工业体系，当然，发展工业的方向是要的。”

中南组会议室里的人们静静地听着朱德发言，是赞同？还是尊重？

会议期间，朱德还多次找有关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且看下面几组镜头：

农民该富还是该穷？

庐山地处江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既是会议的参加者，也是东道主。中央的会议在江西召开嘛！

刘俊秀总想尽力把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人照顾好。7月8日，刘俊秀见到朱德，询问朱德的健康情况，朱德却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

刘俊秀在思考。朱德接着说：现在有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大锅饭”该不该吃？

陶铸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朱德连续视察了11个省、自治区，还没有到广东。1959年7月9日，朱德同陶铸交谈。在凉风习习、清爽沁人的庐山上，两人谈得很多。下面是朱德讲的几段话：

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

《庐山·1959》第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版。

《庐山·1959》第47页。

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

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

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

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

农民的积极性从哪里来？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周小舟思想敏锐，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

7月11日，朱德在同周小舟谈话中讲到：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朱德还特别讲到：

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

就在7月13日这一天，参加西北组讨论的彭德怀吃完早饭就去找毛泽东，很不巧，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眠的毛泽东刚刚睡下。这几天，彭德怀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感到会议对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够，有些问题没有摆透。他本想找毛泽东当面谈一谈，现在只好继续参加西北组的讨论。

庐山的夏夜，凉风清爽沁人，令人心旷神怡。彭德怀伏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分甲乙两部分。在甲部分中，彭德怀肯定了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从未有过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成绩确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

在乙部分中，彭德怀陈述并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缺点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在信的最后一段，彭德怀提出：“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第二日早上，彭德怀要王承光参谋把这封信抄正，送给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仔细看了彭德怀写的这封信，觉得这封信的份量很重，思考3天以后，毛泽东提笔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

朱德是17日上午看到《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即彭德怀给毛泽东的那封信。

朱德还被告知要讨论这份“意见书”。毛泽东江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彭德怀在参加西北小组的讨论时诚恳他说，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有些

思想缺乏斟酌。彭德怀请求收回这封信。

毛泽东没有同意。

朱德注意到了上述情况。

朱德想起来了。昨天，他同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谈话。吴芝圃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他听后坦率他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

他还告诉吴芝圃：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

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

……现在，这些话仍在朱德耳边轰鸣。

7月23日，朱德接到通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

会场里静静的，朱德来到会场。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先后到了。

毛泽东到会时，表情异常严峻。他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会场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写的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且提出要对这封信进行批判。

大家很快明白了，毛泽东今天的讲话是针对彭德怀的。

彭德怀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毛泽东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突然，毛泽东讲到朱德，毛泽东说：“吃肉只能一口一口的吃，要一口吃个胖子不行。林彪一天吃一斤肉还下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非一朝一夕之功。”

朱德今天听到“朱毛不可分”的这种风趣话，心情非同寻常。

当毛泽东再次讲到朱德时，会场里又多了一种异常的气氛。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转过脸对朱德说：

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

朱德立刻意识到，毛泽东在批评他。他在小组讨论时，曾经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有关系”这样的话。现在看来，毛泽东对这一类话印象深刻。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对食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

《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1958年以来毛泽东多次在有关会议上提及，主要意图也许是告诫大家不要学宋玉，夸耀自己则完美无缺，攻击别人则抓其一点，不及其余。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九省二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时，曾经要周恩来看看此篇文章，今天，毛泽

东又借用这篇文章谈及办食堂问题。

朱德的心情很沉重。他同有关省委书记谈话时，多次讲到对食堂的看法。他更注意听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整整讲了一个上午，讲完就散会。

彭德怀先走出会场，在门口等毛泽东。毛泽东走过来时，彭德怀怀着一种委屈、痛苦、紧张、激愤的心情迎上去，说：主席，我的信是给你个人的，没有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没有说话，一直往前走。

彭德怀跟上去说：主席，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

毛泽东一声不吭地走了。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朱德的批评很注意分寸。

7月25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总司令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有积极的一面。

朱德还特别讲到了彭德怀的优良作风，朱德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总司令太了解彭德怀了。自从井冈山斗争以来，彭德怀一直是他的副手。在打败国内外敌人的艰苦斗争中，彭德怀与朱德并肩战斗，朱德了解彭德怀那种严肃正直、疾恶如仇、不讲通融，天王老子也敢骂的个性。有些时候，他们就像兄弟一样有一种自然的心气相通。

那是1952年，彭德怀从风烟滚滚的朝鲜战场回到北京，甲冑未解就走进清幽典雅的丰泽园，向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战况和讨论军事部署。当他走出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时，满面笑容地对等候在一旁的卫士说：“回去洗个澡吧！”卫士感到为难，因为没有带换洗的衣服，谁知朱德主动送来了一套换洗的衣服。

朱德喜欢到郊外走走，节假日常常爱和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去游清幽宁静的香山或者十三陵。彭德怀从朝鲜归国，常常被朱德拉着到野外去，彭德怀一叫就去。

车到野外，人们渐渐走散了，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常常在一起。

这干啥子嘛！朱德收住脚。

摆么！彭德怀也不走了。

两家的卫士一听，立刻架起行军床，摆好象棋，一边放一个马扎。这些东西都是出发前准备好的。

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

吃马！彭德怀突然吆喝一声，把自己的“车”狠狠地砸在朱德的红“马”上面，然后心满意足地把红“马”从“车”下面抠出来，微微一笑。

嘿嘿，吃炮！朱德拿起红“车”，把彭德怀的黑“炮”往旁边一推，像是“横扫”一切，稍后，才像打扫战场似的把黑“炮”抓在手里，看一眼，再叠到其余被“吃”掉的棋子上面，又对着棋盘思考起来。

现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朱德的心情很沉重，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党的

事业，也在思考彭德怀写那封信的前前后后。毛泽东 23 日的长篇讲话非同一般呀！

7 月 26 日，彭德怀对 14 日写给毛泽东的信的“错误”作了“检讨”。这以后，彭德怀就被各大组轮流叫去回答问题，接受批判。朱德在当天的分组会上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

也是在 7 月 26 日，毛泽东写下一段重要批语，认为信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

7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彭德怀问题作结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六开，不要全盘否定。

朱德表示同意。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表示同意。

毛泽东神情严肃，意味深长他说，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政治局委员们这才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7 月底，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位元帅林彪在这个非常时刻来到庐山上。林彪起初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 7 月 23 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以后上庐山的。这几年，林彪虽然怕风、怕光、怕水，有一种莫明其妙的病，但头脑的思维能力仍然健全。他虽然在毛家湾养病，但对党内政治气候的反应十分敏感。

八一，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每年的这一天，总司令都会回忆起南昌起义时的枪声，回忆起花园角 2 号同周恩来的那次密谈。今年“八一”，朱德要去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

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常委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彭德怀、贺龙、彭真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旁听。

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以后，朱德第一个发言。

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毛泽东抬起腿来，用手在自己的鞋面上比划了几下，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朱德脸上有一种燥热感，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总司令已经 73 岁了！

朱德的处境很困难。毛泽东不满意朱德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毛泽东认为，朱德在会议前期一味强调 1958 年以来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不满意朱德关于公共食堂的观点，毛泽东 7 月 23 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以后，认为朱德对彭德怀的袒护比较明显。朱德曾经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问题就好办了，这显然与毛泽东的看法相差甚远。几天前，毛泽东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到张闻天、李锐是“右派”时，对朱德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样式的人物，毛泽东话音刚落，平时说话不多的林彪抢着发言了，林彪上庐山晚，对这次会议的前后情况不甚了解，但他的政治敏感在告诉他，在这种关键时刻，毛泽东要他上庐山，是希望他保驾护航。

“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林彪说这话时，

《朱德传》第 695 页。

《庐山·1959》第 142 页。

显得不动声色。他思量了一下，又不紧不慢他说下去。

毛泽东的神情有了变化。他欣赏林彪的表现。林彪讲完后，毛泽东开始漫谈起来，谈井冈山，谈打南昌、打赣州……彭德怀插了一次话，但毛泽东的思路丝毫没有变。彭德怀再也没有辩解什么。

8月16日，这是庐山会议最后一天。中央委员们陆续来到会议室。朱德手中拿着两个文件，走进会议室。这一天的全体会议，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长达一个半月的庐山会议终于结束了。

苍山似海，夕阳如血。庐山的暮色依然是那样秀丽。

离开会议室，朱德在那条长长的石径上一步一步地走去，总司令迈步的节奏显然比往日慢了。

是73岁高龄的委员长感到疲倦了？

是在尽情饱览庐山美丽的暮景？

还是在消遣心中的苦闷……

朱德一行离开庐山以后，没有在途中停留，直接回到北京，参加8月1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出席会议的有全军选派的师以上党员干部1061人，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有508人。

彭德怀曾经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回忆了他参加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心情，其中写到。

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待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

……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特别积极。林彪知道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就别有用心地对朱德进行攻击。

9月11日，毛泽东到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毛泽东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这一天，林彪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说什么朱德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

听到林彪的这些无端攻击，朱德心里却很平静。

回到家里，朱德沉默不语。康克清走过来，为朱老总泡了一杯茶，默默地坐在一旁。

“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

一听这话，康克清突地抬起头，那诧异的目光仿佛在问：老总，什么事使你伤心啦？

“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朱德的话极有感情，像是默默自语，又像是向夫人诉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5天，国家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职务。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央军委领导人作了调整，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人为常委。

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彭德怀主动交出了元帅服和勋章，搬出了中南海，到北京西郊一个叫“挂甲屯”的地方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朱德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中共中央下发到县、团级以上的党组织。1959年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朱德元帅用更多的时间到外地和基层视察，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朱德委员长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1959年10月至11月，朱德视察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等30多个工业企业。

1960年，朱德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

1961年上半年，朱德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市视察。

1962年2月至6月，朱德再次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等省市视察。12月份，朱德又来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12个省、市、自治区视察。

1963年春夏，朱德视察陕西、四川、河南后，又于10月份到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等5个受水灾的省视察。1964年上半年，朱德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13个省、市、自治区。

1965年春，朱德再次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

1966年，80高龄的朱德在初春时节离京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

总司令脚步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1960年3月，朱德元帅一行在视察了陕西、贵州等省和四川省的重庆市以后，于9日同夫人康克清一起乘车从南充市出发，沿着群岭透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前往朱德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离别故乡已经五十多年了，朱德虽然到过四川7次，却一直没有时间看望故乡的父老乡亲。

朱德元帅和夫人康克清的汽车来到蓬安县和营山县时，两个县委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朱德一行，朱德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以后，特别叮嘱说，粮

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来到仪陇县新寺区，朱德又对区委有关人员说，你们要注意发展社办工作，还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

马鞍场距仪陇县 36 公里。朱德回到故乡时，已是晌午了。当朱德看到琳琅山下大湾屋后的两棵柏树时，凝神静思片刻，兴致勃勃地对随行人员说：少年时，我还在两棵树上捆着木棒，练“扛架”呢！现在，柏材都有合抱粗了。

琳琅山一带干旱缺水。朱德看到，他在房屋右侧挖的那口井现在还可以使用，朱德正想屋前屋后的看一看，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乡音。家乡的亲人听说朱委员长回到了马鞍场琳琅山下，都热情地围聚过来。

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交谈了一会，朱德用祖上传下来的客家话问堂兄弟。

堂兄弟眨巴眨巴眼，冲口而出：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

朱德的神情变了，他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连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药铺垭距大湾 1 公里，那里是朱德的启蒙私塾。朱德来到药铺垭时，看到他当年栽下的香樟树已经长得很高大了。站在香樟树下，元帅眼前又展现出了当年在私塾读书的情景，那是一种充满艰辛和乐趣的情景……

马鞍公社的党委书记对朱德说：委员长，我们根据你要求我们多种茶树的指示，这几年公社已经种了 300 亩茶树，还办起了一个茶厂。

朱德微微点头。他觉得这是件好事。

今年我们计划把茶园扩大到 1000 亩，我们还准备发动群众上山采山货。挖药材。

好嘛！朱德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们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那是指成都坝子一带。像我们这些山区，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要根据这里的情况，把山区的土特产都开发出来。

建国初期，仪陇县曾经计划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并向中共川北区党委写了报告。朱德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刻从北京打电话给有关人员，明确表示：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迁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于发展生产。由于到朱德故乡参观访问的中外宾客陆续不断，仪陇县有关人员只得把朱德父母居住过的几间瓦房修整好，作为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里面摆放着一些朱德少年时用过的劳动工具和学习用品，今天，朱德回到故乡，仪陇县委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热情邀请朱德参观在他旧居举办的陈列。

朱德看完以后，眉宇间有一种忧虑。他对仪陇县委的同志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你们看现在就改好不好？

这以后，朱德还多次叮嘱要把陈列馆办成学校。有一次。仪陇县委书记到北京，朱德当面问他：学校办起来没有？当朱德得知办了一个班时，又说：太少了，多办几个班嘛！县委书记向委员长解释：经常有人来参观访问，必须有几间房子陈列展品。朱德沉思良久，说：琳琅寨那个陈列馆，请保留我的意见。

3 月 11 日，朱德元帅和康克清等人离开故乡马鞍场，来到仪陇县城。

朱德同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语重心长他说：仪陇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有山货药材，要利用这里的优势嘛！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

可以种植果树，这些都很有生产潜力。你们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发展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这样做，不仅可以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也能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离开仪陇县前夕，朱德嘱咐有关人员：“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

带着家乡亲人的无限深情，朱德元帅离开四川。

4月2日，朱德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南方数省的情况。朱德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朱德还强调，“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到吉林省视察时，朱德住在省一号招待所。

一天傍晚，朱德和随行人员一起散步。那是一条宽敞的沙石路，朱德一边走一边和大家谈天。忽然，朱德站住了，他看见路旁草地上有一件东西。略一思索，朱德快步走了过去。

这不是铁吗？朱德拣起地上的半块锄板，前后看了看，又说：“这可是‘宝’啊！”

一名随行人员连忙走过去，接过朱德手中的锄板。

现在全国正在大炼钢铁，应该把这些废钢铁拣起来啊！朱德若有所思他说。

在视察中，朱德看到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和科研领域取得新成就，内心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朱德还常常题诗勉励大家。朱德委员长到浙江杭州视察时，曾多次题诗。

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会议闭幕那天，朱德高兴地在大会上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朱德在会议闭幕的第三天就到上海、浙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1月26日，朱德健步登上杭州狮子峰，视察杭州西湖的龙井茶生产区。在狮子峰上，当朱德俯瞰盘山条田和碧绿的茶树时，满怀喜悦他说，我国荒山很多，如果都能开发出来，种上茶树、柑桔、核桃、柿子，真正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这能创造多少财富啊！

看着看着，朱德即兴作了一首《看西湖茅区》的诗。

狮峰龙井产名茶，

生产小队一百家。

开辟斜坡四百亩，

年年收入有增加。

杭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又是世界著名的游览胜地。朱德元帅偏爱登高远望，在西湖风景区的碧山流泉中，七十多岁的朱德多次登上北高峰、

《朱德传》第 698 页。

《朱德传》第 699 页。

《朱德传》第 701 页。

南高峰。

北高峰海拔 355 米。从灵隐寺西侧的巢枸坞沿石磴盘旋而上，曲曲折折 36 弯。一路上山峦重迭，古松清流，使人享受到一种深邃的幽景。朱德攀登到北高峰山顶后，即兴写下了《登西湖北高峰》的著名诗一首。

南高峰山形奇特，峰峦峭拔，山上怪石嶙峋，岩壁峥嵘，山中洞泉传出潺潺的流水声。朱德登上南高峰后，欣喜不已，吟出了一首《登南高峰》的诗。诗曰。

登上南高峰，
钱塘在眼中。
回首西湖望，
江山锦绣同。 —

30 造反派“勒令”委员长去看大字报。元帅用拐杖敲打地面，愤愤他说：那张大字报只有“朱德”两个字是对的

朱德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叫朱琦，一个是女儿，叫朱敏。

1969年国庆节，朱德的儿媳赵力平从外地到北京来看望朱德。赵力平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流言很不理解，她问自己的公公：爸爸，过去我们学历史，讲的是毛主席和您在井冈山会师，现在有人说是林彪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这是怎么回事？朱德一听，脸色变得严峻起来。他忘不了中南海的造反派围在自己的家门口，高呼“打倒”、“炮轰”口号的情景……沉默了好一会儿，朱德颇为严肃他说，井冈山会师，那是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你们要相信毛主席，这件事情会弄明白的。

本书第8章详细记述了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的生动情景。四十多年以后，社会上为什么出现上述传闻呢？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时期。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1965年12月，朱德元帅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在上海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对于这次紧急会议的内容，朱德事先毫无所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不知道。

会议开始了。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彪“让贤”，显然，李作鹏和吴法宪是秉承了林彪的意旨。

朱德感到非常意外。

林彪曾经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不赞成林彪的这个提法，李作鹏、吴法宪就抓住这个问题对罗瑞卿进行批判。

朱德发言了。朱德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朱德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会发展了。

总司令没有想到，这次实事求是的发言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对他进行政治攻击的重要口实。

上海会议结束后，朱德到了杭州。在江西省搞“四清”的康克清得知朱德到了杭州，就急匆匆到杭州去看望他。吃饭时，康克清忽然发现朱德停住筷子，低头沉思，心里想，老总今天怎么啦？正纳闷，又看见朱德在摇头。

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康克清关切地问。

朱德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

康克清犹豫了一会，埋头吃饭。她知道，有些事情是不便多问的。

饭后，朱德把康克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你不要多问了。

康克清沉默不语。正起身要走，忽然听见朱德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

当时，康克清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朱德的秘书告诉她，朱老总忧心忡忡是因为罗瑞卿同志的“问题”。

正像朱德所担心的那样，罗瑞卿的“问题”越来越大。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

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罗瑞卿等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以及根据会上的所谓揭发材料整理的六个附件。

那几天，朱德在反复思考《五·一六通知》中的几段话。这个通知提出：“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朱德为党和国家的状况担心。

5月18日，林彪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朱德注意到林彪的发言很特别，林彪引证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历史，诬陷中央有人要搞政变，大念“政变经”，制造恐怖气氛，彭吹个人崇拜，称颂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朱德也在小组会上发言。朱德发言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朱德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说到这里，林彪突然把朱德的话打断了。

林彪说，在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朱德就不同意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并以此攻击朱德有野心，认为朱德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

林彪的话音刚落，康生又别有用心地攻击朱德，说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5月24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问题。其中罗瑞卿的所谓“错误”，一是抵制了林彪对领袖宣扬个人崇拜，被诬为“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二是抵制了林彪的“突出政治”，被诬为要“抢林彪的班，夺林彪的权”。

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会议结束后，“文化大革命”动乱迅猛发展，一些学生起来“造反”，产生了“红卫兵”。

为了扫除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阻力”，特别是来自中央内部的“阻力”，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激烈的词句未点名地指向了刘少奇，林彪开始时没有参加会议，到大连休养去了。当林彪得知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后，即于8月6日从大连返回北京参加会议。

8月8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提出：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林彪的言行对其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对

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被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朱德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和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再次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不久，中央又发出通知，决定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教职员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全国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大串连运动出现高潮。仅仅半年时间，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和生活遭到破坏。有人画出了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林彪默认了。

朱德率领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的伟大历史功绩被篡改了。

那个特定的年代呀！

造反派斗争康克清时，要康克清说在井冈山上是毛主席和林彪会师，康克清却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后的部队上井冈山的。

有一次，康克清和朱德等人一起来到江西南昌。在南昌起义纪念馆里，康克清看到了展出的那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她凝视了一会儿，故意问：会师时同主席握手的那个人是谁啊？

陪同参观的人看了康克清一眼，没有吭声。

康克清又问：那个人，是谁？

在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中，带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冲向社会，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掀起了“横扫”、“炮轰”、“打倒”、“砸烂”的狂潮。朱德元帅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会发展得如此快。

这一年，朱德已经是80高龄了。

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看到，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政领导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而受到批判，许多人的家也被抄了，这种批斗和抄家现象使社会陷入极度混乱，各个领域的生产和工作都受到影响。

一天，秘书推门进来送文件，朱德仰靠在沙发上，双目紧闭，似乎不知道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人。秘书走到跟前，递过来一叠文件时，朱德看了秘书一眼，缓缓他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

几十年戎马倥偬的朱德元帅对军队的状况尤为关心，因为军队院校也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指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同时还宣布取消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元帅在思考，军队院校也乱哄哄的，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朱德在会上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朱德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当时，全国的生产秩序已经被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打乱了。

12月15日，朱德元帅再一次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呼吁：现在有一个问

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谁知总司令的正当呼吁不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南海里传出了一阵“打倒”、“炮轰”朱德的口号，造反派的大字报、大标语一次次地贴到了朱德的家里。朱德总司令被称作“黑司令”，康克清也被打成了“走资派”，林彪等人多次阴谋策划，要开群众大会批判朱德，直至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三叉戟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以后，毛泽东又亲切地把朱德叫到身边，一遍又一遍地说，朱德“是红司令、红司令”。

发生这些事件，有复杂的社会背景。

1966年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社论，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宣告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

1月8日，毛泽东肯定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

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很快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整个局势越来越恶化。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忧心重重，寝食不安，朱德为中国的发展，为民族的兴旺而担忧。

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朱德再次呼吁：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朱德还深感痛心地说：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

朱德这番忧国忧民的话不仅没有使国家的生产情况出现好转，反而更被林彪、江青一伙视为眼中钉，林彪、江青一伙对朱德的迫害更加疯狂、更加公开化了。

1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江青的指使下，鼓动造反派在中南海里对朱德等人进行批斗。

中南海，在这片令大多数中国人仰慕和神往的地方，也响起了一阵“打倒”、“炮轰”的口号，朱德的住处也被造反派包围有一天，朱德外出了。康克清也外出了。

傍晚时分，康克清乘坐的轿车驶进中南海，忽然看见楼前围了許多人，心头“突”地一下，眼前闪出一个大问号。“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

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

让朱德到玉泉山去是周恩来的主意。

玉泉山位于京西，玉泉山洞壑迂回，流泉密布，晶莹如玉，风景如画，山泉、石洞、宝塔为玉泉山的“三绝”。当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攻击朱德元帅的大字报时，周恩来闻讯赶到朱德家，一面安慰朱老总要保重身体，一面劝朱老总到玉泉山去休息休息，玉泉山风景好，也比较平静。朱德听从了。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时，造反派也找上门来了。造反派“勒令”朱德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边看批判他的那张大字报，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地面，说：这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它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

一月底，正是北京寒冷的季节。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

一时间，祖国首都的大街上纷纷出现了攻击朱德元帅的大字报。大标语，红军总司令被诬蔑为“黑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也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

有一次，造反派批斗康克清，要康克清自己承认是“走资派”，还逼康克清交待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康克清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走资派”，我和朱总都没有反党，反毛主席。

回到家里，康克清已经很疲倦了。她望了一眼背靠在沙发上的朱德，自言自语地说：这倒好，你是“黑司令”，我也成了“走资派”。

朱德望一眼相伴多年的老战友，但然地说，历史是公正的。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

不一会儿，朱德又说：不要紧，定“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总不会这样下去的。他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朱德相信自己，也信任自己的战友周恩来。当恶浪突然袭来的时候，周恩来保护了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别有用心地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发 50 万份到全国各地。

造反派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周恩来得到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后，马上采取保护措施。在开会的前一天，周恩来要秘书通知戚本禹，“批判朱德大会”必须立即取消。

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及时地制止了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元帅不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进行了抵制，还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长者的风度劝慰其他受迫害的领导干部。且看朱德会见三位老干部的三件事。

“宴”请江渭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围攻时，周恩来想方设法把江渭清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江渭清到北京以后，得知朱德元帅也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和攻击，心中又增加了几分忧愁。他担心 80 高龄的朱德是否经得住造反派的责难。他很

想去看朱德，又担心有什么意外，就给朱德家里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康克清。当她听到被周恩来总理保护起来的江渭清想探望朱德时，很爽快地答应了朱德一见到江渭清，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问：渭清同志，身体还好吧！住处安全吗？

危难之际，听到总司令的问候，江渭清热泪盈眶，在喉咙里翻滚着的那些问候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今天你来了，好！我们随便谈谈心。朱德微笑着给江渭清让座。

在朱德面前，江渭清恨不能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下子倒出来。他讲述了江苏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后，说：总司令，毛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朱德沉默片刻，说，江苏省的情况，你要向毛主席反映。江渭清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毛主席反映了江苏的情况。

朱德听后颇为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江渭清的喉结蠕动了一下，像是十分干渴似的，但他没有去端面前的茶杯。

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

听到总司令这席话，江渭清眼前仿佛明亮了许多。总司令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了造反派的攻击，可是他却那样坦然……

两人又谈了好一阵子，朱德微笑着说：渭清同志，中午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江渭清心中有顾虑，半真半假地说：总司令，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呀？

朱德身子往后一仰，笑得很开心：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餐饭就会受牵连吗？

江渭清十分感激总司令的关心，但依然面有难色。他不想给朱德总司令添麻烦。

沉默了好一会儿，康克清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

江渭清再也不好推辞，就在朱德家里吃了一餐便饭。

书赠萧华萧华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是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歌同的作者。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得罪了林彪。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了7年半之久。萧华被毛泽东指名放出来以后，想到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被林彪、“四人帮”公然诬蔑为“黑司令”，并肆意歪曲朱总司令忠于革命、忠于军队的历史伟业，不由得义愤填膺，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望总司令。

萧华生动地回忆了他见到朱德时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数年不见，他明显地苍老了，皱纹也多了，脸上的寿斑也更明显了。然而，他戴着老花镜，仍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那么可亲，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一句连一句地询问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满肚子的话在嗓子眼里硬着，一句也说不上来。只有悲愤，只有热泪。”

其实，见到萧华时，朱德也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喜之情。元帅语重心长他说：萧华呀，你还年轻么，在部队，还可以工作几十年的。要振作精神呀，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

听了总司令一席话，萧华心里亮堂多了。但他对林彪一伙肆意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依然愤愤不平，他坦率地向总司令诉说心中的积愤……

朱德摘下老花镜，颇力严肃地说：“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哟，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不行的。长征时，李作鹏是个小机要员，邱会作呢？是个担担子的挑……后来官做大了，与我不来往了，见了我连理都不理了！他们的架子大得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说话间，朱德摇了摇头。

元帅的会客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心有灵犀呀！

不一会儿，朱德又勉励萧华：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些年，你被关着，外面有许多情况你都不了解了，所以要抓紧学习呀，多看些书，特别要多看些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朱德见萧华凝视着桌上那本书，转念一想，又问：萧华，你家里还有书吗？

我的家给那些人抄了3次，一掠而空，什么都抄完了，萧华言语间有一种愤怒。

朱德站起来，打开书橱，说：萧华同志，我这里有书，我送书给你。

萧华连声道谢，从书橱里选取了一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选集。

朱德一边点头一边说：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他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要好好地质学，它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列的武器。

“情”侯罗瑞卿 1976 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元帅都是那么宝贵。

初春，乍暖犹寒。

朱德拿起一张报纸，刚看了两行标题，电话铃响了。当得知是罗瑞卿大将来访时，元帅脸上漾起了一种少有的欣喜。

朱德站在会客厅前，仿佛看到了北京西郊公路上那辆风驰电掣的黑色轿车，仿佛看到了轿车里那位粗眉凤眼，身材高大魁伟的将军……

元帅已经有多年没有见到罗瑞卿大将了。自从审查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以后，陷害的浪头向罗瑞卿凶猛地袭去，他被伤了腿，被人看管着住院。手术后，由于“斗争的需要”，他被提前拆线，装进一只筐里抬到会场上示众，”从伤口渗出的鲜血一直从会场门口洒到主席台。“你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别想舒服”！他伤病未愈，就被赶出了医院。林彪一伙不仅不给他治愈伤口，还利用那条伤腿凌辱他，折磨他。当大将的左腿股骨骨折已近 500 个日日夜夜时，被做了终身致残的破坏性大手术，没有详细的手术方案，没有通知病人家属，连主刀的医生和护士也是临时更换的……这一切，朱德是事后才知道的。

元帅揉了揉眼，觉得那辆黑色轿车已经由长安街拐进了南北大道，眼前

不禁现出了罗瑞卿在波澜壮阔的大比武第一线的情景……

那是1964年夏天，齐鲁大地骄阳似火。罗瑞卿大将在济南军区比武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当毛泽东主席听了军事比武精采场面的汇报以后，立即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当贺龙元帅把毛泽东的批示转告罗瑞卿以后，罗瑞卿很快同贺龙、张宗逊一起商定了汇报方案。6月15日和16日，朱德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一起，来到练兵场，检阅军事训练，观看比武汇报。

元帅记得，那是我军训练史上辉煌的一页。

……黑色轿车平稳地在一幢灰色的楼房前停住了。

工作人员刚打开门，朱德元帅就看到了罗瑞卿那张轮廓分明的脸，那挺直的鼻子和抿任的嘴。

元帅正要迎过去，将军已经手扶拐杖，跨上了台阶，径直朝总司令的客厅走来。将军的一条腿留在手术台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康克清也在一旁等候好久了。她担心罗瑞卿坐低了不舒服，特地搬来了一把靠背扶手软椅。

总司令！当元帅与将军四目相对时，罗瑞卿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甩掉双拐，一下子扑到老首长面前。

朱德的眼里泪花闪烁，嘴角动了动，想说，却没有说出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呀！

“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1967年春，朱德应该看到的文件突然被停发了，保健医生也被调离了，委员长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其起因是所谓“二月逆流”。

何为“二月逆流”？那是“四帅”“三老”为了国家利益所表现出来的气势磅礴的“正气篇”。

二月初，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会议，研究和处理“文化大革命”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当时称之为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也吸收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这类会议每两三天召开一次。

2月16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共和国元帅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先后来到怀仁堂，后来称这7位领导人为“四帅”、“三老”。很有意思，每当周恩来总理往会议桌的头上一坐，“四帅”“三老”很自然地坐在一边，对面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这真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怀仁堂，这个在被八国联军烧毁的仪銮殿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专用会场，曾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的召开地，今天却成了“四帅”“三老”同康生一伙尖锐斗争的战场了。在碰头会初中央军委会议上，“四帅”“三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谢富治一伙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乱全国的胡作非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会上，张春桥一伙理屈词穷。当天晚上，张春桥却和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第二天，谭震林写了一封反击江青等人的信给林彪，表明对江青等人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丑化党的行为忍无可忍。林彪把信转送毛泽东阅。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不久又以“二月逆流”的罪名错误地批判了“四帅”“三老”。

朱德没有参加在怀仁堂和京西宾馆召开的那几次会议，但是，当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中央政治局以后，朱德也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那个时期，许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一些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也遭到抢劫，违法事件屡屡发生，整个社会处于大动乱之中。朱德得知有的地方搞武斗搞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被迫参加了武斗时，心情很沉痛。元帅默默自语：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于盾，怎么行呢？

元帅要去找毛泽东，他要向毛泽东诉说自己的想法。几经联系，答复是明确的：主席很忙，没有时间。

元帅要去找周恩来，他甚至没有同总理办公室联系就坚持让工作人员陪他去了。可是，当他来到周恩来的门前，他又犹豫了。他想到，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

元帅注意到，在那个艰难的岁月，有的人不敢接近他了，个别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他的家庭也受到牵连。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批斗，孩子们被禁止进入中南海。

有一次，儿媳赵力平到北京来看望朱德和康克清，康克清只能把儿媳接到前门外的一家餐馆里去吃饭。因为儿女们没有权利进父母的家了。

历史进入 1968 年，林彪、江青一伙对朱德元帅的迫害在继续，朱德同他们的尖锐斗争也在继续。

7 月，康生在送给江青的一份有关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中，把朱德、陈云等 29 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十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四百多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十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

当有的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正气凛然，他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朱德还责问他们：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师，是否真正反毛主席？

吴法宪一听，立刻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

张春桥打断朱德的发言，攻击朱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谢富治在小组会上别有用心地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谢富治还把朱德同中央其它领导联系起来，说“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

更有甚者，他们还不惜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诱逼中国科学院的一名实习研究员诬供朱德、叶剑英、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几十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朱德是“伪中央书记”，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

历史岂能容忍荒诞离奇的供词！

由于毛泽东表态，在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

《朱德传》第 729 页。

《朱德传》第 729 页。

治局委员。

1969年3月,苏联军队两次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在边疆苏军压境、国内局势混乱的严重时刻,朱德元帅虽然蒙冤受屈,但对苏军侵犯边境的事件极为关注,元帅以他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对国际形势和战争的危险进行了全面研究。然而在那个非常时期,林彪却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所谓“第一个号令”,进行图谋篡党夺权的预演,朱德也莫名其妙地“疏散”到广东从化。

其实,林彪也知道大仗一时打不起来,但他心里却另有一番打算。国庆节前夕,林彪“转车”回来,急急忙忙把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召到毛家湾,说:今天主要是讲战备问题。珍宝岛这一阵风过去了,看来这个仗八成是打不起来的,但我们要作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林彪扫了一眼面前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怪声怪气地说:明天就是国庆节,说不定在人们欢庆节日的时候,战争就打响了。苏联的空军基地距北京那么近,苏军的飞机只要90分钟就能飞到北京上空,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就够了。我刚才到西郊机场去转圈,看到我们的飞机都整整齐齐地停在跑道上,这怎么行呢?

林彪这番话,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人脸色大变。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序曲,9月17日下午,林彪即以“第一个战斗号令”的形式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其中讲到: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主要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

10月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紧急传达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外军得到这一情报后,中苏边境地区的苏军立即取消了休假,开始频繁组织演习。驻太平洋的美军第七舰队进入了一级战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岛上的蒋军也开始进行紧急动员。一时间,战云密布。

朱德元帅得知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时,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朱德凝视窗外,很自信地说,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

“第一个号令”下达以后,共和国的六位元帅被疏散到外地。叶剑英元帅抱病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受尽折磨。徐向前元帅带着一名随员和铺盖“疏散”到开封,安置在开封市革委会的一个干休所里,内定的接待原则是“不冷不热,偏重于冷”。陈毅元帅到了石家庄。刘伯承元帅到汉口。聂荣臻元帅到邯郸。朱德元帅的“疏散”地点是广州从化,那时候,彭德怀元帅和贺龙元帅被关押在监狱里。

10月20日中午,两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平稳地降落了。朱德元帅被人搀扶着,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等人及家属先后走下舷梯。

广州白云机场,朱德元帅到过许多次了。以前,朱德下飞机时总有那么多亲切的寒暄,热情的问候。今天,白云机场上没有微笑,没有拥挤的人群,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冷冰冰地伸出一只手……

连续三十多小时的飞行,使83岁高龄的朱德感到相当疲劳了。朱德很想休息,但他却得不到休息。一个人站在元帅面前,毫无表情地说:等着吧,你的驻地还没有收拾呢!

元帅静静地候在候机室里等待,等待……

原来的安排是让朱德住在广州的珠岛宾馆。后来又改变了，有人认为朱德元帅不能在广州，要让他到从化去“疗养”。

从化，离广州不远，那里有闻名中外的温泉，那里是气候宜人、环境幽静的疗养胜地。从化温泉四面山峦重迭，流溪河蜿蜒曲折，碧浪桥横跨河的两岸，各具特色的楼房、小亭、曲廊参差错落在翠绿丛中，显得格外雅致。这里的十多处温泉温度最高为70℃，最低的也是30℃。泉水比一般水轻软，内含钙、镁、钾、钠、二氧化硅等矿物质，无色无味，对关节炎、神经衰弱、慢性肠胃炎等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如果真能让朱德元帅在从化自由自在地疗养，元帅的身体会恢复得更好。然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疗养”呢？

朱德想散散步，有人说：不准超过桥头的警戒线。

朱德想找个服务员来帮助念念报纸，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呀！有人又说：他自己不会看？

朱德想到附近的工厂、农村搞点调查研究，有人说，不行，离开宾馆还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哪能去工厂？去农村？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多次在会上说：朱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中国又发生了一起世人举目的事件。林彪判断他的阴谋已经败露，与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256号专机仓皇出逃，叛国投敌，二时半，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摔死。史称“九一三事件”。

林彪集团的反党阴谋失败以后，朱德的心情舒畅多了。有一天，朱德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兴奋地对军委直属组的同志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

在中共十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元帅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12月21日，朱德元帅应邀参加在毛泽东的住所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当朱德走进会议室时，毛泽东一下子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毛泽东动了动身子，想站起来迎接。

当朱德健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拍了拍身旁的沙发，请朱德元帅挨自己坐下。今天，毛泽东很动情，他问候朱德：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

我很好，朱德元帅很高兴地回答。

两句话，一下子把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毛泽东和朱德身上。

毛泽东拿起一支雪前，吸了一口，环顾四周，又对朱德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

毛泽东看到朱德元帅慈祥的面容，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这句话，毛泽东不止说一次了。今天听起来，朱德感到特别亲切。

红司令，红司令。毛泽东连说四个“红司令”。那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孕育的特有情感。

31 龙年灾月，神州万众哭朱帅，留给垂危 中的毛泽东一个大疑团

公元 1976 年，是龙年。华夏大地祸不单行，大难不止。中国人民洒落了太多太多的眼泪。

7 月，不知犯了龙年哪一条禁忌，竟然是个“灾月”。

7 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头留下了一个疑团：朱老总得的什么病？

那一刻，毛泽东已经生命垂危了。

朱德得了什么病？

1976 年初，一个异常严峻的时期。朱德元帅的身心受到重大打击，同他有半个多世纪的深情厚谊的周恩来总理逝世。

年前，朱德一度住院治疗，组织上没有把周恩来总理病重的消息告诉朱德。过了元旦，朱德自我感觉稍好，就要求出院了。1 月 8 日，天上一颗巨星悄然隐去。无线电波伴着凛冽的寒风传出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和哀乐。就在这个时候，家人也没有把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告诉朱德，怕他受打击太大，这天下午，委员长要去接见外宾，去接受国书。

巨星陨落，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呜咽和哀乐中震颤！吃了晚饭，康克清以一种沉痛的心情对朱德说：老总，总理的病情最近恶化了。康克清依然说病情恶化，也不说恶化到不治。

朱德愕然。他心里想，有那么多好大夫给总理治病，总理的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吧？！

当朱德得知周恩来总理已经病逝时，老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朱德元帅绝少掉泪。1974 年，儿子朱琦突然去世，朱德都没有掉一滴眼泪。这一刻，元帅太悲痛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朱德元帅同周恩来一起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1922 年，他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朱德曾多次到医院看望。

1975 年 7 月 11 日，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让卫士打电话给他：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前几天，他曾经去看总理，因为总理当时身体不太好，没有请他去。周恩来心极细，不愿让年近 90 岁的朱德元帅看到他的病态。当周恩来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时，热情地向朱德发出邀请。

下午 5 时 50 分，当他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他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远远地迎过来。

你还好吗？他紧紧握住恩来的手，声音有些颤抖。

还好，咱们坐下谈吧！

他的动作有些迟缓，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周恩来关切地问：朱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

这个可以。

那天，朱德同恩来交谈了近半个小时。周恩来知道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他又患有糖尿病，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6 时 15 分，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了。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时，周恩来一直目送汽车远去。朱德万万想不到，这次竟是他同恩来之间的最后相见。

朱德的眼前忽然浮现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时的情景，那是 1975 年 1 月 13 日，他主持了开幕式以后，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那时候，恩来已经癌症缠身，身体十分虚弱……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周恩来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

朱德听后沉默良久，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

1 月 11 日，朱德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一路上，朱德都在掉泪，他在车上就要脱帽子了。

在一片哀乐声中，朱德庄严地向周恩来总理举手致敬！朱德望着周恩来的遗容，想起这位比自己年轻 12 岁的领导人竟早走一步，心情更加沉痛。

从北京医院回来，朱德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询朱德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时，朱德坚持要参加全过程。

开追悼会那天，朱德都准备好要出席的，谁知在出发之前，朱德的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已经 90 高龄了，周恩来逝世，他过分悲痛，身体也受到影响。

春暖花开，朱德的身体稍好，又开始为国务活动而忙碌了。一年多来，他承担了大量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1975 年，他再次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几天，他又写下了“革命到底”的条幅。以前，他也多次写过这一条幅。每写一次，都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

6 月 21 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

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里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下去了呢？

朱德吃了药，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当朱德踏进人民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会见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燥热得炙人。由于不知道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何时来到，朱德委员长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等候。

人民大会堂，这座宏伟壮观、风格独特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和人大常委会办公的地方，也是党和国家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朱德委员长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足迹。

……不知不觉，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

迎宾厅的气氛变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的车队缓缓驶

近人民大会堂……

朱德回到家里，就感到浑身不舒服。90 高龄的委员长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呆了近一个小时。

经过诊断，朱德患了感冒。

6 月 25 日，朱德的病情加重，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7 月初，多种病症在朱德身上出现了。元帅的病越来越重。

在病榻上，朱德看到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许多老战友熟悉的面孔，听到叶剑英元帅几乎每天都要他女儿打电话来询问时，心情颇为激动。战友之情，难忘呀！有一天，他对前来看望的李先念副总理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不知是谁，把一盆兰花悄悄地摆放在朱德的病房里。当朱德看到兰花时，有一种少有的满足。朱德元帅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嗜好是种兰花。他总结了一套种兰花的理论，认为兰花是一种很娇贵的花卉，既怕烈日，又怕强光，水、肥、土都要恰到好处，多了少了都不行，所以有“春不入，夏不出，秋不干，冬不湿”的四大戒律。他还喜欢把兰花和其它花种摆在一起欣赏。有一次，他坐在一条石凳上，把几十盆不同品种的兰花分散摆放在桂花树的周围，时而仰视金桂的挺拔、凝重，时而俯看幽兰的潇洒、飘逸，恬静安适，怡然自得。现在，他又开始观赏病房里的兰花……

一缕玫瑰色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间射进来，带来了大自然那种强烈的生存、复苏的气息。朱德眼前仿佛展现出了南昌起义时的激烈场面，想起了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去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苏联和蒙古进行友好访问……那是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以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7 月 5 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当他看见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人站在病床前时，想和他们握手。他用尽了力气，但那只手终于没有抬起来。

7 月 6 日下午 3 时 1 分，朱德的心脏停止跳动。

这时候，共和国的另一位伟人毛泽东也刚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病榻上的毛泽东听到华国锋向他报告朱德逝世的消息时，用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向朱德的遗体告别那一天，元帅躺在鲜花翠绿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他那种坚定的声音去指挥千军万马……

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臂缠黑纱、胸戴白花的悲痛的人群。朱德元帅的灵车徐徐开来。灵车四周，饰有用黄、黑两色绸带扎着的花球，垂着长长的丝穗。丝穗随着灵车的行进和哀乐的节拍而飘动，把人们的心都搅碎了，多少人抹泪，多少人抽泣，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

朱德元帅逝世，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哀悼，高度评价朱德元帅是：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
10年以后，胡耀邦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朱德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朱德元帅的一生。胡耀邦说：

“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它将传诵千古。对新一代年轻的领导者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17年以后，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举行的《朱德传》出版发行暨纪念朱德诞辰107周年座谈会上，心情十分激动地说：

“朱德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们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和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中，朱德同志的名字是不朽的，他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德同志是一个慈祥、淳朴、敦厚的长者，同时又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得来不易的。它经历过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曲折。但是，愈是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愈是在极端艰难的时刻，朱德同志就愈是充分显示出他那无所畏惧、沉着果断的大智大勇。他从不因困难而气馁，更不因挫折而灰“朱德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他为中华民族战胜外敌入侵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但是，他从不居功，永远那样谦虚谨慎，把一切功劳归于群众，归于党。……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这种高尚的人格和革命作风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朱德传》第740页。

《朱德传》第741页。

后 记

写完本书最后一段文字时，1994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然而，作者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向读者提供最新、最好的精神产品，是作者的神圣职责。怎样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好的成品呢？我们为之探索，为之苦恼。完成这部书稿时，又庆幸找到了一种力量的基点：人民军队朱德总司令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赋予我们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的强大力量……

朱德，中国第一帅。

我们经常自问：能写好《中国元帅朱德》吗；

我们掩卷思考：写好了《中国元帅朱德》吗，内疚、惭愧，深深地刺激着我们。面对朱德无帅辉煌的一生，作者的研究功力大薄弱了。五载辛苦，四易此稿，仍难以弥补笨拙的笔。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为祖国为人民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太感动人了。总司令是一面旗帜，一面鼓舞年轻一代、鼓舞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光辉旗帜。正像江泽民主席所说：“在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中，朱德的名字是不朽的。”

本书仅仅摘取了朱德元帅辉煌业绩中的某些片断，选取了总司令丰功伟绩中的几个闪光点。它不仅仅展现出中国第一帅的伟

大，更是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击的力量源泉。

我们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朱德传》编写组的专家，他们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并且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感谢国家新闻出版署，及时审查批准出版该书。我们还要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和各界朋友的鼓励、支持、帮助。

编著本书是向广大专家、学者学习的好机会。在研读朱德原著和一些经典著作时，还参考了相关文献，资料。书中引述之处注明出处，并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照片选自《解放军报》、《伟大的道路》、《朱德传》等。在此敬向提供文献、资料、照片的专家、学者、朋友深表谢意。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壮北以及诸石、启空、论威、毛志艺、龚新智、薄胜、许安、郑福高等人。

初稿完成前夕，喜逢金冲及主编的《朱德传》出版发行，为我们研究朱德提供了翔实、准确的史料。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功底所限，掌握资料不足，书中了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方专家和朋友们指正。

作 者

1995年

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

- 《朱德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3年8月
《朱德年谱》 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3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年5月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66年7月
《毛泽东军事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年12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朱德传》 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传》(1898—1949) 人民出版社 1989年2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4月
《刘伯承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年11月
《陈毅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8月
《贺龙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8月
《徐向前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11月
《罗荣桓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12月
《叶剑英传略》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年1月
《聂荣臻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3月
《伟大的道路》[美]艾格妮丝·史沫 三联书店 1979年4月特莱
- 著
-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 三联书店 1979年12月
《续西行漫记》尼姆·威尔斯著 三联书店 1991年3月
《朱德风范词典》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1年5月
《领袖·元帅·战友》薄一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11
- 月
-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12月
《历史的回顾》徐向前 解放军出版社 1985年10月
《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战华北》杨成武 人民出版社 1986年10月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人民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年7
- 月
- 解放军军事人物分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靳德行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年7月
《将帅录》陈涛周林宝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7月
《庐山·1959》彭程 王芳著 解放军出版社 1989年7月
《八大元帅受衔中南海》刘丽丽 《中华儿女》 1993年第4期董
- 保存
-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5年7月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6月
《朱毛红军侧记》肖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1月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 1986年3月教
- 研室编

- 月 《红色女战士——康克清》[美]尼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2月
- 姆·韦尔斯
- 《朱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7月
- 月 《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王健英 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10月
- 《我的历程》伍修权 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7月
- 《我的回忆》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 1991年12月
- 《中国国民党史》肖效钦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9年6月
- 《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张宏志著 军事学院出版社 1985年9月
-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张宏志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 《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张宏志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 《星火燎原》 战士出版社 1981年12月
- 《我们的总司令》罗瑞卿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11月
- 《朱德总司令与国防现代化》张爱萍 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5月
- 《我眼中的朱德》郭思敏 天羽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
- 月 《叶剑英在1976》范硕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年10月
- 《开国大阅兵》林玉华 《解放军报》 1993年9月30日

